

原 序

这本著作是作为国民經濟学的通俗入門书而写的。我在許久以前就准备出版本书，但因为党校的教学工作及革命运动工作的耽擱，未能如期完成。今年一月国会选举之后，我打算再着手把馬克思的經濟学通俗化，至少可以将原理那部分完成；但是，当时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困难。显然，想在具体的事情下，說明資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以及分析它的客观历史限界，我感到没有什么把握。等到进行了精密的考察之后，我就抱着这样一种见解：即此处不仅存在着說明的問題，而且还存在着理論上牵涉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的內容，以及有关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它的經濟根源的問題。倘若我能够成功地把这些問題給以科学的正确的处理，那么，这本著述将不仅具有純理論上的兴趣，而且在我們对帝国主义进行实际斗争中，也将具有一些意义吧！

1912年1月

露莎·盧森堡

目 次

原 序

第一編 再生产問題

第 一 章	我們研究的目的·····	1
第 二 章	魁奈和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15
第 三 章	对于亚当·斯密分析的批判·····	28
第 四 章	馬克思的簡單再生产图式·····	39
第 五 章	貨幣的流通·····	54
第 六 章	扩大再生产·····	66
第 七 章	对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	77
第 八 章	馬克思对解决这个困难的嘗試·····	93
第 九 章	从流通过程角度看这个困难·····	109

第二編 本問題的历史发展

第一回論戰 西斯蒙第—馬爾薩斯對薩伊— 里嘉圖—麥克洛克

第 十 章	西斯蒙第的再生产論·····	124
第 十 一 章	麥克洛克对西斯蒙第·····	140
第 十 二 章	里嘉图对西斯蒙第·····	151
第 十 三 章	薩伊对西斯蒙第·····	158
第 十 四 章	馬爾薩斯·····	165

第二回論戰 洛貝爾圖對吉爾希曼

第 十 五 章	吉爾希曼的再生产理論·····	171
第 十 六 章	洛貝爾圖对古典学派的批判·····	180

第十七章	洛貝爾圖對再生產的分析·····	192
------	------------------	-----

第三回論戰 司徒盧威—布爾加科夫—圖岡·巴拉諾夫斯基對伏隆左夫—尼古拉·昂

第十八章	問題的新提法·····	208
第十九章	伏隆左夫及其“過剩”論·····	212
第二十章	尼古拉·昂·····	219
第二十一章	司徒盧威的“第三者”和“世界三大帝國”···	226
第二十二章	布爾加科夫及其對馬克思分析的補充·····	231
第二十三章	圖岡·巴拉諾夫斯基及其“不平衡”論·····	242
第二十四章	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的終結·····	254

第三編 積累的历史諸條件

第二十五章	擴大再生產圖式的矛盾·····	257
第二十六章	資本的再生產及其社會環境·····	273
第二十七章	對自然經濟的鬥爭·····	290
第二十八章	商品經濟的侵入·····	306
第二十九章	對農民經濟的鬥爭·····	313
第三十章	國際借款·····	334
第三十一章	保護關稅與積累·····	359
第三十二章	作為資本積累領域的軍國主義·····	365
譯後記	·····	377

第一編 再生产問題

第一章 我們研究的目的

卡尔·馬克思曾促使我們注意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問題，他在这一点上对經濟理論作出了一个不朽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學說史中，对这个問題作确切闡述的嘗試的，我們只见到两次：一为重农学派之父魁奈的嘗試，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开始；二为馬克思的嘗試，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最后阶段。不久，这个问题經常出现于資產階級經濟學中。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从未把这个問題和与此相关的和交織起来的次要問題划分开来，而充分領会到純粹从它本身看的各个方面。他們从未确切地把这个问题表述出来，更不必說解决它了。但这个问题既然是一个极重要的問題，他們的嘗試毕竟能幫助我們对經濟科学的发展趋向得到一些了解。

精确地說，什么是总資本的再生产問題呢？从字面上講，“再生产”是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初看起来，很难觉察再生产的观念在那些方面与我們所都能懂得的重复观念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陌生的新術語呢？在我們所要考察的这—种重复里，在生产过程的不断反复进行中，存在着若干特点：第一、再生产的經常性重复是經常性消費的一般先决条件，而經常性消費又是不論在那—种历史形态下的人类文明的前提。从这样来看，再生产的概念反映着人类文明历史的一个方面。除非若干先决条件如工具、原料和劳动已經在前—生产周期中建立起来，生产是不可能反复进行的，也就是說，再生产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人类文明

的原始阶段，在人类控制自然的初期，这种重新从事生产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地依靠机会。只要打猎和捕鱼是社会生存的主要基础，频繁的飢荒阻断了生产的經常性的重复。有些原始人民很早就認識到为了使再生产成为經常的、反复进行的过程，采取若干措施是必要的；他們把这些措施結合在宗教性的礼仪中，在这样方式下，他們就把这些措施接受下来，当作传统的社会义务。所以，正如斯宾塞和吉倫的詳尽調查告訴我們的，澳洲黑人的图腾崇拜基本上不是別的，而是社会集团为了获取和保存动、植物食物而采取的一些办法罢了。从远古时期年复一年地实行这些預防办法，久而久之，它們就僵化为宗教礼仪了。但只有随着耘耕的发明，家畜的馴养，和以消費为目的的畜牧业的发展，构成再生产要素的消費和生产的循环才有可能。就再生产应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对自然的控制为条件，或用經濟术语來說，以一定标准的劳动生产率为条件而論，它的含义不止于简单的重复。

在另一方面，在一切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生产过程是以两个不同的、而又密切联系的因素——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持續为基础，是以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間的确切关系为基础。再生产在同样程度上依赖于这两項条件。我們刚才看到再生产是如何与人类劳动技术条件相結合的，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它是单纯地由于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結果；但在每种情形下，当时流行的社会生产形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并不較小。在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公社中，再生产以及全部經濟生活計劃是由全体劳动群众和他們的民主机构来决定的。关于重复使用劳动的决定——劳动的組織——作为劳动的主要前提的原料、工具和人力的供应——再生产的安排，和再生产规模的确定，都是計劃合作的結果，在这計劃合作中，本公社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参加的。在以奴隶劳动或徭役为基础的經濟制度下，再生产是通过人对人的統治关系来实行和周密地加以調节的。这里，再生产的规模是决定于占統治地位的上层分子所保有的对多寡不等的其他阶层的劳动的处置权力。在以

資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会中，只要对某些显著现象約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再生产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态。在历史上所能看到的其他社会中，只要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即当时存在的生产資料和劳动力，使再生产有可能，再生产就将連續不断地反复进行着。一般地說，只有外部条件，如兵灾或疫癘，才造成再生产的間断或为时长短不等的很大程度的縮减，因为这些兵灾或疫癘夺去了广大文化区域的人口，从而毀灭了大量劳动力和过去所积存的生产資料。生产計划的专横組織有时也会造成同样的結果。在古代埃及，在法老的意旨下，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奴役了几十年，从事金字塔的建築；在近代埃及，伊斯美帕夏强征了二万农民修建苏伊士运河；或者在紀元前二百年，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国北部边疆的长城，听任四十万人民以飢餓和辛劳致死，因而牺牲了整个一代的人民。这些事情发生的結果，总是大量耕地的荒蕪，有規則的經濟生活受到长时期的阻断。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再生产被阻断的原因显然是由于当政者对再生产計划做了片面性的决定所致。

按照資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会表现了另外一种的景象。我們看到在某些时期，再生产的一切原素，劳动和生产資料，是具备的，但社会对消費品的若干基本需要沒有得到滿足。我們又看到尽管具备这些資源，再生产可能一部分完全停頓，而一部分縮减了。这里，对生产过程造成困难的，并不是由于对經濟計划的专横干涉。这里，与一切技术条件无关，再生产純粹地依賴于社会性的考虑：只有那些預期确实能够出售——不仅能够出售，而且能够获得习惯的利潤——的貨物才被生产出来。因此，利潤成为目的本身，成为不仅规定生产，而且规定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利潤在每种情形下不仅决定从事那些工作，这些工作如何进行，以及产品如何分配，而且还决定在这一劳动周期結束时，劳动过程是否将重新进行，如果重新进行，它进行到什么程度并向什么方向进行^①。

^① “如生产采取資本主义的形态，再生产也同样会采取資本主义的形态”（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707頁）。

由于这些純粹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資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总的說来，形成一个特殊的和十分复杂的問題。我們將要看到清楚地显示資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所特有的历史特点的一个外部标志。这个过程不仅包括生产，而且还包括流通(交换过程)，并把这两要素联合起来。資本主义生产主要是沒有計劃控制的无数私人生产者所进行的生产。在这些生产者之間唯一的社會联系是交换行为。在計算社会需要时，除了前一劳动周期的經驗外，再生产的进行沒有其他綫索可資依据。但这些經驗又是个人生产者的私人經驗，它們沒有結合成为一个全面的、社会的形式。而且这些經驗又不是經常正面地、直接地指向社会的需要。它們对社会需要的关系往往是間接的、反面的，因为只有以价格波动为依据，它們才能表明所生产的商品总額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显得不敷呢，还是超过了它。但个体私人生产者在重新进入再生产时，重复地利用前一劳动周期的經驗，結果是生产过剩或缺貨必然在下一周期中，重复出现了。各生产部門可能独立地发展起来，因此，某一部門可能发生过剩，而另一部門可能发生不足现象。但几乎所有生产部門在技术上既然是互相依賴的，某些較大生产部門的过剩或不足，会造成大多数其他部門发生同样的现象。因此，各种生产物的总供給量，与社会的需求相比較，可能会周期地交替于不足和过剩之間。

这就是資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的特色，它是与我們所已知的其他生产形态不同的。第一、各个生产部門在某种限度內这样地独立发展起来，以致造成为时久暫不等的周期性的生产停頓。第二、各个生产部門都与社会需要发生背离，因而形成了全面的脫节，使再生产陷于总停頓。資本主义再生产的这些征象是十分特殊的。在所有其他的經濟制度下，除了外界的暴力扰乱外，再生产是循着不間断的、有規則的途径进行的。而資本主义再生产，如果引用西斯蒙第的名言，可以拿一連串的螺旋圈来代表。每一个螺旋圈从小环开始，逐渐扩大，最后达到极大的頂点，然后发生紧縮，于是另一

新的螺旋圈复从小环开始,重复上次形象,直至达到阻断点为止。这种周期性的从再生产最大规模到它的縮减至于部分停頓之間的波动,这种所謂萧条、高涨和危机的循环,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显著的特点。

但极其重要的,是在开始时就必须确认这个高涨、萧条和危机的循环运动不是代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全部問題,尽管它是本問題的主要成分。周期性的循环和危机是资本主义經濟制度下再生产的特殊阶段,但不是这个过程的全部。为了論証純粹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含义,我們毋宁要撇开周期性循环和危机而加以考察。这虽然显得奇怪,但这个方法是十分合理的;它实在是唯一的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了論証和解决純价值問題,我們必須撇开价格波动不談。庸俗經濟学的方法总是想用供求波动来解决价值問題。古典經濟学者,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馬克思,用相反的方法研究这个問題,他們指出供求相互关系的波动只能說明价格 and 价值的差异,而不能說明价值本身。为了找出商品的价值,我們必須以假設供求是在平衡状态中,而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又彼此密切相符为出发点。这样,科学的价值問題刚好是在供求影响停止发生的那一点上开始的。

由于周期性的循环和危机的結果,资本主义再生产往往环繞社会上总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而波动,有时超过这个水平,有时降落在这个水平之下,甚至再生产間或縮减至几乎全部停頓。但如果我們考察一个較长的时期,包括繁荣和肖条,高涨和下降的交替阶段的整个循环,也就是我們就再生产的最高和最低量,包括停頓阶段在內,而进行考察,那么,我們可以用高涨来抵銷跌落,而得出一个平均数,即整个循环中的再生产平均量。这个平均数不仅是理論上的想象物,而且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尽管在循环的进程中发生剧烈的上升和下降,尽管有危机出现,社会的需要总是或多或少地得到滿足,再生产繼續循着复杂的途径进行,而生产能力也向前有所发展。为什么撇开循环和危机不談后,这种情况会发生

呢？这里就是真正问题的开始。企图利用危机的周期性特点来解决再生产问题，正如企图利用供求波动来解决价值问题一样，基本上是庸俗经济学的一种手法。尽管如此，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将要看到，当经济理论挨着再生产问题的边缘时，当它开始对这个问题作推测时，它表现了一种执拗地把再生产问题突然转化为危机问题的倾向，因而阻隔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我们在下面论述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我们总是指生产率的平均量而言，这个平均量是一个循环中各阶段的平均数。

全部资本主义再生产是由无穷的、数量上不断变动的、私人生产者创造出来的。他们相互独立地进行生产；除了注意价格波动外，没有社会的管理——个人生产者间除了商品交换外，没有任何社会联系。于是问题发生了：这些无数的、不相关联的动作如何造成现实的全部生产？这个问题的一般面貌确实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要是我们这样提问题，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私人生产者不单纯是商品生产者，而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者；同时，社会的全部生产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的，同样地也不单纯是商品生产，而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

从这个事实出发，让我们再来考察我们的问题。一个生产者，如果不仅生产商品，而且还生产资本，那么，他必须以创造剩余价值为首要之事。资本家生产者的最终目的，他的主要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从他所制造的商品的收入中，不仅必须补偿他的全部开支，而且还必须另外使他获得一个价值，这个价值不与他的任何支出相抵，而是一个纯赢利。如果我们从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我们看到资本家所垫支的资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代表他用在生产资料如房屋、原料、半制成品和机器上面的费用，第二部分是工资开支。即令资本家生产者本人不知道这一点，也不管他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神圣说法来欺瞒自己，欺瞒世界，这个分法总是适用的。马克思把第一部分叫做不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因在劳动过程中被利用而改变其价值，它的价值是全部转

移到制成品中去的。第二部分馬克思称之为可变資本。可变資本造成追加的价值。这追加的价值在无偿劳动的結果被占有时实现的。用資本主义方法生产的每一商品的价值，其組成部分可用下列公式表述： $C + V + m$ 。在这公式中， C 代表不变資本的价值，它包含在无生命的生产資料中而被轉移到商品上来的； V 代表以工資形态墊支的可变資本价值； m 代表剩余价值，即工資劳动的无偿部分的追加价值。不論我們考察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全部，不論我們考察棉制品或芭蕾舞演出，鑄鐵管子或自由主义报纸，每一类物品都表现这价值的三个組成部分。因此，对于資本家生产者來說，商品的制造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但是，这剩余价值，当它隱藏在商品形态的生产物中的时候，对于資本家是沒有用处的。商品一經生产出来后，它必須被实现，必須轉化为純价值形态，即貨幣。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資本支出必須脫去它們的商品形态，而复归为資本家的貨幣，借以使上述的轉化成为可能，从而使資本家能以现款形式占有剩余价值。只有当这个轉化是順利的，只有当商品总额已經按照价值出售了，生产的目的才算完成。出售商品的收入，即从出售商品所得的貨幣，与原来商品总额一样，包含同样的价值組成部分，并能以同样的公式表述出来： $C + V + m$ 。 C 是补偿資本家所墊支的已用去的生产資料； V 是补偿他所墊支的工資；最后一部分 m 代表預期的剩余，即資本家淨利的现款形式^①。

資本从它的最初形态，从一切資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轉化为死的和活的生产資料，如原料、工具和劳动等，通过活的劳动过程，再轉化为商品，最后又轉化为貨幣，較最初阶段增多的貨幣額——这样的資本变形不仅为了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而已。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不是一个簡單的剩余价值，按所希冀的数量来被占

^① 在我們的論述中，剩余价值和利潤等同起来了。对总生产來說，这是对的，而我們下面所探討的就只是总生产。这里，我們暫不討論剩余价值再分成的几个組成部分：企业的利潤，利息和地租，因这样再分对于再生产問題，沒有什么重要性。

有，而是一个在数量上不断增大的剩余价值，无限度的剩余价值。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反复使用同样的魔术般方法，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在商品生产和随后实现的过程中，不断重复地占有未付工资劳动的收入。

这样，对于不断更新的生产，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经常性现象的再生产过程，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动机，这个动机在其他生产制度下是没有的。在历史上其他经济制度下，再生产是决定于社会对消费品连续不断的需要，不论这些需要是象在农村共产主义公社市场上通过民主方式决定的全体劳动者的需要也好，或者象在奴隶劳动或徭役等经济中专横地决定的阶级对抗性社会的需要也好。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推动在这里唯一一起作用的个体私人生产者的，不是对社会需要的考虑。个体私人生产者的生产完全取决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即令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过是实现对个体私人生产者所不可缺少的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个体私人生产者的真正动机是占有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注视真正的动机，即占有剩余价值，那么，生产消费品来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只是一条迂回的道路，尽管对于个人资本家而言，这是出于必要。这个动机，占有剩余价值的动机，也促使资本家反复投入再生产中。就是这剩余价值的生产，把社会必需品的再生产变成一个不断的运动。再生产显然只有当上期的生产物，商品，实现后，也就是转化为货币后，才能重新开始，因为在货币形态下，即纯价值形态下的资本，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对于资本家生产者，再生产的首要条件是顺利地实现上一生产周期所生产的商品。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点。在私人经济制度下，个人生产者，根据自己的权衡，决定再生产的规模。他的主要动机是占有剩余价值，而且占有量还要尽快地增长。但剩余价值的加速占有需要增加资本的产生以造成这剩余价值。这里，一个大规模企业在各方面都较一个小企业处于有利的地位。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

法不仅提供一般再生产的一个永久动机，而且还提供使再生产扩张，使再生产规模不断加大的原动力。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只限于唤起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渴求，从而促使他不断扩张再生产而已。扩张事实上成为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成为个人资本家生存的经济条件。在竞争的准则下，商品价格的低廉是个人资本家争夺市场上一席地位的最重要的武器。而降低商品生产成本的一切方法，除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为目的的一些措施和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外，最后都归结为生产的扩张。至于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措施，它们往往会遭到很多的障碍。在这一方面，大企业总是对中小企业占各种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从房屋和工具的节约，效率较高的生产资料的应用，机器代替人工的广泛实行，直至迅速利用市场的有利转变以取得廉价原料。在极大限度内，这些优势直接随着企业的扩张而比例地增加。因此，只要少数资本家企业扩大了，竞争迫使所有其他企业同样地扩张。扩张成为一个生存的条件。因此，也出现了再生产以不断增大的规模进行的倾向，而这个倾向自动地象波浪般在再生产的表面上伸展。

扩大再生产决不是在资本下的一个新发现。相反地，从远古起，在每一种社会形态里，只要有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表现时，扩大再生产就成为一条规则。当然，在社会历史上，可以看到长时期的生产过程在同样的规模下不断重复，即简单再生产。例如在古代农业和共产主义村社中，人口的增加没有促使生产逐渐扩大，而是把新的一代排挤出来，迫使他们创立同样狭小的、自给自足的居民地。在中国和印度的古老的、小手工业单位中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这些手工业单位以同样形式和同样规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传统地重复着生产。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简单再生产是经济和文化停滞的根源和清晰标志。如果没有扩大再生产，生产不可能向前跨进一大步，而文明纪念物如东方的水利事业、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军用道路、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或中世纪的手工业和城

市的发展,也不可能产生出来;因为重大的文明进步的基础和社会推动力就在于生产逐渐超越当前的需要而不断扩大,以及人口和居民需求的不断增长。

如果没有扩大再生产,特别是交换也是不可想象的,而交换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并促使它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再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扩大再生产具有若干特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扩大再生产对于个人资本家,简直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并不排斥简单再生产,或甚至缩小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在繁荣年代再生产周期性的过度扩张阶段也会随着发生同样周期性的危机现象。但如果不考虑周期性的变化,再生产的总趋向总是向扩大方面进行。对于个人资本家,不能取得这样的扩大意味着从竞争性争夺中撤退出去,意味着经济上的灭亡。

此外,还有若干其他方面必须加以考虑。扩大再生产的概念只适用于生产物的数量,适用于制造品的总额。只要生产全部地或主要地安置在自然经济之上,消费决定着个人劳动过程的范围和性质,也决定着作为目的本身的总的再生产的范围和性质。这适用于印度的农业和乡村公社,利用奴隶劳动经济的罗马庄园,以及以徭役为基础的中世纪封建农庄。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景象。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创造价值而生产。整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受价值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生产消费品,也不是仅仅生产商品,它突出地是生产剩余价值。从资本家看来,扩大再生产是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这是在商品生产的形态下实现的,因而结局还是生产消费品。在再生产进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引起这两方面的不断脱节。要是生产率提高了,同样数量的资本和剩余价值会代表不断增大的消费品数量。因此,扩大生产,如果理解为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量,不一定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意义下的扩大再生产。反过来说,在某种限度内,通过更高度的剥削,如削减工资等,资本可以产生较大的剩余价值,而实际上没有产生较多的物品。但在这两

种情形下，剩余价值有两个方面：它是价值量，也是实物的总量，而从资本家看来，剩余价值的要素在这两者是相同的。

一般地讲，由于以占有的剩余价值一部分追加到原来的资本而形成的资本增大，不论这个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是用来扩大旧企业或创办新企业、即独立的女儿企业，其结果总是造成剩余价值的增产。这样，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有一个特征，即资本的增加是通过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

在资本的准则下，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公式是： $c + v + \frac{m}{x} + m'$ 。这里， $\frac{m}{x}$ 代表在上次生产周期中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 m' 代表资本增加后所创造的新剩余价值。这新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又转化为资本，因而从资本家看来，扩大再生产是剩余价值交替地被占有和转化为资本的川流不息过程。

到这里为止，我们只讲到再生产的一般和抽象的公式。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应用这公式所必需的具体条件。

被占有的剩余价值，当它顺利地市场上摆脱了自己的商品形态后，表现为一笔货币额。这货币形态是它的绝对价值形态，是它作为资本事业的开端。但货币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在这种形态下，它不能在它的事业中前进一步。被积累的剩余价值部分，既已转化为资本，就不能不采取商品形态，因为只有在这种形态下，它才能成为生产资本，换言之，即作为产生新的剩余价值的资本，而赋予此剩余价值部分以活动力量。所以，象原有资本一样，它必须再分为两部分：不变部分包括无生命的生产资料，和可变部分，即工资。到了那时，我们的公式 $c + v + m$ 适用于它，正象适用于原有资本一样。

但资本家进行积累的美好意图，他的节约和禁欲——这种节约和禁欲促使他以他的较大部分的剩余价值用之于生产而不用之于个人奢侈品上的浪费——还不够实现这个目的。相反地，他必

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那些具體形態，即他所企圖賦予他的新剩餘價值的那些形態。第一、他必須取得對他選定和計劃的生產部門所必需的生產品料如原料，機器等，這樣才能使相當於他的不變資本的那部分剩餘價值採取了生產的形態。第二、另一部分，他的剩餘價值中的可變部分，也必須成為可以轉化的東西，而要实现這種轉化，需要兩個要素：首要的是勞動市場必須提供足夠的追加勞動量，其次，工人既然不能僅僅依靠貨幣生活，商品市場也必須提供追加數量的食物，這些食物是由即將僱用的新工人用他們從資本家那里取得的剩餘價值的可變部分來交換的。

這一切前提都具備了，資本家就能運用他的資本化的剩餘價值，使它成為發生作用的資本而產生新的剩餘價值。但資本家的任務還沒有全部完成。這新資本及其產生的剩餘價值暫時還以一筆追加數量的這種或那種商品的形態存在着。在這個形態下，新資本仍然是墊支的，它所創造的新剩餘價值還是停留在對資本家沒有用處的形態上。新資本及其創造的剩餘價值必須擺脫自己的商品形態，重新採取純價值形態，從而作為貨幣復回到資本家的手里。除非這一過程順利地結束，新資本和剩餘價值將全部或部分地遭受損失，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將宣告流產，這樣也就沒有積累可言了。對於資本積累絕對必要的，就是要有新資本所創造的、足夠數量的、商品在市場上獲得一席之地，並得到實現。

這樣，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作為資本積累的擴大再生產是與一系列的特別條件結合起來的。讓我們再仔細考察這些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生產必須創造剩餘價值，因為剩餘價值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使增加生產成為可能的最初形態。在決定資本家和工人在商品生產中的關係時，全部生產過程必須服從這個條件。這第一個條件確立後，第二個條件是剩餘價值必須得到實現，轉化為貨幣形態，這樣才能為資本家所占有，用來進行擴大再生產。因此，這第二個條件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商品市場上來了。這裡，交換的風險決定着剩餘價值今后的命運，從而也決定着再生產的

前途。第三个条件是：如果已經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积累为目的而加入資本中去，这种新資本必須首先采取劳动和无生命的生产資料的生产形态。而且，其中与劳动相交換的新資本部分必須轉化为工人的食物。因此，我們的注意力又被引导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来了。如果所有这些要求得到滿足，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已經发生了，就必须加上第四个条件：代表新資本和剩余价值的追加的商品量必須得到实现，这就是說，轉化为貨幣。只有这个轉化已經順利完成了，資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說是已經实际上发生。这最后条件把我們的注意力又引回到商品市场上来了。

由此可知，資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意味着生产地点和商品市场之間的不斷移动，意味着从私人事务所和工厂到商品市场間的梭子般的往返运动（在私人事务所和工厂，不經許可的人是不准入內的，在那里，資本家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而在商品市场上，沒有人創立任何法律，在那里，意志或理智都不能显示它的力量）。但正是商品市场的这样的松懈和无政府状态，才使个人資本家感到他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的生产和消費成員的全体。个人資本家为了扩大再生产也許需要追加的生产資料，追加的劳动和供应这些工人而追加的食物，但他能否取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决定于在他控制之外的因素和事情，这些因素和事情实际上是在他能力所及之外发生的。为了实现他已經增多的生产物全部，每个資本家需要一个較大的市场来容納他的商品，但对一般需求的增加也好，对他的特殊商品需求的增加也好，他是无法加以控制的。

我們在这里所列举的条件都表现出消費和私人生产間的內在矛盾以及它們的相互社会关系。这些条件絲毫沒有新奇之处，并且也不仅在再生产的阶段上才显露出来。它們表明資本主义生产內在的一般矛盾。但对于再生产的过程而言，由于下述原因，这些条件含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关于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資本主义生产方法不仅显露了它的一般的、基本的特征，而且，更重要

的，呈現了在不同生產期間、在連續進展中的一種明確的節奏——個人意志間起着特有的相互作用。從這一觀點看，我們必須問：每個資本家一般地如何有可能為了實現他所生產的商品，在市場上找到他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儘管沒有任何社會的管理，沒有任何協調生產和需求的計劃。對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為競爭所增強的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貪慾和資本主義剝削的自動影響促使每一種商品，包括生產資料，都生產出來，通常也有日趨增長的無產階級化的工人階級足供資本的利用。從另一方面看，在這裡，計劃的缺乏表現為下列的事實：在所有一切範圍內的供求平衡只通過不斷背離，時刻的價格波動，以及市場情況的周期性危機和變化，才能實現。

從再生產觀點看，問題是不同的。市場上勞動和生產資料的無計劃的供應以及需求的無計劃和不可捉摸的變化如何仍然有可能供應適當數量和質量的生產資料，勞動和為資本家出售貨物所需要的銷售機會呢？如何能保證這些因素中任何一個因素按正確的比例增長呢？讓我們更確切地述說這個問題。按照我們所熟知的公式，試將個人資本家的生產構成以下列比例表現： $40C + 10V + 10m$ 。他的不變資本因此是四倍於他的可變資本，而剝削率是100%。商品總額是以價值60來代表。我們假定資本家有可能以他的剩餘價值半數轉化為資本，追加到原來構成的資本中去。在這個情況下，公式 $44C + 11V + 11m = 66$ 將適用於下一生產周期。

讓我們假定資本家能夠每年以剩餘價值半數轉化為資本繼續進行若干年。為了這個目的，只求一般地有生產資料，勞動和市場的出現，是不夠的，資本家所找到的這些因素必須形成一定的比例，這個比例是嚴格地與他的積累的進展相吻合的。

第二章 魁奈和亞当·斯密对 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迄今为止，在我們考察再生产問題中，我們只涉及資本家个人；資本家个人是再生产的典型代表，再生产的代理人，因为再生产誠然是全部由各个資本家企业所造成的。这方面的探討已經告訴我們：这个問題包含相当多的困难。但當我們把我們的注意力从資本家个人轉移到資本家整体的时候，这些困难增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甚至更为复杂化。

表面的观察即足以說明：資本主义再生产作为社会整体来看不应简单地当作各个資本家的单独再生产过程的机械总和。举例言之，我們曾經看到个人資本家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他商品市场上銷售机会的相应增加。但个人資本家不一定是因为市场容納量的絕對增加而进行扩大再生产，他还可能由于竞争的结果，以損害其他資本家为代价而进行扩大的。因此，某資本家所贏得的，可能正是其他从市场上被排斥的資本家所必須認為已經損失的东西。这个过程将使某資本家有可能按照其他資本家由于亏损而被迫减少生产的数量来增加自己的再生产。某資本家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正因为其他資本家連简单再生产都不能实现。同样地，某資本家可以利用另一資本家的破产（就是說，部分地或全部地从再生产退出来）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和生产資料来进行扩大再生产。

这些常见的现象証明整个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不同于把个人資本家的再生产提高到第 n 度。这些现象也說明各个資本家的再生产活动不断地相互交錯着，并可以或多或少地相互抵銷。

所以，在考察資本主义总再生产的规律和运行情况之前，我們必須把总資本再生产的概念弄清楚。我們必須提出这个問題：既然个人資本是在不断的运动中，时时刻刻按照不可控制、不可捉摸

的规律发生变动,有些按照平行的路线进行,有些交错进行而相互抵销,那么,从这些个人资本的杂乱的混合体中能否得出象总再生产之类的东西呢?我们能否真的把社会总资本当作一个实有的东西来看;如果能这样做,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这就是进行科学探讨再生产规律时必须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在经济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草创时期,重农学派之父魁奈以古典学派特有的大胆和简明的态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把总资本看作一个真的、活动的、实有东西而不加疑问。在他著名的“经济表”一书中(这本书是这样的复杂,以致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人能够看懂它),他用了一些数字来证实总资本再生产的各阶段,同时,还考虑到必须从商品交换,即作为流通过程,来探讨这个问题。^①

照魁奈看法,一个社会包括三个阶级:农业家的生产阶级;所有在农业范围以外活动的不生产阶级——工业、商业、和自由职业者;最后,地主阶级,包括君主和什一税税吏。全国总生产物即总的食物和原料额是在生产阶级手中产生出来的,假定它的总值为50亿利弗。^②在这数目中,20亿代表每年的农业流动资本,10亿代表固定资本的磨损,又20亿是作为地主的纯收益。除了这总生产物外,农业家(这里,被看作相当地符合资本主义意义的租地农业家)在手中持有20亿利弗的现款。于是,流通进行如下:租地农业家阶级付给地主20亿现款的地租(作为上次生产期的成本)。地主阶级用这笔钱向租地农业家购买10亿的食物,并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其余10亿的工业品。租地农业家再以流回到他们手里的10亿购买工业品。于是不生产阶级以他们手中的20亿购买农产品:其中10亿是原料,用来补偿他们每年的流动资本;其余10亿是食物。这样,这些货币结局流回到原来出发点,租地农业家阶级;生产物被

^① “魁奈的‘经济表’……说明国民生产的有定额价值的年生产物,如何通过流通来进行这样的分配,使得再生产得以进行……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被综合成为它们的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成为几个大的机能上规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间的流通”。(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438页。)

^② 一利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法郎。——译者

分配到所有階級，使得每个人得到消費；同时，不生产階級和生产階級的生产資料都已得到补偿，而地主階級取得了收益。再生产的前提都已具备，流通的条件都得到滿足，于是再生产就能循着有規則的軌道重新开始了。^①

我們將要在我們的考察过程中看到上述的論述虽然流露一些天才的光芒，但仍然是有缺点的和粗陋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強調，站在科学的經濟学大門前边的魁奈对論証社会总資本及其再生产問題的可能性是絲毫沒有怀疑的。另一方面，亚当·斯密虽然对資本的关系做了較为深邃的分析，但与重农学派观念中清晰而有概括性的輪廓比較起来，他好象是布置了一个迷宫。由于他对价格的錯誤分析，斯密顛复了对整个資本主义过程的科学論証的全部基础。这个錯誤的价格分析曾經长时期統治着資產階級經濟学。这个理論認為：虽然商品的价值代表它生产时所耗費的劳动量，但价格包含三个要素：劳动的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

因为这显然也一定适用于商品总额，即国民生产物，我們就遇到这样的令人惊异的发现：虽然用資本主义方法制造的商品总额的价值代表所有的工資支出、以及資本的利潤和地租，即总剩余价值，从而，这个价值能够补偿这些項目，但在价值中沒有一个組成部分，相当于在生产时所耗費的不变資本。依照斯密的见解， $V + m$ 是表现整个資本主义生产物价值的公式。以谷物为例，斯密論証他的见解如下：

“这三部分(工資、利潤和地租)似乎直接地或終局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許可以設想第四个部分是必要的，因为租地农业家的資本必須补偿，劳动家畜的及其他农具的磨損也必須补偿。

^① 杜龐特：“經濟表分析”，載“农业、商业和財政”杂志，Finances (1766)，第305頁(附注)(見 Oncken 版“魁奈傳”)。魁奈明白地說，他所描述的流通是以两个条件为根据：沒有干扰的貿易和限于从地租中征收的租稅制度：“但這些事实有不可缺少的条件；商业的自由使生产物在良好的价格下出售，……并且，农业家除了这个收入外不必繳付其他直接或間接的征課，而这个收入，假定为七分之二，必須成为君主的收入”(同上引書，第311頁)。

但任何农具的价格,例如劳动的馬的价格,結局也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那就是,养馬的土地的地租,养馬的劳动,及垫支这种地租和这种工資的租地农业家的利潤。所以,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馬的价格和它的給养所費,但全部价格还是直接地或終局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与利潤”。^①

正象馬克思所說的,斯密用这“空虛的遁辞”,再三地把不变資本分解为 $V + m$ 。然而,他有时也起怀疑,并不时陷入相反的见解中去。在第二卷中,他說:

“在卷一中已經指出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分解为三部分,一部分支付劳动的工資,其次是資本的利潤,第三是用来生产和运往市场銷售的土地的地租……就各个特殊的商品說,既然如此,就一切商品的全体,也必須是如此。它們形成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生产物。这个年生产物的总价格或交换价值也須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分配在国内各种居民之間,有的当作他們的劳动的工資,有的当作他們的資本的利潤,有的当作他們的所有地的地租”。^②

这里斯密就发生疑惑了,他接下去解释道:“虽然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的总价值是这样地分配在不同居民之間,并构成这些居民的收入,但正象对私人地产我們区别总地租和純地租一样,我們也能把一个大国全部居民的收入作同样的区别。

“私人地产的总地租包括租地农业家所交付的;而純地租是地主支付管理、修理費用以及其他必要付款后所剩余的。这就是地主能够用来增加不久即将用来直接消費的儲备量,或耗用于个人吃喝、装璜、和修飾他的房屋家具,或他私人享受和娱乐。他的实际財富不是比例于他的总地租,而是比例于他的純地租。

“一个大国居民全体的总收入包括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全部;在总收入中,先把固定資本的維持費用,再把流动資本的維持費用除去,其余的部分,便是純收入。那就是說,純收入是总收

① 亞当·斯密:“国富論”,卷一,部分譯文引自“資本論”,第二卷,第457頁。

② 同上書,卷二,部分譯文引自“資本論”,第二卷,第443頁。

入的一部分，人們可以把它放在消費品儲存中，或用它來維持生活、獲得安逸和快樂，而不致於侵蝕他們的資本。他們的現實的財富不是比例於他們的總收入，而是比例於他們的純收入”^①。

這裡，斯密引進了相當於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但就在下一步把它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而取消了它。最後，他對這件事情作下列的解釋：

“既然組成個人或社會的固定資本的機器和工具等等不形成個人或社會總收入或純收入的一部分，那麼，同樣地，用來把一個社會的全部收入經常地分配給所有不同成員之間的貨幣，其本身也不形成那個收入的一部分”^②。

不變資本，就是亞當·斯密的固定資本；這樣被放在跟貨幣同一的水平來看，它不列入社會總生產物，即社會總收入中。它在總生產物中不作為一個價值因素而存在。

你不能從石子中擠出血液來。所以，流通，即這樣組成的總生產物間的相互交換，只能促成工資（V）和剩餘價值（m）的實現。然而，它既然無論如何不能補償不變資本，繼續進行再生產顯然成為不可能了。斯密實在也深深地知道這一點，他並不夢想去否認每一個人資本家，為了開辦他的企業，除了他的工資基金，即可變資本外，還需要不變資本。但上述的商品價格分析，當它開始涉及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時，就讓不變資本在‘迷糊’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樣，資本再生產的問題陷入混亂不堪的狀態中。顯而易見的，如果論證社會總資本這個問題的最基本的前提觸了礁，那麼，全部分析必然歸於失敗。里嘉圖、薩伊、西斯蒙第以及其他因襲了亞當·斯密這個錯誤的理論的，他們在考察再生產問題時，都在這最基本的困難，即論證社會資本上栽了筋斗。

另外有一個困難，在進行科學分析時，一開始就與上述的困難混淆起來。一個社會的總資本的性質是怎樣的？關於個人生產者，

① 亞當·斯密：“國富論”，卷二，部分譯文引自“資本論”，第二卷，第443—444頁。

② 同上書（Moculloch, Edinburgh, London, 1928年版），卷一，第23頁。

其情况是清楚的：他的資本包括他的企业的开支。在資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假定下，他的生产物价值替他产生了一个超过他的开支的剩余，这个剩余价值并不补偿他的資本，而是构成他的純所得，这个純所得他能够完全消費掉而不侵蝕他的資本，因之，这是他的消費基金。不錯，資本家可以儲蓄这純所得的一部分，自己不消費它，而把它加到他的資本上去。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个新的步驟，即新資本的形成，而这新資本必須在下次再生产中得到补偿，并必須替資本家再产生一个剩余。在任何情形下，个人的資本总是包括他在生产上所需要的，以及他在經營他的企业时所垫支的款項，而他的所得就是他自己所实际消費或可能消費的，也就是他的消費基金。要是我們問一个資本家：“你所付給工人的工資是什么？”他的回答将是：“这显然是我的流动資本的一部分”。但要是我們問：“工人所获得的这些工資对工人是什么东西？”資本家不可能把它們說成資本，因为工人所获得的工資不是他們的資本，而是他們的所得，他們的消費基金。

讓我們再举一例。机器制造商在他的工厂里生产机器。年生产物是若干数量的机器。但是，以价值而言，这年生产物包含制造商所垫支的資本以及他所賺得的純所得。因之，所制造的一部分机器代表制造商的所得，并注定在流通和交換过程中实现这个所得。但向制造商购买这些机器的人不是作为所得而购买的，而是为了利用它們作为生产資料；对于这个购买者，这些机器是資本。

根据这些例子似乎很有理由說成这样：一件东西对于某一个人是資本，可能对于另一个人是所得，相反也是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如何有可能得出一个具有社会总資本性质的东西呢？誠然，在馬克思以前几乎每一个科学經濟学者作出了結論：社会資本是沒有的。① 斯密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对这个問題犹豫不决，搖摆不

① 关于洛貝尔图所特別提出的“国民資本”概念，見后面第二篇。

定；里嘉图也是如此。但薩伊已經肯定地宣称：

“就是这样，生产物总价值分配到社会成員之間。我說总价值，因为在所生产的总价值中，如果某一部分沒有流入一个消費生产者之手，它就被其余的取得了。制布商的农民购买羊毛，付給他的各部分工人的工資，然后按一个价格出售布匹，即他們联合努力的结果，这个价格偿还他的全部垫支之款，并且还提供他一笔利潤。除了扣除一切費用和开支后的純剩余外，他决不把更多的东西算作他的企业的利潤或收入。但这些开支只是对以前的生产者收入的垫支，而在布的总价值中得到偿还。付給农民的羊毛价格是耕种者、牧羊人和地主的几种收入的混合。虽然农民只把繳付地主和雇工后的剩余算作他的純生产物，但对地主和雇工，这些付款是收入項目——对于前者是地租，对于后者是工資——对于前者是土地的收入，对于后者是个人辛劳的收入。所有这些的总和是从布的价值中支付的，而布的全部价值形成了某一个人的收入，并就这样被完全吸收去了。由此可见，純生产物这名称只适用于每个单独生产者或企业活动家的个人收入，而个人收入的总和，即全社会的总收入，是等于土地、資本和劳动的总生产物。这完全推翻了上世紀經濟学者的体系。这些上世紀的經濟学者除把土地的純生产物当作农业收入外，不考虑其他东西，所以，他們結論說：这純生产物就是社会所有可以消費的东西，他們沒有作出明显的推論說，凡是創造出来的全部东西，都可以为人类所消費”^①。

薩伊以他特有的作风来証明他的理論。亚当·斯密所企图作出的証明是这样：他把每一单位的私人資本推溯到它的生产场所，其目的是为了把它分解为單純的劳动生产物，他又把每一个劳动生产物看作在严格的資本主义意义下的有偿和无偿劳动的总和，即 $V + m$ ；这样，他就最后把社会总生产物分解为 $V + m$ 了。而薩伊当然有足够的自以为是的信心来“修正”这些古典的錯誤，其方法

^① 薩伊：“政治經濟学”，C.R.Prinsep 英譯本，倫敦，1821年版，卷二，第75—77頁。

是把这些錯誤扩大为普通的庸俗說法。薩伊的論点是根据这样的事实：企业家在每一生产阶段付款給旁人，即以前各生产阶段的代表者，作为生产資料的代价，而这些生产資料对于他就是資本；这些旁人把这笔付款的一部分留在自己的口袋里，作为自己的所得，而把另外一部分用来补偿他們所垫支的費用，这样就提供了另外一些人的所得。薩伊把亚当·斯密的无穷尽的劳动过程鏈条轉变为一条同样地无穷尽的鏈条，这条鏈条是由对所得的相互垫支以及从售貨收入中对这些垫支的偿还所組成的。这里，工人是作为企业家的絕對平等者出现的。他的所得是以工資形态垫支的，而他以他所作的劳动来偿付这个所得。这样，社会总生产物的結局价值表现为大量的垫支所得的总和，它又是在交換过程中被用来偿还所有这些垫支項目的。足以表明薩伊的肤浅特征的，是他以鐘表制造的例子來說明資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联系——这个生产部門，在那时，部分地也在今天，是純粹“工場”性質，在那里，每个工人又是小规模的企业家，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被一系列的、連續的具有簡單商品生产典型性的交換行为所掩盖了。

这样，薩伊对这个发端于亚当·斯密的混淆給了一个极端粗魯的表述。社会年总生产物，以价值而論，能够完全分解为一連串的各种所得。所以，它是每年被消費掉的。至于沒有資本和生产資料，生产如何有可能再行发动起来，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解的謎，而資本主义再生产看起来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从重农学派时代到亚当·斯密时代对这个問題的不同解决方法加以比較，我們不能不发现部分的进步和部分的退步。重农学派經濟观念中的主要特征是他們假設只有农业創造剩余，即剩余价值，以及农业劳动是在資本主义意义下唯一的生产劳动。因此，我們在“經濟表”中看到不生产的工业工人階級只創造了等于他們所消費的原料和食品的20亿利弗价值。因此，在交換过程中，全部制造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之于租地农业家階級，另一部归之于地主階級，而制造階級沒有消費它自己的生产物。

这样，在商品的价值上，制造阶级，严格地讲，只再生产它所消费的流动资本，它没有给企业家创造任何所得。社会上投入流通的唯一超过所有资本垫支的所得是在农业中创造的，并以地租形态为地主阶级所消费，而即使租地农业家阶级除补偿他们的资本外，也没有做什么，这就是，在10亿利弗的固定资本利息和20亿利弗的流动资本中三分之二是原料和食品，三分之一是工业品。而且，令人惊异的是魁奈假设只有在农业中存在着固定资本，即他所称的“原垫支” (avances primitives) 以区别于“年垫支” (avances annuelles)。照魁奈看来，工业显然在没有固定资本下进行活动的，它只有每年周转的流动资本，因此，工业在每年出产的商品中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因素，用来补偿固定资本(如房屋、工具等)的磨损。^①

与这个明显的缺点相反，英国古典学派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声称每一种劳动都是生产的，从而揭露了在工业中创造剩余价值，正如在农业中一样。我们说英国古典学派，因为亚当·斯密自己在这一点上有时悄悄地退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中去。只有里嘉图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在资产阶级研究方法的限度内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逻辑性。结局是：我们必须认为所有资本投资之生产常年剩余价值，在农业中如此，在社会生产的一般制造业部门中亦复如此。^②

在另一方面，在农业和制造业中每一种劳动具有生产的，创造

①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米拉波在他的“经济表”的“说明”中明白地提到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这个阶级对制造厂房，工具，机器，磨子，铁工场，其他工场的原垫支……(合计为) 20 亿利弗(“Tableau économique avec ses Explications”，1760年，第82页)。米拉波在他对“Tableau”的混乱描述中，也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考虑进去。

② 斯密因此作出这样的表述：“所以，工人追加在原料上的价值在这样情形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付给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雇主所垫支的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国富论”卷一，83页)。此外，在卷二，第八章论工业劳动时：“制造者的劳动一般在他所工作的原料的价值上追加了维持他本人生活所需的价值和他的雇主的利润的价值。相反地，家庭仆役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价值。虽然制造者的工资是他的雇主垫支给他的，他实际上并不对雇主形成任何耗费，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一般从在制造者所施与劳动的物体上所增进的价值中得到补偿，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利润”(亚当·斯密：同上书，卷二，第93—94页)。

价值的属性这一点的发现使亚当·斯密联想到农业劳动也必然对租地农业家阶级产生除了地主阶级的地租而外的一个剩余，即超过他们资本支出的剩余。这样，除了补偿资本而外，还出现了租地农业家阶级的常年所得。^①

最后，通过系统地发挥魁奈所用的原垫支和年垫支概念——这两个概念斯密称之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斯密弄清了，除了其他问题外，这样的一点：社会生产中的创造部分既需要一笔固定资本，又需要一笔流动资本。这样，他正在向恢复社会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并以确切的辞句表述这些概念的道路上前进。下面的表述代表他在这一点上所达到的最高的清晰水平：

“虽然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生产物，无疑地，最终是用来供应这个国家居民的消费，并使他们获得一笔收入，但当它最初从土地或生产劳动的手中出现时，它自然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首先用来补偿资本，或更新从资本中抽走的食物、材料、制成品；另一部分或则形成对资本所有者的一笔收入，作为资本的利润，或则形成对另一个人的一笔收入，作为土地的地租。^②

“一个大国的居民全体的总收入包括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全部；在总收入中，先把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把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除去，其余的部分，便是纯收入。那就是说，纯收入是总收入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把它放在消费品储存中，或用它来维持生活、获得安逸和快乐，而不致于侵蚀他们的资本。他们的现实的财

^① “在农业中雇用的工人……所以……象制造业的工人一样，不但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价值的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加上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一个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所有的利润之外，这些工人经常造成地主的地租的再生产。（“国富论”卷二，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富不是比例于他們的总收入，而是比例于他們的純收入”。^①

这里的总資本与总所得的概念，是以一个比在“經濟表”一书中較为全面而謹严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所得与农业片面的联系被割断了，社会所得成为一个較广濶的概念；而且一个較广濶的資本概念在固定和流动資本的两种形态下，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不是把生产区别为农业和工业两部門，令人誤入歧途，而是把真正重要的其他范畴提出来了：資本与所得的区别，并进一步，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区别。

斯密接着进一步分析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們如何在社会过程的进行中，在生产和流通中，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变化的。他这里強調从社会观点来看固定与流通資本的根本区别。

“維持固定資本的全部費用显然必須从社会的純收入中除去。維持有用的机器和工具、生利的房屋等等所需要的材料也罢，把这些材料变成适当的形式所需要的劳动生产物也罢，都不能构成这純收入的一部分。誠然，那些劳动的价格可以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这样雇用的工人可以把他們工資的全部价值放在消費品儲存中。但在其他种类的劳动上，劳动的价格和生产物两者都归入这种儲存中，其中价格归入工人的消費品儲存中，而生产物归入其他一些人的消費品儲存中，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安逸和快乐是被这些工人的劳动所增加了”^②。

这里，斯密看到生产生产資料的工人和生产消費資料的工人之間的重要区别。对于前者，他說这些工人創造生产資料如原料、工具等形态的价值——用来补偿他們的工資，并形成他們的所得，而这些东西在它們的自然形态下是不能消費的。至于第二类工人，斯密認為：相反地，全部生产物，或更好地說，它所包含的那部分价值，用来补偿工資，即工人們的工資的，以及其余部分的价值，都是以消費品形态来表现的（这个結論中隱藏的真实意义是：

① “国富論”，卷二，頁19，譯文引自“資本論”，第二卷，第443—444頁。

② 同上書，第19—20頁。

生产物的一部分，即代表在它生产时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那部分，也同样以这个形态表现的，不过对于这一点，斯密沒有明白說出来)。在我們进一步的探討中，我們將要看到斯密是如何接近了一个关键地位，正是从这个地位馬克思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斯密对这基本問題不作进一步研究而維持了这一总的結論，即在任何情形下，用来保存和更新社会上固定資本的东西不能加到社会的純所得上去。

对于流动資本，情形有所不同。“但虽然維持固定資本的全部費用必然地从社会純收入中扣除去，对于維持流动資本可不一样。在这流动資本所包含的四部分，貨幣、食品、材料和制成品中，前面已經說过，食品、材料和制成品这三种是經常从流动資本中抽走，或則被放在社会的固定資本中，或則被放在消費品儲存中。在那些可以消費的产品中，沒有被用来維持固定資本的部分，全部归入消費品儲存中，并除了維持固定資本所必需的外，构成社会純收入的一部分。”^①

我們看到斯密在这里簡單地把除了已經使用的固定資本外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流动資本的范畴內，那就是說，一切东西除了食品、原料以及一部分商品以外，这部分商品，按照它們的自然形态，是属于补偿固定資本的。这样，他把流动資本的概念弄得含混不清。但另外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出现了，并貫串了这个概念：“一个社会的流动資本在这一点上是不同于个人的流动資本的。个人的流动資本是完全从他的純收入中扣除去的，因为个人的純收入必定全部表现为他的利潤。虽然每一个人的流动資本构成他所属社会的流动資本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因此而在社会純收入中被全部排除出去”^②。

在下面的說明中斯密申述他的看法：“虽然一个商人的鋪子中的全部貨物沒有必要放在他自己的消費品儲存中，但这些貨物可

① “國富論”，卷二，第21—22頁。

② 同上書，第22頁。

以放在旁人的消費品儲存中，這些旁人可以用從其他款項中取得的收入經常為這個商人補償他的貨物的價值，連同它的利潤，而不致侵蝕這個商人和這些旁人的資本”^①。

這裡，斯密創設了關於社會流動資本的再生產和運動的一些基本範疇。固定和流動資本，私人 and 社會資本，私人 and 社會收入，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這些是作為廣泛性的範疇被提出來了，但它們的現實的、客觀的相互關係一部分是被指示出來了，但一部分卻沉沒在斯密分析中的主觀的和理論的矛盾裡面。重農學派理論中的扼要、謹嚴和清楚的圖式被分解為一堆雜亂的概念和關係，這些概念和關係，初看起來，好像是一團糟。但斯密對社會再生產過程較魁奈理解得更為深刻，更為近代化，更能抓住關鍵，我們已經可以從他所理解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內部看出新的關係來了，不過象密吉爾良哥在大理石上沒有彫刻出來的奴隸一樣，這些關係還僅僅是在萌芽中而已。

這是斯密對這問題所給的唯一說明。但同時，他從另一角度——從價值的分析——研究這個問題。這個較重農學派進一步的理論本身——一切勞動具有創造價值的基本屬性的理論；補償工資的有償勞動和創造剩餘價值的無償勞動之間的嚴格的資本主義區別；以及最後，剩餘價值嚴格地分割為利潤和地租兩個主要範疇——這一切較重農學派分析進步的地方導致斯密得出這樣一個奇怪的命題：每一商品的价格包括工資、加利潤、加地租，或者用馬克思的縮寫，包括 $V + m$ 。結果，社會每年生產的商品總額，從價格而論，可以完全分解為兩個組成部分：工資和剩餘價值。這裡，資本這一範疇突然消失了；社會不生產別的，只生產所得，只生產為社會全部消費的消費品。沒有資本的再生產成為一個不可解之謎。因此，對這個問題的處理，總的說來，較重農學派大大的后退一步。

^① 亞當·斯密：“國富論”，卷二，第22頁。

斯密的信徒們从完全錯誤的途徑研究这双重的問題。在馬克思以前，沒有人关心在斯密著作的第二卷中对于这个問題的确切叙述所提供的重要开端，斯密的信徒們大多数兢兢业业保留斯密对价格的根本錯誤的分析：象里嘉图之流接受了这个分析而不加疑問，又象薩伊之流，把它发展成为一种陈言滥調。斯密提出了有丰富意义的疑問和有启发性的矛盾，而薩伊則卖弄自己不高明头脑中的武断臆測。斯密关于某一个人的資本可以成为另一人的收入的见解促使薩伊宣称：在社会规模上資本和所得的一切区别是荒誕的。而年生产物总值全部包含在所得中，从而完全被消費掉的謬論，在薩伊的探討中，获得了絕對正确的教条的特質。如果一个社会每年完全消費掉自己的总生产物，那么，沒有任何生产資料的社会再生产必然成为每年重复的創造奇迹了。

在馬克思以前，再生产問題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中。

第三章 对于亞当·斯密分析的批判

讓我們重述一下从斯密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1) 一个社会有一笔固定資本，它的任何部分是不計入社会純收入中去的。它包括“为了維持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所需要的材料和为了把这些材料变成适当的形态所需要的劳动生产物”^①。斯密把这种固定資本特別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种类的生产，并明白地把它区别于消費品的生产，他这样做法实际上是把固定資本轉化为馬克思所称的“不变資本”——包括一切物質生产資料而与劳动力不同的那部分資本。

(2) 一个社会有一笔流动資本。扣除了固定或不变資本部分，剩下來的只有消費品一类；这些东西不是社会的資本，而是社会的純收入，一笔消費基金。

^① 亞当·斯密：“国富論”，卷一，第19頁。

(3) 个人的資本和純收入不是严格地相当于社会的資本和純收入。对于社会是固定或不变資本的东西，对于个人不可能是資本；它必定也是收入，是消費基金，它包括代表工人工資和資本家利潤的那部分固定資本。在另一方面，个人的流动資本，对于社会不可能是資本；它必定是收入，特别是当它成为食物的形态时。

(4) 至于在社会总年生产物价值中，一点資本的痕迹都沒有留下来。它能完全分解为三种所得：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

要是我們把这些零星观念杂凑起来，試图建立一幅社会总資本的每年再生产及其运行情况的图案，我們將立即对我們的任务表示絕望。誠然，上述所有的看法使我們对于社会資本如何每年得到补偿、每人的消費如何从自己的所得中得到保証等問題的解决离开得更远了，尽管以个人而論，他們仍旧能以他們自己的观点来看資本和所得。但是，如果我們希望充分了解馬克思在闡明这个問題上的貢獻，我們必須充分了解所有这些观念上的混乱，这一堆矛盾观点的集合体。

讓我們从斯密的最后論題开始，单是这个論題已經足够破坏古典經濟学中対再生产問題的探討。

斯密的基本原理是：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方面考察，能完全分解为工資、利潤和地租：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地渊源于他的科学理論：价值仅仅是劳动生产物。但凡是已經完成的劳动都是工資劳动。这样把人的劳动与資本主义工資劳动等同起来的确是斯密学說中的精义。社会总生产物价值包括垫支工資的偿还和从无偿劳动得到的剩余，这剩余表现为資本家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凡是对于个别商品适用的，对商品总额也必定同样地适用。社会所生产的商品全部，作为一个价值量来看，不是别的，而是劳动的生产物，有偿的和无偿的劳动的生产物，因此，它也必然完全分解为工資、利潤和地租。

在涉及所有一切劳动时，我們必須考虑到原料、工具、以及其

他，这誠然是不錯的。但如果說这些原料和工具本身同样也是劳动的生产物，而这些劳动既有有償的，也有无償的，这是不是也对呢？我們可以任意地尽量向后推溯，我們也可以任意地曲解或轉变这个問題，但我們从任何商品的价值中——因而从任何商品的价格中——将找不到一个不能分解为单纯的人类劳动的要素。但我們在所有一切劳动中能区别为两部分：一部分償还工資，另一部分归入資本家和地主的手中。除了工資和利潤外，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来了——然而資本有个人和社会的。我們如何克服这个众目昭彰的矛盾呢？馬克思自己花了長時間頑強地研究这个問題，但他的“剩余价值学說史”^①一书証明他在初期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这个事实說明这个理論性問題的确是极难解决的。但他最后得到的解决是出色地成功的，而这个解决是以他的价值論为基础的。亚当·斯密認为除了劳动外，沒有別的东西构成各个商品的价值，也沒有別的东西构成商品总額的价值，这一点是完全对的。亚当·斯密也同样地沒有錯，当他說从資本主义角度来看，所有劳动或者是有償的——償还工資——或者是无償的——作为剩余价值而归入占有生产資料的各階級手中。然而他所遺忘的，或者毋宁說他所忽視的，是劳动除了創造新价值外，还能把包含在所使用的生产資料中的旧价值轉移到新商品中去。从資本主义观点看，面包师的十小时工作日分为有償和无償的钟点，分为 $V + m$ 。但在这十点钟內所生产的商品将代表較十点钟劳动为多的价值，因为它还包含麵粉的价值，所使用的炉子的价值，房屋、燃料等等的价值，簡言之，所有用于烤面包所必需的生产資料的价值。只有在一個条件下，一个商品的价值仅仅等于 $V + m$ ；即如果一个人在半空中工作，沒有原料，沒有工具和工场。但既然凡是在材料上进行加工（物質劳动）是以某些生产資料为前提，而这些生产資料本身又是以往劳动的結果，这种过去的劳动价值必須轉移到新生产物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斯图嘉特，1905年版），第一卷，第179—252頁。

上来。

这个过程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而已，它是不依社会历史形态为转移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基础。使用人造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在新劳动之前，并为新劳动准备基础的旧劳动这一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在文明史中所演变的结合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劳动努力所密切交织成的永恒链条，其起点是湮没在人类社会化的黎明期中，而其终点将标志着整个文明人类的末日。所以，我们必须把人类劳动看作借助于工具而进行的，而工具本身是以往劳动的生产物。每一新的生产物因此不仅包括赋予这个生产物以最后形态的新劳动，而且还包括提供原料、工具等等的过去劳动。在价值的生产中，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也进入其中）中，这个现象没有中止，仅仅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表现。这里，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双重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创造有用物体，即使用价值的这种或那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它是抽象的、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并因而创造价值。在这一点上，它做劳动所经常做的：它把包含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转移到新生产物中去，其唯一区别就是这过去劳动现在也表现为价值，即旧价值。在第二点上，劳动创造新价值，用资本主义名词来说，这新价值可分解为有偿和无偿劳动， $V + m$ 。这样，每一商品的价值必然包含由劳动作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从生产资料转移到新商品的旧价值，以及由同一劳动但作为社会必要劳动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耗用时所创造的新价值。

这个区别不是斯密所能见到的，他没有区别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双重特征。马克思曾经声称他发现了斯密的奇怪教条——所生产的总价值能完全分解为 $V + m$ ——的最终根源在于斯密的根本错误的价值论。^①不能区别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具体和有用的劳动，另一方面是抽象和社会必要的劳动，诚然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以下同），第二卷，第462页。

构成了不仅是斯密，而且所有古典学派成员的价值论中最重要特征之一。

古典经济学不顾一切社会后果，承认只有人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因素，而且它发挥这个理论到那样的明晰程度，象我们在里嘉图的表述中所看到的。然而在马克思和里嘉图的价值论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误解，而且在许多场合下，也为马克思学说的通俗传播者所误解。里嘉图用自然规律来观察资产阶级经济，相信价值的创造也是人类劳动的一个自然属性，是个人的特有的、具体的、劳动的一个自然属性。

这个观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斯密扬言他所称的“交换倾向”是人性所特有的性格，他在动物，特别在狗中，没有找到这种性格。虽然斯密对动物中交换倾向的存在表示怀疑，他赋予动物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如同人类劳动一样，特别当他有时重新堕入重农学派的学说中的时候：

“没有比农业家以同量的资本推动更多数量的生产劳动的了。不仅他的雇工，而且他的耕畜是生产劳动者……。”^①

“所以，农业中所使用的劳动者和耕畜，象制造业中的工人一样，不仅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所消费的价值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的价值以及资本所有者利润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远远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利润之上，他们经常造成地主地租的再生产。”^②

斯密认为价值的创造是劳动的直接生理的属性，人类中动物有机体的表现，他这个信念在这里最生动地表达出来了。正象蜘蛛从自己身上生产蜘蛛网一样，劳动的人生产价值——单纯劳动的人，每个人生产有用的物体——因为劳动的人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者，同样地，人类社会是天然地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造成的，而商品经济是人类经济的正常形态。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148页。

② 同上书，第149页。

直到馬克思，才認識到一個特定的價值代表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所發展的一定的社會關係。這樣，馬克思接着區別生產商品的勞動的兩個方面：具體個別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當這點區別被指出來之後，貨幣問題的解決是昭然若揭的，好像光綫集中地照耀在上面似的。

為了要區別資本主義經濟中靜態的勞動二重性，即勞動的人與創造價值的商品生產者的二重性，馬克思必須從動態的歷史過程中，把商品生產者從單純勞動者中區別開來。在他能夠洞悉資本主義的奧秘之前，他必須發現商品生產是社會生產的一個特定的歷史形態。簡言之，馬克思必須採取與古典學派截然相反的演繹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在他的研究方法中，他必須否定古典學派把資本主義生產看作正常的人性因素的信念，而只承認它的歷史暫時性：他必須把古典學派的形而上學的演繹法變為相反的，即辯證的演繹法。

在這點上，斯密不可能認識到創造價值的勞動的兩個方面之間的清楚的區別，一方面它把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舊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物中去，另一方面它又同時創造新價值。此外，斯密的總價值能完全分解為 $V+m$ 的教條還有一個來源。如果我們認為斯密沒有看到所生產的每一商品不僅包括生產中所創造的價值，而且還包括在製造過程中所耗用的一切生產資料所包含的價值，那是錯誤的。斯密不斷地要我們從一個生產階段轉移注意到前一個階段——象馬克思所指責的，把我們引得東奔西竄，借以證明總價值有全部分解為 $V+m$ 的可能——從這一事實，斯密證明自己是充分了解這一點的。在這裡令人驚異的，是他再三地把生產資料的舊價值也分解為 $V+m$ ，終於它吞沒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價值。

“比方說，谷物的價格，會有一部分支付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維持生產上使用的勞動者和耕畜給養的工資，第三部分支付租地農業家的利潤。這三部分（工資、利潤和地租）似乎直接地

或終局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第四部分也許可以設想是必要的，因为租地农业家的資本必須补偿，耕畜和其他农具的磨損也必須补偿。但必須考虑到任何农具的价格，例如耕馬，本身也是由同样三部分构成的：养馬的土地的地租，养馬的劳动，以及垫支这种地租和这种工資的租地农业家的利潤。所以，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馬的价格和它的給养所費，但全部价格还是直接地或終局地分解为三个部分：地租、劳动和利潤。”^①

显然，斯密的混淆产生于下面的前提：第一、所有劳动都借助于这种或那种生产資料而进行的——但与某一劳动相結合的生产資料（如原料、工具等），如果不是前一时期劳动的产物，又是些什么呢？面粉是面包师用以加入新劳动的生产資料，但面粉是磨坊生产的結果，而在推磨者手中，它不是生产資料而是生产物，正象面包和点心现在是面包师的生产物一样。这个生产物面粉又以生产資料谷物为前提，而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一步，这谷物在农业家手中不是生产資料，而是生产物。我們不能找到任何一种包含价值的生产資料，其本身不是以前劳动的生产物。

第二、从資本主义角度来講，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所有在制造任何商品中完全耗用掉的資本都能最終分解为一定数量的已完成的劳动。

第三、商品的全部价值，包括所有的資本垫支，不难同样地分解为一定数量的劳动。凡是对每一商品适用的，对于社会在一年中所生产的总商品量也必然是适用的；这总商品量的总价值也能同样地分解为一定数量的已完成的劳动。

第四、所有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劳动分为两部分：有偿劳动，它补偿所垫支的工資；无偿劳动，它創造利潤和地租，即剩余价值。这样，所有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使用的劳动符合于我們的公式

^① 亞当·斯密：“國富論”，卷一，第86—87頁，部分譯文引自“資本論”，第二卷，第457頁。

$V+m$ 。①

所有上述的論点是完全正确的和无可非議的。斯密运用这些論点的方式足以証明他的科学分析是始終一致、万变不离其宗的。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观念是在重农学派的研究上一个显著的进步。只是在他的第三論点上，他偶然地在最后結論中誤入了歧途，因为他說年生产商品总量的总价值能分解为这一年的劳动，虽然在別处他自己有足够的銳敏力来承認一个国家在一年中生产的商品价值必然包括以前历年的劳动，这就是說，体现在移交下来的生产資料中的劳动。

即令上述的四点本身是完全正确的，斯密从它們所得出的結論——每一商品的全部价值，同样地，社会的年商品总量的全部价值，都能完全分解为 $V+m$ ——是絕對錯誤的。他所持的下列见解是正确的，即一个商品的全部价值除了代表社会劳动外，沒有其他东西，但他把这一点与所有价值除了 $V+m$ 外，沒有其他东西这一錯誤原理混同起来了。 $V+m$ 公式表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活劳动的功能，或者毋宁表示活劳动的双重功能：第一、补偿工資或可变資本；第二、替資本家創造剩余价值。由于商品的价值实现为金錢，工資劳动在資本家的雇用下完成了这个功能。資本家取回他以工資形态墊支的可变資本，并把剩余价值攫为己有。所以， $V+m$ 表示工資劳动和資本家間的关系，这个关系每当商品生产过程結束时即告終止。一旦商品出售了， $V+m$ 的关系对資本家而言已实现为金錢了，那时，全部关系是被消灭了，在商品上再也看不出任何痕迹了。如果我們考察商品及其价值，我們不能确定它是由有偿劳动生产的呢，还是由无偿劳动生产的，也不能确定这两者所提供的形成何种比例。只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商品包含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而这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是在交換中表现

① 在这里我們沒有考虑到貫串在斯密著作中的一个相反观念。按照这个观念，商品的价格不能分解为 $V+m$ ，虽然商品的价值包含 $V+m$ 。但这个区别对于斯密的价值論比在这里我們文中所討論的較为重要，因为我們这里主要是研究他的 $V+m$ 公式。

出来的。对于交换行为以及商品的使用来说，生产商品的劳动能否分解为 $V + m$ 这一问题是不相干的。在交换行为里，重要的是商品代表着价值，并且只有它的具体特性，它的有用性，才能与我们对它的利用发生关系。这样， $V + m$ 公式只表示资本与劳动的密切关系，工资劳动的社会功能，而在实际的生产物中，这完全被消灭了。垫支的、并投在生产资料上面的不变资本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每一种劳动活动需要若干原料、工具和房屋。这种情况表示资本主义特征的，是这样的事实：这些生产资料表现为资本， C 是作为劳动者以外并与劳动分离了的某个人的财产，作为自己不劳动的一些人的财产。其次，不变资本 C ，仅仅作为一笔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垫支，这里只表现为 $V + m$ 的基础。但不变资本的概念，其含义不止于此：它表示在人类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资料不依一切历史的或社会的形态为转移的功能。每一个人必须有原料和工具，即生产资料，不管他是南洋群岛的居民用来制造独木船，抑或是印度的农村公社用来耕种他们的公地，抑或是古埃及的农民用来耕种自己的村地或用来建筑法老的金字塔，抑或是在雅典小工场中的希腊奴隶，抑或是封建农奴，抑或是中世纪行会中的手工业师傅，抑或是近代工资劳动者。他们都需要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既然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它表示人类劳动与自然物质之间的联系，并构成人类生产过程的永恒的、普遍的前提。在 $C + V + m$ 公式中的 C 代表生产资料的某种功能，它不是在劳动过程的持续中被消灭掉的。对于一个商品的交换和实际使用而言，它是由有偿劳动或无偿劳动、由工资劳动或奴隶劳动、或强迫劳动或其他任何劳动所生产的，这是不相干的；但另一方面，在使用商品时，它本身是生产资料呢，还是消费品，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在生产机器中使用了有偿劳动呢，还是使用了无偿劳动，这对机器制造商和他的工人是有关系的，但也仅仅对他们有关系，对于社会，当它通过交换行为获得这部机器时，仅仅作为生产资料的这部机器的质地，仅仅这部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功能，才是有关重要的。正

如从远古时代起，每一生产的社会必须对生产资料的重要功能予以应有的注意，其做法是在每一生产周期内，安排制造下一周期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同样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达到每年生产符合于 $V + m$ 公式——这个公式表明工资劳动的被剥削——的价值，除非作为上一周期的结果，存在着为了补充不变资本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每一生产周期与下一周期特有的联系形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基础，而这一联系包含着这样的事实，即在每一周期内，一部分的生产物是被指定充作下一周期的生产资料的，然而这个关系在斯密的眼光下始终没有看到。斯密不关心生产资料在其使用过程中的特有功能，他所注意的生产资料，只是当作跟其他商品一样，本身是在资本主义方式下所雇用的工资劳动的生产物。在生产过程中，工资劳动所特有的资本主义功能掩蔽了斯密的眼睛，使他看不见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内的永恒的、普遍的功能。他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看法完全漠视了在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下面还有人与自然的一般关系。这里，似乎就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年生产物总价值可分解为 $V + m$ 的奇异教条的真正根源。他忽视了在 $C + V + m$ 的公式中第一项 C 是资本剥削工资劳动的一般社会基础的主要表现。

我们的结论是：每一商品的价值必须以 $C + V + m$ 公式表现。现在成为问题的，这个公式对于一个社会的商品总额适用到什么程度。让我们看看斯密在这一点上所表示的怀疑，他的声明说：个人的固定和流动资本以及他的收入，并不严格地与从社会观点来看的同样的范畴相符合（见第29页（3））。对于一个人是流动资本的，对于另外一个人不是资本而是收入，例如资本垫支为工资。这个说法根据了一个错误的论点。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他没有抛弃他的可变资本，让它分散在工人的手中而变为工人的收入。他不过以可变资本的价值形态交换它的自然形态，即劳动力。这可变资本永远留在资本家手中，起初是货币，后来是劳动力，更后来连同剩余价值回到资本家手中作为商品销售所得的现款收入。

在另一方面，工人从不占有可变資本。工人的劳动力对工人永远不是資本，而是他仅有的財產，劳动的能力是他所具有的唯一东西。其次，如果工人出售他的劳动力，而取得一笔貨幣工資，这笔工資对于他也不是資本，而是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所得的价格。最后，工人以他所取得的工資购买食物这一事实，对于这笔貨幣在資本家手中作为可变資本而發揮的作用，是沒有任何联系的，正如一个商品銷售者以銷售所得的貨幣作私人花用时一样。这不是資本家的可变資本成为工人的所得，而是工人出售他的商品“劳动力”所得的价格，至于可变資本，现在象以往一样，仍旧留在資本家手中，并發揮着它的特殊作用。同样錯誤的是把隐藏在机器中——即在我們的机器制造商的例子中——还没有实现的資本家所得（剩余价值）当作另外一个人，机器购买者的固定資本。这不是机器或其中若干部分，而是隐藏在机器中的剩余价值——工資劳动者的无偿劳动——形成了机器制造商的所得。当机器出售后，这笔所得只是象以前一样留在机器制造商的手中，它不过改变了自己的外形，从“机器形态”变为“貨幣形态”。反过来看，这部机器的买主，通过购买，并不占有了新的固定資本，因为在购买之前，这笔固定資本是以一定数量的现款形态保持在他的手里的。通过购买这部机器，他不过赋予他的資本以适当的物质形态，使它成为能生产的东西。在这部机器出售前后，所得或剩余价值始終是在机器制造商的手里，而固定資本也始終是在另一个人即购买机器的資本家的手里，正象在第一例中一样，可变資本总是在資本家手里，而所得总是在工人的手里一样。

斯密和他的信徒們之所以造成混乱，就是因为他們在考察資本主义交换时，把商品的使用形态和它們的价值关系混淆起来了。其次，他們沒有区别个别的資本和商品的流通，而这些流通是永远相互交錯的。同一的交换行为，从一方面看，能成为資本的流通，而同时，又是以消費为目的的簡單商品交换。对于一个人是資本的，必然对于另一个人是所得（或者反过来說，也是如此），这个錯

誤的說法因此必須改成這樣的正確說法：對於一個人是資本的流通的，對於另外一個人可能是簡單商品交換（或者反過來說，也是如此）。這只表明資本有經受轉變自己的特性的能力，並表示在社會交換過程中不同利益範圍的相互聯繫。與所得截然不同，資本始終存在在具有明確涵義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形態下，而這樣的存是在具有清晰的輪廓的。即令如此，斯密已經接近了真理，當他說個人的資本和所得不能與從社會觀點來看同樣範疇嚴格地等同起來。只是缺少一些進一步的聯繫環節才使得真正的關係不能清楚地揭露出來。

第四章 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圖式

現在讓我考察作為表現整個社會生產物的 $C + V + m$ 公式。它是不是一個理論性的抽象呢？還是在應用到社會生活時，表達着現實的意義——這個公式對整個社會而論，有沒有客觀的存在？一直到馬克思，才在經濟理論中確立了不變資本 C 的重要性。但在他之前的亞當·斯密，單靠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範疇來進行研究，實際上把固定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雖然他自己沒有理解到達到了這個結果。這不變資本不僅包括要經歷好幾年磨損的生產資料，而且還包括在一年中全部被生產所耗用的生產資料。斯密的總價值分解為 $V + m$ 的教條以及他在這一點上的論證促使他本人區分兩類的生產——活勞動和無生命的生產資料。在另一方面，當他企圖根據個人的資本和所得推論到社會再生產過程時，他所認為存在於這些東西之外的固定資本，實際上，就是不變資本。

每一個人資本家在生产商品时，使用若干物质生产资料，如房屋、原料和工具。为了生产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个人资本家所使用的全部物质生产资料显然是一个必要前提。在社会内存在这些生产资料是一个实际事实，尽管这些生产资料是以纯粹的私人资本形态存在的。这是在一切历史形态中社会生产的普遍的、绝对

的条件。^①

资本主义特有的形态表现在下列事实上：即物质生产资料是作为不变资本 C ，作为那些不劳动者的财产而起作用的；这是与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即工资劳动的对等物相比，刚好是另一极端。可变资本 V 是社会在一年的生产中所实际付出的工资总额。这个事实也是实际的客观存在，尽管它表现为无量数的个人工资。在每一个社会里，实际从事于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和工人们常年生活的维持是一个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在这个因素采取资本主义特有的形态 V ，即可变资本的情况下，到达工人手里的生活资料最初采取工资的形式，而工资是工人售给另一个人即自己不劳动的物质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力的价格；在这个形态下，它是后者的资本主义财产。其次， V 是一个货币总额，这就是说，它是工人生活资料的纯粹价值形态。这个 V 的概念意味着工人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即个人自由和与一切生产资料分离而达到的“自由”。它也表达这个事实：在一个社会里，生产的普遍形式是商品生产。

最后，剩余价值 m 代表个人资本家所赚得的所有剩余价值的全部。每一社会进行剩余劳动，即令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如此。它之必须进行剩余劳动，有三重意义：它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来维持非工人的成员（不能工作的人，如儿童、老人、残废者，以及政府官吏和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不直接参加物质^②需要的满足）；它必须提供一笔社会保险基金来应付威胁常年生产的自然灾害，如歉收、森林起火和水灾等；最后，它必须提供以增加生产为目的的一笔基金，或则由于人口的增加，或则由于文明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更多的需要。就是在下列两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特点：剩余

^①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采用一般的提法，在这里和下面都用“每年生产”一词，虽然这个提法，严格地说，只一般适用于农业。工业生产或资本周转的周期未必与日历年相吻合。

^② 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区别不必形成在人口中的特殊门类。它会在若干精神领域的存在中表现出来，而这些领域必须予以物质的支持。同样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内发挥这些不同的功能。

劳动是(1)作为剩余价值,即可以变为现款的商品形态出现的;(2)作为不劳动者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出现的。

同样地,如果我们把 $V + m$ 两个数量合起来考察,我们看到它们代表有普遍正确性的客观数量:社会在一年中所完成的总的活劳动量。每一个人类社会,不管属于那一种历史形态,必须在其所获得的结果上,在其现存所使用的劳动力一般的关系上,对此事实(即数量)加以注意。 $V + m$ 的区分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依社会的特殊历史形态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这个区分不仅表现在上面已经指出的 V 和 m 的质的特点,而还表现在量的关系上: V 趋向于被压低至最低水平,仅足够维持工人的生理的和社会的存在,而 m 趋向于以牺牲 V 为代价,相对于 V 而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表现在这最后情况上: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是生产真正的目的和动机。

我们已经考察了总生产物的资本主义公式所依据的诸关系,并发现这些关系是普遍适用的。在每一计划经济里,这些关系被作为社会有意识控制的对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决定这些关系的是工人团体及其民主机构;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则为上层有产阶级及其专制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没有这样有计划的控制。社会资本总额与社会商品总额实际上同样地包括无量数的个人资本和各种类的商品合计起来的。

这样,问题发生了: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总数本身是不是比一个单纯的统计结果具有更多的意义,而这个统计结果还是不精确的,有很大出入的。用整个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看到私人企业的个人自主的、完全互不依赖的存在只是在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形态,而社会相互联系才提供了基础。尽管个人资本是在完全互不依赖下行动的,并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的控制,但资本的运动形成了一个性质一致的整体。这个运动也表现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形式。在每一种计划生产的制度下,首要的是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劳动与生产资料间(按照我们的公式, $V + m$ 与 C 间)的关系,或

者必要消費品的總額(按照我們的公式,又是 $V + m$)與 C 間的關係受到控制。而在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有為維持無生命的生產資料所必需的社会勞動和為維持活勞動所必需的社会勞動是作為同樣東西、資本來看待的,它是與已完成的剩餘勞動,即剩餘價值 m 不同的。這兩個數量 C 和 $(V + m)$ 間的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明顯的、真實的客觀關係:這是平均利潤率;每一資本實際上是被看作一個共同體,即社会總資本的一部分,並按它的數量大小,在从社会所榨取的剩餘價值中分配給它應得的利潤,不管這筆資本實際所創造的有多少。這樣,社会資本及其對等物,社会剩餘價值的全部,不僅是客觀存在的真實數量,而且更重要的,它們間的關係,即平均利潤,指導着和指揮着交換的整個過程。這是在下列三種方式下進行的:(1)通過價值規律的運用,建立各種商品數量上的交換關係,不依賴於它們特有的價值關係;(2)通過社会分工,把資本和勞動的若干部分分配給各個生產部門;(3)通過勞動生產率的發展,一方面刺激個人資本從事於開拓性的工作,以取得高於平均率的利潤為目的,另一方面把個人取得的進步推廣到全部生產領域去。總之,通過平均利潤率,社会總資本完全控制了個人資本的表面上獨立的運動。

這樣, $C + V + m$ 公式適用於在資本主義下社会所生產的商品總額,並不亞於適用於每一個別商品的價值構成。但這僅是對於價值構成可以這樣說,再進一步,這兩者的相似性就不能推論下去了。

如果我們把一個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社会的總生產物看作一年勞動的產品,而希望對它按其各個組成部分進行分析,那麼,這個公式誠然是完全確切的。 C 的數量表示在本年的生產物中吸收了幾多的在生產資料形態下的往年勞動。 $V + m$ 的數量就表示在上年度中新勞動所創造的生產物的價值組成部分; V 和 m 間的關係最後告訴我們社会常年的勞動方案是如何在維持工人生活和維持不勞動者生活這兩個任務中進行分配的。這個分析對個人資本的

再生产也是适用的、正确的，不管这笔资本所已经创造的生产物的物质形态是什么。C, V 和 m 三者对于机器工业的资本家同样表现为机器及其部件；对于音乐厅老板，它们又同样表现为舞蹈家的动人魔力和杂技家的技巧。只要生产物还没有被区别开来，C, V 和 m 只是作为价值中各个完整的组成部分而相互区别的。这对于个人资本的再生产已很足够了，因为这种再生产是以资本的价值形态为起点，即以实现制成品所得的一笔货币为起点的。C + V + m 公式于是成为分割这笔货币额的基础，一部分用来购买物质生产资料，第二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力，第三部分——最初在简单再生产情况的假定下——供资本家个人消费。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第三部分再进行分割，只有一部分是用之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其余用来增大他的资本。为了实际上再生产他的资本，资本家当然必须把这样分割出来的资本带到商品市场上去，以获取在生产上必需的物质前提，如原料、工具等等。在个人资本家和他的科学上的理论家、庸俗经济学者看来，如果这个资本家能够事实上在市场上找到刚好他在营业上所需要的那些生产资料，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于一个社会的总生产而言，其地位是不同了。从整个社会来看，商品交换只是总生产物中各个部分转手时所造成的商品的移动，而这生产物的物质构成是不会因这个过程而改变的。正如象以前一样，在这样的移动地位后，总资本有可能再生产出来，只有当前一周期的总生产物中有：第一、足够数量的生产资料；第二、足够数量的生活用品用来维持与过去数量相同的劳动；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在符合资本家及其随从者的地位下维持他们生活所必需的货物。这就使我们转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涉及的已不是单纯价值关系的观点，而是物质的观点了。这里有关重要的，是社会总生产物的使用形态。个人资本家所认为别人管不着的事情成为对于资本家全体有重大关系的事情了。尽管对于个人资本家而言，他生产机器、糖、人造肥料、抑或进步报纸，只要他

能够为他的商品找到一个主顾使得他能够收回他的資本連同剩余价值,事情沒有絲毫的區別,但对于“总資本家”而言,极端重要的,是他的总生产物必須具有一定的使用形态。这就是指它必須提供三种要素:生产資料用来更新劳动过程,簡單生活用品用来維持工人,以及高級和奢侈品用来維持“总資本家”本人。他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不是空洞的、一般性的,而是精确地在数量上规定好的。如果我們問这“总資本家”需要这三类东西的数量是多少,那么,只要我們限制在作为我們研究起点的簡單再生产范围之内,上年总生产物的价值构成就給我們一个确定的估計。迄今为止,我們把 $C + V + m$ 公式看作仅是总价值在数量的分割,它同样地适用于总資本和个人資本,并代表包含在社会年生产物中的劳动数量。現在我們看到这个公式又是生产物的物质构成的基础。显然地,如果“总資本家”要进行与以前同样规模的再生产,他必須在他的新总生产物中找到与 C 大小相当的生产資料,与工資总数 V 相当的供工人消費的簡單生活用品,并与 m 相当的供他自己和他的随从者消費的高級生活用品。这样,我們对社会总生产物价值的分析可写成对生产物如下的一个总葯方:为了进行簡單再生产,社会的 C 的总额必須重新体现在相等数量的生产資料中, V 体现在工人的生活用品中,而 m 在資本家的生活用品中。

这里,我們接触到个人資本家和总資本家間的区别。个人資本家总是在这样方式下再生产他的不变和可变資本以及剩余价值的:所有这三部分都以相同的物质形态包含在他的同性质的生产物中,而且这物质形态是与这里的問題无关的,它可以在每一个人資本家手中有不同的性质。至于“总資本家”,他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再生产年生产物价值中的每一組成部分: C 作为生产資料, V 作为工人的生活用品, m 作为資本家的生活用品。在个人資本的再生产中,价值关系观点与物质观点間沒有歧异之处。此外,很明显的,个人資本可以集中注意价值方面,把物质条件当作天賦的法律,当作商品交換中不言而喻的现象而接受下来,但“总資本家”

却必須估計到物質觀點。如果社會的總C每年沒有以同等數量的生產資料形態再生產出來，每一個人資本家將注定在商品市場上以他所實現的C的現款找不到供他個人再生產需要的物資。從總資本再生產的觀點看， $C+V+m$ 公式是不適當的。這再一次證明：總資本概念是現實的東西，它不僅僅是生產概念的注釋而已。但我們在論述總資本時，必須作出總的區別如下：我們必須指出它的三大類別，而不把它表現為一個同性質的整體；我們並不破壞我們的理論，如果為了簡便起見，我們目前只考慮總資本的兩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與工人和資本家消費品的生產。我們必須在遵守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下，分別考察每個部類。同時，從再生產觀點看，我們還必須着重指出這兩部類的相互聯繫。因為，只有當一個部類聯系到另一個部類來考慮時，它們才形成了整個社會總資本的基礎。

我們以考察個人資本為起點。但我們必須以不十分相同的方式着手論證總資本及其總生產物。從數量上看，社會上的C，作為一個價值量，恰恰包括個人不變資本的總和，其他數量，V和m也是如此。但這三者每一個的外形已經改變了——不變資本C在生產過程中是作為一個價值要素重新出現的，它表現許多極端不同的面貌，包括一連串的混雜的使用對象，但在總生產物中，它顯然歸結為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同樣也適用於V和m，這兩類既然是供工人和資本家用的適當數量的生活用品，它們在個人資本家手中是作為極其豐富多采的商品雜拌而重新出現的。亞當·斯密離認識這個事實已不遠了，當他指出：同樣的固定和流動資本範疇和收入範疇對個人資本家而言，與對社會而言，是不相符合的。

我們現在得出下列的結論：

(1) 公式 $C+V+m$ 用來既表示作為整個來看的社会生產，也表示個人資本家的生產。

(2) 社會生產分為兩部類，分別從事於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生產。

(3) 这两部类都按照资本主义方法进行活动，就是说，两者都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因而公式 $C + V + m$ 对这两部类是都适用的。

(4) 这两部类是相互依赖的，因此，这两者必然表现某种数量上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部类必须生产所有一切的生产资料，而另一部类必须生产两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所需的所有一切的生活用品。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进一步设计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图式如下：

I.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生产资料

II.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消费品

这图式中的数字所表达的价值量、货币数量是任意选择的，但它们的比例是准确的。每一部类是以它所生产商品的使用形态为特征。它们间的相互流通进行如下：第一部类为整个生产过程，为本身和第二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单从这一点来讲，可以看出：为了使再生产继续下去而不受干扰——我们仍然假设在原来规模上的简单再生产——第一部类的总生产 (I 6,000) 必须具有与两部类的不变资本总和 (I 4,000C + II 2,000C) 相等的价值。同样地，第二部类提供全社会的生活用品，供本部类自己的、以及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用。因此，可以得出：为了使消费和生产进行无阻，并照原来规模获得更新，有必要使第二部类所提供的生活用品总量在价值上等于社会上所雇用工人和资本家的全部所得 [这里， $II 3,000 = I (1,000V + 1,000m) + II (500V + 500m)$]。

这里，我们确是表明了不仅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而且作为每一社会的再生产基础的价值关系。在每一进行生产的社会里，不管它的社会形态如何，在巴西的巴开利的原始小农村的公社也好，在雅典第蒙的农庄及其奴隶也好，或者在查理大帝下的皇家农奴庄园也好，社会上可资利用的劳动力必须这样的分配，使得适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都生产出来。其中生产资料必须足数

当前生产生活用品和以后更新生产资料本身之用，而生活用品必须足敷维持从事于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工人以及一切不劳动者之用。

马克思的表式，大体上符合于社会再生产的普遍的和绝对的基础，只是它具有下列的特点：社会必要劳动这里表现为价值，生产资料表现为不变资本，维持工人所必需的劳动表现为可变资本，而维持不劳动者所必需的则表现为剩余价值。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两大部类间的联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等价物的交换。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从第二部类所取得的生活资料只能相等于他们对第二部类所提供他们自己的商品，即生产资料。在另一方面，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取决于它的不变资本的大小。因此，在生产生产资料中，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这里， $I(1,000V + 1,000m)$ 〕必须等于在生产生活资料中的不变资本〔这里， $II(2,000C)$ 〕。

在上述图式中必须加入一个重要条件。这两部类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实际上只是社会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这不变资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固定资本——房屋、工具、耕畜等——这些东西要用好几个生产周期，在每一个周期中只有它的价值一部分，按照其磨损量，被吸收在生产物中。第二部分是流动资本如原料、辅助性半制品、燃料、照明等——它的全部价值在每一个生产周期中被吸收在新生产物中。但对再生产有关系的只是在价值生产中实际被吸收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在正确表述社会流通时，我们可以不考虑没有被生产物所吸收的生产资料的剩余部分。这样做不至于削弱我们表述的正确性，不过，我们也不应完全忘记它。这一点是不难证实的。

让我们假设两部类实际上在年生产物中所吸收的不变资本为6,000C，其中包括固定资本1,500C，流动资本4,500C，而1,500C的固定资本代表房屋、机器和耕畜的每年磨损。假定这每年磨损等于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总价值的10%，那么，社会总资本实际上包

括 $19,500C + 1,500V$ ，而两部类的不变资本为固定资本 $1,500C$ 和流动资本 $4,500C$ 。既然总固定资本的寿命按照假设为十年，磨损率为10%，这固定资本经过十年才需要更新。在这期间，它价值的十分之一每年进入社会年生产物中。如果一个社会的全部固定资本，其磨损率相同，具有相等的寿命，它按照我们的假设就需要每隔十年全部更新一次。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固定资本的各部分，具有不同的使用形态，有些用得长久些，有些用得短暂些；不同种类的固定资本和各个固定资本的磨损和寿命也是不同的。因此，所有固定资本不必全部同时加以更新——把它的具体使用形态再生产出来——，仅仅部分的固定资本在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中不断地进行更新，而其他部分仍旧在原来形态下发挥作用。我们假设固定资本为 $15,000C$ ，磨损率为10%，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固定资本必须每隔十年全部同时更新一次，而是说，在全部社会固定资本中，每年平均更新和替换的部分相当于它的价值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第一部类为了满足社会对于生产资料的需要，必须每年不仅再生产全部原料和半制品等等，即它的流动资本，达到 $4,500$ 的价值，而且还再生产固定资本的使用形态——房屋、机器等等——达到 $1,500$ ，相当于固定资本每年磨损之数。如果第一部类继续这样地每年更新固定资本的十分之一的使用形态，结果将使社会全部固定资本每十年被新的出品彻底更换一次。由此可知上面所不加以考虑的那些固定资本部分的再生产问题，在上述的图式中是充分估计在内的。

在实践上，程序是这样的：每个资本家从他的常年生产中，从他实现商品所得，储存起一笔钱来偿付他的固定资本。这些每年的扣款必然是一笔资本，因此，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更新他的固定资本，这就是说，他已经以新的、更有效的东西来更新他的固定资本了。建立用以更新固定资本的准备金和定期使用这些积累起来的资金，以实际上更新固定资本，这个交替的过程对每一个资本家是不同的，所以，当有些资本家正在积累准备金时，另外一些资本

家已經开始进行更新了。因此，每年有部分的固定資本实际上是更新的。这里，貨幣程序只是掩盖了作为固定資本再生产特点的实际过程。

在更仔細的考察下，我們看到事情是應該这样的。固定資本的全部参加了生产过程，因为从物質方面看，房屋、机器、耕畜等有用物品是全部被使用的。在另一方面，作为固定資本的特殊性就在于只有一部分价值在价值的生产中被吸收进去，因为在再生产过程中（仍旧在簡單再生产的假設下），攸关重要的是在自然形态下补偿在年生产中作为生活和生产資料被实际耗用的价值。所以，固定資本只須按照它实际在生产商品中被耗用的数量而进行再生产。体现在固定資本的全部使用形态中所剩下的价值部分，对于生产作为一个劳动过程來說，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但对于社会常年再生产作为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來說，它是不存在的。

此外，这里以价值关系表示的这个过程也同样适用于每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不生产商品的社会。如果古时为了建設著名的莫埃里斯湖，連同相关的尼罗运河体系——据海洛道忒斯告訴我們，这个美妙的湖是用人工修筑的——我們假定需要1,000个埃及农民进行十年的劳动，而为了維持这个世界上最宏伟的排泄系統，假定每年还需要100个埃及农民（这些数字当然是任意选用的），那么，我們可以說，每隔一百年，这莫埃里斯水坝和运河被再生产一次，尽管在实际上，这全部工程并不是每一百年建筑一次。这显然是真实的。在政治历史上的风暴和异族入侵中，当这些古老的文化紀念物被粗暴地漠視时——例如英国人在印度所表现的，对古老文明中再生产需要的不理解——于是經過相当時間，整个莫埃里斯湖，它的水、堤和运河、以及在中間的两座金字塔，建筑在上面的巨象，以及其他神奇的建筑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修筑过似的。只有海洛道忒斯著作中的十行文字，托力曼地图上的一小点，古代文化的遺迹，以及村落和城市的遺迹，証实在这个宏伟的灌溉系統中曾經有一个时期出现过丰富的人类生

活，而今天在那里，只见到利比亚内部的几条干燥的沙漠地带和沿海的荒凉的沼泽而已。在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表式中，只有关于不变资本的一点，可能看起来令人感到不满意或不完备，这就是当我们追溯到全部固定资本最初创造的那个生产周期的时候。诚然，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转化的劳动，要较多于被吸收在常年生产物价值中，转而成为常年生产物所补充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在我们所举例子的数字中，社会总资本不是象图式中的 $6,000 C + 1,500 V$ ，而是 $19,500 C + 1,500 V$ 。虽然固定资本（我们假定为15,000）的1,500以适当的生产资料形态每年被再生产出来，但同等数量是在每年这个生产中被消耗掉的，尽管全部固定资本，作为使用形态看，即许多物品的总和，已经被更新了。十年以后，在第十一年，正象在其他各年一样，社会拥有固定资本15,000，而它每年所创造的只是1,500C；它的不变资本总额是19,500，而它所创造的只是6,000。显然，既然这个社会必定在以前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过这其余的13,500的固定资本，它拥有了超过我们表式所保证的过去积累的劳动。就在这个阶段上，社会每年的劳动必须奠基于若干被贮藏起来的以前的常年劳动。但，这过去劳动作为所有现在劳动的基础的问题，把我们引导到最初的开端，这个开端对人类经济的发展毫无意义，正如对物质的自然发展毫无意义一样。再生产表式把社会过程看作恒动的，看作无穷无尽事情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既不希冀证实它的最初起点，也不应该这样来证实。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以过去的劳动为基础，我们可以尽情追溯上去。社会劳动之没有开始，正如它没有终结一样。象海洛道忒斯的莫埃利斯湖一样，文明史中的再生产过程的起点消失在朦胧的传说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生产资料改变了形态，粗糙的旧石器为磨光的工具所代替，石制器具为典雅的青铜器或铁器所代替，手艺匠的工具为蒸汽机械所代替。但，虽然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不断地改变形态，社会已经拥有了为自己的劳动过程所需的若干数量的过去劳动，作为每年再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下，保存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社会的劳动采取了资本的形态，而形成再生产过程基础的这个过去劳动的起源问题就成为资本的发生问题。这是较少地具有传说性的；的确，它是以血的文字写入在近代史中的。然而，除非我们假定有一笔过去劳动的贮藏，在数量上超过了常年为维持社会而必须完成的劳动，我们便不可能有简单再生产，这一事实正是碰到了简单再生产的创痛之处。它表明简单再生产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而且在一般文明的进步中，是一个虚构的事实。如果我们只要求正当地了解这虚构的事实，并把它简化为一个表式，我们必须假定有过去生产过程的结果作为它的先决条件，而这过去的生产过程不能限于简单再生产，它坚决地指向扩大再生产。为了说明起见，我们可以拿社会总固定资本与铁道相比。铁道各部分的耐用程度，从而每年的磨损率是各不相同，相差很远的。隧道和桥梁可以维持几百年，蒸汽机可以维持几十年，而其他车辆将在较短时期内消耗掉，有些只能用几个月。但有可能计算出一个平均磨损率，假定说它三十年，这样，整个铁道的价值每年磨损三十分之一。这个价值的损失不断地通过铁道的部分再生产（可当作修理看）而得到补偿，所以，今天更换了一节客车，明天更换了机器的一部分，后天又更换了一段枕木。根据我们的假设，三十年以后这条旧铁道被一条新铁道所替代了，这里，由社会每年完成同量劳动，结果是实现了简单再生产。但铁道能够在这样方式下实现再生产——它不能在这样方式下被生产出来。^①为了使铁道合用，并修补它的逐渐磨损部分，它必须首先造好。尽管铁道可以按各部分进行修理，但它不能一点一滴地分散使用，今天一个车轴，明天一节客车。的确，固定资本的实质就在于它必须以它的整体进入生产过程中去，作为一个物质的使用价值。为了首先准备好这个使用形态，社会必须使用比较集中的劳动量来制造它。以我们的例子来说，用来

① 指实际修建而言。——译者

进行修理的三十年劳动必须压缩到二、三年中去。因此，在这制造期间，社会必须花用远超过平均量的劳动量，这就是说，它必须乞助于扩大再生产；随后，当铁道造好了，它可以回复到简单再生产。虽然我们不必把全部固定资本设想为一个单一的、联贯的、使用物品或者许多物品的一个结合体，它必须全部一次生产出来，但较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房屋、运输机关和农业诸设备等要求较集中地使用劳动，这不仅对于近代铁道和轮船如此，而对于粗糙的石斧和手推磨坊也是如此。所以，只是在理论上可以设想把简单再生产看作扩大再生产的替代，后者不仅是进步文明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一般条件，而且对于固定资本的经济形态或在每一种社会中相当于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而言，也是一个先决条件。

马克思只是间接地论到固定资本的形成和简单再生产间的冲突，即在他涉及固定资本磨损的变动，有些年份比另一些年份较快的时候。这里，他强调永恒“生产过剩”的需要，即扩大再生产，因为严格地执行简单再生产政策将周期地引起再生产的损失。简言之，他是在社会固定资本的保险基金方面，而不是从实际生产过程角度，看到扩大再生产。^①

在另一不同的行文中，马克思看来同意上述的意见。在“剩余价值学说史”卷二第二编中，他在分析收入转化为资本时，谈到固定资本的特殊再生产，即固定资本的更换本身已经提供了一笔积累基金。他得出下列的结论：

“关于这一层，我们所要讨论的如下：即使在机器制造中所使用的总资本只够补偿机器的每年磨损，每年生产的机器会较需要多得多，因为磨损的部分地发生只是理想，而实际上，只在若干年后才需要以实物形态来更换。这样使用的资本每年供应一批机器，可以用作资本投资并为新的资本投资作准备。让我假定一个机器制造商今年开始生产。在本年内，他供应12,000镑的机器。如果他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83—586页，关于在偿还基金方面有扩大再生产的必要，见同上书，第207—208页。

只再生产他以前所制造的机器，在以后十一年內，他只須生产1,000鎊的机器，即令如此，一年的生产不能在当年內消費。如果他运用他的全部資本，他所生产的更不能消費掉。为了繼續运用这笔資本，为了使这笔資本每年得到再生产，凡是需要这些机器的制造部門必須有新的、不断的扩张。如果机器制造商本人也进行积累，那更需要这样了。因此，即令投在某一生产部門的資本进行着简单再生产，^①必須同时有其他生产部門的不断积累伴随着”。^②

我們可以拿馬克思的机器制造商的例子來說明固定資本的生产問題，其推論是如果一个社会在这个範圍內維持简单再生产，每年运用同量的劳动来生产固定資本（在实际生活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所有其他範圍內的年生产必須扩大起来。但如果在其他範圍內也維持简单再生产，那么，对一經創造出来的固定資本如果仅仅进行更新的話，只有在原来創造时所使用的劳动的一小部分才能使用得上。或用另一种說法：如果一个社会对固定資本进行大规模的投資，即令在整个社会实行简单再生产的假設下，它必須周期地求助于扩大再生产。

随着文明的前进，生产資料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本身所代表的价值量上——或更好地說，在其本身內部貯存的社会劳动上——发生变化。除了为了直接保存社会本身所需的劳动外，一个社会有愈来愈多的节余的劳动時間和劳动力，用来在不断增大的规模上制造生产資料。这如何影响再生产过程呢？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如何从每年劳动中創造較过去所拥有的更多的資本量呢？这个問題涉及扩大再生产問題，而我們至今还没有時間討論它。

① 着重点是馬克思加的。

②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三联書店版，第580—581頁。

第五章 貨幣的流通

在我們對再生產過程的研究中，我們至今還沒有考慮到貨幣的流通。這裡，我們並不把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價值的體現來論述，因為社會勞動的所有一切關係已經以貨幣來表現、假設和計量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從貨幣作為交換手段這方面檢查我們的簡單再生產圖式。

魁奈已經看到如果我們假定除了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外有一定數量的貨幣，我們就會了解社會再生產的過程。^①

現在發生兩個問題：（1）貨幣應該為誰所有？（2）應該有多少貨幣？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無疑地，是工人以貨幣形態取得工資，並以這些貨幣購買消費品。從社會觀點來看，這只意味着工人被分派到消費基金中的一個份額，而每一個社會，不管它的生產的歷史形態怎樣，總是對工人進行這些分派的。但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一個基本特徵就在於工人不是直接以實物形態，而是通過商品交換，取得他們的份額的，正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特點是勞動力也不是直接作為個人控制關係的結果，而是通過商品交換，而被使用的：工人以自己的勞動力出售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自由地購買他們的消費品。貨幣形態的可變資本是這兩種交易的表現和媒介。

這樣，貨幣首先通過工資的支付而進入流通。資本家階級因此必須首先把一定數量的貨幣流通起來，而這個數量必須與他們所支付的工資額相等。第一部類的資本家需要1,000單位的貨幣，

^① 在魁奈：“經濟表”的第七附注中，他在批駁重商主義把貨幣和財富等同起來的理論後，接着說道：“一個國家的貨幣數量不能增加，除非這個再生產本身有所增加；否則，貨幣數量的增加必然會損害每年財富的生產……所以，我們不能以貨幣數量的多寡作為判斷國家貧富的根據；因此，對於一個有規則地進行流通和在信任和充分自由條件下開展商業的農業國家，貨幣的數量，如果等於地主的所得，那麼，可以算作大大地超過足夠而有多餘了。”（“經濟表的分析”，Oncken版，第324—325頁）

第二部类的資本家需要500单位,来支付他們的工資賬。这样,按照我們的图式,两笔貨幣是在流通中:Ⅰ(1,000V)和Ⅱ(500V)。工人把全部1,500用在消費品上,这就是說,用在第二部类的生产物上。这样,劳动力得到了維持;这就是說,社会可变資本是以自然形态被再生产出来,作为所有其他資本再生产的基础。同时,第二部类的資本家出售他們的总生产物(1,500)如下:他們自己的工人取得500,而第一部类的工人取得1,000。这项交換使第二部类的資本家拥有1,500单位的貨幣:500是回到他們手中的他們自己的可变資本;这笔錢可能作为可变資本再流通起来,但目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路程。其余的1,000是他們年复一年从实现他們生产物的三分之一中得到的。第二部类的資本家现在以这1,000单位的貨幣向第一部类的資本家购买生产資料用来更新自己的不变資本中已經用去的部分。通过这笔购买,第二部类以自然形态更新了它所需的不变資本ⅡC的半数。第一部类现时收回了1,000单位的貨幣,这就是它原来付給工人的貨幣。經過两次轉手,这笔貨幣又回到第一部类,此后将作为可变資本而发生作用。到此为止,这笔貨幣完成了流通过程,但在社会上的流通还没有終結。第一部类的資本家还没有实现他們的剩余价值来为自己购买消費品;这剩余价值还包含在对他們在形式上没有用处的他們的生产物中。此外,第二部类的資本家还没有更新他們的不变資本的其余半数。这两笔交換行为在实质上和在价值上是等同的,因为第一部类的資本家以第二部类的資本家所需要的生产資料Ⅰ(1,000C)向第二部类交換到他們的物品。但是,为了实行这笔交換,需要一笔新的貨幣。不錯,那笔已經完成它的路程的貨幣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再投入流通——在理論上,这是无可非議的。但在实践上,这样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資本家作为消費者的需要,正象工人的需要一样,必須經常得到滿足——它們与生产过程相平行,并必須有特殊数量的貨幣作为媒介。由此可知,两部类的資本家,亦即所有資本家,除了作为可变資本所需要的貨幣以外,必須另有一笔

現款留在手中，用來實現他們的剩餘價值，使之成為消費品形態。在另一方面，在全部生產物實現之前，並在生產過程中，不變資本的某些部分必須不斷地購買進來。這些是不變資本的流動部分，如原料、輔助材料、半製品、照明費用等。所以，不僅第一部類的資本家必須在手中有一定數量的貨幣，用來滿足作為消費者的需要，而且第二部類的資本家也必須有貨幣來滿足他們對不變資本的需要。這樣，1,000mⅠ（包含在生產資料中的第一部類的剩餘價值）對物品的交換是以如下的貨幣完成的：一部分是第一部類的資本家為了滿足他們作為消費者的需要而墊支的；另一部分是第二部類的資本家為了滿足他們作為生產者的需要而墊支的。^①這兩類資本家可能各自墊支為交換所需要的500單位的貨幣，也可能兩者墊出了不同的比例。不管怎樣，有兩件事情是確定的：（a）兩部類為這個目的而提供的貨幣必須足夠實現Ⅰ（1,000m）和Ⅱ（1,000C）間的交換；（b）不管這筆貨幣在兩部類間的分配如何，交換完成后，每一部類必須又擁有了它以前所投入流通的同量貨幣。這第二個原則相當普遍地適用於整個社會流通：流通過程一告結束，貨幣總是會回到原來的起點的。這樣，所有資本家，在實現普遍交換后，獲得了雙重的結果：第一、他們以對他們在自然形態下無用的生產物換取對他們在自然形態下作為生產資料或為了自己消費所需要的其他生產物。第二、他們重新擁有他們為了實現這些交換行為而投入流通的貨幣。

這個現象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是不可理解的，因為在那里，商品和貨幣不斷變換位置——商品的占有排斥了貨幣的占有，因為貨幣經常奪取了商品所讓開的地位，反之，也是如此。誠然，當商品交換是社會流通的形式時，這對於每個人的商品交換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513—514頁）以第二部類的資本家所直接動用的貨幣作為這個交換行為的起點。正如恩格斯正確地在他的附注中指出，這並不影響流通的最後結果，但這個假設不是社會流通的正確條件。馬克思自己曾在‘資本論’第二卷，第492—495頁有較好的闡述。

行为是完全适用的。但这个社会流通本身不仅限于商品的交换；它是资本的流通。这一种流通的主要特点是：它不仅使资本家的原有资本价值，连同—个增加额，即剩余价值，回到资本家的手中，而且它还通过提供在生产资本的自然形态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通过保证维持那些不劳动者的生活来帮助社会再生产。资本家占有了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货币，他们发动社会总流通过程；当社会资本完成了它的循环，一切又落到他们的手里，按照每一部类的投资额分配到每一部类去。工人只暂时占有货币，在这期间，他们把可变资本从货币形态转化为自然形态。在资本家手中的可变资本不是别的，而是他们部分资本的外形，而由于这个原因，它必然回归到他们手中。

迄今为止，我们只考虑到在两大生产部类间发生的流通。但第一部类产品中4,000单位还以生产资料的形态停留在那里，等待用来更新本部类的不变资本4,000 C。此外，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品500〔相当于剩余价值II (500m)〕也以消费品的形态留在本部类供资本家之用。既然两部类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无计划的私人生产，每部类就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方式，这就是说，通过在同部类的资本家间的大量个人销售交易，来在自己的资本家间分配本部类的生产物，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的消费品。所以，两部类的资本家必须有一笔货币准备金，用来进行这些交换行为——更新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供资本家用的消费品。这一部分的流通并不显示任何特别令人感到兴趣之处，因为它不过是简单商品流通。买卖双方同样地属于同一类的生产代理人，而流通只牵涉到在同一阶级和同一部类内部的货币和商品的易手。但不管怎样，这种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从一开始就必须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这是他们资本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即令我们考虑到货币的流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并不显示任何特殊之点。很明显，在一开始时，一个社会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才能使这流通成为可能。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

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形態是商品生產形態，而商品生產形態包含貨幣的流通；第二、資本的流通奠基於三種資本形態的不斷交替上面：即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最後，既然作為資本而活動的就是這筆貨幣——我們的圖式專指資本主義生產而言——資本家階級必然占有這筆貨幣，因為它占有了所有其他形態的資本；資本家階級把貨幣投入流通中去是為了在流通過程一經完成時重新占有這筆貨幣。

初看起來，只有一點引起我們的注意。如果資本家自己把所有在社會上流通的貨幣活動起來，他們必須也墊支實現他們自己的剩餘價值所需要的貨幣。這樣，資本家階級好像有必要以自己的貨幣購買自己的剩餘價值。既然資本家階級由於以往生產周期的結果，甚至在每個生產期的生產物被實現以前，就占有了這筆貨幣，那麼，初看起來，剩餘價值的占有不是以工資勞動者的無償勞動為基礎——實際上是以這個為基礎——而僅僅是商品對同等量的貨幣的交換的結果，而這兩者又都是資本家階級自己提供的。但我們稍加深思就可消滅這個錯覺。在流通完成之後，資本家現時象以前一樣，獲得回歸於他們手中或留在他們手中的同額貨幣。此外，他們獲得與他們已經消費的同等量的消費品（注意我們仍然限於簡單再生產作為我們再生產圖式的基本條件：生產以原有規模更新，而所生產的全部剩餘價值用來供資本家階級的个人消費）。

而且，如果我們不以一個生產周期為限，而觀察幾個連續的周期的相互聯繫，上述的錯覺就完全消失了。資本家以實現自己的剩餘價值為目的今天以貨幣形態投入流通的價值事實上不是別的，而是前一周期生產結果所得到的剩餘價值的貨幣形態。資本家必須從自己的口袋中墊出貨幣來購買供自己消費的商品。在一方面，他每年生產的剩餘價值或者採取了不适宜消費的形態，或者採取了適宜於消費的形態，但暫時是在別人的手中。在另一方面，他（資本家）已經重新取得了貨幣，他現在通過實現前一周期的剩

余价值来垫支货币。一旦他实现了包含在商品形态中的他的新剩余价值,这笔货币又将回到他手中了。因此,在几个生产周期的进程中,资本家阶级从共同物品总汇中,既吸取了它的消费品,又吸取了它的其他自然形态的资本。但是,原来在它的手中的货币没有受到这个过程的影响。

对社会上货币流通的考察告诉我们:个人资本家决不能把他的全部货币资本投入生产中去,他必须经常保留若干货币准备金,用作可变资本,即工资。其次,他必须保留若干资本准备金,用来在任何规定期间购买生产资料。此外,他必须保有一笔现金准备供自己个人消费之用。

这样,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带来了货币本体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货币也是资本,因为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马克思的图式设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限。这样,这个图式似乎是不完全的。我们应该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Ⅰ)和消费品(Ⅱ)]之外,增加一个部类,生产交换手段的部类。诚然,这第三部类的特点是它既不能用来生产,也不能用来供应消费,而仅仅是代表在一种不能使用的、没有差别的商品中的社会劳动。虽然货币及其生产,象商品的交换和生产一样,远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但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把货币流通变为社会流通的一般形态,并从而变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表明货币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其他两部类间的原始关系,我们就可得出了一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要点的全面图景。

但是,我们在这里离开了马克思。马克思把黄金的生产(为了求其简便起见,我们把整个货币的生产简化为黄金的生产)包括在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中。

“金的生产,和金属一般的生产一样,只属于第Ⅰ部类,那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88页。

只有当黄金的生产是工业用金(首飾、牙医用品等)的生产时,这是正确的。但作为货币用的黄金不是金属,而是社会劳动的抽象的体现。因此,它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消费品。此外,只要約略地看一下再生产图式的本身,就可发现把交换手段和生产资料混同起来的結果是何等自相矛盾。如果我們在社会生产的两部类之外,加上一个作为货币本体的黄金的常年生产的图式表现,我們得出下列三套数字:

$$\begin{array}{l} \text{I. } 4,000 C + 1,000 V + 1,000 m = 6,000 \text{ 生产资料} \\ \text{II. } 2,000 C + 500 V + 500 m = 3,000 \text{ 生活资料} \\ \text{III. } 20 C + 5 V + 5 m = 30 \text{ 交换手段} \end{array}$$

这30的价值量,为馬克思所选择作为例子的,显然不代表常年在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它只代表每年再生产的部分,即每年货币本体的磨損量,这磨損量,平均說来,只要社会再生产維持在同一水平上,是不变的。資本的周轉有規則地进行着,商品的实现也以相同的步調前进。如果象馬克思要我們做的那樣,把第三行看作第一行整体的一部分,下面的困难就发生了:第三部类的不变資本包括真实的、具体的生产资料、房屋、工具、輔助材料、船只等等,正象其他两部类一样。然而,它的生产物 30g 代表货币,它不能以它的自然形态在任何生产过程中作为不变資本而起作用。所以,要是我們把这30g包括在第一部类的生产物(6,000生产资料)中作为一个主要部分,生产资料将表现对全社会短缺了这个数量,这将妨碍第一和第二部类在旧规模下重新进行再生产。按照以前的假設——这是馬克思整个图式的基础——整个再生产是从每部类的生产物在它的实际使用形态上开始的。这个图式的各項比例是以这样的假設为基础,即沒有它,它們将成为一团糟。这样,第一个基本价值关系是根据下列方程式: $I(6,000)$ 等于 $I(4,000 C) + II(2,000 C)$ 。这不能适用于生产物 III (30g), 因为两部类中沒有一个部类能够把黄金用作生产资料〔假定按 $I(20 C) + II(10 C)$ 的

比例]。从这里得出的第二个基本关系是根据下列方程式： $I(1,000V) + I(1,000m) = II(2,000C)$ 。这将意味着对黄金生产而言，从第二部类所取得的消费品数量是与对它供应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等的。但这也是不对的。尽管为了生产黄金，从社会总生产物中取去了具体的生产资料，用来作为它的不变资本，尽管它也取去了相当于它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的消费品，供它的工人和资本家之用，它所供应的生产物不能在任何生产部门中当作生产资料起作用，也不能作为适合人们消费的消费品。所以，把货币的生产包括在第一部类的活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图式中表现价值关系的所有一切比例关系，并从而削减了这个图式的正确性。

马克思企图在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内为黄金的生产找到一席之地，从这个企图还得出一些不可靠的结果。在这个新的附属部类(马克思称之为 Ig)和第二部类(消费品)间的第一件流通行为照例是工人以从资本家得来的作为工资的货币，向第二部类购买消费品。这笔货币还不是新生产周期的生产物。它是被 Ig 部类的资本家从包含在上一周期的生产物中的货币中贮藏起来的。这诚然是一个正常的步骤。但现在马克思让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以所贮藏的货币向 Ig 购买相等于价值2的黄金，作为商品材料。这是从货币的生产到黄金的工业生产的一个跳跃，而黄金的工业生产对于货币的生产，其不相干程度正如对于鞋油的生产一样。但在所贮藏的5 IgV 之中，还剩下3来，而资本家，既然不能把它们当作不变资本来用，就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马克思替这个资本家安排的是把这些黄金加入他自己的货币贮存中去。马克思还找到避免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发生短缺的下述办法，而这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是必须全部与生产资料相交换($IV + Im$)的：

“所以，这个货币必须全部由 IIc 转化为 II_m (无论是在必要生活资料的形态上，还是在奢侈资料的形态上存在)，而在反面，就要有相应的商品价值由 II_m 转化为 IIc 。结果是：剩余价值的一

部分，当作貯藏貨幣积累着”。^①

老实說，这是奇怪的结果！我們通过单纯地限制自己在貨幣基金的常年磨損范围内，而获得了貨幣的增加，貨幣本体的过剩。由于不可知的原因，这个剩余的价值是以牺牲消費品部类資本家的利益而发生的。他們实行禁慾，不是因为他們想扩大他們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我們可以說，而是为了替从事生产黄金的工人取得足够数量的消費品。

然而第二部类的資本家从这种基督美德中沒有得到好的报酬。尽管他們实行了禁慾，他們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而且他們不再有可能繼續在旧有规模下重新进行生产。即使相应的“商品价值”是从IIg轉移到II C，但实际上有关重要的不只是价值，而是它的实际的和具体的形态。由于第一部类的生产物中新的部分是不能用作生产資料的貨幣，第二部类，尽管实行禁慾，不能按照旧有规模恢复它的不变实物資本。我們的图式既然假设为简单再生产，它的条件因而在两方面遭到破坏：剩余价值被貯藏起来，而不变資本表现了短缺。馬克思自己所得的结果于是証明了黄金的生产不可能在他的图式的两部类中任何一部类获得一席位置；当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間的第一个交换行为完成时，整个图式是被打乱了。如恩格斯在他的附注中所指出的，“这个研究，即新生产的金在第一部类不变資本之内如何进行交换的研究，在原稿里面是找不着的”。^②此外，矛盾将会更大。我們所持的观点是为馬克思本人所証实的，当他对这个问题給了这样一个透彻无遺的、也是突出地簡短的答案：“貨幣本身并不是现实再生产的要素”。^③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为什么我們應該把貨幣的生产放在整个社会生产的第三个单独部类：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仅对于資本主义是合适的，而且作适当修正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590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592頁附注。

③ 同上書，第二卷，第615頁。

后,对于一切有調节的、計划的經濟秩序,例如社会主义經濟,也是合适的。但是,貨幣的生产,正如生产物的商品形态一样,当生产資料私有制取消后,将成为过时的了。它构成在資本主义下无政府經濟的“不合法的負債”,“附带的开支”,对于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一个特殊負担,因为它意味着每年支出大量劳动来制造既非生产資料,也非消費品的生产物。在資本主义下生产的社会中这个特殊的劳动支出,在社会主义計划經濟中将告消失。在社会資本再生产过程中,最恰当的是用一个单独的部类来表现它。至于我們把一个国家描繪成自己生产黄金的,还是从国外进口黄金的,在这里是无关重要的。在第一种情形下为了直接生产黄金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支出,在第二种情形下为了进行交换行为,是同样需要的。

这些論述說明总資本再生产問題并不象那些只从危机观点来研究的人們覺得的那么粗疏。中心問題可以表述如下:在一个无計划的經濟中,为什么无量数个人資本家的生产总和能够滿足社会上所有的需要呢?从問題本身所暗示的答案是:随着需求的变化,生产水平也是不断波动的,这就是,市场是周期地变化的。这个把社会总生产物看作一堆无差別的商品,并以同样荒謬的看法对待社会需求的见解忽視了最重要的要素,即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突出的标志。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义再生产問題包含有若干精确规定的属于資本主义特有的范畴的关系,这些关系,作适当修改后,也适用于人类劳动的一般范畴。真正的問題在于它們內在地既傾向于冲突,又傾向于和諧。馬克思的图式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表述。

我們现在必須探討这个图式在分析生产过程中的含义。它对于实际生活上的問題有沒有现实的意义?按照这图式,流通吸收了全部社会生产物,所有消費者的需要都得到了滿足,而再生产的进行是沒有磨擦的。貨幣的流通接替着商品的流通,从而完成了社会資本的循环。但现实生活是如何呢?这个图式所描繪的关

系，在一个简单再生产体系，即生产规模不变的假设下，确立了计划生产中社会劳动分工的第一个明确的原则。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的整个过程的计划机构是不存在的，而事情并不按照一个数学公式，象图式所指示的，圆滑地进行的。相反地，再生产的进程表现对图式中的比例关系的不断背离，而这些背离显露在：（1）日常的价格变化；（2）利润的不断变化；（3）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生产部门的不断流动；以及最后，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地和循环地起伏。

但，除了所有这些背离外，图式显示了一个社会必要的平均水平，所有这些运动必然围绕这个水平为中心而进行，一旦离开了它，必然会力求回到它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个人资本家起伏不定的变化并不恶化为大混乱的局面，反而形成了一种能保证社会在没有一个计划下也能长期存在下去的秩序的道理。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和魁奈的经济表，如果比较起来，其相同之点和深刻不同之点是马上令人感觉到的。这两种图式，也是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开端和终结，是用确切的辞句描绘一个显得混乱的局面的仅有的尝试，这个混乱的局面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联的运动和无数私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差别所造成的。这两位作者都把个人资本的混乱的混合物简化为少数高瞻远瞩的规则，这些规则事实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混乱中发展的锚链。他们两人都把成为社会资本整个运动的基础的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同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为文明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产品的过程。他们两人都指出商品流通起着整个社会过程的中介人作用，都把货币流通看作次要现象，看作在商品流通中不同阶段的外面和表面的表现。

创造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个在马克思价值论中的基本规律为解决货币问题做了准备，并除了其他方面外，进一步引导他把总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即价值方面和实际物质联系方面，

首先加以区别，然后综合起来。其次，马克思的图式是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明确区别为基础，而这一区别本身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内部运行机构，并作为一个价值关系，把它与两大物质生产类别、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建立了确切的关系。

魁奈以后，有些古典经济学者，特别是亚当·斯密和里嘉图很接近这个观点。里嘉图的贡献，他对价值论的确切阐明，常常被人与马克思的价值论混淆起来。根据里嘉图自己的理论，他看到斯密把所有商品的价格分解为 $V + m$ 的方法是错误的——斯密这一理论曾经给再生产的分析带来这么多的危害；但他对斯密的错误没有多大兴趣，对整个再生产问题确实也不十分热心。事实上，里嘉图的分析代表亚当·斯密分析以后的一个退步，如同斯密部分地从重农学派后退一样。如果说里嘉图阐述资产阶级经济中的基本价值范畴——工资、剩余价值和资本——比前人更为精确，更为前后一致的话，那么，他对待这些范畴也更为谨严。亚当·斯密对生活中的联系，全部的广阔运动，表现了远比别人多的了解。因此，他不惜对一个问题提供两个不同的答案，或者，象在价值问题上，甚至三、四个不同的答案。虽然他在自己的分析的各部分中自相矛盾而毫不在乎，这些矛盾本身总是刺激他作重新努力，促使他用一个经常不同的观点来研究这整个问题，并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动态。归根到底，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注定了斯密和里嘉图的失败。要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范畴，作为社会过程的活的动态来看，就要求在这个过程的历史发展中理解它，要求对这些范畴本身作为一般劳动关系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形态来理解。这意味着只有社会主义者能够真正解决资本再生产问题。在“经济表”和“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之间，存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时间和在实质上的繁荣和衰落。

第六章 扩大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图式的缺点是明显的：它说明一种再生产形态的规律而这种再生产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是作为偶然的例外才有可能发生。每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常规，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与其他经济制度比较起来，这更是如此。^①

然而这个图式在两方面具有真正的科学上的重要性。在实践上，即令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大部分社会生产物可以看作简单再生产，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生产就在简单再生产所形成的广阔基础上超越它的原来界限而扩大的。在理论上，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又提供了所有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科学阐述的必要起点。因此，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必然引起了进一步的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的历史特点。它必然表现为资本的积累，这既是它的特殊形式，又是它的特殊条件。这就是说，整个社会生产——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原来活动的社会资本现在被它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增多，才能扩大。把部分的剩余价值（特别把越来越多的部分）用来生产，而不是用来供资本家个人的消费，或用来增加准备金，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特点——正如在我们以前的简单再生产假设中一样——是个人资本的再生产，因为只有私人资

^① “简单再生产，是以 $I(V+m) = II C$ 为前提。这个前提，不只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相容（虽然在十年或十一年的产业循环中，往往会有一年的生产比前年度的总生产小，所以，和前年度比较起来，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没有）。并且，在人口年年的自然增殖中，简单再生产要能够发生，那个代表总剩余价值的1,500，就只好由相应增加的不生产的婢仆去分享了。但反过来，资本的积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情形下，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7页）

本所造成的无数独立的再生产运动的形式下，才能发生整个生产，不管被看作简单的或扩大的。

对个人资本的积累的第一次全面分析发表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22、23两章中。在那里，马克思研究了(a)剩余价值的分割为资本和收入；(b)除这分割外，确定资本积累的各种情况，例如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和劳动生产率；(c)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相对增长，作为积累的一个因素；(d)工业后备军的加速发展，这既是积累过程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在这个讨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积累的两个意见：较为庸俗的经济学者所持的“禁慾論”，他们声称剩余价值之被分割为资本，因而积累本身，是资本家的一种道德的、英雄的行为；以及古典经济学者的错误，他们的学说认为剩余价值的整个资本化部分是完全用来供生产性工人的消费的，这就是说，是完全用来作为年复一年所雇用的工人的工资的。这个错误的设想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即生产的每次增加不仅表现在雇用工人的增多，而且还表现在物质生产资料（房屋、工具、以及无疑地原料）的增加。这个错误的设想显然是根源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亚当·斯密的“教条”。而且，以较大的资本额用来开支工资就足以扩大生产，这种设想也是下列错误看法的结果，即所有商品的价格完全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根本忽视了不变资本。奇怪的是：即令李嘉图，他至少有时也意识到斯密学说中这一点错误，竟然也极端肯定地支持它的最終推論，尽管这些推論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一个国家的全部生产是消费掉的；但这些产品被再生产另一价值的人们消费呢，还是被不再生产另一价值的人们消费呢？这将造成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大区别。当我们说收入被储蓄起来，加到资本上去了，我们意指这部分被加到资本上的收入是被生产的劳动者，而不是被非生产的劳动者消费了”。①

① 李嘉图：“原理”，第八章，“論租稅”，英国Mac Cullock版，第87頁。

q 如果所有生产出来的物品被人们消费所吞食了，那么，在社会总生产物中没有节余的东西可以作为不能消费的生产资料，如工具、机器、原料和房屋，结果，扩大再生产也必须采取一条特殊的道路。按照这个奇怪的观点，事情将这样发生：将要生产出来的是供新工人消费的主要食物，它相当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的数量，而不是过去供给资本家的高级食物。古典学派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不允许除了有关消费品生产的变动以外的其他任何变动。经过我们上面的论述，毫不奇怪，马克思能够容易地驳斥了里嘉图和斯密两人的基本错误。正如简单再生产，除了供应工人和资本家的必要数量的消费品外，还需要有调节地更新不变资本，即物质生产资料，同样地，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新增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扩大不变资本，即增加物质生产资料。马克思发现这里还必须应用另一规律。被古典经济学者不断忽视的不变资本，与用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比较起来，将相对地增长。这只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下的表现。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的劳动能够动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把它们转化为物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意味着相对于无生命的生产资料，活劳动的开支，即工资的开支，将递减下去。与亚当·斯密和里嘉图的设想相反，扩大再生产不仅必须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分割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在这分割中必然将越来越多的部分分给不变资本，而越来越少的部分分给可变资本。资本结构的这样不断的质的变化是资本积累，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所特有的表现。^①

① “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于这个资本主义方式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仅与积累的前进并驾齐驱，而且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并行。它们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因为与单纯积累，即社会总资本的绝对增加，相伴的是这个总资本所由构成的个人资本的集中；并因为追加资本的技术构成的变化是与原来资本技术构成的类似变化相伴发生的。所以，随着积累的增进，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变化了。如果原来的假定是1:1，现在逐渐变为2:1, 3:1, 4:1, 5:1, 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增加，从总价值中，不是 $\frac{1}{2}$ ，而是 $\frac{1}{3}$, $\frac{1}{4}$, $\frac{1}{5}$, $\frac{1}{7}$ 等等，转化为

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間比例关系的不断变化，这个图景的另一方面是象馬克思所称的，相对人口过剩的形成，这就是說，劳动人口的一部分超过了資本的平均需要，因而变为过剩了。这个失业产业劳动的后备軍(这里以較广的意义来說，包括商人資本占統治的无产階級)总是存在的。它成为在商情活跃期間生产突然扩张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也是資本主义积累的另一特殊条件。^②

从个人資本的积累，我們因之可以得出扩大再生产的下列四个特征现象：

(1) 在某种限度內，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不依赖于資本的增长，并能超越了它。达到这点的必要方法是：对劳动和自然力量的加强剝削，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包括固定資本的效率提高)。

(2) 一切真正的积累开始于剩余价值中意图資本化的部分被分割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

(3) 积累，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是与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間的关系的不断改变相伴随的。通过这个改变，投在无生命的生产資料上的那部分資本，与开支在工資上的資本相比，不断地有所增加。

(4) 与积累过程連带的，同时，也是积累过程的条件，是一

劳动力，而另一方面， $\frac{2}{3}$, $\frac{3}{4}$, $\frac{4}{5}$, $\frac{5}{6}$, $\frac{6}{7}$ ，轉化为生产資料。既然劳动的需要不是决定于整个資本的数量而是只决定于資本中的可变部分，这个需要随着总資本的增加而递减，不是象以前假定的，比例地增加，它相对于总資本量而降落，而且随着总資本量的增加，以递增的速度下降。随着总資本的增长，它的可变部分，或包含在其中的劳动，确实也增加了，但在比例上是不断下降的。积累只当作一定技术基础上的生产的扩大来发生作用的中頓時間，是縮短了。为要吸收一定量的追加劳动者，甚至为要在旧資本的不断的形态变化中雇用既經在机能中的劳动者，不仅总資本有以累进比例来加速积累的必要。这种增大的积累与集中，只会成为一个源泉，以致引起資本构成上的新变化，促使可变資本与不变資本相比，更加速地趋于减少。”(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992—993頁)

② “近代产业的特征的生活过程，相当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滯的十年循环(其間有各种小的变动把它中断)形态，就是以产业后备軍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多少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一种現象作为基础，但产业循环的各种轉变，也生出新的过剩人口，并为它的最有力的再生产因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797頁)。

个产业后备軍的发展。

从个人資本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中得出的这些特征，与资产阶級經濟学者的分析比較，表现了向前大大地迈进一步。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論証以这些个人資本的运动为根源的总資本的积累，并以簡單再生产为基础，建立以积累为目的的下列两方面間的确切关系：一方面貫串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价值因素与另一方面在生产消費品和生产資料中的物质考虑。

扩大再生产和簡單再生产間的基本差別在于：在后者資本家阶級及其随从者消費全部剩余价值，而在前者，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从它的所有者的个人消費中取出来，不是用来貯藏，而是用来增加活动的資本，即資本化。为了使这件事情有可能，新增資本必須有供它此后进行活动的物质前提。这里，社会总生产物的具体构成变为重要了。馬克思，当他探討个人資本的积累时，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过：

“首先年生产必須供給这一切对象物(使用价值)，来补充一年中消費掉的資本的物质成分。把此等部分除去以后，留下的就是剩余价值依以存在的純生产物或剩余生产物。这个剩余生产物是由那些物品构成呢？也許是由那些用来滿足資本家阶級需要与愿望的物品；此等物品，会加入資本家阶級的消費基金內。但若就是这样，剩余价值就被干杯到底，只能有簡單再生产了。为要积累，人們就須把剩余生产物一部分轉化为資本。除非借助于奇迹，能轉化为資本的，是限于能被使用在劳动过程上的物(即生产資料)，和劳动者能依以維持生存的物(即生活資料)。因此，年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必須被使用来生产追加的生产資料及生活資料，那是替換垫支資本必要的量以上有余的。一句話，剩余价值能轉化为資本，只因为剩余生产物(剩余价值就是它的价值)，已經含有一个新資本的各种物质成分”。^①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726—727頁。

然而，仅仅追加的生产资料和供工人用的追加的消费品是不够的；使扩大再生产真的动起来，还需要追加的劳动。马克思对这个条件发现一个特殊的困难：

“关于这件事体，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经先有安排了，因为它会把劳动者阶级当作依赖于工资的阶级再生产出来；他们通常的工资，不但够维持他们的生存，而且还够他们去繁殖他们的种属。资本不过要把劳动者阶级每年供给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和那已经包含在年生产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①

这是马克思对总资本的积累问题所给的第一个解答。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后，他又在同书第二卷末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最终的第二十一章是专门用来讨论总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马克思对积累的图式表述。按照我们所熟悉的简单再生产图式的式样，马克思设计了一个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如果我们把两者比较一下，它们间的差别是清楚地看得见的。

假设社会年总生产物以价值量9,000(指百万的工作小时，或用资本主义货币名称来表现，一个任意选择的货币量)为代表，总生产物应分配如下：

$$\text{I. } 4,000 C + 1,000V + 1,000m = 6,000$$

$$\text{II. } 2,000 C + 500V + 500m = 3,000$$

$$\text{合計} \quad 9,000$$

第一部类代表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代表消费品。粗略地看一下这些数字的比例关系告诉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只有简单再生产才有可能。第一部类所制造的生产资料等于两部类所实际耗用的生产资料总和。如果对这些不过进行替换更新，生产只能按照以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

的规模重复进行。在另一方面，第二部类总生产物等于两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总和。这表明所有的消费品只能雇用象以往所雇用的那样数目的工人，而全部剩余价值同样地用在消费品上，这就是说，供资本家阶级的个人消费。

现在让我们把同样的总生产物9,000用下列方程式表现：

$$\text{I. } 4,000 C + 1,000 V + 1,000 m = 6,000$$

$$\text{II. } 1,500 C + 750 V + 750 m = 3,000$$

$$\text{合計} \quad \underline{\quad\quad\quad} \quad 9,000$$

这里，我们碰到双重的比例失调：所创造的6,000生产资料，超过了社会实际所耗用的，即 $4,000 C + 1,500 C$ ，因而剩下了500。同样地，生产出来的消费品(3,000)少于支付工资的数目(即 $1,000 V + 750 V$ ，即工人的需要量)加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1,000 m + 750 m$)。这造成了短缺500。既然我们的前提不允许我们减少所雇用的工人数目，其结果必然是资本家阶级不能消费它所取得的全部剩余价值。这证明完全符合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的两个物质先决条件：被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被消费掉，而是用来从事生产；较多的生产资料必须生产出来，借以保证把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实际上作为扩大再生产之用。

在考察简单再生产图式时，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基本社会条件包括在下列方程式中：生产资料总额(第一部类的产品)必须等于两部类的不变资本，而消费品总额(第二部类的产品)必须等于两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至于扩大再生产，我们必须推论出恰恰相反的两重比例。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先决条件是第一部类的生产物必须在价值上大于两部不变资本相加之数，而第二部类的生产物必须少于两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

然而，这绝对没有完结了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毋宁是它引导我们到达了这个问题的大门。我们在推论出这个图式的比例关系后，必须探索它们进一步的活动情况，流通的循环和再生产的持

續。正如簡單再生产可比之于一个不变的圓圈，不断地重复着自己，扩大再生产，用西斯蒙第的話，可比之于一个螺旋形的越来越大的环鏈。讓我們首先考察这螺旋形的各环。在这里的第一个总的問題是：在我們现在所已知的条件下，积累实际上在两部类中是如何进行的，这就是說，資本家如何把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轉化为資本，而同时取得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質先决条件。

馬克思闡明这个問題如下：

讓我們假設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是被积累起来了。資本家于是用500供他們的消費，而以另外的500增大他們的資本。为了进行活动，我們知道，这笔追加資本500必須分割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假定对于原来資本的4对1比率維持不变，第一部类的資本家将把他們的追加資本500分割如下：他們将以400购买新的生产資料，而以100購買新的劳动。这并不发生什么困难，因为我們知道第一部类已經生产了过剩的生产資料500。但可变資本相应地增大了100貨幣单位是不够的，因为新增的劳动力必須找到适当数量的消費品，而这些消費品只能由第二部类供应。现在这两大部类間的流通是轉移了。以前，在簡單再生产的条件下，第一部类为它自己的工人取得1,000消費品，而现在它必須为自己的新工人找到另外100消費品。所以，第一部类从事扩大再生产如下：

$$4,400 C + 1,100 V$$

輪到第二部类时，它出售了这些消費品达到价值100后，现在就有可能从第一部类取得同量的追加的生产資料。事实上，第一部类刚好有100的剩余生产物留下来，这些生产物现在就流到第二部类里去，使得第二部类能够同样地扩大再生产。但在这里，只是追加的生产資料也沒有多大的用处；要使得它們起作用，就需要追加的劳动力。再假定以前的資本构成維持不变，即不变資本对可变資本的2对1的比率，那么，就需要50的追加劳动来运用这追加的生产資料100。但这些追加的劳动需要相当于它們的工資額的

追加的消费品，而这些追加消费品事实上是由第二部类本身供给的。所以，这个部类除了生产供第一部类的新工人用的100追加消费品和供自己工人用的消费品外，还必须生产另一笔消费品50，作为它的总生产物的一部分。所以，第二部类以 $1,600C + 800V$ 的速率开始扩大再生产。

现在，第一部类的总生产物（6,000）已全部被吸收了。5,500是补偿两部类的老的、耗用掉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而其余500是用来扩大再生产：400在第一部类，100在第二部类。至于第二部类的总生产物（3,000），1,900用来供应两部类的增大了的劳动力，剩下的1,100消费品供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他们的剩余价值的消费。500在第一部类里消费，600在第二部类里消费，而在第二部类里，从剩余价值750中，只有150是资本化了（100用之于生产资料，50用之于工资）。

扩大再生产现在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向前进了。如果我们维持剥削率100%，如在原来资本的情况下一样，下一周期将得出如下的结果：

$$\text{I. } 4,400C + 1,100V + 1,100m = 6,600$$

$$\text{II. } 1,600C + 800V + 800m = 3,200$$

$$\text{合計} \quad \underline{\quad\quad\quad} \quad 9,800$$

社会的总生产物已经从9,000增长到9,800，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从1,000增至1,100，第二部类的从750增至800。资本主义扩大生产的目的，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已经达到了。同时，社会总生产物的物质构成，以生产资料（6,600）而论，在实际需要量（4,400+1,600）之外，又表现了过剩600；而在消费品方面，与已付工资（1,100V+800V）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1,100m+800m）相加之数对比，又表现了一笔短缺。这样，我们又有了物质可能，同时，也有必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不用来供资本家阶级消费，而用来进行新的扩大生产。

这样，第二次生产的扩大和剩余价值的增产接踵于第一次之后，以数学上的精确性，理所当然地出现了。资本积累，一经开始后，自动地越来越向前发展。这个循环变成一个周围越绕越大的螺旋形，好象被一个以数学外衣装饰的自然规律强制似的。假设在以后年份中总有剩余价值的一半被资本化，同时，资本构成和剥削率维持不变，那么，资本的再生产将形成累进的结果如下：

第二年	I. $4,840 C + 1,210 V + 1,210 m = 7,260$	
	II. $1,760 C + 880 V + 880 m = 3,520$	
		合計 10,780
第三年	I. $5,324 C + 1,331 V + 1,331 m = 7,986$	
	II. $1,936 C + 968 V + 968 m = 3,872$	
		合計 11,858
第四年	I. $5,856 C + 1,464 V + 1,464 m = 8,784$	
	II. $2,129 C + 1,065 V + 1,065 m = 4,259$	
		合計 13,043
第五年	I. $6,442 C + 1,610 V + 1,610 m = 9,662$	
	II. $2,342 C + 1,172 V + 1,172 m = 4,686$	
		合計 14,348

这样，积累了五年以后，社会总生产物从9,000增至14,348，社会总资本从 $(5,500 C + 1,750 V = 7,250)$ 增至 $(8,784 C + 2,782 V = 11,566)$ ，剩余价值从 $(1,000 m + 750 m = 1,750)$ 增至 $(1,610 m + 1,172 m = 2,782)$ ，而供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在积累开始时为1,100，增至最后一年的 $732 + 746 = 1,478$ 。^①所以，资本家阶级增加了资本化的数量，实行了更大的节欲，然而却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在物质上，社会变得更富庶些，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多的消费品，并在资本主义意义下，它同样变得更为富庶，因为它生产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8页（卢森堡原著所引数字有誤）。

多的剩余价值。社会生产物全部在社会中流通。一部分，它为扩大再生产服务，一部分它为消费服务。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符合于社会总生产物的物质构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的是不错的：增大的剩余价值之所以能够加到资本上去，是因为社会剩余生产物出现在世界上时，一开始就采取了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这种形态除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外不能供其他的用途。同时，再生产是严格地按照流通规律扩大的：两生产部类间相互供应追加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是按照等价交换进行的。就是在商品交换的进程中，一部类的积累是另一部类积累的条件，并使它可能。复杂的积累问题这样被转化为极端简单的图式而前进。我们可以无尽地把上述方程式的连锁继续写下去，只要我们遵守这个简单的原则：第一部类不变资本的某种增加总是要求它的可变资本的某种增加，这事先规定了第二部类增加的幅度，而随着第二部类的增加，必须同时配合可变资本的相应增加。最后，留给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应占总量的多少，这取决于两部类的可变资本的增加幅度。这个增加幅度还表明留给资本家私人消费的消费品数量正好等于两部类中没有被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按照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几条简易原则，积累按这样图式的继续发展，是没有限制的。但现在正是要我们小心的时候了，不要让我们仅仅从简单地演算出来的正确无误的加减法数学练习中得出这些令人惊异的顺利结果。我们要进一步问：是否仅仅由于数学方程式容易地写在纸上，积累就会没有阻碍地无限地继续下去。

换言之，现在已经到了寻求积累的具体的社会条件的时候了。

第七章 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

第一次再生产的扩大得出下列的情况：

$$\text{I. } 4,400C + 1,100V + 1,100m = 6,600$$

$$\text{II. } 1,600C + 800V + 800m = 3,200$$

$$\text{合計} \quad 9,800$$

这已清楚地显示了两部类的相互依赖性——但这是一种特殊的依赖性。这里，积累起源于第一部类，而第二部类仅仅是跟着走。这样，只是第一部类决定了积累的规模。马克思这里让第一部类把它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资本，这样来实现积累；而第二部类所能转化为资本的数量只能不多、也不少于保证第一部类生产和积累所必要的数量。马克思让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消费 $600m$ ，而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只消费 $500m$ ，尽管它占有了两倍的价值，和远远较多的剩余价值。在第二年，马克思假定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又把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资本，这次使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把比上年较多的数量转化为资本——他毫不迟疑地决定了一个恰恰符合于第一部类需要的数目。现在， $500m$ 留下来供第二部类资本家的消费——比上年减少——从任何方面看，这是积累的一个毋宁离奇的结果。马克思现在描述这个过程如下：

“假设第一部类继续依相同比例积累，那就是以 $550m$ 当作所得支出， $550m$ 积累起来。这样， $1,100\text{I}V$ 将先由 $1,100\text{I}C$ 来替换， $550\text{I}m$ 也要实现为等额的商品 II，合计为 $1,650\text{I}(V+m)$ 。但第二部类等待替换的不变资本只有 $1,600$ ，其中 50 必须从 $800\text{II}m$ 取出来补足。在这里，如果我们先把货币存而不论，这个交易的结果就是：

I. $4,400C + 550m$ (要资本化的)；还有 $1,650(V+m)$ ，充作资本家及劳动者的消费基金，实现在商品 II C 之上。

II. $1,650C$ (其中有50是由II m 取出一部分来补足的) + $800V + 750m$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但假若第二部类的 V 与 m 是保持原来的比例,增加 $50C$,就也要增加 $25V$ 。这又必须从 $750m$ 取出。所以,我们得:

$$\text{II. } 1,650C + 825V + 725m$$

第一部类有 $550m$ 要资本化;如果保持以前的比例,其中就有 440 形成不变资本, 110 形成可变资本。这 110 结局必须从 $725\text{II}m$ 取出,那就是有价值 110 的消费资料,要由第一部类的劳动者消费,而不是由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因此,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也只有把他们所不能消费的 $110m$ 转化为资本。这样,在 $725\text{II}m$ 中就只剩下 $615\text{II}m$,但第二部类把 110 化为追加不变资本时,他们再要有追加的可变资本 55 。这也必须由他们的剩余价值中取出。在 $615\text{II}m$ 中减去此额,就只剩下 560 可让第二部类资本家消费了。所以,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转移完成之后,我们将有资本价值:

$$\begin{aligned} \text{I. } (4,400C + 440C) + (110V + 110V) \\ = 4840C + 1,210V = 6,050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II. } (1,600C + 50C + 110C) + (800V + 25V + 55V) \\ = 1,760C + 880V = \underline{2,640} \end{aligned}$$

合计 8,690”^①

这里把原文全部引下来,因为它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这里是以第二部类为牺牲来安排第一部类的积累的。在以后几年里,生活资料部类的资本家受到同样的不利待遇。按照同样的规则,马克思让他们在第三年积累 $264m$ ——这次较前两年有稍大的数目。第四年,他们被允许以 $290m$ 转化为资本,并消费 $678m$;在第五年,他们积累 $320m$,并消费 $745m$ 。马克思甚至说:

“如果事情要照常进行,第二部类的积累,就必须比第一部类的积累进行得更速,因为 $\text{I}(V+m)$ 中与商品 $\text{II}C$ 相交换的部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5—646页。

在非此的情形下，将会比ⅡC增加得更速。而这一部分是只能与ⅡC交换的”。^①

但我们所引的数字没有显示第二部类较速的积累，事实上，只显示它动摇不定。这里的原則似乎是：馬克思以扩大第一部类的生产基础来使积累有可能繼續下去。第二部类的积累只表现为第一部类积累的条件和結果：第一、它吸收对方的剩余生产資料，第二、以必要的剩余消費品供应对方追加劳动的需要。第一部类在整个時間保持主动，第二部类只是一个被动的追随者。这样，第二部类的資本家所被允許积累和消費的，是不多，也不少于第一部类的积累所需要的。一方面，在第一部类里，每次总有剩余价值的半数轉化为資本，其余半数供消費，这样，生产和資本家的个人消費都是有秩序地扩张的，而另一方面，这双重过程在第二部类却采取了不規則的路綫如下：

第一年	150轉化为資本，	600供消費
第二年	240	660
第三年	254	626
第四年	290	678
第五年	320	745

这里，不能发现为积累和消費所遵守的規則：这两者都完全从属于第一部类积累的需要。

不必說，这图式中每一方程式的絕對数字是任意选择来的，但这并没有取消它們的科学价值。对本問題重要的是数量上的比率，因为这些比率是被用来表现严格的确定的关系的。那些规定第一部类积累关系的确切的、合乎邏輯的規則似乎以摒弃解释第二部类同样关系的任何原則为代价而得到的。这个情况要求对这个分析所揭露的各种固有关系加以修正。

然而也許可以設想这一缺点是由于例子选择不恰当所致。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46頁。

馬克思本人不滿意于上述圖式，他接下去舉了第二個例子來說明積累的运动。在這個例子中各方程式的數字如下：

$$\text{I. } 5,000\text{C} + 1,000\text{V} + 1,000\text{m} = 7,000$$

$$\text{II. } 1,430\text{C} + 285\text{V} + 285\text{m} = \underline{2,000}$$

$$\text{合計} \quad 9,000$$

與上面的例子不同，兩部類的資本這裡有相同的構成，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是5比1。這裡假定資本主義已經有顯著的發展，跟着社會勞動生產率也已經有顯著發展——生產規模已經有顯著的先行的擴大，最後，在工人階級中生出相對過剩人口的事情也有發展。我們不再象在第一例一樣，在簡單再生產開始轉入擴大再生產的階段上才看到擴大再生產的。第一例只是為了抽象理論的方便才這樣做。這一次，我們所面對的積累過程是在一個確定的、相當高度發展的階段上進行的。設想這些條件，是完全合法的，它們並不歪曲我們必須用來推算再生產螺旋形的各個環節的那些原則。這裡，馬克思仍以第一部類的剩餘價值的半數轉化為資本作為起點。

“假設第一部類資本家只消費剩餘價值的半數 = 500，而以其餘半數積累。 $(1,000\text{V} + 500\text{m}) \text{ I} = 1,500$ ，要轉化為 $1,500 \text{ II C}$ 。但在這裡， II C 只 = 1,430，不足之數，必須由剩餘價值70來補足。在 285 II m 中減去此額，留下 215 II m 。所以，我們得：

$$\text{I. } 5,000\text{C} + 500\text{m}(\text{要資本化的}) + 1,500(\text{V} + \text{m})(\text{資本家與勞動者的消費基金})$$

$$\text{II. } 1,430\text{C} + 70\text{m}(\text{要資本化的}) + 285\text{V} + 215\text{m}$$

但因為在這裡，有 70 II m 直接合併在 II C 裡面，所以，為要推動這個追加的不變資本，還要有一個可變資本 $\frac{70}{5} = 14$ 。這14也要

由 215 II m 中扣除，所以，只余下 201 II m 。我們得：

$$\text{II. } (1,430\text{C} + 70\text{C}) + (285\text{V} + 14\text{V}) + 201\text{m} \text{ ①}$$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48—649頁。（盧森堡原著所引，有誤）

在这些初步安排之后，资本化现在已能继续进行下去。这是依下列情况进行的：

第一部类已经资本化的500m分割为 $\frac{5}{8}(417C) + \frac{1}{8}(83V)$ 。这83V从II_m吸取了同等的数量，这II_m就用来购买不变资本，加到II_C上去。II_C增加了83就要求II_V增加17(83的 $\frac{1}{5}$)。在完成了这个周转后，我们得出：

$$\text{I. } (5,000C + 417m) + (1,000V + 83m) = 5,417C + 1,083V \\ = 6,500$$

$$\text{II. } (1,500C + 83m) + (299V + 17m) = 1,583C + 316V \\ = \underline{1,899.}$$

合计 8,399

第一部类的资本从6,000增至6,500即十二分之一；第二部类的资本从1,715增至1,899，即九分之一强。

在这基础上至下年度终的再生产结果如下：

$$\text{I. } 5,417C + 1,083V + 1,083m = 7,583$$

$$\text{II. } 1,583C + 316V + 316m = \underline{2,215}$$

合计 9,798

如果在继续进行积累时维持同样的比率，第二年终的结果如下：

$$\text{I. } 5,869C + 1,173V + 1,173m = 8,215$$

$$\text{II. } 1,715C + 342V + 342m = \underline{2,399}$$

合计 10,614

第三年终：

$$\text{I. } 6,358C + 1,271V + 1,271m = 8,900$$

$$\text{II. } 1,858C + 371V + 371m = \underline{2,600}$$

合计 11,500

在三年中，社会总资本从I 6,000 + II 1,715 = 7,715增至I 7,629 + II 2,229 = 9,858，而总生产物从9,000增至11,500。

与第一例显著不同的，是这里两部类积累的进展是一致的。从

第二年起，两部类都以剩余价值的半数轉化为資本，半数供消費。因此，在第一例中，似乎由于数字选择得不好，积累才表现了任意变动的情况。但为了确定这次不仅仅由于以巧妙选择的数字加以数学运算，才达到积累的順利进展，我們还必须进行查对一下。

在第一和第二例中，我們不断地看到一个好像是积累的一般規則：要使任何积累可能，第二部类总是必須以与第一部类增加(a)剩余价值的消費部分和(b)可变資本兩項刚好相同的数量增加自己的不变資本。如果我們以第一年的例子來說明，第二部类的不变資本必須增加70。为什么？因为这个資本过去只是1,430。

但如果第一部类的資本家愿意积累剩余价值(1,000)的半数，并消費其余半数，他們需要供他們自己用的和工人用的消費品达到1,500单位，而这只有以他們自己的产品生产資料向第二部类交换才能取得。既然第二部类已經滿足了相当于自己的不变資本(1,430)的生产資料的需求，上述的交换只有当第二部类决定对它的不变資本增加70时，才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它必須扩大它自己的生产——而达到这一点，它只能把自己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轉化为資本。如果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是285，其中70必須加到不变資本上去。由此可知第二部类走向扩大生产的第一步同时就是第一部类資本家增加消費的条件和結果。我們再看下去：迄今为止，第一部类的資本家只能以剩余价值的半数(500)用在个人消費上面。要把其余的半数轉化为資本，他們必須重新分配这500m，使得原来的构成比率至少得到維持，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增加不变資本417，可变資本83。第一个举动没有什么困难：属于第一部类資本家的剩余价值500，是包含在他們自己生产物、即生产資料的自然形态中的，因而是直接适合于投入生产过程中去的；所以，第一部类能够以适当数量的自己生产物来扩大自己的不变資本。但剩下的83，如果有供新雇工人用的同等数量的消費品，才能用作可变資本。这里，又一次明显地看出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于第二部类；第一部类必須从第二部类取得較过去多83的消費品供自己工人之

用。既然这又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才有可能，第一部类只有在第二部类准备接受第一部类的生产物、即生产资料达到83之数的条件下，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既然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除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外，没有其他的用途，因此，第二部类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增加它自己的不变资本83，这83现在就转化为资本，³从而从本部类的可消费的剩余价值中抽出来了。这样，第一部类增加不变资本引起第二步在第二部类中扩大生产。第一部类积累的一切物质前提现在都已具备，扩大再生产能够进行了。但第二部类到此为止，只增加了不变资本两次。这样扩大的结果是：如果新取得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要加以使用，劳动力的数量也必须相应地增加。在维持原来的比率下，新的不变资本153需要新的可变资本31。这意味着必须把另一笔同等数量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样，第二部类供资本家个人消费的资金成为从剩余价值(285)中扣除用来两次扩大不变资本的数目(70+83)以及可变资本的相应增加额(31)——合计共扣除184后的余额，即101。第二年积累的类似安排使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分割为158，转化为资本，158供资本家消费；在第三年，同样的数字将为172和170。

我们之所以这样仔细地研究这个过程，一步一步地探求下去，就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第二部类的积累是完全由第一部类的积累所决定和控制的。虽然这个依赖关系，不象在马克思的第一例一样，不再以剩余价值分配的任意变动表现出来，但它没有否定这个事实的本身，即使现在剩余价值总是整齐地在每一部类分为两半，一半转化为资本，一半供个人的消费。虽然从数字来看，两部类的资本家没有什么彼此之分，但很明显，第一部类采取了主动，积极地实现整个积累过程；而第二部类只是一个被动的附属品。这个依赖关系也表现在下列的确切规则上：积累必须在两部类同时进行，而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即生活资料部类增加不变资本的数量恰恰等于生产资料部类的资本家增加他们的可变资本和个人消费基金的数量。不管我们在具体应用中，选择什么数

字,这个方程式(ⅡC的增加 = ⅠV的增加 + Ⅰm^①的增加)是馬克思的积累图式的数学奠基石。但我們现在必須看一看資本主义积累是否实际上符合这个硬性的規則。

讓我們回到簡單再生产中去。我們可以回想馬克思的图式如下:

$$\text{I. } 4,000\text{C} + 1,000\text{V} + 1,000\text{m} = 6,000 \text{ 生产資料}$$

$$\text{II. } 2,000\text{C} + 500\text{V} + 500\text{m} = \underline{3,000} \text{ 消費資料}$$

$$\text{合計} \quad 9,000$$

这里,我們也建立几个成为簡單再生产基础的方程式;它們是:

(a) 第一部类的生产物在价值上等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不变資本的总和。

(b) 第二部类的不变資本等于第一部类的可变資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a)的必然結果。

(c) 第二部类的生产物等于两部类的可变資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a)和(b)的必然結果。

这些方程式符合(a)資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但在簡單再生产的有限水平上)。方程式(b),举例來說,是商品生产的結果,这个結果是产生于这个事实,即任何一部类的企业家只能通过等价交换取得另一部类的生产物。第一部类的可变資本和剩余价值合起来代表这部类对消費品的需要。第二部类的生产物必須准备滿足这个需求,但消費品只有通过交换同等量的第一部类的生产物、即生产資料才能取得。这些同等量在自然形态下,如果不作为不变資本使用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第二部类是无用的,因此,它們决定着第二部类必須拥有多少的不变資本。如果这个比例沒有被遵守,如果,举例來說,第二部类的不变資本(作为一个价值量)大于Ⅰ(V+m),那么,它不能全部轉化为生产資料,因为第一部类对消費

① 剩余消費。

品的需求将太小了一些；如果不变資本(II)小于I ($V + mC$)，或則原来数量的劳动力不能在这部类中得到雇用，或則資本家不能消費他們全部的剩余价值。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簡單再生产的前提是被破坏了。

但是，这些方程式不仅是数学上的练习，也不仅是商品生产制度的結果。为了使我们相信这一事实，这里有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暂时設想：我們所在的不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社会，在这社会里，社会分工代替了交换。这个社会也将把自己的劳动力分为生产資料的生产者和消費品的生产者两类。让我们进一步假設劳动的技术发展是这样：社会劳动的三分之二使用在制造生产資料上，而三分之一使用在制造消費品上。假定在这些条件下，1,500单位（按日計、月計、或年計均可）是足以維持这社会的全部劳动人口，其中1,000，按照我們的前提，是在社会第一部类中使用（制造生产資料），而500是在社会第二部类中使用（制造消費品）。又假定从过去劳动周期算起，在一年劳动中所消耗的生产資料为3,000劳动单位。但这个劳动方案对这个社会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社会需要远远較多的劳动来維持不参加物质生产的成員：儿童、年老者、疾病者、机关職員、艺术家和科学家。此外，每一个社会需要一些后备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以預防自然的灾害。假定与維持工人所需要的相等的劳动量和生产資料用来維持不劳动的人以及建立后备物資，那么，从我們以前假設的数字中，我們應該得出一个有調节的生产的图式如下：

$$\text{I. }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text{ 生产資料}$$

$$\text{II. }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text{ 消費資料}$$

这里C代表已經消耗的物质生产資料，以社会劳动時間单位表现的；V代表为維持工人自己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時間；m代表用来維持不劳动者和用来建立后备物資所需要的。

如果我們查对这图式的比例关系，我們得出如下的結果：这里既沒有商品生产，也沒有交换，而实际上是社会劳动分工。第一

部类的生产物以必要的数量被分配給第二部类的工人；第二部类的生产物被分配給两部类的所有工人和非工人，并作为后备基金。所有这些不是等价交换的结果，而是计划和指导整个过程的社会机构的结果——这是因为现有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而生产物除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外，没有其他的目的。

但所有这些，并不减少这些方程式的正确性。第一部类的生产物必须等于 $IC + IIC$ ：这仅意味着第一部类必须每年更新社会在一年劳动中所用去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的生产物必须等于 $I(V + m) + II(V + m)$ ：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必须每年生产所有它的成员，不论劳动者或不劳动者，所需要的消费品量，加上一定数量的后备基金。这个图式的比例关系对于一个计划经济是同样地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正如对一个以无政府状态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这证明这个图式具有客观的社会正确性，即使由于它只涉及简单再生产，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或计划经济，几乎仅有理论上的意义，它只有在难得遇到的场合下才得到实践的应用。

同样的仔细查对现在必须转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以马克思第二例作我们查对的基础，让我们再设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从一个有调节的社会的观点来看，我们当然应从第二部类，而不是从第一部类出发。假定这个社会生长得很快，结果是它的成员，不论是劳动者或不劳动者，他们对生活用品的需求也继续增长。这个需求增长得如此迅速，以致需要不断增长的劳动量——暂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来生产消费品。如果以包含在消费品中的社会劳动量来计算，所需的消费品量逐年递增之数，假定为2,000:2,215:2,399:2,600，依此类推。让我们再假定技术条件要求用日渐增多的生产资料量来生产日渐增多的生活用品量，而日渐增多的生产资料量，也用社会劳动量来计算，则逐年递增之数为7,000:7,583:8,215:8,900，依此类推。要达到这样扩大再生产，我们必须还要有每年所花用的劳动递增如下：2,570:2,798:

3,030:3,284。〔这些数字符合于 $I(V+m)+II(V+m)$ 〕。最后，每年所花用的劳动，必须分配如下：半数用来维持工人自己，四分之一用来维持不劳动者，其余四分之一用来进行下年度的扩大再生产。这样，我们得出：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第二图式中的比例关系，也是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即使在计划经济下，扩大再生产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这个社会必须有数量日增的劳动力足供利用；（2）在每一劳动周期中，社会的目前需要必须不占用全部的社会劳动时间，这样使得部分的时间可以从事于准备将来的、不断增长的需求；（3）必须逐年生产足够的、数量日增的生产资料——没有这一点，生产不能按增大的规模扩大。关于所有这些要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作适当的修改后，对于一个计划社会，也具有客观的正确性。

现在还待考验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否也能适用。这里我们要问：积累的起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考察两个生产部类的积累过程的相互依赖性的进行方法。无疑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二部类，就它的积累决定于现有的追加生产资料而言，是依赖第一部类的。反过来看，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可供追加劳动力用的相应数量的追加消费品。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这两个条件都被遵守了，两部类的积累必然象马克思的图式所显示的，自动地年复一年地进行。我们所列举的积累条件不过是那些条件，没有了它们，就不能进行积累。两部类可能有积累的愿望，但积累的愿望，加上积累的技术前提，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中是不够的。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在马克思的图式中，这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基础。但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从那里来的呢？

它不可能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本身那里来——这是可以立即肯定的——它不能从他们的个人消费中产生。相反地，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抑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费一部分的剩余

价值,把它用来生产供别人使用的物品,而这部分的剩余价值——至少从绝对数字看——是不断地增加的。不错,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家阶级的个人消费也将增加,甚至,所消费的总价值也有增加,但尽管如此,用来供资本家消费的仍然不超过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积累的基础诚然是这么一个事实:即资本家抑制自己不把剩余价值的全部消费掉。但其余的剩余价值,即积累的那部分,是如何呢?它给谁使用呢?按照马克思的图式,第一部类采取主动:这个过程是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为起点。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加的生产资料呢?这个图式回答道:第二部类为了生产增多数量的消费品而需要它们。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多的消费品呢?这个图式回答道,当然是第一部类,因为第一部类现在雇用着较多的工人。我们简直是在兜圈子。为了维持更多的工人,因而生产较多的消费品;并为了使这些过剩的工人得到工作,因而生产较多的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这样做是荒唐的。诚然,从资本家个人来看,工人只要出得起钱,他和另一个资本家或其他任何人一样,是同样良好的消费者,即商品的购买者。每一个资本家在他的商品的价格中实现他的剩余价值,不管他把这商品卖给工人或其他主顾。但从整个资本家阶级观点来看,这就不对了。工人阶级一般地从资本家阶级取得社会生产物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其数恰恰相当于可变资本,除此之外,不会再多一些。因此,工人在购买消费品时,只是归还给资本家阶级他们所领得的工资,即分配给他们的可变资本。他们所归还的不能多一文钱;如果他们有可能储蓄一些,为了想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小业主,那么,他们会归还得更少一些,但这是例外。

部分的剩余价值是以消费品形态为资本家阶级本身所消费的,而用来交换这些东西的货币将留在资本家手中。但谁能够买包含在另一部分、即资本化部分的剩余价值中的生产物呢?这个图式回答道:一部分由资本家自己,他们需要新的生产资料来扩大生产;另一部分由新的工人,他们被用来运用这些新的生产资料。

但这意味着先有资本家的扩大生产的动机存在；如果新的工人被用来运用新的生产资料，那么，对于即将生产出来的生产物必然有新的需求。

——也许，答案是人口的自然增加创造了这增长着的需求。事实上，人口及其需要的增长对我们考察一个假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在那里，社会的需要可以成为一个恰当的基础，因为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欲望的满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形就不同了。当我们谈到人口的增加时，我们设想的是那些人增加呢？按照马克思的图式，人口中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的自然增加已经从被消费的那部分的剩余价值中得到照顾，因为那部分在绝对数量上是增长的。无论如何，不能由资本家消费其余的部分，因为全部剩余价值由资本家消费就意味着回复到简单再生产去了。这剩下了工人们，工人阶级也由于自然增加而不断扩大。但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个增加的本身，作为增长着的需要的出发点，是不感兴趣的。

供ⅠV和ⅡV的消费品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不象在那么一个社会里，那里的经济制度是为工人和他们的需要的满足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二部类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工人而生产大量的消费资料。相反地，一定数量的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工人之所以能够维持自己是因为在既存的供求条件下，他们的劳动力是有用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不是一定数量的工人以及他们的需求，而是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因素本身是不断变动的，是资本家对利润期望的“因变数”。所以，问题是：工人阶级的自然增加是否会引起超越可变资本以外的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答案是极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图式里，工人阶级的货币的唯一来源是可变资本，因此，必须为工人的自然增加而预先准备好可变资本。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或者老一辈的工人必须赚足够的钱来养活他们的子孙——这些子孙因此不能算作追加的消费者；或者做不到这一点，下一代、青年工人，必须参加工作，

以获取工資和供自己需用的生活資料——在这个情况下，新的劳动一代已經包括在被雇用的工人数目中了。由此可知，馬克思图式中的积累过程不能以人口的自然增加來說明。

但即使在資本主义統治下，一个社会不仅包括資本家和工資劳动者。除了这两个階級外，还有一系列的其他人民：土地所有者、職員、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師、艺术家和科学家。此外，还有教堂及其侍奉者、僧侶、以及最后还有国家及其官吏和軍隊。严格地讲，人口中的这些阶层既不能算作資本家，也不能算作工人階級。但社会必須供养他們。也許就是他們，即資本家和工資劳动者以外的这些阶层，通过他們的需求，才引起扩大再生产的。但这个解决办法是經不起仔細考察的。土地所有者作为地租，即部分剩余价值的消費者显然应列入資本家階級內；既然我們在这里只涉及沒有分割的、原始形态的剩余价值，这些土地所有者的消費已經包括在資本家階級的消費中了。自由职业者大多数直接地或間接地从資本家階級取得他們的貨幣，也就是取得分配給他們的社会生产物的一部分，而資本家階級付給他們的是点滴的剩余价值而已。同样也适用于僧侶，其差別只在于僧侶还部分地从工人，即工資中取得他們的購買力。最后，国家維持官吏和軍隊所需的經費是由捐稅負擔的，而捐稅是从剩余价值或工資中征收的。在馬克思图式的界限內，事实上社会只有两种的所得来源：劳动者的工資和剩余价值。因此，所有上述除了資本家和工人以外的阶层只能作为这两种所得的联合消費者。馬克思自己拒絕任何把这些第三者当作不是遁詞的建議。

“一切不直接在再生产上参加进来的社会成份（無論劳动与否）能够在年商品生产物中取得他們的一份，取得他們的消費資料，本来都要通过这几个階級，即生产劳动者、产业資本家及土地所有者的手，因为生产物第一次是落在他們手里。在这限度內，他們的所得，實質上，是由工資（生产劳动者的工資）、利潤与地租派生出来的，与原始的所得相对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所得。但另一方

面，这个意义上的派生所得的受領人，又是靠他們的社会机能(当作国王、牧师、大学教授、娼妇、兵士等等)来取得这些，他們可以認他們的这种社会机能，是他們的所得的原始源泉”。^①

又关于利息和地租的消費者作为买主，馬克思說：“但若产业資本家在商品剩余价值中当作地租或利息奉献于剩余价值別一些共有者的部分，竟长此不能由商品的售卖而实现，地租或利息的支付也就不能不終止了。土地所有者或利息收取人，也就不复能成为救神，由他們的支出，来使年再生产的一定部分任意轉化为貨幣了。一切所謂不生产劳动者，官吏、医师、律师等等的支出，以及其他各种在‘社会大众’形式上給經濟科学者以‘服务’，來說明他們所不能說明的事情的东西，都有同样的情形”。^②

我們已經看到在資本主义社会內部我們不能发现那些体现剩余价值的积累部分的商品的任何买主。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沒有考虑到，即对外貿易。但把对外貿易看作任何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找到一个适当地位的商品的方便之門，这种看法有許多可以反对之处。求助于对外貿易实际上只是以未决的問題作为論据的詭辯：分析中所包含的困难只是从一国轉移到另一国去，而沒有解决。如果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实际上不以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为对象，而以資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对象，就不可能有对外貿易了，一切国家都是“本国”。这一点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在涉及积累时已經提出来了：

“在这里，使一国奢侈品能轉化为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反之，也使一国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能轉化为奢侈品的輸出貿易，是被擱在一边了。为了要摆开搅扰的附隨事件，便于在純粹的形态上理解研究的对象，我們在这里必須把商业世界全体当作一国，并假定資本主义生产已經到处确立，并且已經征服了一切产业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455—456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568頁。

部門”。①

如果我們从另一方面考察这件事情，同样的困难又出现了。在馬克思的积累图式中，我們假定用来积累的那部分社会剩余价值从开始时就采取一种自然形态，这种自然形态要求把这部分剩余价值轉化为資本。

“一句話，剩余价值能轉化为資本，只因为剩余生产物(剩余价值就是它的价值)，已經含有一个新資本的各种物质成分”。②

在我們图式中的数字为：

I. $5,000C + 1,000V + 1,000m = 7,000$ 生产資料

II. $1,430C + 285V + 285m = 2,000$ 消費資料

这里，剩余价值570m能轉化为資本，因为从一开始，它就由生产資料所組成。与这个数量的生产資料相应的，还有追加的消費品达114m，所以，总共有684m能轉化为資本。但这里假定一方面把生产資料简单地轉移为不变資本，另一方面把相应数量的消費品轉移为可变資本，这个过程是与資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結構相矛盾的。不管剩余价值具有什么形态，不可能以积累为目的直接把它轉移到生产地点去。它必須首先得到实现，它必須轉化为实在的貨币。③

在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中，500是适合于轉化为資本的，但在它們首先得到实现之前，这样轉化是不可能的。在它能够加到生产資本上去之前，剩余价值必須丢掉自己的自然形态，并采取純粹价值的形态。这既适用于每一个人資本，也适用于“社会总資本”，因为資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剩余价值必須实现为純粹价值形态。因此，从整个社会观点看再生产：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727頁附注21a。

② 同上書，第一卷，第726—727頁。

③ 这里，我們可不談一些生产物的例子，这些生产物能够不經交換也部分地进入生产过程，如矿上的煤。在資本主义生产內部，总的來說，这种情况还是少有的。（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三联書店版，第二卷，第589—590頁）

“……絕不要陷入蒲魯东从資产階級那里抄襲来的看法,并且这样去看事情,好象一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将它这个特殊的历史的經濟性質喪失掉。刚好相反,在这里,我們是要研究总資本家”。^①

所以,剩余价值必須脫去作为剩余生产物的形态,然后才能重新采取以积累为目的的形态;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它必須經歷貨幣阶段。所以,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剩余生产物必須有人购买——誰来购买呢?根据上面的揭露,仅仅为了实现这两部类的剩余价值,必須有在第一和第二部类以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才能使剩余生产物变为现款。就是这样,我們还只到达了剩余价值变为貨幣的阶段。如果这实现的剩余价值要进一步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在积累中被使用的話,必須預期对将来会有更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也必須在两部类以外才能得到。因此,或則剩余生产物的需求必須每年按照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率而增长,或則,反过來說,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必須每年按照剩余生产物的需求的增长率而增长,——积累只能恰恰按照第一和第二部类以外的需求增长而前进。

第八章 馬克思对解决这个困难的嘗試

我們看到,完全把貨幣流通抽象掉,虽然使积累过程在扩大再生产图式中显得这样順利和簡單化,也有它本身的重大缺点。这个方法用来分析簡單再生产时,很有它的道理,因为在簡單再生产中,消費是生产的一切,生产目的的一切。貨幣在这里只起着短暫的作用,它作为社会生产物在不同消費集团間分配的居間者,資本更新的代理者。但在积累过程中,貨幣形态起着一个重要作用:它不單純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者,而且也起着作为資本的现象形态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537頁

資本的流通要素的作用。即令剩余价值的轉化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它却是資本主义积累在經濟上的必要前提。所以，在生产轉变为再生产时，剩余价值經歷着两次变化：第一、它抛弃了它的使用形态，第二、它采取了一种适合于积累目的的自然形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不同生产周期是以年为单位来計算的。以月为单位来計算也是同样可以的。在这一点上，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的各个部分的轉化甚至可能在時間上是交錯的。这里，連續的各年份并不意味着時間的单位，而实际上是指經濟轉化的順序。真正重要的是：如果积累保持它的資本主义性質，不管它延續的时期长短如何，这个順序必須得到遵守。这把我们引回到老問題上来了：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被誰实现的呢？

馬克思充分意識到他的看起来好象天衣无縫的积累图式沒有恰当地处理这一点。因此，他再三地从不同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他說：

“我們已經在第一卷，講过个别資本家的积累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商品資本的貨幣化，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生产物也会轉化为貨幣。資本家会把这样轉化为貨幣的剩余价值，再轉化为他的生产資本的追加的自然要素。而在下一个生产循环內，已經增大的資本，会提供一个增大的生产物。在个别資本上面发生的事情定然也会出现在年总生产上面。例如在考察簡單再生产时，我們已經看到，在个别資本上面发生的固定資本磨損部分依次沉淀成为貨幣，积累起来的现象，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也会表现出来”。^①

馬克思进一步从这个观点考察积累的运行方式，集中焦点在这个事实上面，即剩余价值在被积累起来以前，必須經歷貨幣阶段。

“比方說，有資本家A在一年間或多年間，依次把他所生产的商品生产物的一定量卖掉时，他也把商品生产物中負担剩余价值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15頁。

的部分——剩余生产物，把他在商品形态上生产的剩余价值，依次轉化为貨幣，并漸次把这种貨幣貯藏起来，形成一种可能的新貨幣資本。它是可能的新貨幣資本，因为它可以轉化并决定要轉化为生产資本的要素。但在事实上，他还不过实行了一种简单的貨幣貯藏，那并不是现实再生产的要素。所以，他的活动，起先不过是依次把流通的貨幣，从流通中取出。当然，并不是說，这样鎖藏起来的流通貨幣，在它加入流通以前，不可以是別一个貨幣貯藏的部分”。①

“貨幣所以会从流通中取出而当作貯藏貨幣积累起来，那是因为商品出卖之后，不曾繼以购买。所以，如果把这种行为看为是普遍的，那就难于明白，购买者是从何处来，因为在这个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必須認为是一般的，因为每一个个别的資本，都能够是在积累过程中——內，每一个人都为要貯藏貨幣而卖，但没有誰要买。

“假設年再生产各不同部分的流通过程是以直綫进行——这是不对的，因为除了少数例外，那是由各方面同时互相逆流的运动构成——我們便須从金(或銀)的生产者开始。金的生产者是只买而不卖的。并假設一切其他的人都卖給他。这样，常年的社会剩余生产物全部(即全部剩余价值的担負物)，都会过渡到他手中；其他一切資本家，就依比例，把他的天然在貨幣上面存在的剩余生产物，他的剩余价值的自然金化物，分配在他們的中間；因为金生产者生产物中要用来补偿他的机能資本的部分，都已經被拘束住了，并且已經在这上面被处理了。金生产者在金上面生产的剩余价值，这时，已經象是唯一的基金，一切其他的資本家，都要从这里，取出他們的年剩余生产物依以轉化为金的材料。所以，这个剩余价值，就其价值的大小而言，好象必須要与全部要先蛹化在貨幣貯藏形态上的社会年剩余价值相等。这个假設是不合理的，除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15—616頁。

了用它來說明有可能发生一般的的同时的貨幣貯藏，是不能再有別的幫助的。除了在金生产者方面，用这个也不能把再生产自身推进任何一步。

我們在解决这个外表上的困难之前，先要区别……”。^①

尽管如此，这个实现剩余价值的障碍，馬克思称之为“外表上的困难”的，还是这样的重要，以至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进一步加以討論，以便集中力量来克服这个困难。作为初步的嘗試，馬克思提議用貨幣貯藏来解决，这个貨幣貯藏，由于不同的个人不变資本在流通过程中是分开的，因之必然会在資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形成起来的。既然不同的資本投資享有不同的寿命，而且在每一工厂的各部分輪到更新前，总有一个間歇時間，那么，我們在任何时刻，都可以看到某一資本家正忙于更新他的工厂，而另一資本家却正在以出售商品所得的款項建立起准备金以备一旦准备金足够时，用来更新他的固定資本。

“例如假設A以商品 600(=400C+100V+100m)售于B(那可以代表多数购买者)。他已經用商品600卖到貨幣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当作貨幣积累起来。这100貨幣，不过是剩余生产物(那是价值100的負担物)的貨幣形态”。^②

为了在純粹意义下理解这个問題，馬克思这里假定全部剩余价值轉化为資本，由于这个原因，他完全不考虑供資本家个人消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此外，A'、A''、和A'''以及B'、B''和B'''这里都属于第一部类。

“一般地說，貨幣貯藏既然不是生产，也不是生产的增加。資本家的活动，在这里，不过是把售卖剩余生产物所得到的貨幣100，从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貯藏起来。并且，还不只A一方面会这样做，在流通范围的許多点上，还有别的資本家A'、A''、A'''，在股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15—618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618—619頁。

勤地从事同样的貯藏。……但A能够成就货币的貯藏，仅仅因为就他的剩余生产物来说，他只是卖者，而不接着成为买者。剩余生产物——他的要货币化的剩余价值的担負物——的連續的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貯藏的前提。在我們只討論第一部类的流通时，剩余生产物的自然形态及其所属的总生产物的自然形态，就是不变資本的一个要素的自然形态，那是属于生产資料的生产資料的范畴。我們馬上又会知道，它在B、B'、B''等等购买者手中将要成为什么，那就是，将要用在什么机能上面。”

“在这里，先应把握住这一点：A为他的剩余价值，从流通中把货币取出貯藏起来时，他就是把商品投在流通中，不由此取出別的商品来。也就因此，所以B、B'、B''等等能够投入货币而由此只取出商品。在当前的场合，这种商品，依其自然形态与规定性，便是B、B'等人的不变資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①

关于这整个过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馬克思在討論簡單再生产时已經广泛地描述这个问题，因为它单独能够解释一个社会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如何能够更新不变資本。至于这个过程如何能解决我們在分析扩大再生产中所遭遇的这个疑难问题，这是很难了解的。困难是：为了积累的原故，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沒有被資本家消費，而被加到資本上去，借以扩大生产，从而引起了誰购买这个追加的生产物的问题：資本家們不要消費它，工人們沒有能力消費它，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們的全部消費总是由所有的可变資本开支的。被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的需求是从那里来的？或則馬克思宁愿这样問：“支付被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是从那里来的？”

如果以个人資本家在不同時間对不变資本逐步进行更新的货币貯藏过程作为對我們的一个答案，那么，这两者間的联系还是不明显的。在B、B'、B''等向他們的同行A、A'、A''等购买生产資料，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19—620頁。

用来更新已經用去的不变資本时，远沒有超过簡單再生产的范围，因而对我們的问题來說这是毫无关系的。但一旦 B、B'、B'' 等所购买的生产資料以积累为目的，用来增加不变資本时，有一些新的问题要求我們注意了。第一、也是最突出的，B 等从那里得到錢向 A 等购买追加的生产物呢？他們唯一可能取得貨幣的办法是出售他們自己的剩余生产物。在他們为了扩张自己的企业而获取新生产資料之前，也就是說，在他們作为被积累起来的剩余生产物的买主而出现之前，他們必須首先銷售他們自己的剩余生产物——簡言之，B、B'、B'' 等必須自己曾經是卖主。但誰能預先购买他們的剩余生产物呢？显然地，这个困难仅仅是从 A 等轉移到 B 等，而沒有加以解决。

在分析的某一阶段，好象有一个时候真的最后找到了一个解答。在簡短的离題討論后，馬克思回到他所考察的主要問題如下：

“在我們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生产物要由生产生产資料的生产資料构成。当然，这个剩余生产物要到 B、B'、B'' 等等（第二部类）手中，才会当作追加的不变資本来发生机能。不过，在出卖之前，它已經在可能性上，在貨幣貯藏者 A、A'、A'' 等等資本家（第一部类）手中是不变資本。要是我們只考察第一部类方面再生产的价值的量，我們就还是在簡單再生产的限界之內；因为，还没有追加的資本，被推动来創造这个可能的追加的不变資本（剩余生产物），剩余劳动也不比簡單再生产基础上支出的剩余劳动更大。在这里，区别只是在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的形态上面，只是在它的特殊有用方法的具体性質上面。它是被支出来生产 IC 的生产資料，不是被用来生产 $II C$ 的生产資料，是生产生产資料的生产資料，不是生产消費資料的生产資料。在簡單再生产的场合，我們假設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是全部当作所得来支出，从而，是支出在第二部类的商品上。所以，它只由那种会在自然形态上替换不变資本 $II C$ 的生产資料构成。因此，要由簡單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

第一部类就要能够少为第二部类生产不变资本的要素，多为第一部类生产不变资本的要素。……如果只就价值的量考察，我们就可以結論說，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已经在简单再生产里面生产出来了。那不过直接是第一部类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被支出来为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創造可能的追加资本 I 。 A 、 A' 、 A'' （第一部类）方面会由他們的剩余生产物（那无须有任何资本主义的货币支出）的漸次售賣，形成一个可能的追加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这个可能的追加的货币资本，不过是追加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 I 的货币形态”。^①

根据这个解释，困难在我们接触到时好象就化为烏有了。积累根本不需要新的货币来源。在这之前，当资本家自己消費他們的剩余价值时，他們必須在手中有一笔相应的货币准备金，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已經証明资本家阶级自己必須把实现他們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投到流通中去。现在，资本家阶级，或 B 、 B' 和 B'' 不购买消費品了，而购买同等量的生产资料，借以扩大他們的生產。这样，同等价值的货币在其他资本家集团，即 A 、 A' 、 A'' 等的手中积累起来了。

“这种货币貯藏……决不表示貴金属財富的增加，但仅表示一向在流通中的货币的机能已經改变。以前，它是当作流通手段发生机能，现在是当作貯藏手段发生机能，是形成中的可能的新货币资本”。^②

一切就是如此！但这个摆脱困难的方法对于我们只有在在一个条件下有效，而这个条件是不难看到的：馬克思在这里所說的积累是指积累的最初萌芽状态，当它开始从简单再生产中发生的时候。对价值量而言，生产还没有扩大，它不过这样地重新安排，使得它的物质要素在不同方式下組合在一起。因此，货币来源之显得充分，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样的解决只对一个特殊的时刻，即在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23—625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625頁。

从简单再生产转变到扩大再生产的过渡时期，才是合适的——简言之，这样的一个时刻不适用于现实，它只能在设想中意识到。一旦积累已经建立起来了相当的时间，当增大的价值量在每一个生产周期中投到市场上来时，这些追加价值的买主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就在这一点上，上述的解答失败了。由此可知，它是一个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解答。再加以更仔细的考察，正当它好象为我们填平道路的时候，它却失去了效用。因为如果我们研究积累正当在它从简单再生产中出现的时候，它所要求的主要条件是资本家消费的降低。正当我们发现用已有的生产资料来扩大再生产的办法时，我们看到从前的消费者以同样的速度溜掉了。那么，扩大生产有什么好处呢？谁有能力从B、B'、B''那里购买这些增大数量的生产物呢？而这些生产物他们只有通过自己不花用那笔用来向A、A'、A''购买新的生产资料的货币才能生产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解答只是一个错觉——困难仍然存在。马克思自己重新提出问题：B、B'、B''从哪里得到货币来购买A、A'、A''的剩余生产物呢？

“如果B、B'、B''等人（第二部类）所生产的生产物，会有一部分再在自然形态上加入他们的过程，那不待说，在这限度内，他们自己的剩余生产物就会依比例有一个部分直接（不经过流通做媒介）转化为他们的生产资本，并在那里当作不变资本的追加要素。在这限度内，他们对于A、A'等人（第一部类）的剩余生产物的货币化，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不说此，货币又从何处来呢？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和A、A'、A''等人一样，由各个自剩余生产物的售卖，形成他们的货币贮藏，并且现在已经达到这个界限，因此要把他们当作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可能的货币资本，实际当作追加的货币资本来发生机能。但这样，我们也不过兜了一个圈子。问题依然是，B、B'等人（第二部类）以前从流通中取出的积累着的货币，是从何处来”？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8页。

馬克思迅速的回答又显得出奇地簡單：“我們已經由簡單再生产的考察，知道必須有一定的貨幣額在資本家Ⅰ和資本家Ⅱ手中，為了要互相交換他們的剩余生产物。在那里，仅仅為了要当作所得而支出在消費資料上的貨幣，会比例于各人為交換各自的商品而墊支的貨幣額，流回到各个資本家手里。在这里，同样的貨幣会再现出来，只是机能已經改变。諸A与諸B(第一部类)会交替供給貨幣，來使剩余生产物得以轉化为追加的可能的貨幣資本，并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貨幣資本，当作购买手段投回流通中去”。^①

这是循原路又回到簡單再生产上來了。当然，这是不錯的，資本家A等和資本家B等經常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貨幣貯藏，这样才能时常更新他們的不變(固定)資本，而在这样做时，他們实际上是在互相幫助实现他們的生产物。但这个积累起來的貨幣貯藏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固定資本(在价值上)不断地分期轉移到生产物上而自然地沉淀下來的，这些生产物然后逐一地在銷售过程中得到实现。由于它本身的性質，积累起來的貨幣貯藏只能抵充旧資本的更新，不可能有足够的数量來进一步购买追加的不變資本。这就是說我們仍然在簡單再生产范围之内。但，也許部分的流通手段原来用之于資本家个人消費的而现在轉化为資本了，这部分流通手段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追加貨幣來源吧？但要使这一点說得过去，我們必須回到唯一的、轉瞬即逝的时刻，这个时刻只是在理論上存在——从簡單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过渡时期。超越了这一間歇時間，积累就不能前进——老实說，我們仍然在兜圈子。

所以，資本家的貨幣貯藏不能作为摆脱我們困难的一条出路。这个結論的得出不見得出乎意外，因为这样表述困难本身是令人誤入歧途的。成为积累問題的，不是貨幣的來源，而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所产生的增多物品的需求的來源；不是在貨幣流通中的一个技術障礙，而是牽涉到社会总資本再生产的一个經濟問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28頁。

題。在迄今吸引馬克思全部注意的問題，即B、B'等(Ⅱ)從那里得到貨幣向A、A'等(Ⅰ)購買追加的生產資料的問題之外，要順利進行積累必然地將遭遇到一個遠較嚴重的問題：B、B'等等現在能把他們的增多的剩餘生產物賣給誰？馬克思最後使他們相互間出售他們的生產物：

“把可能的新貨幣資本當作能動的來發生作用的B、B'/B''等人(第二部類)，也許也要互相購買並且互相售賣他們的生產物(他們的剩餘生產物部分)。在這限度內，墊支在剩餘生產物流通上的貨幣——在正常的進行下——就會比例於諸B為了要流通各自的商品而墊支的貨幣，流回到諸B各自手里”。^①

“在這限度內”——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為歸根到底，B、B'、B''縮減他們的消費和擴張他們的生產，不單是為了購買相互間增大了的生產物，即生產資料。附帶地指出，就是這樣也只有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才有可能。馬克思假定第一部類本身的分工，A等生產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而B等生產製造消費品的生產資料。這等於說：雖然A、A'等的生產物永遠不必離開第一部類，但B、B'等的生產物由於它們的自然形態一開始就注定為第二部類服務。由此可知，B、B'等的積累必然會引導我們到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流通問題上來。因此，馬克思的分析証實：如果第一部類要積累，最後的結局，消費資料的部類也必須增加它直接或間接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因此，我們應該從第二部類及其資本家那里尋求對第一部類所生產的增多的生產物的買主。

十分肯定地說，馬克思的第二步研究這個問題是從下面一點開始的：第二部類資本家對追加的生產資料的需求。這種需求必然意味著第二部類的不變資本ⅡC是處在擴張的過程中。這是困難真正成為嚴重的所在之處：

“現在，我們假設A(第一部類)是以剩餘生產物，售於第二部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29—630頁。

类的某 B, 并由此把他的剩余生产物轉化为货币。这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由于 A (第一部类) 在以生产资料出售于 B (第二部类) 之后, 不再购买消费资料, 那就是, 只是由于他这方面的片面的售卖。但我们讲过, II C 要由商品资本的形态轉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自然形态, 不仅 I V 須与 II C (那是在消费资料形态上存在的) 的一部分相交换; I m 也至少須有一部分, 与 II C 的一部分相交换。但现在 A 依照来把 I m 轉化为货币的方法, 却使这种交换不能进行。我們的 A 宁可把他由 I m 的售卖从 II C 处取得的货币, 从流通中取出, 不把它用在消费资料的购买上。由此, 在 A (第一部类) 方面固然有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形成, 但在 B (第二部类) 方面却有等价值額的不变资本部分, 被拘束在商品资本的形态上, 不能轉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自然形态。那就是, B (第二部类) 商品的一部分已經不能售出。一看就知道, 沒有这一部分商品售出, 他就不能把他的不变资本全部轉化为生产形态。就这个关系說, 将会发生生产过剩, 并且同样就这个关系說, 那又会使再生产——甚至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受到阻碍”。①

第一部类通过向第二部类出售它的追加生产物来进行积累的努力, 遇到了一个意外的結果: 在第二部类资本家方面的短缺, 严重到甚至阻碍在原有规模上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程度。

馬克思討論到这个关键点后, 他企图用謹慎而詳尽的闡述来揭露这个問題的根源:

“現在我們略为細密地考察一下第二部类的积累。就 II C 說, 第一个难点——即商品资本 II 的一个成分, 如何轉化为不变资本 II 的自然形态——是与简单再生产有关的。我們再采用以上的表式:

(1,000V + 1,000m) I 与 2,000 II C 相交换

比方說, 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生产物有半数或 $\frac{1000}{2}$ m 或 500m

① 馬克思:“資本論”, 第二卷, 第631—632頁。

是再当作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剩余生产物这个仍然留在第一部类手中的部分，就不能替换ⅡC的任何部分。它不转化为消费资料……却当作第一部类自己的追加的生产资料。它不能在第一部类同时又在第二部类担任这种机能。资本家不能把他的剩余生产物的价值，支出在消费资料上，同时又生产地消费这种剩余生产物，把它合并在他的生产资本中。这样，就没有2,000Ⅰ(V+m)，而只有1,500，即(1,000V+500m)Ⅰ，能够与2,000ⅡC相交换了。因此，会有500ⅡC不能由它的商品形态再转化为第二部类的生产(不变)资本”。①

此刻，几乎任何人不能不相信这个困难是实在的，但我们却没有朝着它的解决方向走近一步。附带地说，这就是马克思从他上述不审慎地过分简单化中连续求助于一个虚构的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过渡时刻而自食恶果之处，这个过渡时刻他用来说明积累问题，从而把在发轫时的积累作为他的大前提，即在积累微弱的萌芽期，而不是在它壮大前进的阶段。只要是第一部类的积累问题，这个虚构至少还有一些道理。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抑制不用他们过去用来消费的那部分，从而得到一笔新的货币贮藏在那里，可以开始进行资本化。但当来到第二部类时，这个虚构的事情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第一部类资本家的“禁慾”这里表现为痛苦地丧失了消费者，因为生产是大体上根据这些消费者的预期的需求而布置的。我们曾探求过第二部类资本家能否成为第一部类的积累的追加生产物的求之不得的买主，但第二部类资本家自己也陷入困难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置他们卖不掉的生产物。既然如此，他们更少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不能闭着眼睛看不到这一事实：让一个资本家集团牺牲了另一个资本家集团而进行积累，这种做法必然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

但马克思后来又提到另一个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但他立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3—634页。

認為它是一個遁辭而拒絕它。由於第一部類積累的結果而產生的第二部類賣不掉的剩餘價值，也許可以當作一個社會在下年度所需要的商品儲存。這個解釋馬克思以他常有的透徹說理加以駁斥：

“……(1) 這裡說的商品儲存及其必要，對於一切資本家，Ⅰ與Ⅱ，都是適用的。把他們當作商品售賣者看，他們不過由下述的事實來自相區別：他們是售賣種類不同的商品。商品Ⅱ的儲存，假定商品Ⅰ以前已經有一個儲存。如果我們把一方面的這種儲存忽略過去，便也須在別方面如此做。但兩方面都把它放進來考察，問題是決不會因此變更的。(2) 在Ⅱ方面，固然必須在今年結束時，為次年保留一個商品儲存，但在今年開始時，我們也曾在這方面從去年得到一個商品儲存。把年再生產還原為它的最抽象的表現，我們必須在年再生產的分析上，在兩方面都把它勾銷。我們考察本年的總生產時，既然讓本年為次年的商品儲存包括在內，所以也要把去年留下來為今年的商品儲存除去，而實際以一個平均年度的總生產物作為分析的對象。(3) 這裡所要躲避的困難，在簡單再生產的考察上，是我們不會碰到的。這個簡單的事情，證明這裡處理的是一種特殊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是由於第一部類各種要素間（和再生產相聯系而言）有了不同的組合，只是由於組合上有了變化。沒有它，一般說，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是不能發生的”。^①

請注意：這最後一句話同樣地損害馬克思自己在前面所提出的說法，在這說法中，馬克思企圖以屬於簡單再生產的時機，這就是說，在資本家手中的固定資本逐漸周轉所形成的貨幣貯藏，來解決積累中的特殊困難（這個說法上面曾被引伸作為第一部類積累的說明）。

馬克思接着用圖式來闡明擴大再生產。但他剛開始分析他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36頁。

图式时，同样的困难以略为不同的外形又馬上重新出现了。在第二部类資本家必須把 140m 轉化为不变資本才有可能进行积累的假定下，馬克思問道：

“第二部类必須用現錢来购买 140m，但不能在此后以商品售賣于第一部类，并由此将此貨幣取回。在我們是說扩大的再生产时，这是一个会在每一个常年新生产上不断反复发生的問題。然則，第二部类是从何处取得这种貨幣呢”？^①

在下面，馬克思試作各种探索来找出这个来源。首先第二部类資本家在可变資本上的开支曾被仔細地考察过。不錯，它是以貨幣形态存在的，但它的正当机能是购买劳动力，它不可能被收回去，或許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資料。

“这样不断反复从出发点离开又回到出发点——資本家的錢袋——無論如何也不会增加在这个循环內游来游去的貨幣。它不是貨幣积累的源泉”。^②

馬克思于是考虑一切可以設想到的說法，結果表明它們只是規避了問題的症結所在。

“但是”，他說道：“这里不是有一个小小的便利么”？^③

他考虑到資本家能否做到把工人的工資压低到正常平均水平以下，这样節約出一些可变資本，从而取得一个新的貨幣来源来进行积累。当然，他只要一举手就可以駁斥这个见解：

“但我們不应忘記，实际支付的正常工資（在其他一切情形相等的条件下，就是这个工資决定可变資本的量），决不是因为資本家好才支付的，却是在一定条件下必須支付的。由此，这个說明方法便被排开了”。^④

他甚至探求有什么隱蔽的方法可能用来“節約”可变資本，例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39頁。

② 同上書，第640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書，第二卷，第640—641頁。

如实物給付制、欺騙手段等等。結果，他只能下这样的評語：“这个方法，正好就是(1)項的方法，不过是掩飾了的，是迂迴曲折的。所以，也要和(1)項的方法一样被排开”。^①

一切試图从可变資本获得新的貨幣来源以进行积累的努力都沒有得到結果。“所以，要达到所期望的目的，用376II V是不行的”。^②

馬克思下一步轉向第二部类資本家为了实现他們自己的消費而保持的貨幣准备金，他考察能否以这笔貨幣的一部分轉用到积累目的上去。但他承認这“更是不行的”。

“在这里，只有同部类各个資本家互相对立。他們互相买卖他們所生产的消費資料。交換所必要的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在正常的进行中，这种貨幣必定会比例于各自垫支入流通中的量，流回到各个當事人手里；必須如此，它才能不断地，重新地，通过同一的軌道”。^③

象可以預料的，接下去的嘗試是属于遁辞一类的东西，这些馬克思无情地加以駁斥了，例如企图說明第二部类的一个資本家集团能够通过欺騙同一部类的其他資本家——这就是說，在相互銷售消費品的过程中——来积聚一笔貨幣資本在手里。我們对这个微不足道的論点不必多花時間了。

接下去有一个比較健康的意見：“或者是II_m的一部分，由必要生活資料代表的，直接轉化为第二部类的新的可变資本”。^④

这一点如何幫助我們克服困難，促使积累向前迈进，我們不十分清楚。从一方面看，在第二部类形成追加的可变資本，是沒有多大用处的，如果在这个部类里沒有追加的不变資本，而事实上第二部类正是在寻找追加的不变資本。从另一方面看，我們现在所关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41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642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

心的是为第二部类觅取向第一部类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所需的货币来源，至于第二部类在生产过程中用这个或那个方式处理自己增多的生产物不是在我们考虑范围内的。再次，是不是有这样的含意：有关的消费品将在第二部类生产中“直接”使用，不经过货币的媒介，因此相应数量的货币得以从可变资本转移到积累目的上去？如果是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解答。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用消费品直接作为工人的报酬的方法是被排斥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奠基石之一就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主和消费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独立交易。马克思自己在另一场合下也强调这一点：

“我们知道现实的可变资本，是由劳动力构成，所以，追加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劳动力构成。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无须象奴隶所有者那样，向第二部类购买必要生活资料储存着，也无须为所使用的追加劳动力，堆积着这种必要生活资料。与第二部类交易的，是劳动者自己”。^①

这是对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正如对第一部类的资本家一样，也是适用的，这就排除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最后努力。

马克思在结束时，要我们参考“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的最后部分，即恩格斯称之为“补论”的那部分。这里，我们找到简短的说明如下：

“对于第二部类，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一部类金生产者用来交换ⅡC一部分的 $V+m$ 。只有在金生产者积累他的剩余价值或将它转化为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从而扩大他的生产的时候，他的 $V+m$ 才不会加入第二部类去。但另一方面，又要金生产者方面的货币积累，结局会引起扩大的再生产，金生产的剩余价值中那不当作所得来用的部分，才会当作金生产者的追加的可变资本，加到第二部类去，并在那里促进新的货币贮藏，或给予新的手段，使它能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9—650页。

第一部类购买,而无需直接再售卖給它”。^①

在解释积累中,一切可以設想到的嘗試都归失敗后,在我們被赶得东奔西窜,从AⅠ到BⅠ,又从BⅠ到AⅡ后,我們最后被引回到金生产者那里去,而馬克思在他的分析开始时,曾經認為求助于金生产者是“荒唐”的。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以及“資本論”第二卷,最后在結束时,始終沒有对我們的困难提供一个久觅不得的答案。

第九章 从流通过程角度看这个困难

馬克思分析中的缺陷,在我們看来,是錯誤地把这个問題表述为一个简单的“貨幣来源”問題,而实际的爭端是在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物品所投入的用途,而不是用来支付这些物品的貨幣的来源。至于当作流通手段的貨幣:当我們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时,我們應該假設資本主义社会所安排的貨幣或其代替物,在数量上总是刚刚相当于在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所需要加以說明的,是由现实經濟需要所引起的大的社会交換行为。尽管要記住的重要的一点是:資本主义剩余价值在能被积累之前,总是經歷貨幣阶段,但我們还必须追溯到剩余生产物的經濟需求,这与貨幣从那里来的疑团是毫不相干的。正如馬克思自己在另外一段中說的:

“……一方面的貨幣能够喚起別一方面的扩大的再生产,那是因为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沒有貨幣也已經存在;貨幣本身并不是现实再生产的要素”。^②

在另一场合,馬克思实际上指明关于“貨幣来源”的問題是一个对积累問題毫无裨益的表述。

事实上,在以前当他考察流通过程时,他有一次曾經遭遇到这个困难。还在討論简单再生产时,他曾經就剩余价值的流通問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659頁。

② 同上書,第615頁。

題，問道：

“但商品資本，在它再轉化為生產資本以前，在其中所含剩餘價值能被支出以前，必須先轉化為貨幣。為這個目的的貨幣，從那裏來呢？這個問題，最初一看，好象是很難的，杜克沒有把它答復，一直到现在，也還沒有別的人曾經把它答復”。^①

馬克思於是毫不退縮地追溯這件事情的根源：“假使在貨幣資本形態上墊支的流動資本500鎊，不論其周轉期如何，就是社會（即資本家階級）的總流動資本罷。又假設剩餘價值是100鎊。這樣，資本家階級全體在只不斷投入500鎊時，怎樣能不斷從流通中取出600鎊呢”？^②

這裡要提醒的，是所有一切都指簡單再生產，因而全部剩餘價值是用來供資本家階級個人消費的。所以，從一開始，這個問題應該更確切用下列方式提出來：資本家在投入流通中去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500鎊以外，如何能夠為自己獲得達到剩餘價值100鎊的消費品呢？很明顯的，這個500鎊，在資本形態下，總是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和支付工人的，它不能同時用來開支資本家個人消費的費用。那麼，這筆追加的貨幣從那裏來呢——即資本家實現他們自己的剩餘價值所需要的100鎊從那裏來呢？這樣，所有可以設想的理論上的託辭都被馬克思斷然加以拒絕了：

“現在我們不要再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辭來躲避這個困難了。

“例如，說到不變的流動資本，很明白，那不是全部同時投下的。在資本家A售賣他的商品，從而，使他的墊支資本取得貨幣形態時，買者B就把他的在貨幣形態上的資本，取得那正好是A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形態。同一個行為，使A能夠把他所生產的商品資本再取得貨幣形態的，會使B的資本再取得生產形態，即由貨幣形態轉化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同一貨幣，在一個兩面的過程上，象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398頁。

^② 同上。

在每一个简单的购买W—G上一样,发生机能。另一方面,当A再把他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时,他是从C购买,C又以这个货币付于B等等。这样,过程就好象已经被说明了。但:

“我们讨论商品流通时(第一卷第三章第137页以下)关于流通货币量所成立的各种法则,并不因生产过程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发生变化。

“有人会说,在货币形态上垫支的社会的流动资本等于500镑时,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实加在考虑中了:它从一方面说是同时垫支的金额,但另一方面,这个金额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却比500镑更大,因为它会交替充作不同种生产资本的货币基金。所以,这种说明方法,是把货币已经存在当作前提,但应该做的,正是说明它的存在。

“还有人会说,资本家A所生产的物品,是由资本家B个人地,不生产地消费的。B的货币,使A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所以,是同一个货币额,使B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又使资本家A的流动不变资本转化为货币。但在这里,待解答的问题,还是直接假定为已经解决。那就是,B从那里取得这种货币来支付他的所得。他怎样把他的生产物的这个剩余价值部分转化为货币?

“还有人会说,A不断垫支给劳动者的流动可变资本部分,会不断从流通中流回;其中只有一个交替的部分,要不断保留在他手里,被用来支付工资。在支出和流回之间,会经过一定的时间;在这时间内,付作工资的货币,除了用在别的用途,就可以用来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但第一、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愈大,资本家A必须预先保留的货币准备额,就必须愈是大。第二、劳动者会支出货币,会用它来购买商品,从而,会在这个程度以内,把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在这里,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还无需乎深入,只要说:全资本家阶级及依赖于他们的全部不生产者的消费,是与劳动者阶级的消费同时并进的;所以,在劳动者以货币投入流通中时,资本家为了要把他们的剩余价值当作所得来支

出,也必須以貨幣投在流通中。所以;为这个目的,貨幣还是必須从流通取出。以上的說明,不过减少了,但并没排除为这个目的而成为必要的量。

“最后,还有人会說,固定資本初投下时,会不断有一个鉅額的貨幣投在流通中,那只能漸次地,斷片地,在多年間,由投入者再从流通中取出。这个貨幣額,不够使剩余价值化为貨幣么?——对于这点,我們可以答复:在500鎊的金額(当作必要准备基金的貨幣貯藏也包含在內)中,宁可說已經包含这个金額要当作固定資本来用的意思。即使不是由投下它的人本人,也会由某別的人。并且,說到那种要当作固定資本用的生产物是用什么金額来购买时,我們已經假定,这个商品內包含的剩余价值也已經被支付。問題依然是这个貨幣从何处来?”^①

附带地說,对于这最后的一語,值得注意的,在于:馬克思在这里明白地否定了即使在簡單再生产情形下,用为了周期地更新固定資本而形成的貨幣貯藏来解释剩余价值的实现問題的說法。稍后,为了在远較困难的积累条件下实现剩余价值,他不止一次地試圖証实这一类型的解释方法,但他自己不得不拒絕它,斥之为“似是而非的遁辞”。

于是出现了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似乎也带有不合拍的調子。“一般的答复是已經給予了:当一个 $X \times 1,000$ 鎊的商品額要流通时,这个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額的大小,絕不致因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这个商品量是否在資本主义下生产,而有所变更。这个問題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在其他一切条件(如貨幣的流通速度等等)不变的情形下,要流通 $X \times 1,000$ 鎊的商品价值,就須有一定額的貨幣,而完全与这个价值有多少归于这个商品的直接生产者的事情无关。如果在这场合有什么問題,那也是和一般的問題相同:流通一国商品所必需的貨幣額,是从何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399—401頁。

来？”^①

这个論点是相当健全的。这个对于流通一国内一定数量的商品的貨幣来源的一般問題的答案也会告訴我們流通剩余价值所需的貨幣是从那里来的。把包含在商品内的价值总量分割为不变資本、可变資本和剩余价值——这样的分割，从貨幣流通的角度看，是不存在的，同时，从这一点來說，也是无意义的。但只是从貨幣流通角度，或簡單商品流通角度来看，这个問題才是不存在的。从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方面看，这个問題确是现实的；但它当然不能放入那样令人誤入歧途的形式下，使我們退回到簡單商品流通的地位，在那里，这个問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們不應該問：实现剩余价值所需的貨幣是从那里来的？但應該問：这剩余价值的消費者是在那里？无疑地，就是这些消費者，在他們手中有这笔貨幣用来投入流通中去。这样，馬克思自己虽然刚刚否認了这个問題的存在，又不时地回到这个問題上来了。

“现在又只有两个出发点：資本家和劳动者。一切第三种人，不是为这两个階級服务，从他們那里得貨幣为酬，便是不提供对等的服务，就在地租利息等形态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剩余价值不全部留在产业資本家錢袋中但須与別人分割的事实，对于我們当前的問題，是一点关系沒有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他怎样把他的剩余价值轉化为貨幣？不是这种已經轉化为貨幣的剩余价值后来要怎样分割？现在，我們尽可以視資本家为剩余价值的唯一的所有者。至于劳动者，我們講过，就劳动者投入流通中的貨幣說，他只是第二步的出发点，資本家却是第一步的出发点。当作可变資本墊支的貨幣，在它由劳动者为支付生活資料而支付时，是已經在通过它的第二流通了。

“这样，資本家階級便是貨幣流通的唯一的出发了。如果他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401頁。

們必須有 400 鎊支付生產資料，100 鎊支付勞動力，他們就會把 500 鎊投在流通中。但包含在生產物內的剩餘價值，在剩餘價值率為 100% 時，是等於一個 100 鎊的價值。他們既然只是不斷投下 500 鎊，又怎樣能不斷從流通中取出 600 鎊呢？由無不能生有。全資本家階級只能把他們以前投在流通中的東西，從流通中取出”。^①

馬克思還推翻另一個想法，這個想法也許被認為對這個問題是合用的，這就是，一個較快的貨幣周轉率，能以較少量的貨幣流通較大量的價值。當然，這個遁辭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在造成商品總量和一定數量的英鎊相等時，貨幣流通速度已經估計在內了。最後，我們好像已經望見了一個正確的答案：

“事實上——最初一看，這好像是一種怪論——把貨幣投在流通中，以實現商品中包含的剩餘價值的，就是資本家階級自己。但請注意，他們不是把它當作墊支貨幣，不是把它當作資本，投在流通中的。他們支出它，是把它當作個人消費品的購買手段。它不是由他們墊支的，不過他們是它的流通的出發點”。^②

這個清晰而概括的闡述最好地証實這個問題不是僅僅幻想，而是十分現實的。它不是以揭露實現剩餘價值的一個新的“貨幣來源”，而是以結局指出這剩餘價值的消費者，來提供一個答案。在馬克思的假設下，我們仍然是在簡單再生產的範圍內；這就是說，資本家階級用他們全部的剩餘價值來供個人的消費。既然資本家是剩餘價值的消費者，這不是詭辯，而是真理，即他們按正常事理說，必須擁有取得消費物品（即剩餘價值的自然形態）的貨幣。交換的流通行為是下列事實的必然結果：個人資本家不能立即消費他個人的剩餘價值，因之，也不能立即消費個人的剩餘生產物，例如象奴隸勞動的主人一樣。一般地說，剩餘生產物的自然物質形態傾向於排斥這樣用法。但是資本家的總剩餘價值，一般地說，是包含在社會總生產物中，而以供資本家階級使用的相應數量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 402 頁。

② 同上書，第 403 頁。

的消費品为代表——只要在簡單再生产的情形下——正如可变資本总额有它相应数量的供工人阶级用的消費品一样，也正如所有个人資本家的不变資本的总和是以相应数量的物质生产資料为代表。为了要以不能消費的个人剩余价值交换相应数量的消費品，双重的商品交换行为是必要的：第一、出售本人的剩余生产物；其次从社会剩余生产物中购取消費品。这两笔交易只能在資本家阶级的成員間，即在个人資本家間发生；这就意味着，他們的工具、貨幣、因而在一个資本家与另一資本家之間易手，但并没有从整个資本家阶级中脱离出来。既然簡單再生产必然含有等量交换的意思，同量貨幣就可以年复一年地供剩余价值的流通之用。只有过度的热心会促使提出进一步的疑問如下：作为資本家自己消費的媒介的貨幣最初从哪里来的？但这个问题簡化为更一般性的問題时，即为貨幣資本最初如何到达資本家手里，而在这貨幣資本中，資本家們除用来进行生产投資外，还保留一部分供个人的消費。但如果这样提出来，这个问题就属于所謂“原始积累”的一章，即資本的历史起源，这将超出分析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范围之外了。

这样，只要我們停留在簡單再生产范围之内，事实是清楚而无可怀疑的。这里，这个问题以自己的前提解答了。事实上，这个答案是簡單再生产概念本身所預定好的，因为簡單再生产就是以全部剩余价值为資本家所消費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必須是資本家来买它，这就是說，个人資本家必然相互間购买剩余价值。

馬克思自己說：“在这场合，我們假定，資本家在其資本第一次流回以前，为个人消費而投在流通中的貨幣額，恰好与他所生产，所貨幣化的剩余价值相等。就个别資本家說，这个假定，当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在簡單再生产的假設下，这个假定，对于全資本家阶级，必須是正确的。簡單再生产的假設，正好表示了我們这里的假定，那就是全部剩余价值（只是剩余价值，不包括原資本的任

何部分),是不生产地消費掉的”。^①

但在資本主义基础下的簡單再生产,归根到底,是在經濟理論中的一个虛数,較之数学上的 $\sqrt{-1}$ 既不較多也沒有較少的合法性,而且是同样地不可避免的。更坏的,它不能对在现实生活中,即在扩大再生产或积累的情况下,实现剩余价值問題有所帮助。馬克思自己在进一步發揮他的分析时,又再次这样地說。

如果有了积累,即部分剩余价值不用作消費而轉化为資本时,实现剩余价值的貨幣是从那里来的呢?馬克思的最初回答如下:

“先說为了要使增加的生产資本发生机能而成为必要的追加貨幣資本罢。那会由已經实现的剩余价值一部分供給出来。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会当作貨幣資本,不是当作所得的貨幣形态,由資本家投在流通中。貨幣已經在資本家手中。所不同的,不过是它的用法”。^②

我們对再生产过程的考察,已經使我們熟悉这个說明,我們同样也熟悉它的缺点。举其一而言,这个答案依仗着从簡單再生产最初过渡到积累的时刻。資本家就在昨天消費了他們全部的剩余价值,因此,在手里有相应数量的貨幣供流通之用。今天他們决定“节省”一部分剩余价值,不胡乱用掉,而进行生产性的投資。如果已經制造出来的,是物質生产資料而不是奢侈品,他們只要把他們个人的貨幣基金一部分投入另一用途就成了。但从簡單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过渡,較之資本的簡單再生产本身,其在理論上的虛构性,并无逊色。由于这个原故,馬克思立即接下去說道:

“但由于生产資本增加,将会有有一个追加的商品量,当作它的生产物,投到流通中来。商品量增加时,其实现所必要的追加貨幣一部分会同时投到流通中来,不过要这个商品量的价值,与其生产所消費的生产資本的价值相等才是这样。这种追加的貨幣量,是当作追加的貨幣資本被垫支下去的,并且会通过資本的周轉,流回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405頁。

② 同上書,第416頁。

到資本家手里。所以，这里遇到的問題，正好和上面遇到的問題相同。现今在商品形态上的追加的剩余价值，到哪里去找追加的货币来实现呢？”^①

問題是提得再也沒有比这里更确切的了。但接下去的却不是一个解答，而是令人惊异的結論如下：

“一般的答复还是一样：流通商品量的价格总额增加了，不是因为一定量商品的价格已經提高，却是因为现在流通的商品量，比以前流通的商品量已經增大，而又沒有价格的跌落，从中为之抵銷。这个較大的有較大价值的商品量的流通所必須有的追加货币，或是由流通货币量的高度的經濟——那或是由支付等等的平衡，或是由同一枚货币流通加速的方法——得到，或是由货币由貯藏形态到流通形态的轉化得到”。^②

所有这一切等于这样說：在繼續发展和增大的积累条件下，资本主义再生产把不断加大的商品价值量抛到市场上来。把这个价值不断加大的商品量投在流通中时，需要不断增大的货币量。这增大的货币量必定有办法找到的。从它本身而論，这一切无疑是动听的和正确的，但我們的问题沒有解决，而仅仅是在愿望中消除了。

不是这个，便是那个！我們或許把资本主义經濟中的社会总生产物简单地看作一堆混杂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而在积累条件下，把这个沒有区别的商品混杂堆以及它的全部价值看作單純的增大。这样，我們所要說的是：为了流通这一价值总量，相应数量的货币是必要的，并随着这价值总量的加大，货币数量也必然增加，除非这个价值的增长被交易的加速和节约所抵銷了。而最后的问题：所有这些货币原来是从那里来的，于是可以用馬克思的处方来回答：从金矿中来。当然，这是对事情的一种看法，即简单商品流通的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沒有必要引用不变資本，可变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416頁。

② 同上書，第416—417頁。

資本和剩余价值等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在简单商品流通中是没有地位的，它们基本上是属于资本流通和社会再生产的；也没有必要探讨起初在简单再生产，后来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来源问题。在简单商品流通的状态下，这种疑问是没有意义或没有内容的。但一旦这些问题提出来了，一旦确定了方向，要考察资本流通和社会再生产时，我们不能再求助于简单商品流通的范围了，因为在简单商品流通范围内，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因而也没有解决这样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在那里找寻一个答案，然后胜利地宣称这个问题老早就解决了，并且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似乎一直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盘问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货币的来源不能起任何有益的作用。问题毋宁是：需求能从那里发生——寻找剩余价值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问题在开始时就这样提出来，那么，就没有必要走了这么多的曲折道路来证实它能不能解答出来。在简单再生产下，事情是较容易的：既然全部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消费，资本家自己就是买主，因而提供了社会剩余价值的全部需求，¹并照此看来，他们在手中必然有必要的现钱供剩余价值流通之用。但根据这样的阐述，十分明显的，在积累的条件下，即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下，资本家自己，根据假设，不能购买全部剩余价值，他们不可能实现全部的剩余价值。不错，如果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要得到实现的话，为了实现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货币必须供应无缺。但这笔货币如果是从资本家阶级的钱袋中出来；这是十分不可能的。正因为已经假定了积累，资本家本身不能购买自己的剩余价值，尽管他可能在抽象上，有这笔货币来这样做。另外还有谁能够对包含着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商品提供需求呢？

“依照我们的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有一般的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这个阶级（资本家）之外，还只有劳动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所买的全部，等于他们的工资的总额，等于资本家阶级全体垫

支的可变資本的总和”。^①

这样，工人們比資本家階級更少可能来实现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如果資本家們还能够收回他們所积累和垫支的資本，必須有一些人来购买它；但是，除了資本家和工人之外，我們想不出其他的买主。在这样情形下，“全資本家階級要怎样才能积累货币呢”？^②

剩余价值要在社会上仅有的两階級外实现，看起来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它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样的。資本积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內。至少，資本論卷二沒有指出一条出路。

如果我們现在問：馬克思的資本論为什么对資本积累这个重要問題沒有提供一个解答，我們必須首先記住这第二卷不是一个写好的全稿，而是一个半完成的稿子。

特别是这一卷最后几章的外形証明这些部分是属于筆記的性質，用来澄清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作为教导讀者用的最后結論。这个事实充分地為恩格斯所証实，恩格斯編輯了第二卷，因而他最能了解这本书。在第二卷的恩格斯序言中，他詳細地报道了馬克思所遺留下的論文和手稿，这些遺作构成了本卷的基础：

“材料是包含以次几部分：第一、是題为‘政治經济学批判’，包含四开本1,472頁，計分23冊的原稿，那是由1861年8月至1863年6月間写成的。那是1859年在柏林以同一标题刊行的第一冊的續稿……这种原稿虽然极有价值，但对于现在刊行的第二卷，是不大能够利用的”。

“从時間的順序說，接着的，是第三卷的原稿……”

“其后，即第一卷出版以后，有留作第二卷用的对开紙原稿一組，計四件，由馬克思自己附有工—Ⅳ的記号。第Ⅰ稿共150頁，大概是成于1865年或1867年。这对于第二卷，对于现在这样編輯的第二卷，是第一个独立的論究，但多少有断片的性質。在这里，也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420頁。

② 同上書，第421頁。

不能利用。第Ⅲ稿一部分是由馬克思札記簿上的引文和提示的汇集——主要是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所构成，一部分是論究个别諸点，特别是批判亚当·斯密关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以及关于利潤源泉的见解；其中还曾論述到剩余价值率对利潤率的关系，那是属于第三卷的范围。这种提示，沒有提供多少新的见地，而由于后来的修改，这些論究，对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經成为多余的，所以大部分也不得不弃置不用了。第Ⅳ稿系討論第二卷第一篇及第二篇前几章的問題，已經完全整理好，可以付印，也已經被利用在适当的地方了。这个原稿，虽然証明了是在第Ⅱ稿之前写的，但因为形式上較为完整，可以有利地用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只要从第Ⅱ稿把若干文句加进去就行了。——这最后說到的一件原稿，是唯一可以在第二卷利用的相当完整的東西，成于1870年。我馬上就要述及的供最后修訂时参考的筆記，就明白說：‘第二稿必須当做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休止期間，那主要是由于他的病。他照例是利用这种期間，作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貨币市场与銀行业，最后，地質学，生理学一类自然科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是这时以后許多札記簿的內容。1877年初，他觉得他的健康已經恢复，能够重新来做原来的工作了。在同年三月末，他由前述四件原稿，作成提示与筆記，希望由此作成第二卷重新制作的基础。这种工作的开端，见于第Ⅴ稿（对开紙56頁）。这第Ⅴ稿含有最初四章，但还未完成。許多要点，是在本文的注中討論，其材料与其說已經編好，不如說只是搜集在一起。不过，就第一篇最重要的部分說，这份原稿就是最終的完全的叙述了。——根据这些来作成一個可以付印的原稿的初步嘗試，见于第Ⅵ稿，那是在1877年10月以后，1878年7月以前写成的，仅仅四开紙17頁，包括着第一章的最大部分。他的第二次的或最后一次的嘗試，见于‘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Ⅶ稿，只有对开紙7頁。

“大約就在这时候，馬克思似乎明白了，要是他的健康状态沒

有一种完全的革命，他决不能令自己也感滿意地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其实，第Ⅴ稿到第Ⅶ稿也已經屢屢留下痕迹，表示出他正在和困人的病况相苦斗。第一篇最困难的部分，已在第Ⅴ稿中重新推敲过了。第一篇其余部分及第二篇全部（第十七章除外），未曾在理論上出现何等大的困难。但討論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第三篇，在他看，是迫切地需要修改。因为第Ⅱ稿討論这种再生产时，起初还不曾顧及起媒介作用的貨幣流通，那是以后才考慮到的。因此，就得加以淘汰，把全篇改造，使它可以和著者的扩大了的眼界相一致。第Ⅷ稿就是这样产生的。这虽然只是四开紙70頁的稿件，但只要看到现在付印的第三篇（除去由第Ⅱ稿插入的部分），就知道馬克思要在这个篇幅內压缩进一些什么东西。

“但这个第Ⅷ稿，也不过对主题作了初步的討論；其主要目的，在确立并展开第Ⅱ稿所不曾表示的新的见地，那些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說的地方，就都被忽視了。多少与第三篇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再在这里被論究，被扩充了。邏輯的联系往往被中断；有的地方論述得不完全；特別在結尾的地方，完全是断片的。但馬克思所要說的話，都已經在那里，依某种方式說出来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告訴他的女儿爱灵娜（Eleanor）說，他希望我用这个‘做出一点东西’来”。^①

我們不能不欽佩恩格斯从这样的材料中設法“做出”这样“一点东西”来。但对于我們現在的問題來說，这个詳細的报道指出，在組成第二卷的三篇中，只有第一篇“关于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的流通”和第二篇“关于流通的原因和資本的周轉”，在馬克思的遺稿中，成为写好而可以付印的样子。第三篇討論总資本的再生产，仅仅是断片的汇集，馬克思自己也認為“迫切地需要修改的”。然而就是这一篇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二十一章“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对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2—6頁。

于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最關重要，但在第二卷中它是最不完全的。它包括印好后三十五頁的篇幅，而在分析的中間就中斷了。

除了這個外來的境況外，我們想提供發生鉅大影響的另外一點。馬克思對社會再生產過程的考察，象我們上面所看到的，是以亞當·斯密的分析為起點，而除了其他原因外，由於所有商品的价格由 $V+m$ 組成這個錯誤的學說，亞當·斯密的分析陷入了困境。對這個學說的論戰籠罩着馬克思對再生產過程的全部分析。他致力於證明社會總資本不僅必須按照不同所得來源的全部總額供應消費，而且還必須供更新不變資本之用。由於在這方面說理時所採取的純理論形式是通過簡單再生產，而不是擴大再生產來表達的，馬克思傾向於主要從一個與積累相反的观点，從全部剩餘價值為資本家所消費的這一假設，來考慮再生產問題。這些論戰如何重大地影響他的分析可從下列事實得到說明：在他的著作中，他屢次回過頭來從極端不同的角度攻擊亞當·斯密。在第一卷中已經有下列地方從事於這個論戰：第七篇第二十二章（2）第738—740頁；在第二卷中則有下列各頁：第442—478、504—505、538—542、595頁。

馬克思在第三卷中又提出總再生產問題來討論，但從一開始又一次糾纏在亞當·斯密所提的問題之中，對於這個問題，他用了第四十九章的全部和第五十章的大部分篇幅（第1090—1116，1117—1148頁）。最後，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我們又看到對斯密學說的詳細駁斥：第一卷中第163—241頁；第二卷第二篇中第278—279、283、460頁。馬克思再三強調這個事實：他認為從社會總資本中更新不變資本是最困難的、也是最重要的、再生產問題。^①這樣，另外一個問題，積累問題，也就是，以資本化為目的的剩餘價值實現問題，被推入幕後，直至結束時，很少為馬克思所論及了。

既然這個問題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是如此的重要，資產階級經

^① 例如見“資本論”第二卷，第457—459頁，557—582頁。

济学者再三討論它是不足为奇的。在經濟理論史上，曾一再有人提出資本主义經濟中的这个关键問題，即資本积累在实践上是否可能的問題，而企图加以解决。現在我們就要在下面看到在馬克思前和在馬克思后在历史上的这些嘗試。

第二編 本問題的历史发展

第一回論战

西斯蒙第—馬尔薩斯对薩伊— 里嘉图—麦克洛克

第十章 西斯蒙第的再生产論

在1815年和1818—19年英国最初的經濟危机的直接影响下，资产階級經濟学者中开始对資本主义体系的神圣性发生严重的怀疑。导致危机的因素，当初还只是外部的，而且表面上带有偶然的性質：因为第一，由于拿破侖的大陆封鎖，英国在某一时期，对欧洲市场的联系，被人为地阻断了；大陆各国的工业在短期內有了显著的发展；第二，大陆封鎖取消以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结果，大陆上的民穷財尽，使那里对英国生产物的需求較預期的要少。然而，这些早期的危机，仍然足以把大家認为一切社会組織中最好的一种，所包含的可怕的黑暗面，暴露出来了。一方面，市场的泛濫，商店堆滿了商品而找不到购买者，无数的破产者；另一方面，劳动者大众的极度貧穷——这些事实都初次展开在那些理論家們的眼前，他們曾經宣扬资产階級自由放任所帶來的美好的和諧，并曾以各种音調加以歌頌。当时許多商业报告、杂志、旅行家的札記，都报道英国商人所受的損失。在意大利、德国、俄国、巴西的英国人，冒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損失，来拍卖他們所貯存的商品。1818年，好望角的居民訴說所有商店內，欧洲商品充斥，它們虽以低于欧洲的价格出售，但仍卖不出去。同样的怨声也从加尔各答

传来。整批的貨物从澳洲退回英国来了。据当时在美国旅行的一位旅客目击談：“在这片广大而富饒的大陆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没有一个城市或村庄所陈列的商品不是大大地超过购买者的能力的，尽管商人們采用了种种方法吸引顧客，如长期賒欠，各种付款的便利，分期付款，接受实物償付等等”。

同时，英国工人階級的激烈呼声，到处都听得见。1820年5月“爱丁堡評論”登載着諾廷汉(Nottingham)制袜工人的請愿书，其中說明如下：“我們每日劳动十四小时乃至十六小时，而每周工資不过四先令乃至七先令，以这点微薄的工資，要去养活妻子与家屬。我們还要說，普通英国人食桌上稍含营养的食物，我們是吃不起的。我們只能用面包与水，或加盐的馬鈴薯来下餐。工作了一天之后，带着疲乏的身体回家，为了少听点飢餓的哭声，不能不常令小孩子餓着肚子去睡觉。我們要严肃地声明，在最近十八个月內，我們始終沒有感受到飽腹的味道”。^①

于是，英国的欧文，法国的西斯蒙第，差不多同时对資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訴。但是，欧文作为道地的英国人，最先进工业国的市民，扮演了慷慨的社会改革的代言者的角色；反之，瑞士小資产階級的西斯蒙第，則針對着现有社会制度和古典学派經济学中的缺陷大肆抨击。在这样做时，西斯蒙第对于資产階級政治經济学，比之欧文，提出了一个較难解答的难题。而欧文則直接对着无

^① 1820年倫敦前議會議員所写的“关于外国貿易限制的有害結果的考察”一文的評論中，可以找到很有趣味的纪录摘要。这篇有自由貿易主义傾向的論文，大体上是以最阴惨的話調，描述英国工人的地位，其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实：“……大不列顛的工业劳动者階級，从富庶与繁榮的頂点，突然陷入貧困与悲惨的极端。在上屆議會會議期間的某次討論中，曾述及格拉斯哥与其近郊的織工工資，最高时期，平均为每周約25先令乃至27先令；但到1816年，即降为10先令，1819年又降到5先令6辨士或6先令那样小得可憐的数目。近来，工資實質上也并未有所提高。”根据同一証据，在兰开夏，織工的每周工資，只达到6先令到12先令左右，而每天須劳动十五小时。“半飢餓的小孩們”，一周想获得2先令或3先令，必須每天工作十二时到十六时。約克夏的貧困状态，恐怕更为厉害。关于諾廷汉制袜工人的申訴，著者曾說，根据他自己亲身調查的結果，工人們的声明，一点也沒有夸张。（“爱丁堡評論”，1820年5月，第66卷，第331—332頁）

产阶级，进行有丰富内容的实际活动。

英国特别是英国最初的经济危机，给予西斯蒙第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以很大的刺激。他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序言中，有详细的叙述：（第一版出版于1819年，第二版则在八年后问世）

“我是在英国完成准备第二版的工作的。英国产生了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在英国今日还是被人热心地提倡着……普遍的竞争，或努力生产愈多愈便宜的东西，久已成为英国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使英国的工业获得惊人的进步；但也时常使制造厂家陷入可怕的困境，我认为这种制度是很危险的，不得不予以抨击。在这些财富的剧烈动荡面前，我认为我应该致力于重新检查我的论点，并拿这些论点来与事实对照一下。对英国的研究证实了我在‘新原理’书中的见解。这个令人惊异的国家，似乎为了教育其他国家，正在进行一个巨大的实验。在这个国家里，我看到生产的增长和享乐的减少。这个国家的群众正和思想家差不多，似乎忘记了财富的增加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只是为全民获得幸福的手段。我想在每一个阶级里面找出这种幸福来，然而到处找不到它。事实上，上流的英国贵族的财富与奢侈，已经达到了在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程度。可是，它们自身并未享受到那些显然由于牺牲其他阶级所获得的财富。没有安全，而在每个家庭里多数人忍受着匮乏，而没有享受到富足。……在具有头衔的贵族和没有头衔的贵族之下，我看到商业占着显著的地位，他们的企业遍布全世界，他们的代理人勇敢地和积极地与冰雪和赤道的炎热作斗争，而每一个商界领导人在交易所见面时，都可以支配成千上万的财富，同时在伦敦及英国其他大城市的街头，商店都陈列着足够全世界消费那样多的商品。但是，这些财富曾否给英国商人带来应有的幸福吗？没有！没有一个国家这样经常发生破产。也没有一处可以找到这样巨额财富，其数目之大，足以供应一笔公债来维持一个王国或共和国，而这种王国或是共和国又同样可以迅速

地被推翻。無論什么人都埋怨營業少，困難多，而且賺不到錢。在幾年內，已經發生了兩次可怕的危機，使一部分銀行家破產，在全部工廠間傳播倒閉的浪潮。同時，另一次危機又毀滅了農業企業家，而小零售商也受到影響。在另一方面，商業的範圍雖然很廣，但不能給青年人以職業。所有的職位不管社會的上層或下層，都已有人佔據了。更多的人要求做工，沒有成功，因為他們不能獲得工資。

“那種使人注目的物質進步，那種全國富饒的情況，究竟對貧民有沒有利益呢？沒有。將來的安全也好，現在的舒適也好，對英國人民來說，都是無從得到的。農村早已是一個自耕農都不存在了。他們被迫變成日傭勞動者。在城市里，手工業者 and 獨立的小企業家也差不多一個都沒有了，只有工廠主在那裡。至於在這種制度下所造成的職工，他們雖然獲得了職業，但並不知道它有什麼意義。他們只是賺工資，而工資也並不一年到頭很够用，因之，每年不得不求助於救貧基金的補助。

這個富裕的國度認為把所有的黃金和白銀出售，用紙幣流通來代替硬幣，是更為經濟。它於是自願拋棄了硬幣的優點中最有價值的一點，即價值的穩定性。持有地方銀行鈔票的人們每日冒着因頻繁地、帶有流行病似的銀行破產而遭受損失的風險。倘若外敵的侵入及革命的騷動，動搖了全國銀行的信用，那麼，全國一切財產關係，都會被那極度的動盪所襲擊。英國國民認為更為經濟的，是放棄那種需要許多手工勞動的耕作方法。把居住在農村中的耕作者的半數放逐出去。英國國民發現用蒸汽機代替工人，更為經濟。它也解雇了城市里的職工，而為機器織布機所代替的織工現已陷入飢餓的狀態中了。英國國民也認為更為經濟的：是使無產階級的勞動者接受僅足賴以生存的最低限度的工資。這些勞動者既然成為社會上最低的階層，他們也不怕生兒育女使他們陷入更深的愁苦之境。他們又認為更為經濟的，是以馬鈴薯養愛爾蘭人，讓他們穿襤褸的衣服。現在每一郵船裝來整隊的愛爾蘭人，他們

以較英格蘭人低廉得多的工資做工，從而在每一就業部門中把英格蘭人排擠出去。這些莫大的財富積累的結果是什麼呢？那除了把忧患、匱乏和完全毀滅的危險分給每一階級之外，還有其他的作⽤嗎？英國不正是為了物而忘掉了人，從而也是為了手段而忘却了目的嗎？”^①

這面鏡子，差不多在百年前用來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形象，真是够清晰和全面的了。西斯蒙第打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每一個要害：小企業的沒落、農村人口的外流、中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工人的貧困化、機器的驅逐工人、失業、信用制度的危險、社會的對立，生活的不安定，危機和無政府狀態。他的辛辣而深刻的懷疑，對於當時在英國的麥克洛克(Macculloch)、法國的薩伊(J. B. Say)的影響下流行於這兩國的庸俗經濟學所宣傳的對和諧的空洞的崇拜和知足的樂觀主義，構成了一個銳利的不調和的音調。我們很容易設想，下面的表述所給我們的印象將是何等深刻而沉痛。他說：

“奢侈只有在以他人的劳动去购买它时，才有可能；只有那些要求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不是装饰品的人，才从事紧张而无休息的劳动”。^②

“尽管发明提高人的能力的机器，对人类說来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却因分配不当，而变成对穷人的一种灾难”。^③

“企业家的利潤，不外是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利潤，并非由于他的企业生产得比成本多，而是由于他没有支付所有的成本。換言之，就是他对劳动者不給与相当于工作的報酬。象这种的产业，乃是社會的罪恶，因为它使劳动者陷于极度的貧困，從而保證那些企业主获得通常的資本利潤”。^④

“在分享国民收入的各阶层中，某些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而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罗伯特·普拉格譯，柏林版，1901年，第一卷，序言，第13頁。

②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79頁。

③ 同上書，第一卷，序言，第21頁。

④ 同上書，第一卷，第71頁。

取得新的权利；另一些人則靠一种基本的力量已經获得了永久的权利，而这种基本的力量使一年的劳动变得更为有利”。^①

“在应用力学中每一个发明，使劳动人数减少，这是无可防止的事实。劳动人口經常受着这个危险的威胁，而社会不能提供补救的办法”。^②

“将来会到达一个时代，那时我們的子孙会把我們看成野蛮人，因为我們沒有給工人阶级以安全保証，正如我們自己把那些使工人阶级成为奴隶的民族看成野蛮人一样”。^③

因此，西斯蒙第的批評抓住了問題的根源。对于他來說，把他所揭发的資本主义致富的黑暗面，当作單純的过渡期間的暂时缺陷而加以漠視的让步或逃避办法是不存在的。在他結束他的考察时，他对薩伊作如下的反駁：“七年来我指出了社会組織中的这种疾病，但是这种疾病，在这七年中並沒有消除，反而更加恶化。我不能把这种长时期的苦难看作只是伴随着变化而发生的磨擦。再回到收入的起源問題上，我認为我已经表明我們所遭受的疾病是我們組織中的缺点的結果，我已表明这些疾病看来是不会終止的”。^④

西斯蒙第看出了資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資本主义生产与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均衡。由此，他就进入了我們现在所关心的积累問題中来了。

他批判古典經经济学的主要論点是：資本主义生产受到无限扩大的鼓励，而完全不顧及消費，但消費是由收入决定的。他說：“近代所有經济学者，事实上都承認公共財富是由私人財富构成的，因而公共財富的发生、增加、分配和消灭，具有与各个私人財富相同的过程。他們都知道，在私人的財富中，要考虑的最主要事实是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111—112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258頁。

③ 同上書，第337頁。

④ 同上書，第358頁。

收入，而消費或開支必須受收入的控制，否則資本便將毀滅。但在公共財富上，某人的資本成為他人的收入，因此，要決定哪個是資本，哪個是收入，這些經濟學家感到非常困惑不解，而較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一點完全不考慮進去。由於忽視了一個必需決定的數量，薩伊與里嘉圖就得出了一種結論：消費似乎是一個無限制的力量，或者至少，除了生產以外，它是無限制的；但事實上，它是受收入所限制。……他們聲言不管財富生產得如何多，總是可以找到消費者的。他們鼓勵生產者造成市場的泛濫，以致釀成今日文明世界的災難，而實際上他們應該警告生產者，只能把具有收入的消費者計算進去”。^①

西斯蒙第以一種收入理論作為他的主張的基礎。什麼是收入？什麼是資本？他對於這兩種概念的區別是非常注意的。他認為這種區別是“政治經濟學中最抽象、最困難的問題”。“新原理”第二卷，第四章，主要就討論這個問題。西斯蒙第照例以引用魯濱遜故事來開始他的研究。對魯濱遜而言，資本與收入的區別，“仍然是混淆的”；只是，對於社會而言，這個區別才成為必要。然而，即使在社會上，這個區別仍有困難，這是大部分由於我們大家所熟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一個神話所致：這個神話說：對某一種人是資本，對另一種人則又是收入；反之亦然。亞當·斯密要負這個混亂的責任，薩伊把它提高到作為一條公理來為自己的思想惰性和淺薄性辯護。西斯蒙第忠實地接受了這種混亂看法。他說：“資本的性質與收入的性質，不斷混淆在我們的思想之中。我們看見有些東西對某人是收入，對另一個人又是資本；而且同一物體在轉手之間，常常接連地獲得千差萬別的稱號；價值，當它脫離了所消費的對象物時，表現為一個無形的數量：這個數量有人把它支出去，另有人把它交換；對某一個人，它和對象物一道消滅，而對另一個人，它獲得更新，並在流通期間持久不滅”。^② 他作了這一大有希望的緒論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頁。

② 同上書，第二版，第一卷，第84頁。

后,就进一步探究那个困难问题,他说: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产物、收入是财富的一部分、从而也不能不具有同一的源泉。可是,普通都承认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它们是从“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不同的源泉所产生的。关于第一个命题,西斯蒙第显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所谓“财富”者,在社会意义上是意味着有用的对象物,也就是使用价值的总额。但它不单纯是劳动生产物,它也包括那些提供原料,并为支持人类劳动提供工具的自然产物。另一方面,“收入”是一个价值概念,即是指,一个人乃至许多人,对于财富或社会总生产物的一部分所能处理的数量。西斯蒙第把社会收入当作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他所理解的社会收入就是社会上每年实际消费的基金。倘若如是,那么,财富中剩下的未消费部分,就是社会的资本。这样解释,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总算接近了我们所寻求的在社会基础上资本与收入的区别吧。然而,西斯蒙第转瞬之间又接受了“流行”的收入三类区分法,这三类收入中,只有一类是由“积累的资本”所产生,而在其他两类中,土地和劳动是与资本相结合的。这样一来,资本的概念,就又模糊起来。现在我们更进一步看一看,对于足以表明社会基础破裂的这三类收入的源泉,西斯蒙第说了些什么话。他以劳动生产率的一定发展程度作为出发点,这是对的。这即是说:“由于人类借以征服自然力量的苦干精神和科学知识已有相当的发展,每个劳动者可以每日生产出比他消费所需要的要多得多的产品。”于是西斯蒙第正确地强调把劳动生产率作为在历史基础上剥削的必要条件。但他对于剥削的实际根源,提出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他说:“但是,即使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出财富,倘若让劳动者享受这种财富,那么,财富就会使他越来越不适宜于劳动。此外,财富决不会停留在那种人的手中,即为谋生而亲自劳动的那种人手中。”^①因此,他与里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门徒们相同,以剥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削与阶级对立作为生产必不可少的刺激物，但他接着谈到剥削的真正原因，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他说：“通常，劳动者是不能保持其土地的。然而，土地具有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由人类劳动驾驭来为人类服务，那块进行劳动的土地的主人保留在他的土地参与下所获得的劳动果实的一部分，作为这块土地生产能力所提供的利益的报酬。”^① 这就是地租。其次：

“在现代文明状态下，在工人找到他的劳动力的买主之前，他不可能把他进行劳动时赖以生活的充足数量的消费品看作自己的。而他不再占有原料，他所赖以劳动的原料是从远处来的。那些使劳动容易，并可无限地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复杂而昂贵机器，他更不会再有了。而占有消费品、原料和机器的富翁，可以不从事劳动，只要把所有这些东西交给工人，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为劳动的主人。他直接支取了工人的劳动果实的大部分，作为他交给工人支配的各种利益的报酬”。^② 这就是资本的利润。财富中由地主与资本家两次扣除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劳动工资——即工人的收入。西斯蒙第再补充说：“工人能够把它消费掉，而不复再生产了。”^③ 因此，西斯蒙第把不复再生产（工资与地租同样），作为收入与资本区别的标记的。然而，这种标记，只有关于地租和资本利润的被消费部分，才算正确。至于在社会生产物中当作工资的被消费部分，事实上是在再生产自己，它成为工资劳动者的劳动力，在劳动者自身看来，这是为了生活而当作商品出售的，他可以再三带到市场来出售；而就社会看来，这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为了使再生产不蒙受损失，它必须反复出现于年总再生产中。

到这里为止，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迄今还只学到下列两个事实：即劳动生产率使那些自己不劳动的人得以剥削工人和由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剥削成为分配收入的实际基础。然而，所谓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86—87页。

③ 同上书，第87页。

“收入”所謂“資本”，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們依然不知道。西斯蒙第試圖說明這個問題，象平常一樣，他以魯賓遜為出發點。他說：“在個人眼光中，一切財富都不過是一種為將來需用時所積累的貯存品。但是他已把這種貯存品區別為兩部分：其一是充將來直接地或幾乎直接地使用的一部分，另一是他平日不需要，只有在新生產時才使用的那部分。具體說來，他的谷物的一部分，用來养活自己直至下次收穫期為止；另一部分留作播種用，要到下年度才帶來果實。社會的形成和交換的實行，使這些播種的種籽，即積累的財富中能孳生的部分，有可能幾乎無限地增加。而這就是人們所謂資本。”^①

這些話可以稱之為胡說八道。西斯蒙第在這裡以種籽為比擬，把生產資料和資本等同起來了。這樣解釋包含兩點錯誤：第一，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僅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成為資本；第二，資本的概念不只包括生產資料。在資本主義社會——連同西斯蒙第所抽象掉的一切條件——生產資料不過是資本的一部分，即不變資本。

在這裡，西斯蒙第之所以迷失方向，是因他企圖在資本概念和社會再生產的物質方面之間建立一個聯繫。如上所述，當他著眼在個人資本家身上時，他認為在資本的構成部分中，除了生產資料以外，還得加算工人的生活資料——這從個人資本的再生產的物質方面看來，也是不妥當的。但當他企圖把社會再生產的物質基礎集中起來，並在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之間建立正確的區別時，資本的概念在他的手中消失了。

然而，西斯蒙第也感覺到單單是生產資料並不能進行生產與剝削。不錯，他也有這樣的正當看法：他認為剝削關係的中心，正是活勞動的交換。他剛剛把資本全部簡化為不變資本，但立刻又把它完全簡化為可變資本。他說：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7—88頁。

“当农业家把他認為直到下一收获期为止所需要的谷物貯备起来时，他知道利用剩余谷物的好办法：他将把他所剩余的谷物，养活为他耕种土地、生产新谷物的人及为他紡織亚麻和羊毛的人等等。”“通过这种活动，农业家就把他的收入的一部分变为資本。实际上，这就是新的資本借以形成的道路……他所收获的谷物，除了維持自己劳动所必需的数量和为了保持旧规模經營的播种数量外，其超过部分就形成一种財富。这部分財富他可以施舍給別人、浪費掉、或任意消費掉，而不会較前貧穷。这些財富是收入；但如果他用来維持能創造新物的劳动者，或者，以之和他的手工劳动者、織布工、矿工的劳动果实相交换，則此时的財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只有增加，不会消失，这就是資本”。^①

这里有許多混乱的和正确的东西，杂然并陈。为了維持旧有规模的生产（即簡單再生产），仍然需要不变資本。尽管奇怪得很，不变資本已簡化为流动資本（即种籽），而固定資本的再生产已完全被忽視了。然而，为了扩大再生产（即积累），流动資本看起来也好像是多余的：即是說全部剩余价值資本化的部分，轉化为新的工人的工資，而这些工人沒有任何生产資料，显然是在空中劳动了。西斯蒙第在其他地方也更清楚地表明了同一见解。他說：“富人节省其收入而将它添加到資本上去时，他給穷人带来了利益，因为他把年生产物分摊別人了；他所称为收入的那一部分，就是他保留起来供自己消費的那部分；他所称为資本的那一部分，就是他让給穷人成为后者的收入的那部分”。^②但同时，西斯蒙第又适当地注意了“获得利潤的秘訣”和資本的起源：剩余价值是由資本与劳动交换（即可变資本）而发生，資本是由剩余价值的积累而发生。

不管怎样，我們在資本与收入的区别上，并没有很大的进展。现在，西斯蒙第试图以社会总生产物的相应部分来代表生产和收入的各个不同要素。他說：“企业家和农业家一样，并不把他們所生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8—89頁。

② 同上書，第108—109頁。

产的财富全部用之于播种。而是将其一部分充作建筑物、机器及工具，以便减轻劳动负担，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正如农业家把他的一部分财富，投向于能够使其土地肥沃的永久工程上一样。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种种财富如何发生及以后如何逐渐区别开来。社会积聚的财富一部分，被每个财富的所有者用之于慢性的消费，借以提高劳动的效率，并促使盲目的自然力负担着人类的工作。这一部分的财富叫作固定资本，它包括垦荒、灌溉、工厂及各种行业的工具，各种样式的机器等。财富的另一部分，是用来立即消费的，它在其完成工作中实现自己再生产，并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尽管它的价值没有改变，这部分叫作流动资本，它包括种籽、加工原料和工资。最后，财富的第三部分，是从第二部分出来的：这是完工的制成品在价值上超过各项垫支额的部分。这部分叫作资本收入。它不再进行再生产而用之于消费的。”^①

在苦心地试将社会的总生产物分割为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剩余价值的几个不可比较的范畴之后，西斯蒙第就立刻透露出一点含糊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当他提到固定资本时，他意味着不变资本；提到流动资本时，他意味着可变资本。因为，“一切被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充人类消费用的。但是，固定资本是被间接消费掉的，而流动资本则变为“以工资形态供工人消费的资金”。^②这样，我们就稍微接近把总生产物分割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可变资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及剩余价值（资本家的生活资料）三部分的区分法了。但是，到此为止，西斯蒙第对他自己看作根本性的题目，没有说得特别明确。在这种混乱上，至少我们不能看到超越亚当·斯密的“思想断片”而有任何的进步。

西斯蒙第自己已经感觉到，并愿意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澄清这个问题。他叹息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完全是抽象的。要理解它，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93—94页。

^② 同上书，第95页。

需要巨大的思想集中能力。”^①于是他把我們再度引到了魯賓遜那里。但是魯賓遜在此时已經改变了，他已有了家庭，而且是殖民政策的前驅者。

“在遙远的殖民地，沿着荒地边缘，有一个孤独的农夫，他一年間收获了百袋谷物。但附近，并无市场可以出卖。因为谷物对农夫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不能不在一年之內把谷物自己消費掉。然而，这个农夫，即使全家都来消費，也不过食三十袋。这就是他的支出，也就是他的收入所交换来的东西。这三十袋谷，沒有为任何人再生产。于是，他就拉来一些工人开辟森林、涸干近鄰沼泽、垦拓荒地的一部分。这些工人，就会消費掉他另外三十袋谷物。这是他們的开支，他們有能力以他們收入的代价，也就是他們劳动的代价来支付这笔費用。就农夫方面看，那是交换，他把此三十袋谷，轉化为固定資本。（在这里，西斯蒙第是将可变資本完全变为固定資本！他說代替工人所得的三十袋谷的工資，农夫也就能够制造出可以使用于扩大固定資本的生产資料。）农夫现在还剩下四十袋谷。他去年播种約用二十袋，今年則增加为四十袋。这就是他的流动資本，它现在已加倍了。如是，他的百袋谷物全部消耗尽了。然而，其中有七十袋是他实际的投資：一部分至下次收获期，另一部分至更下一次收获期，都将显著地有所增加。我們若把例中的农夫孤立地考察，那么，就可更好地認識这种活动的限界。如果，他在自己所收获的百袋谷物中，今年仅仅消費六十袋，那么，由于播种的增加而获得的二百袋谷物，到第二年有什么人去吃呢？人們会这样回答說：那是将由他的家族增加的人口去消費。不錯，但人口的增殖，並沒有食物的增加那样快。倘若农夫每年有充分的劳动力来重复这个过程，則谷物的收获量，将每年加倍。但是，他的家族至多每二十五年才得加倍。”^②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85頁。

② 同上書，第95—96頁。

不管这个例子是如何粗略，最后，势必出现一个关键问题：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从哪里找买主呢？资本积累，可以使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但是，社会消费方面，又如何呢？那是由种种收入决定的。这个重要问题，西斯蒙第已在“新原理”第二卷第五章“市民各阶级间的国民所得之分配”中有所说明。

在这里，西斯蒙第企图重新说明社会总生产物的组成部分问题。他说：“从这个观点上看，国民收入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第一，包括在年生产物中，它是从财富所生的利润；第二，从生活所产生的劳动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财富理解为土地的占有和资本；把利润理解为土地所有者的纯收入及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全部生产资料，就与当作“财富”的“国民收入”区别开来了。而“国民收入”，分解为剩余价值及劳动力，更精确地说，即可变资本的等价物。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表示得不十分明确）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割了。可是，转瞬之间，西斯蒙第又把“国民收入”理解为社会年总生产物。他说：“年生产或总的年劳动成果，同样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财富产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能力，这一部分劳动能力我们设想是等于与之相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工人的生活资料。”^①在这里，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上说，只分解为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两部分，而不变资本却不见了。于是我们到达斯密的教条上来了：即一切商品价格，分解为 $v + m$ （或者说由 $v + m$ 所构成），换言之，总生产物，只是由工人及资本家的消费资料所构成。

西斯蒙第于是接着讨论总生产物的实现问题。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收入总额，是由工资、资本利润与地租所构成，以 $v + m$ 表示之；他方面，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上说，同样分解为 $v + m$ ，“因此，国民收入和年生产，相互平衡（并表现为相同的数值）”。也就是必须在价值上相等。“年总生产物，每年完全被消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05页。

費掉。而其中一部分是由那些以劳动相交换的工人来消费，而这些工人就把它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再生产出来；另外一部分，由那些以收入相交换的资本家来消费并消灭了它”。“年收入的全部，势必与年生产物的全部相交换”。由此，西斯蒙第就在“新原理”第二卷第六章“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决定”中，提出了再生产的明确规律如下：“支付今年的生产的不能不是去年的收入”。如果这样，那么，资本主义的积累又如何发生呢？假定总生产物必须被工人和资本家完全消费掉，一点也没有剩余，那么，很明显地我们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积累问题就无法解决了。事实上，西斯蒙第的理论，等于否认了积累的可能性。既然一切社会需要，是由工人的工资总额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组成的，那么，在扩大再生产的场合下，什么人购买那些剩余生产物呢？在这点上，西斯蒙第争辩道，积累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他说：“结果，实际所发生的总是这样：我们把本年生产的全部，与上年生产物全部相交换。倘若生产逐渐增大，则在交换中，每年势必引起小额的损失，这样同时，就改进了将来的条件。”换言之，积累在生产物全部都实现的时候，就不能不产生出每年无法出卖的剩余。西斯蒙第不愿意得出这最后的结论，他宁愿采取“中间路线”，从而不得不求助于相当难懂的遁辞，他说：“倘若损失不大，而且分配得当，每个人宁愿负担下来，而不致为自己的收入诉苦。国民经济正是这样成立起来的。一系列的小牺牲，反足以增加资本与公共财产。”^①另一方面，如果积累肆无忌惮地进行，那么，不能卖出的剩余就会增大，酿成大众的灾难，结果，危机必然上门。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逃避方法就成为西斯蒙第的解决途径：这就是压低积累的速度。他对主张生产力无限制发展和生产无限制扩张的古典学派不断进行论战。他的全部著作不外是对无限制热望、积累所引起的不幸后果，敲起警钟。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21页。

西斯蒙第的分析，証明他不能把再生产过程作为整体来把握。由于他从社会观点试图区别資本与收入这两个范畴，沒有获得成功，他的再生产理論也蒙受了从斯密那里繼承过来的根本錯誤的損害：——即認為年总生产物，都給个人消費完結，不剩下任何的价值部分以供社会不变資本更新之用；而积累只包含資本化的剩余价值，轉化为追加的可变資本。后来的西斯蒙第的批判家，如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伊林^①，指出了在分析总生产物中的这个根本錯誤，从而痛快地把西斯蒙第的积累論一笔勾銷，認為全部是不恰当的，“謬誤的”。然而，这样的态度只足以証明，他們自己对西斯蒙第真正关心的事情、对西斯蒙第的最后問題缺乏敏感。其后，馬克思的分析初次指出了亚当·斯密的重大的謬誤，这个分析証明：如果只考虑总生产物中，相当于不变資本的价值部分，积累問題决不算是得到解决。这一点在西斯蒙第理論的实际发展中，更突出地得到証明。为着支持他的见解，他和古典学派的代表者及传播者里嘉图、薩伊、麥克洛克进行了很激烈的論战。这論战的两方面，代表着两个对立的见解：西斯蒙第認為积累决不可能；而里嘉图、薩伊及麥克洛克，則支持积累无限可能性的见解。但关于斯密的某些錯誤见解，两方面都是相同的：西斯蒙第的反对者，也同样忽視了再生产中的不变資本，特别是薩伊，他把斯密关于总生产物分解为 $v + m$ 的混乱理論当作无可非难的教条而企图永远保存下来。

很显明的，如果我們单单依靠馬克思的分析，認為社会总生产物，除了供工人及資本家消費的生活資料 ($v + m$) 以外，还包含作更新之用的生产資料 (c)，从而，积累不仅由可变資本的增大，而且也由不变資本的增大所构成的。那么，积累問題，正如这一系列赏心悦目的事情的发生所証实的，到底还没有得到解决。我們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样強調再生产过程中不变資本的份額，在积累理

^① 烏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經濟学研究与論集”，圣彼得堡，1899年。

論产生了新的謬誤。目前，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即順从斯密关于总資本再生产的錯誤，并不是西斯蒙第理論上所特有的缺点，它无宁是最初关于积累問題論战的共同的基础。从上述的事实上看，仅仅产生如下的結果：即資产階級經濟学，連簡單再生产的基本問題还没有解决，就突进到更复杂的积累問題上去了。这就恰如在其他領域一样，科学的研究循着非常曲折的道路前进，它常常在基础未奠定之前，就着手建筑上层的楼房。总之，在西斯蒙第的推理中，尽管存在着显明的、难于克服的弱点；但是他的反对者对他却束手无策，由此可见西斯蒙第在他的积累論的批判中无疑地給資产階級經濟学提出了一个难以解答的問題。

第十一章 麦克洛克对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对欧洲資本残酷地取得統治地位曾发出强有力的警告，这就引起了三方面激烈的辯难：英国的里嘉图学派，法国的薩伊，即亚当·斯密学說的庸俗化者和圣西門学派。英国的欧文，深刻地看到工业制度中的黑暗面，特别是危机，他在許多方面与西斯蒙第抱同样的见解。另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圣西門，曾經強調在囊括世界的概念下，工业的巨大扩张和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他的学派也被西斯蒙第的警告激起了不安。但在这里，引起我們的兴趣的，是西斯蒙第与里嘉图派的爭論，这个爭論从理論观点上看是最有結果的。首先是里嘉图派名下的麦克洛克，他于1819年十月，即“新原理”出版后不久，在“爱丁堡評論”杂志上，用匿名发表一篇辯論文章，对西斯蒙第展开攻击。那看来是获得了里嘉图本人的同意的^①。西斯蒙第也于1820年，在罗西(Rossi)的“法学年报”上，以下列的标题“关于社会生产能力的增大，是否引起消費能力的增大？一个研究”。发表过一篇論文，作为回答的答辯^②。

^① “爱丁堡評論”(Edinburg review)上的論文，本来是以欧文为攻击目标。这篇論文用二十四頁的篇幅，对欧文的四篇論著，提出尖銳的批評。这四篇論著是：“关于社

西斯蒙第在其答辯中，指出他的辯論是在商业危机的冲击下产生的：“我們两人所探究的真理（西斯蒙第在試行答辯时，还不知道“爱丁堡評論杂志”上的匿名者是誰。），是现代最重要的問題，它可以看作經濟学中根本的东西。普遍的灾难，蔓延到商业、制造业甚至某些国家农业。这样拖延很久的、非常特殊的痛苦对无数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对所有的人带来了不安和沮丧，一直到它威胁着社会秩序的基础本身。——对于造成这样震动的灾难，人們提出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解释：有些人說：我們生产得太多了；又有人說，我們生产得不够。前者的人說：倘若我們能尽数消費那些卖不出去，而压迫市场的某些过剩商品；倘若我們根据购买者的需求，为将来組織生产，那么，均衡才能开始恢复，和平与幸福，才能得到。后者的人說：只要我們付出双倍的努力去积累和再生产，均衡即可以保持。如果，你們以为我們的市场上商品泛滥成灾，那是

会的新見解或人格构成論” (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 “关于制造业制度的影响的考察”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为工人階級向美国及欧洲諸政府提出的两个請願書” (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s of America and Europe), “小論三篇及关于貧民雇傭的會議录” (“Three tracts”, and “An Account of Public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Employment of the Poor”). 匿名者企图詳細地指出欧文的改良主义思想，毫沒有抓住英国无产阶级貧困的真正原因。它的真正原因是：过渡到开垦荒地（这是里嘉图的地租論！），谷物法及压迫农业家和工业家的重稅。因此，自由貿易与放任自由——就是他的起点与終点。在积累无障碍地进行下，生产的增大，将为自己創造出需要的增大。欧文被他指責为对薩伊与詹姆士·穆勒的“全无所知”。他說：“欧文無論在推理上或在方案上，都表示他自己对一切支配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規律全无所知”。而笔者更从欧文轉向西斯蒙第，提出如下的論爭：“他（欧文）認為当竞争无阻碍地不受什么人为的統治，而工业也任其自然发展时，机器的使用，可使几种財富物品的供給，增加到超过必要的数量，这样形成的商品的过剩，終于使工人階級失业。这个論点，我們認為是根本錯誤的。这也是著名的西斯蒙第在其大作‘政治經濟学新原理’上所强烈主张的，因此，我們恳求我們的讀者原諒我們，讓我們指出他的謬誤，并企图証明消費力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爱丁堡評論”，1819年10月，第470頁）

② 論文的标题，原文是“Examen de cette question: Le pouvoir de Consommer S'accroît-il toujours dans la société avec le pouvoir de produire?” 罗西的“法学年报”，我們找不到，但是西斯蒙第已將該論文全部編入在其“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二卷中。

欺人之談。因為我們的倉庫只裝滿一半，讓我們裝滿其餘一半，而這些新財富的相互交換就會使商業獲得新的生機”。這裡，西斯蒙第就以其卓越的透徹明了的筆法，表明了爭論的真正焦點。

事實上，麥克洛克的整個論點是與下列聲明同命運的，即交換實際上只是商品與商品間的交換。從而，一切商品不僅代表供給，同時也代表需求。接着有下面的對話。麥克洛克說：“供給與需求，確是相關的、而且可轉化的名稱。某種商品的供給，形成對他種商品的需求。因此，對一定量農業生產物的需求，只有在提供一定量的工業生產物（與農產物的生產費用相等的），與之相交換的場合下，才能發生；另一方面，對這種工業生產物的有效需求，只有在提供一定量的農業生產物（與工業產品的生產費用相同的），作為等價物的場合下，才能發生”。^① 里嘉圖派的策略在這裡是很明顯的。換言之，他有意把貨幣流通撇開不談，好像商品只是直接以商品去購買和支付的。

因此，我們從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下，突然被移到今日尚在非洲內地流行的那樣原始物物交換時代。在這個手法中還有一點隱約的正確因素，因為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貨幣只單純起着媒介的作用。然而，在有這種媒介者參加——W—G—W（商品——貨幣——商品）的流通領域，兩個行為即銷售與購買兩個行為是分離的，在時間上和地點上，都是互相獨立的。這就是為什麼，再度購買不必立即跟在銷售一件東西的後面；次之，銷售與購買也不需要由相同的人執行——由相同的人執行，那是稀有的例外——可是麥克洛克恰恰作出這個沒有根據的假設，一方面把工業；一方面把農業，當作購買者與銷售者同時對立起來。這些範疇——作為交換的全部範疇——的普遍性，把社會分工的實際分裂情況蒙蔽起來了。而在無數的私人交換行為進行的場合下，雙方商品的購買與銷售，同時相遇的事，乃是屬於最稀少的例外。麥

^① 麥克洛克在“愛丁堡評論”上的論文，見“愛丁堡評論”，1819年10月，第470頁。

克洛克对于商品交换的简单化的见解——使商品直接变为货币，并认为商品可以直接交换——，就使货币的经济意义及其历史起源完全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可是，西斯蒙第的答复，实在是笨拙的。为了要证实麦克洛克对于商品交换的解释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他求助于来比锡(Leipzig)的书市^①。他说：

“来比锡的书市，集中了全德国的书籍业者。他们每家都带来了四部或五部著作，每部有五百册至六百册。他们以之与其他书籍相交换。每个书籍业者在市场上售出二千四百册，也购进二千四百册。但是，他只拿出去的四部著作，而拿回去的却有二百部著作。按照这个里嘉图的门生，所谓需求和生产是相关的，可以互换的；一方从他方买进，一方又向他方支付，一方是他方的结果。但是，据我们的看法，对于书商和公众而言，需要与消费，尚未开始哩。坏书即使在来比锡可以交换，然而，依然很难卖出去（此点西斯蒙第大错特错了——著者）。于是这些书就充满在书商的书架上，任何人都需要它，或者，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本。来比锡市上所交换的书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卖出去：书商发现了那种人，他不仅想买书，而且宁愿付出代价，把那些书从流通中抽出来。——这样，才算开始形成了有效的需求。”这个例子，看起来虽然是非常天真，但也清楚地表明西斯蒙第并未被反对论者的诡计所迷惑，根本上他是知道问题之所在的。^②

现在，麦克洛克企图从抽象的商品交换，进而观察具体的社会关系。他说：“例如：假定有一个农业家以粮食与衣服预付给一百

^① 西斯蒙第的“来比锡书市”，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图，五十五年之后，又在杜林(Dühring)——的科学“体系”之中复活了。当恩格斯对这位不幸的博学之士，进行尖锐的批评时，恩格斯认为这种思想——以“来比锡书市”的想象上的危机，来解释实在的工业危机，正如以玻璃杯内的水花，来解释海上的风浪——充分证明了杜林的“地道德国学者”的真面目。但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正如恩格斯所指摘的许多其他境合一样，只不过是偷偷地剽窃他人的东西而已。

^②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81—382页。

个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就生产出能养活二百人的粮食。同时,工业家方面也假定以粮食和衣服预付给一百个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可以生产出二百人的衣服。于是,农业家扣除了他预付给劳动者的衣食外,还可以自由处理其他一百人的粮食;工业家也在补偿预付劳动者的衣食外,可以把剩余的百人的衣服送到市场上去。在这种场合,这两种物品互相交换,粮食的供应,决定了对衣服的需求;而衣服的供应,决定了对粮食的需求”。^①

我們不知道人們对这种假設将如何惊奇。这完全是顛倒一切现实关系的荒謬构想,或者是把在前提中假設的事情,后来又自称为已經証明的厚顏无耻的态度。反之,来比錫书市,則无論如何可以認為是一种深刻而现实的思考方法的标本。麦克洛克想証明对各种商品可以造出无限的需求,就假設了下面一个例子——属于任何人最基本最切实的要求的两种生产物(粮食与衣服)。为了为証明任何定量的商品,可以不顧社会的需要,而得进行交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即两个生产物的数量,最初就极其严密地和需求一致,从而,以社会來說过剩东西,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在这个场合,将社会的必要量称之为“过剩”——即是由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物的个人需要来測定的过剩。于是,他就这样鮮明地証明某种商品的“过剩”,都可以和其他相应的商品的“过剩”进行交换。最后,为了要証明私人生产的种种商品之間——不管它的数量、它的生产費、以及它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不同——仍可进行交换,他又以这些商品为例:即从最初起,它們的数量,生产費,以及在社会上的必要性完全相同。总之,为了要証明在无計划的、資本主义的、私人經濟中,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就假設了一种沒有生产过剩的有計划的严格被統制的生产。

然而,狡猾的麦克洛克的滑稽处,是別有所在。在論战中爭执的問題,是积累問題。使西斯蒙第感到苦恼,而他又以之使里嘉图

^①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評論”上的論文,第 470 頁。

及其門徒們感到苦惱的問題是：如果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沒有被資本家私人消費掉，而被轉化為資本，也就是用來擴大生產，使之超過社會的收入，那麼，從那里找到剩餘商品的買主呢？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又怎麼樣呢？含有這部分剩餘價值的商品又歸何人購買呢？西斯蒙第這樣提出了問題。而“偉大的”麥克洛克——里嘉圖學派的魁首，這個學派在倫敦大學講壇上正式的代表，當時英國自由黨閣員和倫敦市的權威——就這樣回答：他舉了一個例子，在這個例子里沒有任何剩餘價值生產出來。他的“資本家們”，為了行善，在農業與工業中做苦工，而社會生產物的全部，包括“剩餘部分”，僅足以償付工人的需要，即工資，“農業家”和“工業家”則不要糧食，也不要衣服，他們只注意生產與交換的進行。

西斯蒙第對此不以為然，是有道理的。他叫着說：“當我們找到了什麼是超過工人消費的生產剩餘時，我們決不能漠視在剩餘中構成勞動所必要的利潤與雇主所必要的份額。”^①

麥克洛克的唯一反應是把他的愚蠢論點乘以一千倍。他要求讀者假設有“一千個農業家”和“一千個工業家”，他們靈巧地動作，完全和個人一樣。於是，交換順利地按照所希望的進行。最後，由於“更熟練地使用勞動和利用機器”，他把勞動生產率，增加了一倍；“因此，在一千個農業家中，每一農業家以糧食和衣服預付給一百個勞動者，結果，收回足夠二百人吃的普通糧食與等於糧食生產費用的砂糖、煙草和酒。”另一方面，每個工業家，依據同樣的辦法，除了供工人用的原來數量的衣服外，還獲得“與生產費用相等，因而在交換價值上與衣服相等的花邊、緞帶和麻布”。他於是完全顛倒歷史的次序，開始時，假定帶有工資勞動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到後一階段，又假定一般地使剝削成為可能的那種勞動生產率；現在，再假定這種勞動生產率的進步在一切領域，都以同一速度進行，各生產部門的剩餘生產物，恰恰包含着同量的價值，此價值又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二卷，第384頁。

分配給恰恰同数目的人之間；这些不同的剩余生产物在相互交换时，得以圓滑进行，使人人滿意，那有什么奇怪呢？那又是麦克洛克的謬論之一。他使原来吃着空气，裸着身体，而从事自己职业的資本家們现在完全依靠砂糖、烟草和酒来維持生活，并以花边、緞帶和麻布来打扮着自己了。

但是，最可笑的是麦克洛克突然改变主张，以迴避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即資本家不用作自己消費，而用作扩大生产的那些剩余价值，怎么样啦？他的答复：一方面把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笔抹煞，另一方面又把全部剩余价值用来生产奢侈品。如果是这样，那么对新奢侈品生产的购买者又是誰呢？显然是資本家（他的农业家及工业家），因为，从他的例子看，除了这些人外，只有工人了。由此可知，全部剩余价值供資本家个人使用而被消費了，换言之发生的是簡單再生产。因此，麦克洛克对剩余价值資本化問題的答案，或者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談，或者当剩余价值发生的一瞬間，就假定发生的是簡單再生产而不是积累，二者必居其一。他这一次又和以前一样，当他假装要討論“剩余”时，他用了一个詭計：首先制造一种不可能的資本主义生产情况，即沒有剩余价值的資本主义生产，然后，哄讀者說，后来出現的剩余价值形成了生产的扩大。总之，外观上好象他是正在討論扩大再生产呢。

对于这种苏格兰的走繩索絕技（指麦克洛克的詭辯——譯者），西斯蒙第现在已无法跟它周旋了。在此以前，他一步一步地逼住麦克洛克，証明麦克洛克的“荒謬絕倫”，但是现在他自己在論战中的關鍵点上，也陷入迷途了。对于对手上述的夸夸其談，他不能明确而冷靜地声明道：“最敬畏的麦克洛克先生，我对于你的圓滑的精神，不能不表示敬意。然而，你恰如鱈魚一样圓滑，你回避了問題的实质。我要繼續問：如果資本家不把剩余价值全部花掉而把它积累起来（即使用之于生产的扩大），那么，誰是剩余生产物的购买者呢？而你的答复是，啊！他們扩大奢侈品的生产。因此，这

些奢侈品，會由他們自己消費掉。這種答案，顯然是在玩魔術。因為，資本家把剩餘價值用來開支奢侈品，那很顯明是剩餘價值的消費，而不是積累，但是，問題正在於積累是否可能這一點上，而不是資本家個人的奢侈是否可能！因此，如果可能的話，請你明確地回答。否則，你就去玩你的酒和煙草，或者听你的便罷，我才不管”。

可是，西斯蒙第並不抓緊這個庸俗論者，反而突然地用情感和社会良心來說教。他喊道：“誰的需求？誰的享樂？农村的紳士嗎？都會的紳士嗎？還是他們的工人呢？根據麥克洛克的新概念，有了剩餘的生產物，即從勞動得來的好處，但是，它歸誰享有呢？”^①他自己以激動的辭令答复自己提出的問題：“由於勞動生產物的倍增而獲得利益的，不是工人：工人的工資並不會增加，這是我們都知道的，而商業史上也充分地告訴了我們這樣。里嘉圖自己也曾說過，倘若人們不想使社會財富停止增加，那就不應如是。但是，沉痛的經驗告訴我們，事實完全相反，勞動生產物愈增加，工資差不多常常比例地減少。那麼，財富增加所及於公共福利的作用是什麼呢？我們的著者，假定一千個農業家得到利益，而十萬個工人勞苦地工作；同時，又假定一千個工業企業家發財，而十萬個工匠在他們的指揮下勞動。因此，由於增加對奢侈品的放浪的享樂而得到的幸福，僅由全國百分之一的少數人享受而已。那些百分之一的人（他們消費工人階級所生產的全部剩餘生產物），是否與由於機器和資本的進展而不斷增加的生產相適應呢？著者假定：國民生產物每加一倍，則農業家與工業家，就必須增加消費百倍。由於許多機器的發明，現今國民財富如果一百倍於剛够償抵生產費那個時代的財富，那麼，今天每個僱主，就必須消費足夠維持一萬工人的生產物。”^②這樣，西斯蒙第相信他已經抓住了危機產生的由來了。他說：“讓我們假定：一個富人，可以消費一萬個工人所製造出來的生產物——生產物中包含着花邊、緞帶和麻布，這些東西的來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二卷，第394—395頁。

② 同上書，第396—397頁。

源，著者已指出过了。但是一个人不能够以同一比例来消费农产品，象由里嘉图（“爱丁堡评论杂志”上的匿名作者是谁，起初西斯蒙第不知道；当时他怀疑那篇论文是里嘉图所写的）所假想的由交换产生的酒、砂糖与香料，摆在一个人的饭桌上，是过多的。这些东西不能出卖，否则当作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的农业生产物与工业生产物间的严格比例，早就不能维持了。”^①

这里，我们看出西斯蒙第如何堕入麦克洛克的陷阱中了。因为，他不去否定以奢侈品生产来答复积累问题的论点，却把对手追击到这个领域上来而没有发现他的立足点已经变动了。这里，他发现可以反对的，只有二点：其一，从道德观点上，他非难麦克洛克，把剩余价值的利益只施给资本家，而没有给工人；于是，他就离开主题，进入到对资本主义下分配问题的论战。其次，他从这个离题的讨论中又突然回复到他原来的问题上来。这个问题他现在表述如下：资本家自己消费在奢侈品形态下的全部剩余价值。即令如此，那么，一个人的消费能不能象剩余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而增加的那样，迅速而无限制地增大？在这里，西斯蒙第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问题，他并未看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困难，是在于缺乏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他只发现简单再生产的困难，是由于资本家自身消费能力的生理限制。既然资本家对奢侈品的吸收能力，不能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也就是与剩余价值的增加并驾齐驱，生产过剩和危机也就不能不爆发起来了。我们曾经在西斯蒙第的“新原理”一书中，看到这个思想线索。由此可知西斯蒙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并不自始至终十分清楚的。这是不足为奇的！要完全正确地把握积累问题，非首先理解简单再生产不可。而我们已经看到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错误百出的。

不管怎样，西斯蒙第初次和古典学派的继承者交锋时，并没有打败。相反，他终究击溃了他的对手。如果说西斯蒙第误解了社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会再生产最根本的原理，并且全然忽视了不变资本，从而符合亚当·斯密的教条，那么，他在这方面至少不比他的对手更坏。在麦克洛克看来，不变资本也同样地不存在的。他的农业家与工业家，只是以粮食和衣服“预付”给工人，而社会总生产物，也只是由粮食与衣服构成的。西斯蒙第和麦克洛克两人的基本错误，虽然相同；但由于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有直觉的认识，他较麦克洛克还是稍胜一等。关于西斯蒙第所怀疑的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问题，里嘉图学派结局是穷于答复。同样，对那些否认“超过需求的生产过剩”，否认“市场拥挤”，否认“任何受苦”的人，对那些和谐论的传播者和辩护者以及他们的心安理得的态度，西斯蒙第以诺丁汉无产阶级的饥饿哭声来加以反击；他还证明机器的应用必然造成“人口过剩”；特别在最后，他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般倾向及其内在的矛盾；所有这一切表明西斯蒙第的分析较为深入。而麦克洛克直捷地否认一般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对于每一次部分的生产过剩，他有一种特效药。他说：

“有人也许要反驳道，在原则上商品的需求与商品的供给以同一比例增加，但这不能说明由于买卖过多而产生的货物充斥和滞销。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回答道：所谓货物充斥是某一特殊种类的商品供给增加了，而作为它们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没有随之而相应地增加供给量。譬如我们的一千个农业家与一千个工业家，通过交换自己的剩余生产物，相互提供了一个市场，此时，如果有一千个新的资本家参加进来，各自雇用一百个劳动者，从事耕作，则农业生产物市场，无疑会直接发生农产品充斥的现象。因为，用以购买这些农产品的工业产品的供给，并没有与之同时增加。倘若这些新的资本家中，有一半是工业家，那么，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就足够购买其他一半所生产的产品。于是，均衡恢复了。一千五百个农业家与一千五百个工业家交换各自的剩余生产物，他们所享受的便利与过去一千个农业家和一千个工业家交换各自的剩余生

产物时所享受的是一样的”。^①

西斯蒙第以他目击的在世界市场上发生的实际变革来答复这个在模模糊糊之中容易滑过去的可笑的論調。西斯蒙第說：

“……人們有可能迫使野蛮国家进行耕种，而政治革命、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和平，一举把貨运带入古老农业国家的港口，而这些貨运几乎等于这些国家的农业收成的全部。最近俄罗斯在黑海沿岸新开辟的广漠省份、埃及政府制度的改革、以及在巴巴利对海盜的禁止，突然間把奧得塞，亚历山大港及突尼斯的谷仓，卸入意大利的港口，并使市场上充滿这样丰富的粮食，以致沿海一带农业家的貿易难以招架而逐漸失去自己的陣地。由于在密西失必河岸新領土的广泛开垦，从而造成农产物的大量輸出，欧洲其他地区也經歷着类似的变革。从澳大利亚輸入的羊毛和其他农产品，由于運費低廉，在价格上将来也許会給英国的工业带来了毁灭，尽管食品的价格，由于运输比較困难，而影响不大。”^②关于南欧的农业危机，麦克洛克又有什么建議呢？其办法就是把新的农业家的半数轉变为工业家！西斯蒙第答复說：“这种建議，如果严肃地来看，不能适用于克里木的韃靼人和埃及的农夫。”他又补充說：“在海外地区和澳大利亚，建設新工业的时期，尙未成熟。”^③西斯蒙第很正确地認識到海外地区的工业化，只是時間問題。他同样也理解到：世界市场的扩大，并没有解决困难；反而使困难达到更高程度，带来更激烈的危机。他預測資本主义扩张傾向的一个方面，将是更激烈的竞争，更混乱的生产。他在一个地方，論述資本主义生产超出一切市场限界的傾向时，曾把握住危机的根本原因。他在答复麦克洛克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时，說道：“人們不止一次地宣称均衡将会恢复，一切事情将会重新开始；但是每一个需求，每次总会提供一个远远超过交易上实际需要的动力，而这个新的活动，必然会

①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評論”上的論文，第 471—472 頁。

②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二卷，第 400—401 頁。

③ 同上書，第401頁。

带来一次更痛苦的商品充斥现象”。

对于这样深刻地把握着资本运动的实际矛盾的意见，伦敦讲坛上的庸俗论者，尽管唱着调和的滥调，并导演着一千个浓装的农业家和一千个酗酒的工业家的乡间舞，终究不可能给以有效的回答。

第十二章 里嘉图对西斯蒙第

里嘉图认为麦克洛克答复西斯蒙第的理论反驳，还没有使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不象那个马克思曾称之为苏格兰大骗子手的麦克洛克那样，里嘉图确实渴望发现真理，并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大思想家的真诚谦虚的风度。^① 西斯蒙第对里嘉图及其门徒们的论战给里嘉图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从里嘉图对机器的影响问题所采取的修正的研究态度中可以获得证明的，而机器的影响问题，正是西斯蒙第据以说明资本主义的凶恶面貌，借以责难古典学派的和谐论的。西斯蒙第在这一点上是有其不朽的功绩的。原来，里嘉图的追随者曾经发展这样的一种论调：即机器所创造的劳动机会总是与它所排挤的劳动机会同样的多，甚至还要更多一些。对于这个所谓“补偿理论”，西斯蒙第于1819年，即在里嘉图的主要著作出版后两年，在他所发表的“新原理”一书中的一章“论劳动分工和机器”，^② 以及另一章“机器产生过剩人口”^③ 中曾予以严厉的攻击。1821年，在麦克洛克和西斯蒙第的论战之后，里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第三版中，插入了新的一章，在这一章

①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里嘉图于1819年被选入国会后（当时由于他的经济著作已享有盛誉），曾写信给朋友说：“你知道我已经当了下院的议员，但我怕我在那里不能有所作为。我两次想发表演说，但我感到非常窘迫。我没有希望克服在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时被袭击来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况。”（里嘉图致麦克洛克信件，纽约，1895年，第23—24页）。象这样的羞怯在大言不惭的麦克洛克身上是找不到的。

②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编，第七章。

③ 同上书，第七编，第七章。

中，他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并与西斯蒙第同調地說：“劳动階級認為機器的采用往往对劳动階級不利，这个见解并不是基于偏見和誤斷，而是符合于政治經濟學中正确原理的”。^①

他跟西斯蒙第一樣，必須為自己洗刷反对技术进步的嫌疑；但不象西斯蒙第那樣率直，他以这种灾禍是逐渐发生的那样的遁辭来与人妥协。他說：“为了說明这个原理，我是假定改良的机器是突然发现的，并获得了广泛的使用；但事实上，这些东西是逐渐发见的，它們的影响毋宁在于决定資本（儲蓄和积累起来的）的使用，而不是从实际使用中把資本轉移出来”。^②

但危机和积累問題繼續使里嘉图困惑不解。在1823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日內瓦住了几天以便亲自与西斯蒙第討論這個問題。这些討論的結果就成为西斯蒙第在1824年五月出版的百科全书評論中发表的一篇以“論消費与生产間的平衡”为題的論文。^③

里嘉图在他的原理里，在重要問題上，完全接受了薩伊的陈腐的生产和消費協調的理論。在第二十一章中，他說：“薩伊已最令人滿意地証明沒有任何数量的資本在一个国家內会找不到被使用的场合，因为生产的唯一限界就是需求。人們如果不是为了消費或出售，就不会生产；如果不是为了购买某种其他商品，也不会出售，而所购买的某种其他商品或者是直接对他有用的，或者对于将来生产能够起作用的。因此，生产者必然是自己产品的消費者，或者是別人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費者。”^④

① 里嘉图：“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第三版，倫敦，1821年，第474頁。

② 同上書，第478頁。

③ 这篇論文“論消費与生产間的平衡”是收在“新原理”的第二版第二卷內（第408頁起）。西斯蒙第告訴我們当时討論的情况：“里嘉图最近逝世了。他的逝世不仅使他的家族和朋友感到深切的悲慟，而且使那些从他的卓越才識中获得教益的以及受到他的崇高情感啓发的朋友們也感到无限的惆悵。在里嘉图生前的最后一年，他来日內瓦住了几天。对于我們之間存在着意見分歧的这个根本問題，我們曾討論了二、三次。在討論中，里氏表現了他杰出的优雅、誠实和爱好眞理的风度，他的头脑清晰，出乎他的門徒們意料之外，尽管对于他在教室中所要求的抽象思考能力，他們是习以为常了。”

④ 里嘉图：“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第339頁。

对于里嘉图的这个见解，西斯蒙第的“新原理”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他们之间的争辩，一般说来，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里嘉图不能否认当时在英国及其他国家恰恰发生危机的这个事实。所争论的是怎样解释这些危机。在讨论之初，西斯蒙第和里嘉图双方同意了一个异常清晰和精确地表述问题的方法，他们把对外贸易问题完全撇开一边不谈。西斯蒙第很好地把握着对外贸易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扩张要求的意义和必要性；在这一点上，他是与里嘉图的自由贸易论者同调的，而且，对于资本的扩张要求，他的辩证的想法大大超越了那些自由贸易论者。他充分承认：工业“将日甚一日地向国外市场，寻找销路，但在那里，工业又受到更大变革的威胁”。^①正如我们曾看到的，他预言海外各国，对欧洲工业，必然发生危险的竞争。而在1820年间，他就能预见这种事实，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成就，这也说明了西斯蒙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但尽管如此，西斯蒙第并没有象后代评论家所归功于他那样，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即积累问题，依赖对外贸易，作为唯一的解救方法。相反地，西斯蒙第在“新原理”第二卷第六章中，^②很明白地表示：“为了使这些估计具有更多的确定性，并为了简化这些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一直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并假定一个孤立存在的国家；这个孤立的国家是人类社会本身。凡是适用于一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的，也同样适用于全人类”。

换言之，西斯蒙第把整个世界市场当作一个单独用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会时，他据以立论的前提，是与其后马克思所采用的前提相同的。他这个前提也和里嘉图一致。他说：“我们两人，把下述的情况暂置不论：即一个国家出售给国外的东西，多于向国外购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国家掌握着一个不断增长的国外市场，足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四编，第四章，“论商人的财富依存于收入的增加”（第一卷，第115页）。

以容納本國不斷增長的生產。無論如何，下列問題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戰爭的勝負呢，還是政治的變化，給一個國家帶來了新的消費者？這裡所需要的是證明一個國家通過增加自己的生產能夠為自己產生新的消費者”。^①

西斯蒙第在這裡極其精確地表述了實現剩餘價值的問題，正如後來各個時代的經濟學中對我們所提出的一樣，而里嘉圖則相反，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並在本書下面還將更詳細地述說的，他與薩伊抱同樣的見解，認為生產創造它自己的需求。

在與西斯蒙第爭辯中，里嘉圖的論點是這樣：“假定100個工人生產1,000袋谷物，和100個織布工人生產1,000碼呢絨，讓我們把對人們有用的其他一切生產物，以及人們中間的所有中介人都暫置不論，並假定世界上只有上述這些人存在，那麼，他們以1,000碼呢絨與1,000袋谷物交換。如果勞動生產力，由於工業的不斷進步，提高了十分之一，那麼，同樣的那些人將以1,100碼呢絨與1,100袋谷物交換，結果，他們將比從前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新的進步將使他們以1,200碼呢絨與1,200袋谷物交換，依此類推，因此，生產的增加總會使那些生產者得到更多的享受”。^②

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偉大的里嘉圖的推理水平，似乎比那個蘇格蘭大騙子手麥克洛克還要低些。我們又一次被邀請來參觀“碼”和“袋”兩者間的和諧而優雅的舞蹈會——正是要證明的那些比例關係現在又被認為理所當然而滑過去了。而且，一切有關本問題的其他前提也簡單地被略而不論。我們可以回想到，真正的問題，真正爭辯的對象是：如果資本家生產的產品多於他們自己消費和工人消費所需要的，也就是，如果他們把他們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資本，用來擴大生產，增加他們的資本，那麼，誰是這些隨之而出現的剩餘生產物的購買者和消費者呢？里嘉圖的答复是對資本的增大問題完全不管。他為我們描繪的生產的各個階段，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頁。

② 同上書，第416頁。

仅仅是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按照他的说法，同样数量的劳动最初生产1,000袋谷物和1,000碼衣料，其次生产1,100袋和1,100碼，后来，又增至1,200袋和1,200碼，依此类推，按照一条优美的上升曲线而增加。不仅这样由双方象军队一样同时并进，双方所交换的物品数量又完全相符的景象令人厌倦，而且在这个例子中对于资本的扩大只字都没有提到。这里，我们所见到的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简单再生产，这简单再生产具有较大数量的使用价值，但在社会总生产物的价值上没有任何增加。既然交换问题是价值量问题，而不是使用价值量问题，而在里嘉图的例子中，价值量又没有变动，可见，里嘉图实际上没有前进一步，尽管他好象是在分析生产的继续扩大。最后，里嘉图完全忘记了有关的再生产各个范畴。麦克洛克一开始就使他的资本家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而依靠吃喝空气而生存，但他至少承认工人们的存在，考虑到工人們的消费。而里嘉图根本没有提到工人；对于他来说，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区别。除了这个主要的遗漏外，他之象他的門徒一样，没有考虑到不变资本问题，那更不必说了。他想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的扩大问题，但在他的假定中，除了相互交换的若干数量的商品外，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存在。

西斯蒙第没有看出来，战场已经变动了。他忠实地企图把他的著名的宾客和敌手（指里嘉图——译者）的幻想带到人間来，并分析其中的无形矛盾；他抑郁地说，这些假设，“正象德国的形而上学一样，是把时间和空间都抽象掉的”。^①他把里嘉图的假设移植到这么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实际组织中，存在着无产的工人，他們的工资是由竞争决定的，并且一旦雇主不需要他們，他們就被解雇”。西斯蒙第还深刻而谦虚地指出：“因为我们所持的反对见解就是涉及这种社会组织”。^②

西斯蒙第揭露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相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頁。

② 同上書，第417頁。

結合的許多困難和衝突。他指出從社會觀點來看，里嘉圖所假設的勞動技術的變化必然歸結到下列兩種中的任何一種的結果：其一是比例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若干數目的工人必將被解雇——從而一方面出現剩餘的生產物，另一方發生失業和貧困遭遇。或者，這些剩餘生產物用來維持那些從事新的生產部門，即奢侈品生產的工人。這裡，西斯蒙第的見解無疑地超越了里嘉圖：他突然想起了不變資本的存在，並激烈地對英國古典學派，予以正面的攻擊。他說：

“建立一個新的製造奢侈品的工業，也需要新的資本。機器必須製造出來；原料必須購置；遙遠的商業活動必須建立起來；因為富人很少滿足於附近所生產的奢侈品。於是，我們要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新資本呢？而這些新資本可能較之農業方面所需的為數要大得多。……我們的奢侈品工人離開吃我們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谷物，穿到我們普通工廠所生產的布料的時刻，還相當遠哩；他們還沒有變成工人，甚至，他們可能還沒有出世。他們的行業還沒有存在，他所據以工作的材料還沒有從印度運來。所有要從他們那裡分配到麵包的人，還須白白地等待着”。^①

現在，西斯蒙第不僅在奢侈品生產上，而且也在農業上，考慮到不變資本了。他繼續對里嘉圖進行反駁如下：“我們必須把時間因素抽去不論，如果我們假定有農業家，由於機器或農村工業上的發明，有可能把他的工人的生產能力提高三倍，他又找到足夠的資本，使他的剝削、他的農具、裝備、牲口和倉庫都增加三倍，使他的流動資本也增加三倍，而這些流動資本是供他在收割莊稼前使用的”。^②

這樣，西斯蒙第與古典學派的一個迷信決裂了，這個迷信就是在資本擴張時，所有追加的資本都是用在工資、即可變資本上的。西斯蒙第清楚地與里嘉圖的學說，分道揚鑣了。但是，儘管如此，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二卷，第425—426頁。

② 同上書，第429頁。

在三年后，他仍然让这个学说所产生的全部错误混进他的“新原理”第二版中去。与里嘉图的轻便的和諧論相反，西斯蒙第強調了两个要点：其一是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客观上的困难，它并不象里嘉图的荒謬假設所說的那樣，在資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圓滑地进行的；其次是在資本主义下，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所有技术进步都是以犧牲工人階級为代价而得到的，也就是以工人階級的痛苦来換取的。西斯蒙第超越里嘉图之处还表现在第三个要点上：他具有辯証法见解的廣濶視野，而里嘉图則粗魯、狹隘，沒有能力理解除了資產階級經濟以外的任何社会形态。西斯蒙第說：

“我們的眼睛只习惯于看这个新的社会組織，这种普遍的竟爭，惡化为富人和工人階級間的仇恨，从而除了包围在我們四周的廢墟外，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存在的方式。他們自以为以过去制度的缺点来責难我，就可以証明我的荒謬。誠然，关于下层階級的組織，二、三个制度會依次传递下来；但既然这些制度沒有值得留戀的，既然它們开始时做了一些好事，后来就給人类带来了可怕的禍害，那么，我們可不可以作出結論道：我們已进入了一个真正好的制度呢？我們可不可以作出結論道：我們將发现不出工資劳动制度的根本罪惡，象我們所发现的奴隶制度、封建从属制度和行会制度的罪惡那样？无疑地，这样的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到了那时，我們的子孙将斥責我們野蛮，因为我們沒有給工人階級安全保障，正象对那些把同样的階級变为奴隶的民族，我們斥之为野蛮一样，而我們的子孙也将同样斥責我們”。^①

西斯蒙第把无产階級在近代社会和古代羅馬社会所起作用的重要区别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这表明他对历史的联系有深刻的認識。在他与里嘉图的論战中，当他分析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特殊經濟性質以及它們相对的历史意义时，当他最后強調“一切种类的財產与一切种类的劳动完全分离”是資產階級經濟中最显著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34—435頁。

的普遍傾向時，他也表現了卓越的辨別能力。

西斯蒙第和古典學派進行的第二回論戰，也和第一回差不多，沒有給西斯蒙第的敵手帶來任何光彩。^①

第十三章 薩伊對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在1824年五月號“百科全書評論”上發表的反駁里嘉圖的論文對於薩伊是一個最後的挑戰。當時，薩伊是公認的“經濟科學的巨子”，所謂亞當·斯密學派在大陸上的代表人物、繼承人和普及者。薩伊在致馬爾薩斯的信中，已對西斯蒙第提出了若干責難；在同年七月的“百科全書評論”中又發表了一篇反駁論文，標題為“論消費與生產間的平衡”。對這篇論文，西斯蒙第又發表了一篇簡短的答復。這樣，論戰的次序、與對抗理論出現的次序，恰恰相反，因為最初把符合神意的生產和消費間的平衡論傳播給里嘉圖的是薩伊，而里嘉圖又以之傳授給麥克洛克。事實上，早在1803年間，薩伊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論”第一卷第十二章“論銷售市場”中，作出了如下的斬釘截鐵的聲明：“……人們總是以生產物來支付生產物的。因此，倘若某一國家生產某種產品過多，那麼，銷售它們的辦法是生產別一種類的貨物”。^②

這裡，我們又遇到我們所熟知的符咒，這個符咒是由里嘉圖學

① 關於西斯蒙第和里嘉圖的論戰，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站在擁護薩伊和里嘉圖的立場上說：“西斯蒙第被迫承認他所攻擊的學說是正確的，並把所有的要點都讓給他的敵手了”；還說：西斯蒙第本人“已拋棄他自己的理論，但這個理論至今還有这么多的擁護者”；最後還說，“這個爭辯的勝利是屬於里嘉圖方面”，（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國商業危機的理論和歷史研究”，1901年，第176頁）。這表明作者缺乏辨別能力，——姑從寬來說——在自命為嚴肅的科學著作中這樣的缺乏辨別能力，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② “貨幣在雙重交換中，僅僅完成了中介的任務。交換終結時，人們顯然是以生產物來支付生產物。因此，當一國持有某種生產物過多時，銷售這些東西的辦法，就是生產其他種類的貨物”（薩伊：“政治經濟學原論”，巴黎，1803年，第一卷，第154頁）。

派和庸俗經濟學派同樣接受下來，作為和諧論的奠基石的。^①

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基本上是對這個命題的有力的反駁。但在這個階段，薩伊在“百科全書評論”中，突然改變了攻擊的方向，他說：“……有人可以反駁道，由於人類的聰明才智，由於人類可以從自然和技術所供應的工具中汲取利益，每個社會可以生產所有一切適合於滿足社會需要的東西，可以使社會享受到遠較它自己所能消費的更多的東西。但我要問：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國家，得到一切東西的供應的。就是在列入繁榮一類的國家中，其人口的八分之七缺乏許多被公認為必需的物品……。這裡我不欲談論富裕家庭，而是談論中等的家庭。我現在所居住的鄉村是在一個法國最富裕的地區，但在我所訪問的家庭中，二十戶中就有十九戶只有粗糙的食物，沒有一件東西給人帶來幸福，也沒有象英國人稱為舒適品的東西”。^②

對於卓越的薩伊的厚顏無恥，不能不令人欽佩。他以前力言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不可能發生困難，不可能有過剩，也不可能發生危機和貧困；既然商品是相互買賣的，我們只須繼續生產日益增多的東西，一切都將美好無疵。就在薩伊的手裡，這個假設成為和諧論的要義。這個理論是庸俗經濟學的典型代表，它引起了西斯蒙第的尖銳的攻擊，并被後者證明為毫無根據的說法。西斯蒙第還指出不是任何數量的商品都可以銷售出去，商品實現的限界總是

① 事實上，在這裡，薩伊的唯一成就也不過是把前人所發表的見解用夸大其辭和教條的形式來重述一下而已。正如柏格曼（Bergmann）在他的“危機理論”（斯圖加特，1895年）中所指出的，在喬治·杜克（Josiah Tucker）（1752年）的著作，杜爾開在法文小冊子中的注釋，魁奈、杜邦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中對供給和需求間的自然平衡，或甚至兩者的等同性都提出了類似的見解。然而這位憂郁的薩伊（馬克思曾這樣稱呼他），作為和諧論福音的傳播者，要求把“市場理論”的偉大發現，歸功於他；他還謙遜地把自己的著作，與熱力、槓桿和傾斜面原理的發現相比。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論”第六版的序言和目錄中，他說：“本書中所闡述的交換和銷售理論將改變世界的政治”。詹姆士·穆勒在其1808年出版的“為商業辯護”中表達了同樣的見解。馬克思稱他為生產和需求間自然均衡論的真正創始者。

② “百科全書評論”中薩伊的文章，第23卷，1824年7月號。

由社会的收入、由 $v+m$ 规定的。既然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最低的生活水平，既然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能力没有自然的界限，那么，西斯蒙第说，生产的扩大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停滞、危机以及人民群众更大的贫困。萨伊的这次反击是巧妙的。他说，如果你坚持生产过剩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中会出现这么多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赤贫的人呢？请你解释这个矛盾现象。萨伊本人的论点是不重视货币流通，而以物物交换来推理。他现在反说他的对手在述及生产物过剩时，不从它对社会购买力的关系，而从它对社会实际需要的关系来探讨，尽管西斯蒙第在自己的推理上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西斯蒙第在“新原理”第二卷第六章中说：“社会上当然有许多衣食不足、无栖身之处的贫民，但是一个社会只能销售它所能购买的东西，而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一个社会除了以自己的收入来购买外，没有其他的办法”。^①

不久以后，萨伊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又对他的对手加上一个新的罪名。他说：“这样，一国所缺乏的不是消费者，而是购买力。西斯蒙第相信如果生产物稀少，因而价格腾贵，工人生产这些东西就获得较多的工资，那么，购买力就将较为扩大”。^②

萨伊就是这样企图以他自己特有的庸俗的思想方法，或者更精密地说，以他自己特有的庸俗的夸夸其谈的方法，来丑化西斯蒙第，攻击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和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理论。他把“新原理”说成提倡商品“稀少”和高价的笑谈，并以讚美最高限度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形象来与之对比。他说，如果生产活跃起来，劳动的数量也有增加，生产规模扩大，那么，这个国家就得到更好的、更全面的供应。他把工业发展达到最高点的国家的情况，与中世纪的贫穷相比，而对前者加以讚美。对西斯蒙第的“箴言”，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害的。他说：“他（指西斯蒙第——译者）为什么要求调查那些可能强迫企业家对他所雇用的工人的生活负责保证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117页。

② 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第21页。

的法律呢？这些調查将会使企业精神瘫痪。仅仅对国家干涉私人契約的可能发生恐惧就足以造成一种灾难，它对国民财富是有害的”^①。

西斯蒙第没有被薩伊的不分青紅皂白的辯护言論轉移了目标，他再一次抓住基本問題而进行討論。他說：“我确实沒有象他指摘的那樣，否認过法国在路易十四以后，人口增加了一倍，消費增加了三倍。我不过認為如果生产物是需要的，被人购买和消費了，这样增加生产才是一件好事；反之，如果沒有需求，而生产者的唯一希望只是从自己与之竞争的工业生产物那里夺取消費者，那是一件坏事。我曾經試图証明：各国的自然进程是他們财富的累进增长，这种增长是各国对新产品的需求及其偿付手段的增加的結果；但由于我們的制度，由于我們的立法从工人階級手里夺去了一切財產和安全保証，这就造成了脫离了需求、也脫离了购买力的混乱的劳动，結果就使貧穷愈趋严重了”。^②

于是在結束辯論时，他要求和諧論的传教士考虑下列的情况：尽管一个国家可能是富庶的，但大众的貧穷，正如物質財富一样，是不断地在增加中；生产一切东西的那个階級日漸接近于不能消費任何物品的情况。关于資本积累問題的第一回論战就在这个資本主义矛盾的不和諧音节中結束了。

通观第一次論战的經過与成果，可以确定下列两点結論：

(一) 西斯蒙第的分析，虽然有一些混乱，但是比之里嘉图学派以及自封为斯密衣鉢的繼承人，要高明得多。西斯蒙第能够从再生产的观点考察事物，他竭尽全力来探求价值(資本和收入)和物

① 薩伊：“政治經濟学原論”，第29頁。薩伊用下列咆哮的結尾語，指控西斯蒙第为資產階級社会的主要敌人：“它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近代社会組織，这个社会組織剝夺了劳动者除了双手外的所有的財產，从而使劳动者在竞争中陷于不利时，不能得到任何安全的保証。这是什么話！社会之所以剝夺劳动者，是因为要保証使每一类的企业家自由支配自己的資本，也就是，自己的財產。我重复地說：沒有比主张对財產的使用加以管理的見解更为危險的了”，因为“双手和才能也是財產”(同上書，第30頁)。

②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462—463頁。

質要素(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概念，借以把握这些东西是如何在社会总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在这一点上，他最接近亚当·斯密，两人的差别在于斯密所認为主观的和推論得来的矛盾——总过程的矛盾——西斯蒙第特地拿来作为他的分析的基础，并特別強調它，并在他的分析中，他把資本积累問題当作症結点和主要困难点而加以研究。

因此，西斯蒙第显然走在斯密的前面，而里嘉图及其信徒們包括薩伊在內，仅仅用簡單商品生产的概念来考虑問題。他們只看到W—G—W（商品—貨幣—商品）的公式，甚至把一切事物归結为物物交換，并相信这种貧乏的智慧能够对付再生产和积累过程所特有的一切問題。这甚至比斯密又后退一步，而西斯蒙第就在这个近視的看法上，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一个正确的社会批評家，西斯蒙第对資產階級經濟学的范畴，較之那些御用学者，表显着更多的了解，正如后来的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資本主义經濟机构的特殊性及各個問題的理解，較之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合并起来，无可比拟地更为深刻。西斯蒙第在“新原理”第七編第七章中反对里嘉图而大声疾呼：“什么？是不是財富就是一切，人不足道嗎？”在这时候，不仅表现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看法的脆弱的道德气味——这与里嘉图的严峻的、古典的客观性，完全不同——，而且也表现了他的批判的理解力，这个理解力由于对經濟中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敏感而变得更为尖銳了；也表现了他对內在矛盾和困难的注意，这正可与里嘉图及其学派的僵硬的、偏狹的、抽象的看法相对比。这次論爭表明了里嘉图，正如亚当·斯密的信徒們一样，沒有能力把握住西斯蒙第所提出的积累問題之謎，不要說解决它了。

(二)由于全部討論走上了叉道，集中到危机問題上来，解决这个問題的綫索也就不可能发现了。最早发生的一次危机自然地支配了这个討論的內容；同样自然地，这有效地妨碍双方認識到这一点：即危机不就是积累的問題，它只是积累的特殊的外部现象，

只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形态中的一个要素而已。因此，爭論只能陷入双方各执一辞：一方从危机推論出积累的不可能，而另一方从物物交換推論出危机的不可能。資本主义的以后发展証明这两个結論都是錯誤的。

然而，西斯蒙第的批判，对在資本支配下的經濟理論，敲起了第一次警鐘；由于这个理由，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自己提出問題而不能解决的古典經濟学的分崩离析，打开了道路。尽管西斯蒙第对資本主义获胜后的結果，表示恐惧，但他并不是一个怀念前資本主义关系的反动家，即使他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家长制生产形态与資本所統治的形态相比較时，偶尔喜欢对前者加以讚美。但他反复地、极其激烈地抗議这样的解释，例如在“百科全书評論”上，他在对里嘉图的論战中写道：

“我已經听到这样的非难，他們說，我反对农业和手工艺的改进，反对人类所能取得的一切进步；他們还說，我宁愿处于野蛮状态，而不喜欢文明，因为在野蛮时代，犁是一个工具，而鋤是更老的一个工具；他們还說，根据我的体系看，人类无疑地應該以双手来耕地。

“我从来没有說过这样的话。我請求大家原諒，我要断然地抗議所有轉嫁到我的体系上、而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得出过的結論。攻击我的人，和为我辯护的人，都没有真正了解我；不止一次地，我的同盟者，正象我的反对者一样，要使我出乖露丑”。“請你們注意，我所反对的，不是机器、新发现和新发明，不是文明，而是近代社会組織，这种組織剝夺了劳动者除了双手以外的所有財產，在肆无忌憚的討价、还价中，不給劳动者一絲一毫的安全，而且使他陷于不利，并成为犧牲品”。^①

西斯蒙第的批評的出发点，无疑地是无产階級的利益。他在表述如下的主要傾向时，他没有提出不实在的要求：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第432—433頁。

“我只希望找到方法，使劳动者得到劳动的果实，使运转机器的人得到机器的利益”。^①

不错，当他被进一步要求他说明他所希求的社会组织时，他含糊其辞，并承认回答不出来：

“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今天还不想讨论它。我想完全说服经济学家，正象说服我自己一样，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科学已走上了错误的轨道。但我不能相信我自己能够指示他们一条正确的道路；研究社会的形成或社会应该怎样进行，这要求我们在思维上作最大的努力。但即使观察现有的社会组织，已使我们煞费苦心，如果要设想一个目下还不存在的组织，要预见未来，具有这样能力的人，恐怕不容易找到吧”！^②

西斯蒙第这样公开承认他没有能力，预见超越资本主义以外的未来情况，正是在1820年的时候。那时，资本主义刚开始在大工业建立起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思想还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西斯蒙第没有这种预见的能力，那不是他的羞耻。但正因为 he 既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而前进，又不能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上去，他的批判就不能不走上小资产阶级的妥协道路了。他对资本主义以及生产力是否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他觉得有必要竭力主张对积累加以少许抑制，使资本主义前进步调放慢一些。这就是他的批判的反动的一面。^③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449页。

② 同上书，第448页。

③ 马克思在叙述里嘉图学派的反对派及其消散的历史时，只简短地提到西斯蒙第。他说：“我把西斯蒙第排除在我的历史的考察之外，因为他的见解的批判，有一部分属于资本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的范围。对于这个，我是只能在这个著作完成以后，再讨论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52页）然而其后在马克思论马尔萨斯的时候，也有一段论到西斯蒙第，而这一段马克思写得很是详尽：“西斯蒙第有这种深刻的感觉，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的形态，它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的发展；别方面，这种关系又受着限制；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买与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矛盾等等，在生产力越是发展时，将取得越是大的范围。他还感觉到了这种根本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

第十四章 馬尔薩斯

与西斯蒙第同时，馬尔薩斯也对部分的里嘉图学說进行論战。西斯蒙第在其著作的第二版中以及在其論战中，屡次引用馬尔薩斯作为支持他的一个权威。这样，他在“百科全书評論”杂志上表述了反对里嘉图斗争的共同目的如下：

“另一方面，馬尔薩斯之在英国（反对里嘉图和薩伊），正如我之在大陆一样，都主张消費不是生产的必然結果；人类的需要和慾望确实是无限的，可是，需要和慾望，仅在它們与交换手段相結合后，才能通过消費得到滿足。我們認為只是創造交换手段，使之在那些具有慾望和需要的人手中流通，还是不够的；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社会上的交换手段增加了，而对劳动的需要，或工資，反而减少了，結果，一部分人的慾望和需要不能得到滿足，而消費随之

力的不受束縛的发展和財富（那是由商品构成，必須轉化为銀）的增加；別方面，生产者大众又在根本上只能有必要的生活資料。从而，恐慌，在他看来，并不象里嘉图看到的一样，是偶然的，而是內在的矛盾之根本的大規模的定期的爆发。他不断觉得躊躇：为要使国家的生产力适合于生产关系，而束縛生产力呢？还是为要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而束縛生产关系？在这个問題上，他常常是逃向过去，这个好古的人，希望用別的方法，依照資本的比例，来調节所得，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調节分配，并由此駕馭矛盾，但不知道分配关系是附属于生产关系的。他适切的判断了资产階級生产的諸矛盾，但沒有把握它們，从而也沒有理解它們的解决过程。（誠然，既然他所看到的生产还是在成长中，他怎么会理解呢——著者）对于他，基础上，实际已經有这种感觉：財富的新的占有形态，必須与在資本主义社会胎內发展的生产力，財富生产之物質的和社会的条件相适合；并且，资产階級的形态不过是暫时的，充滿矛盾的，在其中，財富常只取得对立的存在，到处都同时表现为它的反对物。財富常常要以貧困为前提；并且，財富只在它发展貧困的时候，发展自己”。（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第55—56頁）。

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中批判蒲魯东的几个地方，也曾提到过西斯蒙第。但对于西斯蒙第本身，則只作如下的簡短表述：“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真正的勻配又保存社会底現在的基础的那些經濟学家們是反动的，因为，要貫徹主张，他們只好竭力設法恢复过去的一切其他生产条件”（“哲学的貧困”，人民出版社版，第88頁）。在“政治經濟学批判”中，对西斯蒙第只提到过两次。一次是把他当作法国资产階級經濟学的最后的古典学者，拿他和英国的里嘉图对比；另一次是力說西斯蒙第反对里嘉图，而承認創造价值的劳动之特別的社会性的性質。——最后，在“共产党宣言”中，称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階級学派的首領。

下降。最后，我們主张，社会繁荣的正确标志不是财富生产的增加，而是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或作补偿劳动用的工資的供給越来越多。里嘉图和薩伊并不否認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是繁荣的象征，但坚持这种需求的增加必然是由生产的增加所引起的。而馬尔薩斯和我認為这两种增加是由于互不相关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原因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根据我們的见解，如果对劳动的需求不先于生产而发生，从而决定了生产，那么，市场必将泛滥，于是新的生产变为破坏的原由，而不是享乐的原由。”^①

从这些言論可以看出西斯蒙第和馬尔薩斯之間的广泛的協議，兩人之間的并肩作战的友誼，至少在反对里嘉图及其学派上是如此。馬克思認為馬尔薩斯在1820年出版的“政治經济学原理”是直接来自西斯蒙第于一年前出版的“新原理”中剽窃来的。但在我們当前所关心的問題上，西斯蒙第和馬尔薩斯又是經常发生冲突的。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生产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它施行猛烈的攻击，甚至否定了它，而馬尔薩斯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辯护者。这不意味着馬尔薩斯，象薩伊和麦克洛克一样，否認资本主义生产的內在矛盾。相反地，他把这些矛盾无情地提高到自然规律的地位，并認定它們是絕對神圣的东西。西斯蒙第的主导观点是工人們的利益。他向往着——尽管相当一般化和模糊——一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彻底的分配改革。而馬尔薩斯是资本主义剝削的寄生者、依靠地租和动用公共財富为生者那些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主张把剩余价值中尽可能多的一部分分配給这些“不生产的消費者”。西斯蒙第的观点主要是倫理的，是社会改良家的观点。他在改进古典学說时，提出反对意见，強調說：“消費是积累的唯一目的”，他要求有限制的积累。馬尔薩斯則相反，他公然宣称，除积累外，生产沒有其他的目的，并主张資本家无限制地积累，而以資本家的寄生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9頁。

者的无限制消費来补充和保証。最后，西斯蒙第从全社会出发，对再生产过程、对資本和所得之間的关系，做了一个批判性的分析，作为論述的起点；而馬尔薩斯，在反对里嘉图时，从一个荒謬的价值論入手，从这个价值論他得出同样荒謬的剩余价值論，并试图把資本主义利潤解释为超越商品价值之上的价格的附加部分。^①

馬尔薩斯在“政治經濟学的定义”一书第六章中，^②曾对把供給与需求等同起来的命題，加以詳細的駁斥。詹姆士·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学綱要”一书中，宣称：

“所謂供給与需求相互协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是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可以与相同数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相交换。如果承認这个命題，其他一切就可以了了了。因此，如果有一双鞋子和一頂帽子都是用同量的劳动生产的，那么，只要一双鞋子交换了一頂帽子，那就是供給与需求是相互协调的。如果鞋子的价值，比帽子的价值下落了，那就証明市场上的鞋子来得比帽子多。这样，鞋子在市场上的数量是过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定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不能与同量劳动所生产的东西相交换。由于同一的理由，帽子在市场上的数量不足，因为表现在帽子的一定的劳动量现在可与包含較多劳动量的鞋子相交换。”^③

对于这样无聊的同义异語的反复，馬尔薩斯从两方面施行攻击。他首先要求穆勒注意到他的論点沒有建筑在穩固的基础上。事实上，即使帽子和鞋子的交换比例不变，这两者的数量，相对于需求，可能都太多了。这将促使这两者都以少于生产費（包括相当的利潤）的价格出售。馬尔薩斯就問道：

“在这种场合下，当帽子和鞋子都太多了，以致这两者都不能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第1—29頁，其中对馬尔薩斯的价值和利潤理論有詳細的分析。

② 此書献給詹姆士·穆勒，1827年出版。

③ 詹姆士·穆勒：“政治經濟学綱要”第三版，倫敦，1826年，第239—240頁。

在符合繼續供給的條件下進行交換，我們能說帽子的供給適合帽子的需求，或者，鞋子的供給適合鞋子的需求嗎？”^①

換言之，馬爾薩斯以一般生產過剩的可能性來責難穆勒：“……與生產費相比時……一切商品（的供給）可能同時下落，或同時上升。”^②

其次，馬爾薩斯反對穆勒、里嘉圖及其夥伴們所喜用的方法，即把他們的論點限於物物交換的體系上。他說：“例如，一個蛇麻栽培者拿一百袋蛇麻到市場去出售，他之不關心帽子和鞋子的供給，正如他不關心太陽上的黑點一樣。那麼，他想到什麼呢？他要把他的蛇麻交換些什麼呢？穆勒先生好像認為，如果說他要獲得貨幣，就暴露了對政治經濟學絕大無知似的。然而，儘管可能會獲得絕大無知的稱號，我毫不懷疑地肯定說他所要想得到的，實實在在是貨幣”。^③

這是因為這個蛇麻栽培者必須向地主支付地租，向勞動者支付工資，並購買為繼續維持他的栽培事業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而這些都需要用貨幣來償付。馬爾薩斯對這一點，有極其精密的闡述。他認為有名的經濟學者不利用貨幣交換的假定，却去利用危險的，最不可能的物物交換假定，是令人非常“驚異的”。^④

此外，馬爾薩斯以闡述這樣的供求機構為滿足：即供給過多將壓低價格至生產費以下，從而自動地造成生產的縮減；反之，供給不足則引起相反的现象。“然而在事物的自然過程中，這種糾正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的傾向並不能證明這些禍患從來沒有存在過”。^⑤

①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定義”，倫敦，1827年，第51頁。

② 同上書，第64頁。

③ 同上書，第53—54頁。

④ “我認為他們害怕別人非難他們，說他們主張財富是由貨幣形成的。然而，財富不是由貨幣形成的，這種說法雖是不錯，但是，說貨幣是財富分配上最有力的媒介物，也同樣沒有錯。在一切交換都實際上由貨幣進行的國家中，繼續試圖以帽子、鞋子、谷物和衣服等來說明需要和供給的原理，以及工資、利潤的變化，這種嘗試必將歸於失敗。”（同上書，第60頁，附注）

⑤ 同上書，第62—63頁。

显然，馬尔薩斯尽管在危机問題上抱相反的意见，他在推理上仍然走上里嘉图、穆勒、薩伊和麦克洛克的道路。对于他，同样地一切事情可以簡化为物物交换。引起西斯蒙第全部注意力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及其巨大的范畴和諸关系，这里完全被忽略过去了。

由于在基本观点上存在着这么多的对立意见，西斯蒙第的批判和馬尔薩斯的批判之間，只有下列共同之点：

(一)与薩伊和里嘉图的信徒們相反，他們两人都否認預先建立的消費和生产間的平衡的假定。

(二)他們两人都主张不仅部分危机有可能，而且普遍危机也有可能。

但他們的共同点到此为止。如果說西斯蒙第認為危机的原因在于工資的低廉和資本家消費能力的有限性，那么，馬尔薩斯把工資低廉的事实轉变为人口运动的一个自然规律；至于資本家的有限的消費能力，他以寄生者对剩余价值的消費作为替代，例如对財富和奢侈品貪得无饜的地主乡紳和僧侶便是。“具有巨大胃口的教会是得到上帝的祝福的”。

馬尔薩斯和西斯蒙第两人为了挽救資本主义积累，把它从危险的境地解救出来，都求之于只买不卖的一类消費者。不过，西斯蒙第希望通过这些消費者把超过工人和資本家消費的社会剩余生产物卖掉，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資本化的部分卖掉。馬尔薩斯則希望这些消費者成为一般的利潤生产者。至于食利阶层和受国家供养者既然从資本家手里得到他們的购买力，他們如何能够通过按提高的价格购买商品来帮助資本家占有利潤——这始終是馬尔薩斯的一个秘密。由于馬尔薩斯和西斯蒙第之間的深刻的对立，他們两人間的联合战綫是一点也不深入的。如果說馬尔薩斯，象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把西斯蒙第的“新原理”歪曲为馬尔薩斯式的一幅漫画，那么，西斯蒙第只強調兩人之間之共同点，并引用馬尔薩斯的話来支持自己，把馬尔薩斯对里嘉图的批判加上了一些西斯蒙第的形象。有时，西斯蒙第无疑地接受了馬尔薩斯的影响；例

如，他接受了馬尔薩斯关于濫用国家支出作为帮助积累的紧急措施的理论，从而使他(西斯蒙第)自己陷入了与自己原来的假定相矛盾的境界中。

总之，馬尔薩斯对再生产问题，既沒有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也沒有充分理解它。在他与里嘉图的信徒們爭論时，他沒有跳出简单商品流通概念的圈子，正如里嘉图的信徒們对西斯蒙第爭論时一样。他与里嘉图学派所起的爭执是圍繞着寄生者对剩余价值的所謂“非生产性消費”的問題；而不是关于資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基础的爭执。一旦揭露了馬尔薩斯利潤理論的荒唐无稽，他的全部体系就崩潰了。西斯蒙第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而即令我們接受了里嘉图的价值論及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西斯蒙第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决。

第二回論战

洛貝尔图对吉尔希曼

第十五章 吉尔希曼的再生产理論

积累問題的第二次論战也是由当时发生的事情引起的。如果說西斯蒙第之反对古典学派是由第一次英国的危机以及由危机造成对工人階級的苦难所引起的,那么,差不多二十五年后,革命的工人运动又刺激了洛貝尔图对資本主义生产进行批判。里昂織工的暴动和英国的宪章运动与第一次危机所引起的朦朧阴影相較,有巨大的不同,而对一切社会形态中最美妙的社会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已震动了資产階級的耳鼓。洛貝尔图最早的社会經濟著作,恐怕是在三十年代末为“奥格斯堡大众新聞”(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写的,但沒有被登載出来。这本著作的意义深长的标题是“工人階級的需求”,它开始这样写道:

“工人階級要求什么呢?別人能不能阻止工人階級取得这些东西呢?工人階級所要求的,会不会变成近代文明的坟墓呢?有心人很早就已看到有朝一日历史必将迫切地把这个問題提出来。目下,即使普通人从宪章运动和伯明翰的活剧中也学到了这个問題。”

在四十年代,革命思潮在法国推进得最为有力,許多秘密团体和社会主义学派——蒲魯东、布朗基、嘉貝、路易布朗等等的信徒們——紛紛成立了。二月革命和六月的“劳动权利”宣言促使資本主义社会的两大世界发生第一次的正面冲突,这是划时代的資本主义內在矛盾的爆发。至于这些矛盾的另一显明形态——危机——,在第二次論战年代,比之同世紀二十年代初,具有更全面的材料足供考察之用。洛貝尔图和吉尔希曼的爭論是在1837年、

1839年、1847年的危机，甚至在1857年第一次世界危机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洛貝尔图写他的小册子“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問題”的时间是在1858年。因此，出现在洛貝尔图的眼簾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与英国古典学者以及他們在英国和大陆的庸俗流派所持的和諧学說格格不入，这是与西斯蒙第高声疾呼，提出警告的时代，迥乎不同的。

洛貝尔图的最早著作曾引用西斯蒙第的話，可见他曾直接受西斯蒙第的批判的影响。洛貝尔图因此熟悉法国同时代的著作，但对为数較多的英国文献，他可能知道得較少。大家都知道，德国的教授們曾創造了洛貝尔图在創立社会主义上优先于馬克思的神話。上面所說的事实就是这个神話的唯一的貧乏的論据。梯尔教授(prof. Diehl)在“国家学辞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中的一篇短文中說：“洛貝尔图是德国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創始人，因为早在馬克思和拉薩尔之前，他在1839年至1842年間的著作中已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体系，对斯密的学說的批判，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新的理論根据和建議”。

这一段敬畏上帝的、虔誠的公道話是在1901年第二版中出現的，尽管那时恩格斯、考茨基和梅林已經写了很多东西来粉碎这个神話。当然，从所有这些飽学的德国經濟学者們看来，尽管相反的証据多么有力，只有从国际革命家馬克思名下夺去“优先”的荣誉轉給具有君主的、普魯士的、民族主义的学識的洛貝尔图，才心安理得，而洛貝尔图就是那个相信五百年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而现时則拥护稳定的200%的剝削率的人物。但是，引起我們兴趣的，是洛貝尔图分析的另一面。那个梯尔教授繼續讚美洛貝尔图說：“洛貝尔图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鋒；整个政治經濟学，在他的启发和推动下，获得了进展；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他对古典經濟学的批判，对收入分配的新理論，对資本的邏輯范畴和历史范畴間的区别等等，都有巨大的貢獻”。

这里我們就打开看看洛貝尔图的这些最后成就，特別是所謂

“等等”，到底是些什么。

洛貝尔图和吉尔希曼的論战是由洛貝尔图在1842年所写的“我国政治經濟情况的解說”一本基本著作所引起的。封·吉尔希曼在“民主主义新聞”上，写了两篇論文——“論社会关系上的地租”和“物物交换的社会”——加以反駁。洛貝尔图又在1850及1851年写了“社会书簡”进行答辯。于是，就在三十年前馬尔薩斯——西斯蒙第对薩伊——里嘉图——麦克洛克作战的同一的理論战场上，再度爆发了爭論。洛貝尔图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发表这种想法：在现代的社会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在国民生产中工資所占的分額却愈益縮小。他認為这是他的創见。从那时起，直至三十年后他去世时，他只是反复申述这个想法并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它。从他看来，这个“工資分額的下降”是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特别是赤貧化和危机的根源。他把赤貧化和危机合并起来叫做“我們时代的社会問題”。

吉尔希曼不同意这个說明。他把赤貧化归咎于地租騰貴的影响，把危机归咎于市场的缺乏，特別对于后者，他說：“大部分社会禍患的造成不是由于生产的不足，而是由于市场的缺乏……一个国家生产得愈多，用之于满足各种需要的手段也愈多，它也愈易惹起貧困和缺乏的危險”。劳动問題这里也包括在內，因为“聞名于世的劳动权利，归結起来，是市場問題”。吉尔希曼結論說：“我們看到，社会問題几乎与市場問題是等同的，一旦市場得到保証，即使深受人指摘的竞争的弊害也将消灭，那时，只有它的好处将保留下来。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的竞争精神将保持下来，但你死我活的爭夺却沒有了，因这种爭夺只是由市場不足所造成的”。^①

洛貝尔图和吉尔希曼的见解分歧是很明显的。洛貝尔图認為国民生产的分配有缺点，这是罪恶的根源，而吉尔希曼則認為根源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市場是有限的。尽管在吉尔希曼的論述

^① 洛貝尔图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吉尔希曼的論点。据洛貝尔图的著作的編者說，登載原文的“民主主义新聞”已找不到了。

中存在着許多混亂，特別是他對資本主義競爭的理想化的看法，把它說成是對價廉物美的商品的值得讚美的競爭精神，以及他把“聞名于世的勞動權利”當作市場問題的观点，儘管如此，他在某種程度上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創痛之處，即市場的有限性，比執着在分配問題上的洛貝爾圖，有更多的了解。因此，把西斯蒙第曾經提上日程的問題，再次提出來的，是吉爾希曼。儘管如此，吉爾希曼並不同意西斯蒙第對這個問題的闡明和解答，他毋寧是站在西斯蒙第的反對者一邊。他不僅接受了里嘉圖的地租理論和亞當·斯密的“商品的价格只由資本的利息和勞動的工資兩部分組成”的教條（吉爾希曼把剩餘價值轉變為“資本的利息”）；他也同意薩伊和里嘉圖的這個命題：即生產物只能用其他生產物來購買，生產本身創造自己的需求，因此，如果一方面看起來生產過多了，這只是意味着另一方面生產的不足。由此可見，吉爾希曼忠实地步上了古典學者的後塵，不過有些象是“德國的翻版”罷了。他開始時認為薩伊的生產和需求自然平衡說沒有反映現實的全面。他說：

“商業還包含着一些潛在的規律，這些規律使在上述命題下的秩序不能以完全純粹的形態出現。只有發現了這些規律，才能說明目前的市場泛濫問題，而這些規律的發現也許會給我們指出避免這個大禍患的途徑。我們相信引起薩伊的無可置疑的規律和現實間的矛盾的，在現代社會制度下有三種關係”。這三種關係是：（一）“生產物的分配太不平等”——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吉爾希曼有些接近西斯蒙第的見解；（二）在人類進行生產的勞動中自然界所帶來的困難；（三）作為生產與消費間媒介的商業的缺點。我們暫時不管薩伊規律的最後兩個障礙，我們現在考察一下吉爾希曼對於他的第一點的議論：

他解釋道：“第一個關係，簡單說來，就是勞動的工資太低以致引起了衰退。對於那些人，知道商品的价格只由資本的利息和勞動的工資兩部分組成的，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說法；如果勞動的工資低廉，價格也將低廉；如果一方高了，另一方也將提高”。（我們

看到吉尔希曼接受了斯密的教条的最令人誤解的形式：价格不是分解为劳动的工資和剩余价值，而是由两者作为一个总和而組成的——这个见解使亚当·斯密远离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論）。

“工資和价格因此是直接相关的，两者相互平衡。英国之所以取消谷物条例、取消肉类及其他食品的关税，就是要促使工資降低，从而使英国制造厂家能够以較低廉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排挤所有其他的竞争者。可是，这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并不触及生产物在工人和资本家間分配的比例。这两者間分配太不平等是薩伊规律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在一切部門的生产进行下市场之所以发生泛滥情况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上述的論述，吉尔希曼提供了一个詳細的例解。他襲用古典的方法，設想一个假定的孤立社会，作为实验政治經濟学的对象。他要我們假想有一块地方叫作奥尔脫(Ort)，有903个居民，其中有三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家雇用300个工人。这块地方通过自己的三个部門的生产可以完全滿足自己的需要：第一个部門生产衣服，第二个部門生产食物、灯料、燃料和原料，第三个部門生产住宅、家具和工具。在每一个生产部門中，“資本和原料”都是由企业家供应的。这三部門都把年生产物的一半付給工人，作为工資，其余一半則留給企业家，作为“資本的利息和企业的利潤”。每个企业所生产的東西，正好足够滿足所有903个居民的一切需要。因此，奥尔脫这块地方具备了全体居民获得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每个居民因此活跃地、勤劳地进行工作。但是，好景不常，这种愉快与滿足，不到几天，变为悲惨和令人战栗的情况。在吉尔希曼的那块乐土上，发生了好象天塌般、出乎意料的事情：具有一切现代特点的工商业危机突然爆发了。尽管只是对900个工人所必需的衣服、食物和房屋生产出来，但这三个企业家的倉庫中却充滿了衣服和原料，他們所建筑的房屋也空着沒有人住。他們埋怨銷路的缺乏，而工人們則埋怨他們的需要不能完全得到滿足。这是什么毛病呢？是不是象薩伊和里嘉图所設想的，某种生产品过多，而另

外一些生产品过少？吉尔希曼回答道：不是。在奥尔脱那块土地上，每样东西都有恰当的数量，刚好足够满足居民的全部需要。那么，障碍从那里来呢？为什么发生危机？障碍是由分配造成的。我们来听一听吉尔希曼自己的话：

“圆滑交换之所以不能发生，其障碍就仅仅在于这些生产物的分配上。这些生产物没有公平地在全体居民中进行分配，企业家为自己保留了生产物的半数作为利息和利润，而仅以另外半数给工人们。显然，衣服部门的工人只能以自己生产物的一半交换所生产出来的食物、房屋等等的一半，同时，也很显然，企业家不能卖掉其余一半，因为工人们已没有更多的生产物来进行交换。企业家对于他们的存货不知道怎么办，而工人们对于他们的饥饿与衣不蔽体，也不知道怎么办”。

顺便加一句，对于吉尔希曼的推论，读者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所举的例子是这样的幼稚，以致我们每进一步只有陷入更深的迷津。

首先，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也看不出什么用意，象吉尔希曼那样把生产割裂为三个部分。如果里嘉图和麦克洛克所用的类似的例子通常以租地农业家和工业家相对照，那大概是受了陈旧的重农学派的社会再生产概念的影响所致，这种概念里嘉图曾加以采用，尽管他自己的价值论（与重农学派的价值论对立的）使这个概念丧失了一切意义，也尽管亚当·斯密在考察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现实物质基础时，已完成了良好的开端。总之，在马克思对社会生产部类采用了划时代的区分法——即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部类——之前，我们看到在经济理论中依然保持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的区分法，作为再生产的基础。但是，吉尔希曼的三部门区分法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把工具、家具、原料和食物混合起来，而把衣服另成为一个部门，这种极端武断的区分法显然不出之于对再生产的物质方面的考虑。我们也可以假定把食物、衣服和房屋列为一个部门，把药品又列为另一个部门，而第三部门则为牙刷。无疑

地,吉尔希曼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劳动分工,所以,他假定在交换行为中,尽可能有相等数量的生产物。但是,作为争论中心的交换问题在吉尔希曼的例子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在那里所进行分配的,不是价值,而是生产物的数量,是当作使用价值的数量。在吉尔希曼所幻想的奥尔脱,生产物是首先进行了分配,其后,当分配完成后,才发生普遍的交换,而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交换带动了生产物的分配,并成为分配的媒介物。此外,在吉尔希曼的分配体系中出现了最奇怪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生产物的价格,社会总生产物的价格,是由 $v + m$, 即工资和资本利息所组成,因此,总生产物必须全部分配给工人和企业家;但不幸的是,吉尔希曼模糊地记起了这一个事实,即生产还需要象原料和工具之类的东西。因此,在他的奥尔脱那块土地上,偷偷摸摸地在食物中塞进了原料,在家具中塞进了工具。于是问题发生了:在一般的分配过程中,那些不能消化的东西归给谁呢?作为工资归给工人呢?还是作为企业利润归给资本家?恐怕这两者都未必欢迎这些东西吧!就在这些脆弱的前提上,出现了一个作为余兴的节目:工人和企业家间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基本交换行为,即工人和资本家间的交换,被吉尔希曼从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转化为生产物的交换。成为全部机构中心的,不是最初的行为,即以活劳动交换可变资本,而是第二个行为,即从可变资本所取得的工资的实现,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商品交换归结为劳动工资的实现问题。而最妙的就在于这个工人和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一切经济生活的中心,如果更仔细地辨别一下,就化为乌有——它根本没有发生。因为当所有工人领到了相当于他们生产物的半数的实物工资后,交换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每个工人只保留他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或则包括衣服,或则包括食物,或则包括家具,视他们的情形而定,而把其余部分的工资实现为等量的其他两类的生产物。企业家不再参加进来,他们拿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即社会所生产的衣服,家具和食物的半数,而无所措手足,他们对于这些东西,不知

道该怎么办。在这个吉尔希曼所创造的灾难中，即使在生产物中实行最慷慨的分配也无济于事。相反地，工人们被分配的生产物数量愈大，他们对企业家的交换关系就愈少，换言之，工人们互相间的交换则将增加。企业家手中的剩余生产物确是缩小了，但这不是由于剩余生产物的交换得到了方便，而是由于剩余价值根本减少了。现在象从前一样，工人和企业家间交换社会生产物仍旧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短短的篇幅中塞进了这些幼稚的、荒唐的经济学，这已超过了一个普鲁士检察官所准许的限度——大家知道吉尔希曼是一个检察官，虽然他具有受过两次纪律性申斥的光荣记录。尽管如此，在这些没有什么用处的初步讨论后，吉尔希曼深入到问题的根源。他承认他把剩余生产物假定为具体的使用形态，这是剩余价值之所以不能有用地得到使用的原因。作为补救办法，他现在让企业家把作为剩余价值而占有的社会劳动的半数用来生产奢侈品，而不是生产普通商品。由于“奢侈品的本质是使消费者有可能比在使用普通商品场合下耗用较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三个企业家就可以把社会所完成的劳动量的半数，在花边、时髦马车等的形态下，由他们自己全部消费掉。这样就沒有卖不掉的东西，于是危机幸运地避免了；生产过剩从此永远不发生；资本家和工人都感到安全。造成这种好事，使生产和消费重新建立平衡的吉尔希曼的灵药是什么呢？是奢侈。换言之，对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这位可爱的夥伴所给的忠告，就是把它吃掉！事实上，奢侈是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并为大家所熟知的发明，然而危机依然频繁地发生。为什么这样呢？吉尔希曼告诉我们：“答案只能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停顿完全是由于奢侈品还是不够，换言之，资本家，即那些有能力消费的人，依然消费得太少”。

但是，资本家这种误入歧途的节欲是一种恶习惯的结果，这种恶习惯是由政治经济学家在错误影响下所鼓励起来的：那就是为了“生产性消费”而储蓄的愿望。换言之，危机是由积累所造

成的。这是吉尔希曼的基本命题。他又用了一个动人的简单例子来证明它。他说：“让我们假定一种被经济学家称誉为较为优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收入全部用在豪华和奢侈上，而用来重新投资到生产中去。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不外是：创办各种新的生产企业，由此出产新的一种商品，把这种商品出售后可以使三个企业家获得资本的利息（吉尔希曼意指利润），这个资本就是他们从未消费的收入储蓄起来而加以投放的。因此，这三个企业家决定只消费一百个工人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大大地削减了他们的奢侈性消费，而把剩下的350个工人的劳动力和所用的资本用来创办新的生产企业。现在发生的问题是这些资金应该用到那些种类的生产企业中去呢？”

既然，根据吉尔希曼的假定，不变资本没有再生产出来，而全部社会生产物只包括消费品，因此，“这三个企业家只能在制造普通商品的企业和制造奢侈品的企业中选择”。

这样，这三个企业家将遭遇到我们所熟知的进退两难的情况：如果他们生产“普通商品”，危机就会发生，因为工人缺乏购买这些追加的生活资料的手段，他们已经把他们生产物价值的一半用掉了。如果生产奢侈品，企业家就必须自己消费这些东西。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国外贸易也无法改变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因为国外贸易只能“增加在国内市场上商品的种类”或增加生产率而已。

“这些外国商品因此或则是普通商品，那么，资本家不要买，而工人又无力购买这些东西；或则是奢侈品，那么，工人更没有能力购买这些东西，而资本家又由于节约之故，也不要买这些东西”。

这个论述，不管如何幼稚，很清楚地表明吉尔希曼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经济理论中可怕之点：在只有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中，积累将成为不可能。所以，吉尔希曼坦率地仇视积累、“储蓄”、剩余价值的“生产性消费”，并强烈地攻击古典经济学所辩护的这些错误。他的主张是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增加奢侈，作为预防危机的办法。由此可见，吉尔希曼，如果说在他的理论假设中奇形怪状

地模仿了里嘉图和薩伊，在他的最后結論中，是一幅西斯蒙第的漫画。但是，为了要領会洛貝尔图的批評的精义和整个爭論的結果，就有必要十分清楚地把握吉尔希曼处理这个问题的观点。

第十六章 洛貝尔图对古典学派的批判

洛貝尔图比吉尔希曼研究得較為深入。他从社会組織的基础上寻求禍患的根源。他对于风靡一时的自由貿易派給以猛烈的抨击，但对于无限制的商品流通体系或貿易的自由无阻，他完全接受下来，并不加以反对，他所反对者，是孟徹斯特学派关于在經濟社会关系内部的自由放任学說。那时，正当古典学派动摇时期之后，毫不检点的辯护論調已盛行于世，其中最完整的表述是弗列得力·巴斯夏（所有市僧的偶像和最著名的庸俗家）的“和諧論”。不久，作为法国和諧論先知的仿制品，許多“叔尔泽”(Schultzes)在德国也家喻戶曉地传播开来了。洛貝尔图是以这些胆大妄为的“自由貿易的小販們”作为攻击的目标，他在“第一社会书簡”中說：

“六分之五的居民，由于他們低微的收入，享受不到文明的幸福，而經常处于真正灾难临头的威胁之下，并实际上时时被这些灾难所压倒。然而他們是所有社会財富的創造者。他們的劳动，从早到晚不停，甚至延长至深夜，但他們的干劲不能改变他們的命运。他們的收入不能提高，对自己精神休养所需的最后一刻時間也保留不住。过去，所有这些苦难可能被認為是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但现今在許多最巧妙的发现和发明把人类劳动力提高至百倍以后，突然出现了改变这些冷酷情况的前景了。結果是一国的財富和資產較速于人口的增长而累进地增加。我要問：从这个增长中，新旧財富的創造者也要分潤一些利益，这是不是自然的、或合理的要求？他們的收入应否增加一些，他們的劳动時間应否縮短一些，或者，他們应否更多地参加到幸运者的队伍中去，享受劳动

的成果？然而国家經濟，或更确当地說，国民經濟只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国民財富增加，一方面这些階級的貧困也增加，甚至有必要通过法令来防止劳动時間的延长。最后，工人階級的人数还是以比其他阶层較大的速度增加。这还不够，劳动生产率的百倍的增長，对于減輕六分之五的居民的負擔，无能为力，甚至还周期地威胁着其余六分之一的居民，威胁着社会全体”。

“特別在經濟領域內存在着何等的矛盾！在一般的社会領域內存在着何等的矛盾！社会的財富是在增長，但隨之而來的，是貧困的增長。生产資料的創造能力增加了，但結果是把生产資料銷燬掉。社会条件要求工人階級的物質地位和政治地位，同样提高，而經濟条件的答复却是使它們每况愈下。社会要使財富无限制地增長，而当今的生产管理者們却必須制造人为的限制，以阻止貧困。只有在一点上存在着和諧：那就是正如社会情况的不合理一样，社会的統治阶层也是不合理的，他們傾向于从任何方面找寻禍患的根源，就是不想从正确之处找寻它。那些披上学者外衣的利己主义者还誣蔑工人們，說工人們的坏習慣是貧困的原因。他們把外来因素对工人們所犯的罪惡，归咎于所謂工人們的不知足和懶惰。当这种利己主义无法否認工人們的无辜不幸时，他們就闡述了一条“貧困的必要性”教条。他們不断地教訓工人們，要勤勞，要祈祷上帝，并以节慾和節約的义务强加在工人們的身上；甚至还用强制儲蓄制度来侵犯工人們的权利，从而增加工人們的痛苦。他們沒有看見有一种盲目的商业力量把工作的祈祷变为强制失业的咀咒……节慾是不可能的或是残酷的，最后，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誠如一个詩人說的，它是为那些秘密地飲酒但却公开地贊扬白水的人們所称道的”。①

在西斯蒙第和欧文的三十年后，在英国社会主义者非难里嘉图的信徒們的二十年后，更加重要的，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

① 卡尔·洛貝尔图—雅格卓夫博士 (Dr Carl Rodbertus Jagetzow)：“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三卷，第172—174頁，184頁。

上述的勇敢言論本身不具有什么破天荒的重大意义。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这个控訴的理論根据。这里，洛貝尔图建議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簡述如下：

由于許多規律在一个放任自流的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历史所能达到的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人为法律的制度，即私有財產制，許多不合理的和不道德的现象发生了：

(一) 交換价值代替了“正常的”、“构成的”价值，結果，金屬貨幣代替了一种确实符合貨幣观念的“紙币”或“劳动券”。第一个原則是一切經濟財貨都是劳动的生产物，或換一句話說，只有劳动才是生产的。但上述的命題并不意味着，生产物的价值总是等于劳动的成本，或者換一句話說，并不意味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真相是“这还没有成为事实，而只是政治經濟学上的一个观念”。^①

“如果价值是由生产物上所耗費的劳动构成的，我們就可以設想一种貨幣，这种貨幣可以是公众賬簿上撕下的一頁，也可以是在廉价材料或襪布条写的收据，而每个人从自己所产生的价值領到这种貨幣，他把它当作一种票据，用来实现以后分配的国民生产物的一个同等量的部分……可是，由于某些原因，还不可能建立这种价值，那么，貨幣就能作为等价物，作为抵押或担保品，随身周轉，保留那个价值，即貨幣本身被用来清算的价值。換言之，貨幣本身必須用具有內在价值的商品如金或銀来做成。^②当資本主义商品生产出现时，一切事情都顛倒过来了。已不再有构成的价值，因为只能有交換价值。”^③“既然价值不能构成，貨幣也就不能是純粹的貨幣，它不能完全符合貨幣的观念”。^④在公平的交換中，生产物的交換价值应等于生产这些生产物所需的劳动

① 洛貝尔图：“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二卷，第104—105頁。

② 同上書，第一卷，第99頁。

③ 同上書，第173頁。

④ 同上書，第176頁。

量，因此，生产物的交换总是意味着等量劳动的交换。然而，每个人是以生产正好他人所需的使用价值为前提，“在这种场合下，人类的認識和人类的意志必須加以考虑，因此，先决問題是包含在可交换的生产物中的劳动量的正确計算、調整和分派。因此，必須有一个为所有事实所遵从的规律”^①。

如所周知，洛貝尔图，在发现“构成价值”上，特別強調他比蒲魯东占先一步。这一点我們是乐于同意他的。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貧困”中以及恩格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曾毫无遺漏地指出：这个“观念”^② 仅仅是一个錯觉，尽管在理論上还用它，但在实践上，远在洛貝尔图之前，它早已在英国被埋葬了；它不过是里嘉图的价值論的空想化的歪曲。因此，这里如果再探究这个“用小儿的喇叭玩具所奏出的未来音乐”，那就成为画蛇添足了。

(二) “交换經濟”的結果，使劳动淪为一种商品；劳动工資是作为一个生产費項目，而不是作为国民生产物的固定份額的代表，而被决定的。洛貝尔图大胆地跳越历史，間接地从奴隶制得出他的工資规律。他認為資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帶給剝削制的特点只不过是欺騙的謊言，他从道德观点对此怒加斥責。

“当生产者自己成为非生产者的財產时，当奴隶制还存在时，“主人”的利益要求单方面决定这个份額(工人的)的大小。自从生产者得到完全的人身自由，此外一无所有时，双方事先在工資上取得協議。用现代名称說，工資是“自由契約”的对象，也就是，竞争的对象。所以，劳动当然也和它的生产物一样，受同一的交换规律所支配。劳动本身取得交换价值，工資的高下依存于供給和需求的影响”。

洛貝尔图这样把每一件事情顛倒过来，从竞争中得出劳动的交换价值后，他就立即从它的交换价值得出它的价值。他說：

“在交换价值的规律下，劳动，象生产品一样，获得了一种‘費

① 洛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65頁。

② 指“构成价值”——譯者。

用价值’，这种‘費用价值’对劳动的交换价值，劳动工資的数量，发生磁性般的作用。正是那笔为‘維持’劳动所必需的支付額，使得劳动有可能通过子孙传代而繼續存在——这就是所謂‘生存的最低額’”。

然而对于洛貝尔图，这不是客观經濟规律的述說，而仅仅是道德非难的对象。他把古典学派的“劳动的价值不会超过工資”的命題叫做一个“譏諷性的說法”。他决心要揭露导致这个粗糙和不道德結論的一連串的謊言。

“象計算机器的修理費一样，按照‘維持費’来估計劳动的工資，是一个可耻的景象。作为一切商品的源泉的劳动既然自己已变为一种交换商品，令人同样感到可耻的，是提到劳动的‘自然价格’，劳动的‘費用’，正象我們提到劳动生产物的自然价格和費用一样，并把这个自然价格，这些費用，包括在貨物量里面，而这个貨物量正是使劳动連續流入市场所必需的”。^①

然而，这种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特性以及相应的决定劳动力价值的方法，不外是对自由貿易学派的恶意曲解而已。洛貝尔图，不象英国里嘉图的信徒們那样，指出資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內在矛盾，确定劳动的价值和确定劳动所創造的价值之間的矛盾；相反地，作为一个优秀的普魯士人，他認為整个資本主义商品生产触犯着现存的宪法，从而加以控訴。他說：

“那些經濟学者的二重概念是愚蠢得难以言語形容。他們一方面在法律地位上，要工人們参加决定社会的命运，另一方面，在經濟观点上，又把这些同样的工人們仅仅当作商品看待！”^②

现在要探究的，是为什么工人們能忍受这样愚蠢而无耻的不公平待遇。这是例如黑尔曼(Hermann)之流对里嘉图的价值論所提出的反对論点。洛貝尔图的回答是这样：

“工人們在解放以后，如不順从这些規章，又将怎么办呢？”

① 洛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182—184頁。

② 同上。

試設想他們的地位：當工人們獲得自由時，他們衣不蔽體，或衣衫襤褸，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隨着奴隸制或農奴制廢除後，主人贍養他們、照顧他們的需要的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義務也被解除了。但這些需要繼續存在，工人們要求活下去。那麼，他們如何以自己的勞動力維持生計呢？他們能否從社會中攫取一些資本作為糊口之計？可是，社會上的資本已落入他人之手，而法律機關也不允許這樣做。那麼，工人們能做些什麼呢？他們只有下列的選擇余地：或者推翻社會的法律，或者在與從前大致相同的條件下，回到他們從前的主人、地主和資本家那里，領取工資，即相當於從前布施給他們維持生活的收入”。^①

對於人類和普魯士國家而言，可認為幸運的，是工人們有足夠的“明智”，他們沒有推翻文明，而寧願順從他們從前主人的卑鄙的要求。如果我們相信洛貝爾圖的高度創造性的說明的話——就是那個洛貝爾圖，他的理論據說曾被馬克思剽竊——這就是資本主義工資制度的起源，工資規律的起源，是“一種奴隸制”，由資本家的權力濫用和無產階級朝不保夕的地位以及馴良順服所造成的。讓洛貝爾圖要求享受在這個特殊價值論上的優先權，而不必與之爭辯吧，因為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社會批評家早就分析過工資制度，但不如他那樣粗糙和幼稚罷了。關於所有這一切的特点是：洛貝爾圖對工資制度的起源和經濟規律所表示的憤慨沒有促使他要求取消這個可憎的不公平制度，這“愚蠢得難以言語形容的二重性”。遠非如此！他常常安慰他的同胞說，他之大聲疾呼並不是當真的，他不是一頭兇惡的獅子，他不過是一個喜歡湊熱鬧的人罷了。的確，工資規律的倫理理論只是在得出下列另一結論時才有必要：

（三）既然“交換價值規律”決定工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然促使工人在生產物中的份額下降。於是，我們就到达了洛貝爾圖

^① 洛貝爾圖：“著作集”，第72頁。

体系的重心点。这个“工资份额下降”说是他最重要的“创造性”发现，从他关于社会问题的最初著作（大概在1839年）起，一直到死，他反复提到它，并认为完全是他的独创。其实，这个概念，不过是从里嘉图的价值论中简单引导出来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前，支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资基金说就暗含这个概念。然而洛贝尔图相信，这个“发现”使他成为经济学中的伽里略，他引用他的“工资份额下降”说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切罪恶和矛盾，特别是他从工资份额下降中得出赤贫化的现象，这个现象，连同危机，在他看来，组成了社会问题。这里可以提请现代欲得马克思而甘心的人们注意下列事实：建立关于贫困递增的极端粗糙的理论的，是洛贝尔图，而不是马克思；而且洛贝尔图与马克思不同，他把这个理论作为整个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不仅仅当作一个症状。举例而言，试比较洛贝尔图在他给吉尔希曼的“第一社会书简”中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所提出的论点。此外，工资份额下降说还必须用来说明社会问题的其他基本现象——危机。在这一方面，洛贝尔图抓住了消费与生产的平衡问题，他也触及到西斯蒙第和里嘉图两派所曾经争论的全部错综复杂的争执各点。

当然，洛贝尔图所掌握的危机知识，较之西斯蒙第所掌握的，是以更多的具体材料为根据的。在他的“第一社会书简”中，他已经详尽地描述1818—19年，1825，1837—39年以及1847年所发生的四次危机。由于长时期的观察，洛贝尔图对危机的基本特点可能获得较他的前辈更深刻的认识。早在1850年，他就说明了危机的周期性，危机与危机之间相隔的时间愈来愈缩短，同时，危机也越来越剧烈：

“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些危机，比例于财富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可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牺牲者。1818—19年的危机已经引起了商业上的恐慌和造成了经济科学上的疑惧，但比之于1825—26年的危机，则显得不甚重要。1825—26年的危机给予英国资本财产这样沉重的打击，以致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们都怀疑完全恢复

是否有可能，可是，1836—37年的危机又掩盖了上次的危机，而1839—40年和1846—47年的危机，比以前历次危机，带来了更大的灾祸。“然而，根据最近的经验，危机在愈来愈缩短的间隔期内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之间，相隔了十八年，在第二次和第四次危机之间，相隔了十四年，而在第三次和第五次危机之间，只相隔了十二年。日益增加的各种症状表明新的危机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尽管1848年的事件延缓了这个大灾难”。^①

洛贝尔图指出生产的特别繁荣和工业技术的大跃进是危机的前驱。“每一个危机随着工业突出的繁荣期之后而发生”。^②

从危机的史实中，洛贝尔图证实“危机只是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之后才出现的”。^③他反对那种他叫作庸俗的看法，那就是：把危机仅仅当作货币和信用体系中的扰乱的看法。他批评庇尔(Peel)的整个通货立法，认为是判断错误，并在他的“商业危机和抵押问题”论文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论点。在那篇论文中，他提出下列的意见：“因此，如果把商业危机仅仅看作货币、银行或信用体系的危机，这只是欺骗了我们自己。那些不过是危机最初出现时的外表现象”。^④

洛贝尔图对于对外贸易在危机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也有非常敏锐的认识。象西斯蒙第一样，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的必要性，但他同时着重强调周期性危机的规模也越来越扩大。他说：

“对外贸易之与商业衰落的关系，正如慈善事业之与贫困的关系一样。他们结局是起相互促进的作用”。^⑤他还说：“避免危机发生的唯一可能方法是使用扩张国外市场的这把两面刀。对这种扩张的强烈冲动多半是与患病的器官所激起的一种病态的刺激一样的。既然在国内市场上的一个要素，生产率，是在不断增长，

①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10—111页。

② 同上书，第108页。

③ 同上书，第一卷，第62页。

④ 同上书，第四卷，第226页。

⑤ 同上书，“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第二卷，第一号。

而另一要素，购买力，对于居民的絕大多数來說，却停滞不变，那么，商业就不得不力求在国外市场上創造出同样的无限制的购买力。^① 这样，这种刺激在某种程度上被鎮定下来了，至少使新的灾难不馬上发生。每开辟一个国外市场同样地延緩了社会問題。未开化的国家的殖民地化产生同样的作用：欧洲在从来没有市场的地方，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市场。然而，这种葯剂根本上只不过緩和疾病而已。等到新的市场充分供应了，問題回复到原来的地位：即两个要素——有限的购买力对无限的生产率——之間的冲突。于是，新的危机侵襲，虽然在較小市场上避免了，但在較大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剧烈的变动出现了。地球是有限的，从而新市场的获得总有一天会終止，那时，就到达了問題再也不能简单地延緩下去的一天。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迟早必須找出来”。^②

① 洛貝尔图：“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問題”，（洛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186頁）。

② 同上書，第四卷，第233頁。关于这一方面，洛貝尔图在实践上如何表現为一个，按照当今“大日耳曼人”的样子，极其清醒的和现实的德国殖民政策的預言家，尽管对工人阶级的不幸情况，他曾在道德上大声疾呼。这种态度，在我們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在上面引文的附注中，他写道：“我們繼續简单地看一下开辟亚洲，特别是世界最富饒的市場，中国和日本，以及維持英国在印度的統治的重要性。这可以延緩社会問題的解决”。（这个能言善辯的被剝削者的复仇人坦率地揭露了孜孜为利的剝削者如何能够使“他們的愚蠢的和犯罪的过失”，他們的“罪恶昭彰的不公正行为”一直尽可能地繼續下去）。“对于解决这个問題，現代世界缺乏智慧，也缺乏无私精神和道义的决心”。（洛貝尔图的哲学上的听其自然的态度是无可匹敌的！）“經濟上的利益，我們承認，不能成为武力干涉的合法根据，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問其文明情况何如，严格应用近代自然法和国际法，到底是行不通的”（这里不能不想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多利兰的話：“上天的确維護某些滿足，但其中还要將就一些”）。——“我們的国际法是基督教倫理的文化产物，既然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相互原則上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同一文化的各国之間的关系的标准。如果超越这种界限而应用它，那是情感而不是自然法和国际法，而印度的暴行應該已經治好我們这一点了。基督教的欧洲應該具有希腊人和羅馬人的精神，把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看作野蛮人。于是，年輕的欧洲民族将重新燃烧起創造世界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曾經促使古代人民把他們本土的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国去。这些年輕的欧洲民族可能以共同行动在世界史上再度征服亚洲。这种共同行动和共同目标将促进最大的社会进步，形成欧洲和平的穩固基础，縮減軍隊，对亚洲进行古羅馬式的殖民地化——总之，促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益的团結一致”資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幻想鼓动着这个被压迫，被剝削者的預言家儿

洛貝爾圖也認識到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無政府狀態是導向危機的，但他認為這只是許多因素中的一個，並且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危機的源泉，而不是一般危機的真正原因。對於吉爾希曼的奧爾脫那塊地方所發生的危機，他說：“我認為這種銷路下降在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的。今天的市場是廣大的，有無量數的需要和許許多多的生產部門，生產率是高的，而商情是隱蔽的而容易使人誤入歧途。個人企業家不知道其他企業家生產多少，所以，他對某一商品的需求估計過高，因而使市場供應過多，這樣事情是容易發生的”。

洛貝爾圖坦率地承認唯一解救危機的辦法是“完全改變”現代所有制關係，實行計劃經濟，把所有生產資料集中“在唯一的社會行政機構的手中”。為了安定讀者的緊張情緒起見，他急忙補充說，象這樣的情況實際上是否可能，他保留他的結論——“然而，這也許是防止這類下降的唯一可能辦法”。這樣，他明白地認為近代生產方式的無政府狀態只是導向危機的一種特殊的和部分的表現罷了。

洛貝爾圖輕蔑地拒絕了薩伊——里嘉圖的消費和生產自然平衡的公理。象西斯蒙第一樣，他強調一切事情都以社會購買力為

乎進入詩意中了，而更令人驚異的，這是出現於正当基督倫理的文化完成這樣的光榮功績，如對中國的鴉片戰爭，和印度暴行——也就是說，英國人在他們血腥鎮壓印度叛亂中所犯的暴行——的時候。——在1850年，洛貝爾圖在他的“第二社會書簡”中，表示他確信如果一個社會缺乏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改變財富分配，所必需的“道義決心”，歷史將被迫用“革命的鞭子來反對它”（同上書，第二卷，第83頁）。然而八年以後，這個忠誠的普魯士人卻寧願揮動基督倫理的殖民政權鞭子來壓迫殖民地國家的土著居民。當然，從這個“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真正創始人”那里，看到他還是一個軍國主義的熱心擁護者，這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而他的“縮減軍隊”的論調不過是在他的天花亂墜的語句中的詩人式的放縱不羈罷了。在他的“社會問題解說”一文中，他解釋道：“整個國家租稅負擔永遠向底層轉移，有時形成工資貨物價格的騰貴，有時形成貨幣工資的降低”。這裡，對兵役制他是從國家的負擔方面來考察的，他認為“對於工人階級而言，它與租稅不同，它相當於沒收他們全部收入若干年”。他又馬上接着說：“為避免誤解起見，我要指出我是我們現行軍事制度（就是反革命的普魯士的軍事制度）的堅決擁護者，儘管它可能是壓迫工人階級的，並要求有產階級作出巨大的財政犧牲”。（同上書，第三卷，第34頁）這更不象一頭獅子的吼聲了！

轉移，而社會購買力是取決於收入的分配。儘管如此，他不贊成西斯蒙第的危機理論，並強烈地不同意他的結論。如果說西斯蒙第認為一切禍害的根源是生產不顧及收入的限度而無限制地擴張，從而他主張限制生產，那麼，洛貝爾圖正相反，他擁護生產、財富和生產力的最猛烈的和無限制的擴張，他相信這是社會所必要的。誰要是拒絕社會的財富，誰就同時拒絕了它的權力、它的進步並與進步相伴隨的它的道德。誰要是妨礙財富的增長，那就等於妨礙了社會全盤的進步。知識、決心、能力的增長被認為與財富的增長相結合的。^① 從這個觀點上出發，洛貝爾圖竭力擁護證券發行所制度，他認為這種制度是迅速和無限制擴大公司的發起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他在1859年所寫的關於抵押問題的論文和他的關於普魯士金融危機的專論都致力於這個主張。他甚至對西斯蒙第式的警告進行攻擊，但在攻擊時仍然首先以他常用的空想的倫理學來討論問題。

他說：“企業家基本上是國民經濟中的文職官員。由於所有制制度的結果，全國的生產資料永遠地委託給他們了。如果他們運用這些生產資料，並在這過程中竭盡了他們的全力，他們只是盡了他們的責任，因為資本——讓我反復地說——完全是為了生產的緣故而存在的”。接下去，他更具體地說：“或者，你們是否希望企業家從最初起並經常地以比其實際所獲得的生產資料較少的生產力來進行活動，這樣把劇烈的痛苦打擊變為一種長期的狀態；他們是否要以在期限上的永久持續作為取得在形式上較不嚴重的災禍的代價？即使我們這樣的愚蠢，以致給他們這個勸告，他們也不會接受的。世界上的企業家如何會看得到規定健康市場範圍的那些界限？他們從事於生產而不知有其他，他們在地球遙遠的角落里，為數百哩外的市場而生產，他們用巨大的力量來進行生產，結果，一個月的生產也許已經超越了市場的界限。這樣分散的，然而又

^① 洛貝爾圖：“著作集”，第三卷，第182頁。

是这样强大的生产如何能够预先估计到什么是适当的数量？在这件工作上帮助他们的机构，最新的统计局，等等又在那里呢？更坏的是：单靠价格及其涨落，只表明市场的情况；但价格不是象一个预告市场温度的晴雨表一样，而是象一个纪录市场温度的寒暑表。如果价格下落，界限已经超越，而灾祸也已经降临了”。^①

显然，洛贝尔图的这些议论是对西斯蒙第而发，这些议论也说明了这两人中间的基本分歧之处。如果恩格斯当时在“反杜林论”中说，西斯蒙第首先把危机解释为消费不足所造成，而洛贝尔图借用了西斯蒙第的见解，严格说来，这是不正确的。洛贝尔图和西斯蒙第的共同之点是他们都反对古典学派，以及一般地都以收入分配的结果来解释危机。就是在这一点上，洛贝尔图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生产过剩不是由工人阶级收入水平的低下所造成，也不是象西斯蒙第所主张的那样，由于资本家消费的有限能力，而完全是由于这个事实：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价值计算的工人收入在生产物中的份额将愈来愈缩小。洛贝尔图煞费苦心地图使反对者相信，造成危机的，不是工人份额的绝对量太小。

他对吉尔希曼阐述说：“试设想这些份额微小到仅足以维持获得这些份额的人的最低生活。如果你规定这些份额代表国民生产物中的一个比例，那么，你就有一个不变的“价值容器”，它能够吸收不断增长的容量，从而形成工人阶级幸福的不断提高。……反之，尽管把工人阶级的份额设想得如何巨大，但假定它在国民生产物中的比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越来越缩小。这样，只要它不缩小到象今天的那样菲薄，那么，这个份额仍然将保护工人们不陷入过分的贫困境地，因为它所代表的数量仍然比今天的数量要大得多。但当这个份额开始下降，就会散播不满，逐渐形成一个商业危机，关于这个危机，我们不能责备资本家，因为当他们根据这些份额的大小，规定生产的规模时，他们不过尽他们的责任

^①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四卷，第231页。

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工資份額下降”是危机的真正原因。而唯一有效的克服办法，就是使国民生产物中的工人份額保持一定不变的比例，并用立法手續把它固定下来。如果我們要对这个奇特的想法所包含的經濟意义加以适当的評价，我必須花些工夫好好地理解它。

第十七章 洛貝尔图对再生产的分析

首先，工人份額的减少必定立刻引起生产过剩和商业危机，这意味着什么呢？洛貝尔图的这个见解，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有意义：国民生产物是由两部分——工人的份額和資本家的份額——組成的，也就是 $v + m$ ，其中一个部分与另一部分相交换。这看来就是他在一些场合下所說的，例如他在“第一社会书簡”中，就說：

“工人階級的貧困使他們的收入不能为增加生产提供场所。在企业看来，增多的生产物数量降低了总生产物的价值，以致妨碍生产按以前规模进行，从而使工人們最好也不过停留在他們所习惯的窘迫境地，尽管如果所增加的生产物可供工人购用，这也不能改善他們的命运，仅仅通过增加資本家所保留部分的价值而起平衡力的作用”。^①

掌握在工人手里足以增加企业家“所保留部分”的“价值”的所謂“平衡力”，在这里只能是需求。我們又一次幸运地回到吉尔希曼的奥尔脫那块地方来了，在那里工人和資本家以他們的收入交换剩余生产物，而危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可变資本小而剩余价值大。这种奇特的想法上面已討論过了。但洛貝尔图在其他场合还提出一个有些不同的概念。在他的“第四社会书簡”中，他对他的理論作如下的解释：工人階級份額所体现的需求和資本家

^① 洛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76頁。

階級份額所造成的需求之間的关系的不断变化必然造成生产和消費間的长期的比例失調。

“如果企业家力图維持自己的份額在一定界限內不变，而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工人的份額經常地，在不知不觉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日漸下降，那怎么办呢？——如果工人階級的份額，反比例于他們的生產率的提高，而繼續下降，那又将怎么办呢？……資本家必然按照現行份額的大小組織生產，以便使財富能滿足普遍的需要，但他們的生產却总是超越这个規模（即以前份額的規模），从而引起經常的不滿意，終至形成商業的停滯，这是不是实际事实呢？”^①

由此觀之，危机的解釋大致如下：國民生產物包括工人用的許多“普通商品”（象吉尔希曼所說的）和資本家用的“高級商品”。工資代表前者的數量。而总剩余价值代表后者的數量。如果資本家按照这个基础組織生產，同时，如果生產率不斷提高，那么，比例失調現象将立刻發生了。因为今天工人的份額不再是昨天的份額，而是較小了。如果“普通商品”的需求曾經占昨天國民生產物的七分之六，那么，它今天只占七分之五，而企业家却提供了七分之六的“普通商品”，他們因之将突然痛苦地發現他們多生產了七分之一。現在，通过这个經驗他們变得聰明些了，他們試圖組織明天的普通商品生產，只达到國民生產物总价值的七分之五，但他又遇到新的失望，因为到了明天，國民生產物中工資所占的份額必然只达七分之四了，依此类推。

在这个巧妙的理論中，有几点使我們奇怪。如果我們的商業危机完全是由于工人們的“工資份額”，即可變資本，构成國民生產物的总价值中一个經常下降的部分所引起来的，那么，这个不幸的規律本身带来了对它所造成的灾禍的解救对策，因为在总生產物中发生生產过剩的那部分必定越来越小。虽然洛貝尔图喜欢用

^① 洛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53—57頁

消費者的“最大多数”，或消費者的“广大群众”等字眼，但重要的不是組成需求的人数，而是这些人數所代表的價值。而這個價值，如果相信洛貝爾圖的話，形成總生產物中越來越小的一部分。這樣，危機被放在越來越窄小的經濟根基上了，於是我們仍然要解釋這個事實：就是儘管如此，為什麼後來所發生的，正象洛貝爾圖所充分了解的，還是普遍的危機，而且還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所失去的購買力即為資本家階級所獲得；如果 v 減少， m 必定增加以資抵償。在這個粗略的表式中，社會整個購買力不能有所變動，正象洛貝爾圖說的：“我很清楚地知道，從工人的分額中所取去的部分最後將擴大食利者（地租和剩餘價值作同義詞用——著者）的分額，因此整個購買力從長期看是不變的。但從市場上的生產物來看，危機總是在這個增加發生影響之前就出現了”。^①

總之，問題至多只是：“普通商品”過多而供資本家用的“高級商品”過少。洛貝爾圖這裡不知不覺地、迂迴曲折地、陷入他所激烈反對的薩伊——里嘉圖理論中去了，這個理論就是說一方面的生產過剩總是與另一方面的生產不足相適應。既然這兩個分額的比率經常地向有利於資本家方面變動，我們可以期望商業危機一般說來將愈來愈帶有周期性生產不足，而不是生產過剩的性質了！這種邏輯的練習不必再做下去了。所有這一切歸結為這一事實：洛貝爾圖認為國民生產物在價值上只是由兩部分組成， m 和 v ，因此，他完全繼承了他所激烈反對的古典學派的見解和傳統，甚至，他還加上自己的花樣說，資本家消費全部剩餘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他坦率地反復作如下的說明（下面是以“第四社會書簡”中的話為例）：

“因此，為了要找出區分一般租息（剩餘價值）的基本原則，找出區分勞動生產物為工資和租息的原則，我們必須從把一般租息區分為真正地租和資本地租的理由中抽象出來”。^② 又在“第三書

① 洛貝爾圖：“著作集”，第一卷，第206頁。

② 同上書，第一卷，第19頁。

簡”中說：“我反復說過，地租、資本利潤和勞動的工資是收入。地主、資本家和工人就靠這個收入生活，也就是說，滿足他們直接的人生需要。因此，他們所支取的收入必須是適合這個目的的實物形態。”^①

對資本主義的曲解再沒有做得比這個更粗魯的了。洛貝爾圖無疑地有充分根據要求獲得“優先”的榮譽——這個“優先”不完全是對馬克思，而更多地是對所有庸俗經濟學者而言。為了要使讀者對這個混亂不發生一點疑問，他在同一信中，把資本主義剩餘價值列入與古代奴隸主的收入在同一水平上的經濟範疇：

“第一種的狀態（奴隸制度）是與最原始的自然經濟相伴而行的：從工人或奴隸的收入中剝奪來的、並形成主人或所有者的財產的、那部分的勞動生產物將全部歸屬於占有土地、資本、工人和勞動生產物的所有者的手中；地租和資本利潤間在概念上的區別也都沒有。第二種狀態包括最複雜的貨幣經濟：從現今自由工人的收入中剝奪來的，並歸屬於土地和資本的所有者手中的那部分勞動生產物將再在原料所有者和製造品所有者之間進行分割；前一狀態的單一地租將分裂為地租和資本利潤，並將加以級差的區別”。^②

洛貝爾圖把分割從工人收入中剝削來的剩餘價值看作奴隸剝削和近代資本主義剝削之間的最突出的不同之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不是新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和資本間進行分割的特殊歷史形態，而是剩餘價值在不同的受益人之間的分配，儘管這與生產過程沒有關係。在其他方面，資本主義剩餘價值依然是與奴隸主的單一地租完全一樣：那就是，一筆剝削者個人的消費基金！

然而洛貝爾圖在其他地方，又陷入矛盾。他突然想到了不變資本以及不變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更新的必要。這樣，他不把

^① 洛貝爾圖：“著作集”，第二卷，第110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144頁。

总生产物区分为 v 和 m ，而采用了三分法，即 c , v , 和 m ，在他的“第三社会书简”中，他对奴隶经济的再生产形式论述如下：

“既然主人注意到把奴隶劳动的一部分用来维护或甚至改良耕地、畜群以及农业和制造业的工具，那就是，用现代术语来说，有了“资本的补偿”，其中国民经济生产物的一部分是直接用来维持地产，而不通过交换或甚至交换价值的媒介”。^① 转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话题上时，洛贝尔图接着说：“现在，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以价值计，用来维持地产，作为资本补偿之用；另一部分作为工资，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而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物的所有者保留最后一部分作为收入或地租”。^②

这个就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分法的明白表述。在他的“第三书简”中，他以同样确切辞句表述他的“新”理论的特点：“这样，根据这个理论，在适当的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生产物中，除去补偿资本后留下的作为工资的部分，将作为工资和地租，在土地和资本的所有制的基础上，在工人和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③

现在好象洛贝尔图对总生产物价值的分析显著地超越了古典学派。再接下去，亚当·斯密的教条竟然也被批判了。因此，令人奇怪的：洛贝尔图的饱学的崇拜者，如瓦格纳、梯泽尔、梯尔这一批人，对于在经济理论中这样重要的论点，没有替他们所钟爱的孩子^④ 争夺压倒马克思的“优先权”。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正如在一般价值论上，洛贝尔图的“优先权”是大可怀疑的。如果他有时看起来好象有了正确的领会，但这不久就表明是一个误解，或至少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他之不能解决国民生产物的三分法，可以从他对亚当·斯密教条的批判中得到很好的例证。对于这个三分法，他只是在暗中摸索。他说：

①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146页。

② 同上书，第155页。

③ 同上书，第223页。

④ 指洛贝尔图——译者。

“大家知道，自从斯密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把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劳动工资、地租和资本利润；从而各阶级的收入，特别是各种项目的地租，被当作生产物的一部分，这不是新的见解。但经济学家马上又误入了歧途。他们——里嘉图学派也不例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不承认总生产物、即制成品，也就是国民生产物全部，是工人、地主和资本家共同参与的统一体，而把未制成品的分割当作三种合夥人的分摊问题，制成品的分割则当作另外一种由两种合夥人分摊的问题。从这种理论看，未制成品和制成品构成不同的收入项目。第二个错误（尽管西斯蒙第和里嘉图没有犯这个错误）是他们把劳动没有物质资助，也就是，没有土地，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自然现象当作经济事实，并把劳动分工需要资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资本）的社会事实当作一个基本的论据。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虚构的基本经济关系，根据这个经济关系，并考虑到社会上有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三种不同所有者，他们得出不同所有者的份额如下：地租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用在生产上而产生的，资本利润是从资本家使用资本在同样目的上而产生的，最后工资是从劳动的贡献中产生的。萨伊学派巧妙地阐述这个错误论点时，甚至捏造出与各种所有者在生产物中的份额相适应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职务的概念，并把这些份额解释为这种生产职务的结果。第三个错误是：一方面从生产物的价值中得出劳动工资和各种地租，而另一方面又从劳动工资和各种地租中得出生产物的价值，于是这一方取决于另外一方，而另外一方又取决于这一方，他们就这样最后陷入荒唐可笑的境地了。这种荒谬之处是令人一目了然的，例如有些作者企图在连续的两章中说明‘地租对生产价格的影响’以及‘生产价格对地租的影响’”。①

尽管有这些精彩的评论——其中最后一点特别精彩，它在某种程度上走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这一点所作的评论之前

①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洛貝爾圖安心地接受了古典學派及其庸俗的信徒們的基本錯誤，這就是，他們完全忽略了在總生產物的價值中所需要用來補償社會上不變資本的那部分。這就使得他較容易保持對“工資分額下降”的突出的鬥爭。

在資本主義生產形態下，社會總生產物的價值分解為三部分：其一相當於不變資本的價值，其二相當於工資全部，即可變資本，而其三是資本家階級的總剩餘價值。在這個組成中，相當於可變資本的部分是相對地在下降，這是因為有兩個原因。首先，在 $c + v + m$ 中 c 對 $(v + m)$ 的關係經常發生變化，其變化方向是 c 的相對增加和 $v + m$ 的相對減少。這是一個人類勞動效率遞增的簡單規律，它適用於一切在經濟上進步的社會，不問其歷史形態如何，換言之，它不過意味着活勞動越來越有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把更多的生產資料變為使用的對象。如果 $v + m$ 合起來是在降低中，那麼它的一部分， v ，也將相對於生產物的總價值而降低。如果反對這一點，企圖阻止它的降低，那麼，這就等於與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的一般影響相對抗。而且，在 $(v + m)$ 中間，還有一種趨向於 v 相對地降低和 m 相對地增加的變動，這就是說，在新創造的價值中，用在工資上的部分將越來越縮小，而作為剩餘價值被占有的部分將越來越大。這是關於勞動生產率遞增的資本主義特有的公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它的適用性並不亞於一般規律。用國家的力量阻止 v 對 m 的比例變小，這意味着勞動力這個基本商品被排斥在進步之外，因為所謂進步就是要降低所有商品的生產費；這意味着這一種商品享受不到技術進步的經濟影響。不僅如此，“工資率下降”是剩餘價值率上升的另一種說法，而剩餘價值率的上升是阻止利潤率下降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它既是一般資本主義生產的原動力，也是在這個生產制度內部的技術進步的原動力。用立法手段阻止“工資分額下降”是無異取消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對它的整個制度給以致命的打擊。讓我們看一看具體的事實：個人資本家，正象整個資本主義社

会一样，不知道生产物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的总额所组成的，这种知识是他所不能把握到的。根据资本家的理解，价值是一种派生形态，经过竞争颠倒过来后，就成为生产费了。尽管实际上生产物的价值是分解为价值的组成部分 c 、 v 和 m ，但在资本家心目中，生产费是 c 、 v 和 m 的总和。而且，在他看来，这三者是以下列歪曲的、派生的形象出现的：（1）他的固定资本的磨损，（2）他垫支的流动资本，包括工人的工资，以及（3）流行的利润，即他的全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这样，我们试问：如何通过洛贝尔图所设想的那种法律，强迫资本家在生产物的总价值面前维持固定的工资份额呢？这种做法，完全和用法律规定用在任何商品制造上的原料，不得多于、也不得少于全部生产物价格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没有什么不同。显然，洛贝尔图很夸耀他的高见，认为是新的亚几米德式的发现，想用它来根治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病症，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方面来看，他的看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这只能是混淆价值论的结果。洛贝尔图曾说：“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物之具有交换价值，正如在古代经济中它具有使用价值一样”，^① 在这里，他的糊涂思想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古代社会的人必须吃面包和肉以维持生命，而现在的人只要知道了面包和肉的价格，就已经满足了。所以，从洛贝尔图对于“固定工资份额”的偏执狂得出的最明显的推论是：他对资本主义积累完全没有理解能力。

前面的引文已经表明洛贝尔图只考虑到简单商品生产，这是与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生产消费品以满足“人类需要”的错误见解相协调的。他常常谈到“资本的补偿”，谈到使资本家能够“按从前的规模继续他们的企业”的必要性。但他的主要论点是直接反对资本积累。把剩余价值率固定下来，防止它的增长，这就等于使资本积累濒于瘫痪。西斯蒙第和吉尔希曼都承认生产与

^①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消費的平衡問題是一個積累問題，也就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問題。他們兩人都認為再生產平衡的破壞導源于積累的傾向，因而他們否定積累的可能性，他們之間的差別在於一方建議壓制生產力，作為一個補救辦法，另一方卻贊成把生產力更多地使用到奢侈品的生產上，並把剩餘價值全部用於消費。在這個問題上，洛貝爾圖卻是孤芳自賞。前二人試圖理解資本主義積累的现象而收到或多或少的效果，而洛貝爾圖却要反對這個概念本身。“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都先後贊同這個原理，即資本只能靠節約和積累來發生，並把它當作一個普遍的、絕對的真理”。^①

洛貝爾圖堅決起來反對這個“誤入歧途的判斷”。他用六十頁的篇幅詳細地說明：（甲）資本的源泉不是節約，而是勞動，（乙）經濟學家們對於“節約”的“謬見”，是從他們認為資本本身有生產性的誤解所引起的，（丙）這個謬見最後又是從另一謬見中產生，即“資本就是資本”。

吉爾希曼對於資本主義“節約”的背後隱藏着什麼，有很好的了解。他精辟地論述如下：“大家都知道，資本的積累不僅僅是準備金的窖藏，也不是在庫房中存儲金銀貨幣而不動用它。想節約的人之所以進行節約，就是要把自己所節約之數，作為資本，由自己或他人加以利用，借以從中取得收入。只有把這些資本投入新企業，進行生產，從而提供所需的利息時，這種收入才有取得的可能。例如某甲造了一艘船，某乙修了一座谷倉，某丙開墾了一塊荒地，某丁定做了一架紡織機，而某戊為了擴大他的制鞋工業，買了更多的皮革和雇了更多的工人，依此類推。只有當所節約的資本供這樣的使用時，它才能提供利息（指利潤），而利息是一切節約的目的物”。^②

這就是吉爾希曼如何笨拙地，但總的說來，正確地描繪剩餘價值的資本化的事實，也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過程，而資本主義積

① 洛貝爾圖：“著作集”，第一卷，第40頁。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25頁。

累就构成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在正确的本能下，所贊成的節約的全部意义。吉尔希曼，象西斯蒙第一样，認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积累，因此，他之反对節約和积累是与他的前提相符的。这里，洛貝尔图更为“深思远虑”。他从里嘉图的价值論中，学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是資本的源泉的见解，但他完全被这个初步的知識所蒙蔽，看不到資本主义生产和資本运动的所有复杂关系。既然資本是由劳动产生的，資本的积累，也就是，“節約”和剩余价值的資本化是一个騙局而已。

为了要解开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所造成的一大套复杂的謬见，洛貝尔图，正象我們所猜想到的，以一个孤独的庄稼汉为例子，通过对这个不幸的人物进行冗长的解剖来証明他所需要的一切。在这里，他已經发现了“資本”，当然，这就是說，那根“原始の木棒”，这根木棒就是“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用来从知識的树上采集資本理論的果实的。洛貝尔图問道：“節約能不能产生这根木棒”？既然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節約”不能生产木棒，它是由魯滨逊·克羅叔(Robinson Crusoe)用木头做成的，那么，我們已經証明了，那个“節約”理論是十分錯誤的。再者，这个“孤独的庄稼汉”用他的木棒从树上打到一个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他的“收入”。

“如果資本是收入的源泉，那么，这种关系已由这个最原始的，最单纯的事实加以証明了。如果把木棒当作收入或部分收入——由击落的果实所形成的——的源泉，这样說法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不违背事实和概念呢？我們能不能把全部或部分收入的产生原因归之于木棒？我們能不能把它全部或部分地当作木棒的产物”。^①

当然不能。既然这个果实不是击落果实时使用的那根木棒的产物，而是結果实的那棵树的产物，因此，洛貝尔图証明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是錯誤的，如果他們主张收

^① 洛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50頁。

入来自資本的話。洛貝爾圖利用魯濱遜的經濟為例子，清楚地闡述了所有的基本經濟概念之後，他把這樣所獲得的知識推廣到一個沒有資本所有制或土地所有制的虛構的社會，即共產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中去，接着再推廣到有資本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的社會，即現代的社會中去，於是請看：魯濱遜經濟的一切規律逐條逐條地都適用於這兩個社會了。這裡洛貝爾圖建立一個資本和收入的理論，這個理論是他烏托邦式幻想的頂點。既然他發現魯濱遜的資本就是生產資料而已，於是他把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資本也同樣地與生產資料等同起來了。這樣，一舉手之勞，他把資本簡化為不變資本，然後他以正義和道德的名義抗議把工資，即工人的生活資料，也當作資本看待。他猛烈地攻擊可變資本的概念，認為這個概念是一切災禍的原因。他痛心地说：“請經濟學家們注意我所說的，請他們毫無偏見地考察一下，到底他們對呢，還是我對。這是在現行的制度下關於資本的所有錯誤見解的焦點。這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工人階級存在着不公平的最終源泉”。^①

這是因為“正義”所要求的，是構成工人的“實際工資”的貨物不應算作資本的一部分，而應歸屬於收入的範疇。儘管洛貝爾圖很知道資本家必須把他們墊支的工資當作他的資本的一部分，正象墊支在直接生產資料上的另一部分一樣，但在他看來，這只能適用於個人資本。當成為社會總生產物的問題，整個再生產的問題時，他馬上宣稱資本主義的生產範疇是一個幻想，是惡意的謊言，是錯誤。“資本自身、組成資本的項目、從全國來看的資本，是大大不同於私人資本、資本資產、資本財產以及在現代用法下‘資本’一

^① 洛貝爾圖：“著作集”，第一卷，第225頁。洛貝爾圖在一生中反復地申述他早在1842年在他的“我國政治經濟情況的解說”一書中的思想。“在目前的條件下，不僅勞動的工資，而且地租和資本利潤被算作貨物的生產費。因此，我們必須詳細地批駁這個見解。這個見解有兩個基礎：（一）對資本的錯誤理解，把工資看作資本的一部分，正象材料和工具一樣，而實際上工資與地租和利潤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二）混同了商品的生產費和企業家的墊支或企業經營費用”（“我國政治經濟情況的解說”，1842年版，第14頁）。

詞通常所代表的一切”。^①

个人資本家用資本主义方法从事生产，而整个社会却必須象魯滨逊般的，作为一个集体所有主，使用共产主义方法来从事生产。

“在一切不同的生产阶段上，国民总生产物的或多或少部分是被不算作真正生产者的私人所占有，或者真正生产者經常作为这些少数私人占有者的仆役而生产这些国民总生产物，而自己并不分享自己生产物的所有权——这两者間，从一般的、国民的、观点看，没有什么区别”。

无疑地，整个社会内部的关系的一些特点是产生于：（一）作为居間者的“交换”制度，（二）生产物分配上的不平等。

“可是，所有这些影响并不妨碍全国生产的运动和国民生产物的形成，它們今昔一样，总是保持同一状态（在共产主义下也是如此）；同时，这些影响，从全国观点来看，也在任何方面不改变已經建立起来的資本和收入之間的对比”。

西斯蒙第与亚当·斯密及其他許多人相同，竭力想从資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中解决資本和收入的概念。洛貝尔图却用一个較简单的方法，他把資本主义生产为整个社会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态抽象掉，他简单地把生产資料叫做資本，而把消費品叫做“收入”，以后他就停留在这里。

“土地所有制和資本所有制，只对相互往来的个人，发生主要的影响。如果把全国看作一个单位，这种所有制对个人的影响就完全消失了”。^②

^① 洛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304頁。在“我国政治經濟情况的解說”一書中，已經有同样的說明：“我們必須把狹义的、或本来意义的資本与广义的資本区别开来。前者包括工具和材料的实际貯备量，后者包括在現今的劳动分工下，經營企业所需的基金。前者是生产上絕對必要的資本，而后者只是迫于現今条件，才具有这样相对的必要性。因此，只是前者才构成严格的、本来的意义的資本；只是这一概念才完全与国民資本的概念相符”（同上書，第23—24頁）。

^② 同上書，第292頁。

我們看到洛貝爾圖一接觸真正的問題即資本主義總生產物及其運動時，他對生產的歷史特殊性，表現出空想家所特有的遲鈍態度。馬克思對蒲魯東的評語：“提到整個社會時，他假裝社會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了”，這對洛貝爾圖，也恰恰適用。洛貝爾圖的例子再一次說明在馬克思以前的每一個經濟學家如何努力摸索，想把勞動過程的物質觀點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價值觀點，加以協調，想在個人資本的運動和社會資本的運動之間進行調和，但結果是到處碰壁。這種努力通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例如薩伊和麥克洛克的淺薄見解，他們只承認個人資本的概念，以及蒲魯東和洛貝爾圖的空想見解，他們只承認勞動過程的概念。在這裡，我們才開始領會到馬克思的深入分析如何對這個問題放出了偉大的光明。他的簡單再生產圖式把所有這些和諧的或矛盾的观点都搜集起來，借以說明整個問題，并使無數複雜的混亂關係分解為驚人簡單的兩行數字。

如果對資本和收入持有這些見解，顯然不能理解資本的占有問題。誠然，洛貝爾圖簡單地把資本主義的占有說成是“掠奪”，并在它所侵犯的財產權的法庭前對它進行起訴。

“工人的個人自由在法理上應包含對勞動生產物價值的所有權，但在實踐上，却使工人在土地和資本的所有制壓迫下不得不放棄產權的要求；但所有主並不承認這個巨大的、普遍的過錯，好像他們本能地害怕歷史將會按照無情而不可改變的邏輯而發展”。^①

“因此，（洛貝爾圖的）這個理論詳盡地證明一般讚美現今的所有制關係，而同時又不能把所有制奠基於除勞動以外的東西之上的人，是對他們自己的原則發生矛盾的。它證明現今的所有制關係事實上是建築在普遍地破壞這個原則上面，它證明現今社會上所積聚的巨大的個人財富是掠奪的結果，而這種掠奪，從遠古時代

^① 洛貝爾圖：“著作集”，第二卷，第136頁。

起，随着在社会上每添一个新生的工人而越来越加重”。^①

既然剩余价值被叫做“掠夺”，那么，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必然成为今天经济组织中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了。^② 布里索 (Brissot)^③ 的粗鲁的具有革命音调的怪论——“财产是盗窃”——曾经成为蒲鲁东的第一本小册的出发点，但洛贝尔图的命题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认为资本是在财产上所进行的盗窃。只要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所有权法则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的法则一节^④——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历史辩证法的杰作——与洛贝尔图的理论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后者的“优先”之处。洛贝尔图从“所有权”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占有大肆攻击，这种攻击有效地妨碍他看出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如他对“节约”的攻击以前曾妨碍他看出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源泉一样。这样，他处于比吉尔希曼更坏的地位，他缺乏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条件。

这实质上就是洛贝尔图要生产无限制扩张，而不要“节约”，也就是，不要资本主义积累！他要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增长，而同时，他要一个由法律固定的剩余价值率。总之，他表明他自己实在无法把握住他所希望改良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基础，也无法理解他所激烈批评的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结论。

因此，梯尔 (K. Diehl) 教授认为洛贝尔图，就其“新收入理论”以及对资本的逻辑范畴和历史范畴的区分（指本来意义的资本，以别于个人资本）而言，是经济理论的先驱者；而瓦格纳 (Adolf Wagner) 教授称他为“经济社会主义中的里嘉图”，这正证明了瓦格纳既不懂里嘉图，也不懂洛贝尔图，更不懂社会主义。列克西斯 (Lexis) 甚至断言洛贝尔图在抽象思维上，与他的“英国论敌”至少相等，在巧妙地发现现象中最深远的关系上，在富于想象的气

①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5页。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61页。

③ 布里索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译者。

④ 按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译者。

魄上，尤其在对经济生活所采取的伦理观点上，他比他的“英国论敌”高明许多。然而，洛贝尔图在经济理论上的真正成就（除去他对里嘉图地租论的批判外），他有时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明确区别，他对剩余价值整体的研究，并有意識地与剩余价值的部分表现区别开来，他对斯密关于商品的价值分析的教条的批判，他对危机的周期性的确切表述以及他对危机症象的分析——所有这些旨在超越斯密、里嘉图和萨伊的研究，尽管本身是有希望的，但由于基本概念混乱，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洛贝尔图的崇拜者却不懂得这些东西。正如梅林（F. Mehring）所指出过的，洛贝尔图的奇特的命运是：有人把他在经济学上的所谓威力捧上天，而同样的那些人对他在政治上的真正功绩却加以斥责。但我们暂且不管这种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的对比。在经济理论的领域内，他的崇拜者在他以空想家的无用的热心所挖掘的不毛的土地上，为他树立了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另一方面，在平凡的苗圃上他曾播种一些肥壮的种籽，而这些苗圃却任其野草丛生而不加一顾。^①

从整个看，我们不能说积累问题超越这个普鲁士，包美拉尼亚^②的探讨所引起的第一次争论而有很大的进展。如果说经济和谐论已从里嘉图水平降低到巴斯夏——叔尔泽水平，那么，社会批评也同样从西斯蒙第降低到洛贝尔图。1819年西斯蒙第的批判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而洛贝尔图的改良思想，在初次问世时，就是一

^① 此外，洛贝尔图遗著的编辑者曾给他举行了一种最坏的纪念仪式。这些饱学之士，如瓦格纳、柯扎克（Kozak），维特（Moritz Wirth）等等，在洛贝尔图遗著的序文中，象在前厅的一群粗鲁的仆人一样，为了自己琐屑的个人仇恨和嫉妒，争吵不已，并相互谩骂。他们甚至不顾公认的礼貌，对他们各自发现的手稿，不 确定其日期。举例而言，梅林曾指出所发现的洛贝尔图的最早的一个手稿，不象瓦格纳所武断的那样，发表于1837年，而最早发表于1839年，因为那篇手稿在最初几段中，提到关于宪章运动的历史事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应该知道宪章运动发生于1839年。在瓦格纳教授所写的洛贝尔图的绪论中，我们对他的装腔作势以及他不断提到的“要求他花时间的东西太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瓦格纳只是与他的饱学的同事们谈论，因之，他讲得使一般群众不懂。对梅林在一群专家们面前所作的温文尔雅的纠正，他正象一个大人物一样，默不作声。梯尔教授在“国家学手册”中同样地默不作声地把1837年的日期改为1839年，而没有用一字来说明何人何时这样告诉他的。

个可耻的倒退，而其后在反复申述中，则更是如此。

在西斯蒙第一方面和薩伊与里嘉图一方面的爭論中，一方面証明由于危机之故积累是不可能的，因而对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提出警告；另一方面証明危机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积累的无限制发展。尽管他們两方都从錯誤的前提立論，但每一方在邏輯上都是前后一致的。

吉尔希曼和洛貝尔图两人都从危机的事实出发，事实上也不得不从这一点出发。这里，总資本的扩大再生产問題，积累問題，是完全与危机問題等同起来了，并在为危机寻求对策的嘗試中，这个問題走上了歧路，尽管半世紀的經驗很清楚地表明从周期出現的危机是資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必要形态。爭論的一方認為对策是在資本家将剩余价值完全消費掉，也就是，不要积累；另一方認為对策是在用法律来稳定剩余价值率，这也等于是完全放弃积累。洛貝尔图的这个奇想产生于他的强烈的、明确的信念：他認為在沒有資本积累下，生产力和財富有无限制的資本主义扩张的可能。正当資本主义生产发展到这样程度，使馬克思有可能作出他的基本分析之时，資產階級經濟学对解决再生产問題的最后嘗試却墜落到荒唐和无聊的空想中去了。

普脫卡默尔和墨耳勃莱希 (Puttkamer and Muehlbracht, 1899年)的“通俗的”，“新的和廉价的”版本做了最后的修改。有几个爭吵的編者合作編这个版本但在緒論中他們仍繼續他們的爭論。在这个版本中，瓦格納的旧第二卷变为第一卷，但瓦格納在第一卷的緒論中提到它时仍作第二卷。“第一社会書簡”被放在第三卷，“第二、第三社会書簡”被放在第二卷，而“第四社会書簡”被放在第一卷。“社会書簡”，“爭論”，“解說”的一部分……的次序，年代和邏輯的程序，发行和写作的日期都被混淆起来，乱七八糟比多次火山爆发后的重叠地层还要难以分清。大概为了尊重瓦格納教授起見，洛貝尔图的最早手稿的日期仍定为1837年——而这是在1899年出版的，尽管梅林已在1894年作了糾正。如果我們以此与馬克思遺著由梯茨出版的梅林版和考茨基版比較，我們看到如何显然是表面的事情却反映了更深刻的关系：一方面对于有階級意識的无产者的权威的科學遺著的謹慎小心的态度，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官方专家如何胡乱处理一个人的遺著，而这个人，在他們对自己有利的神話中，还被捧为第一流的天才哩。物以类聚，——这是不是洛貝尔图的格言？

② 包美拉尼亚 (Pomerania) 是普魯士的一个省，洛貝尔图在那兒置有地产，并居住在那里，故这里指洛貝尔图本人——譯者。

第三回論战

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图冈·巴拉
諾夫斯基对伏隆左夫——尼古拉·昂

第十八章 問題的新提法

关于資本主义积累的第三次論战，是在与前二次論战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这次論战的时间是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的一段时期，地点是在俄罗斯。資本主义在西欧已經成熟了。亚当·斯密和里嘉图在萌芽期的資本主义社会所持的乐观的古典学派见解早已消逝了，庸俗的孟彻斯特的和諧論所表现的利己的乐观主义，經過七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机的严重影响并在六十年代以来在資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猛烈的階級斗争的沉重打击下，也已銷声匿迹了。即使是用社会改良主义来补綴的和諧論，虽然在八十年代初，特別在德国，曾盛行一时，但轉瞬間也烟消云散，只剩下宿醉后的苦味而已。对社会民主党的特別立法，經過二十年的試驗，只带来了痛苦的失望，并最后地撕破了和諧論的一切面罩，揭露出赤裸裸的資本主义的残酷矛盾的现实。从此以后，只有在上升的工人階級及其理論家的陣营內才有可能产生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不是对自然地或人为地在資本主义經濟中所建立的均衡状态，或对資本主义的永恒不朽而言，而是指一种信念，根据这种信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大力的推动，并由于資本主义的內在矛盾，資本主义为社会走向新的經濟和社会形态的历史性的前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資本主义初期的消极、沮丧的傾向——有一个时期仅仅被西斯蒙第一人揭发出来，其后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又被洛貝尔图观察到——已被一种意志昂扬的傾向

所代替；这就是工人们为取得权势而在职工会运动中和通过政治行动所进行的充满希望的、胜利的斗争。

西欧的背景就是如此。但同时代的俄国情况，则迥不相同。在这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充满着痛苦的国内危机的时期。大工业受了高额保护关税时期的鼓励，才开始向前发展。特别是在1877年西部国境实施的黄金关税，可说是专制政府所采取的用强力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在各种国家补助、担保、奖励和政府订货下，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俄国已经蓬勃地发展了。它所获利润之大，从西方看来，好像是神话般的。然而当时俄国的国内情况一点也不可爱、一点也不美妙。在广大平原上，在国库和货币经济的剥削下，农业的没落和瓦解，造成了悲惨的情况。周期性的饥馑和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无论在社会上或思想上，还没有成长为近代工人阶级。特别在俄国纺织工业的最重要中心，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工业地区，工业无产者大部分还与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还是半农业性的。因此，原始的剥削形态引起了原始的反抗方法。直至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地区的自发的工厂暴动以及打毁机器，才推动沙皇帝国订立初步的工厂立法。

如果说在俄国公共生活的经济方面随时显示出过渡时期尖锐的不调和音调，那么，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同样发生了危机。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土生变种的“民粹主义”，理论上是以俄国农业制度的特殊性为基础，但随着它的极端的革命分子“民意派”的恐怖政策的失败，它在政治上也就破产了。另一方面，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俄国开辟道路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至1883年和1885年才刊印出来，而在以后的十年内似乎产生影响很小。在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为止，具有反抗倾向的俄国人、特别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被“土著的”“民粹派”残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意拥护者的混合体所支配。这个混合体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抱着怀疑的态度。

俄国知識界的注意力老早就被俄国应否仿照西欧的先例，从事資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問題所吸引。最初，他們只看到西方資本主义的阴暗面，即它对传统的家长制的生产形态，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繁荣和安定生活所起的破坏作用。相反地，俄国农村中农民土地公有制（即有名的农村公社）好象提供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乐土的捷径，这条道路好象直接能导向俄国較高的社会发展而不必象西欧那样，经过資本主义阶段及与之相伴随的凄惨情况。如果抛弃这个幸运的、例外的地位，也就是，这个历史上絕无仅有的机会，而用国家力量，把資本主义生产强制地移植到俄国来，这样做法是不是对呢？如果破坏农村的所有制和生产制度，并为无产階級化和劳动大众的貧困和生活不安打开大門，这样做法是不是对呢？

自从农奴制废除以来，甚至，更早一些，自从赫尔岑，以及特别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以来，这个根本問題吸引了俄国知識分子的注意力。这是独一无二的“民粹主义”世界观的要旨。这种思想倾向，从斯拉夫狂的反动学說直至恐怖党的革命理論，在俄国产生了大量的文献。一方面，它鼓励对俄国經濟生活形态、对“国民生产”及其特点、对农村公社实践下的农业、对农民的家庭工业，及“农业劳动組合”，以及对农民的精神生活、宗教制度等等，分別通过調查，搜集大量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艺作品，它們是社会矛盾情况、新旧道路斗争的艺术反映，而这种新旧斗争逐步提出令人困惑的困难問題。最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同一根源还出现了一种特別使人窒息的历史哲学，它的拥护者有彼得·拉夫洛夫、尼哥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加列也夫教授和弗·伏隆左夫。这是社会学上的主观方法。根据这个学說，“批判的思想”被認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更确切地說，这个学說企图使蹩脚的知識分子成为历史前进的担当者。

在这个广闊而牽連甚多的領域中，我們在这里只对一个方面有兴趣：即关于資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不同意見間的斗争。就是在

这一方面，我們所感兴趣的，只限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条件的一般反映为基础的那些意见，因为这些反映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俄国爭論的文献中也占很重要的地位。

爭論的問題首先是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前途，但由此发生的討論必然导向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問題。西方的例子和經驗被用作这个爭論中的重要例証。

在此后的討論中，有一件事实对于討論的理論內容起了很重要作用，这就是不仅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作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已經成为俄国有修养的人士的共同財產，而且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二卷，連同它对資本再生产整个問題的分析，也已于1885年出版了。这对討論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轉变。危机問題不再掩蔽了問題的症結；爭論第一次集中在純粹的整个資本的再生产，即积累問題上来了。在分析上，也不再盲目地在收入、个人資本和总資本的概念上摸索了。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已經給人們提供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最后，問題已不再是放任自流和社会改良之間的爭論，而是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之間的爭論。小資产階級以及头脑紊乱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民粹派”变种，相当地因襲了西斯蒙第的见解，也部分地因襲了洛貝尔图的见解，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抱怀疑的态度，尽管他們常常引用馬克思作为他們的依据。另外一方面，俄国馬克思学派則抱乐观的态度。这样，舞台上的布景已完全轉移了。

“民粹派”运动的两个健将之一伏隆左夫——以笔名弗·弗·聞名于俄国^①——是一个怪人。他的經济学是混乱一团糟；作为一个理論家，他根本不能被認真計算进去。另外一个健将尼古拉·昂（达尼尔逊）^②却是一个博学之士，他熟悉馬克思主义。他編輯資本論第一卷的俄譯本，并且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他与馬克

^① 伏隆左夫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一書中提到的B.B.先生——譯者。

^② 尼古拉·昂，即达尼尔逊，也就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一書中提到的O.H.先生；在恩格斯的書信中，称之为丹尼尔斯昂——譯者。

恩和恩格斯經常通信（他們的通信集于1908年用俄文出版）。但是，在八十年代對俄國知識界的輿論起影響的，是伏隆左夫。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首先對他進行鬥爭。關於我們的問題，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問題，九十年代的年青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學到了西歐的歷史經驗和知識後，與普列漢諾夫會師，向上述的兩個懷疑論者的代表，展開了鬥爭。在這一代中有加布呂科夫教授、馬努依洛夫教授、伊薩也夫教授、斯克伏爾左夫教授、弗拉基米爾·伊林、彼得·司徒盧威、布爾加科夫和圖岡·巴拉諾夫斯基教授。我們以下主要限於介紹以上諸人中的最後三人，因為他們三人都對我們所討論的理論問題提供了或多或少的系統的批判。這次鬥爭，其中有些部分是很光輝的，並曾使九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好像着了迷的樣子。這次論戰以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長驅直入而告結束，它正式宣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經濟歷史理論已滲透了俄國的思想界了。“合法”馬克思主義那時公開地佔據了俄國各大學、各雜誌、和經濟書籍市場的地盤，從而也帶來了這種地位的不利後果。十年以後，當無產階級的革命起義在街道上指示出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樂觀主義的黑暗面時，在馬克思主義樂觀者的七巨頭中，除了一個人是例外，沒有一個是留在無產階級陣營內的。

第十九章 伏隆左夫及其“過剩”論

俄國“民粹主義”的代表們相信資本主義在俄國是沒有前途的。這個信念引導他們轉向資本主義再生產問題上來了。伏隆左夫，在弗·弗·的筆名下，在“祖國追憶”雜誌及其他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闡述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這些文章後來匯集成書，以“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為題，於1882年出版。以後，他又在1883年在同一雜誌的五月號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論市場供給中的商品過剩”；1889年在“俄羅斯思想”雜誌九月號上，又寫了一篇論文“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1893年又出版了“我們的傾向”一書；最

后,1895年,又刊行了“經濟理論大綱”一書。伏隆左夫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態度是不易肯定的。他既不贊同純粹的斯拉夫狂的理論,也就是從俄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和俄國獨有的“民族特性”,把資本主義看作對於俄國是牽強的、有害的,他也不贊同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發展看作一個不可避免的历史階段、看作掃清俄國社會前進的道路所必需的一個階段。伏隆左夫自己只是簡單地指出反對資本主義或讚美資本主義同樣都是沒有用處的,因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沒有基礎的,因而是不可可能的,也是沒有前途的。俄國缺乏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條件,所以,用國家力量企圖人為地促進它,只是枉費心機而已,我們還不如省下這些力量,倒可以避免由此而造成的犧牲哩。但如果我們更詳細地考察一下,我們便可看到伏隆左夫的主張並不這樣的絕無通融的余地。因為如果我們注意到資本主義並不僅僅意味着資本財富的積累,而且還包含小生產者向無產階級水平的沒落,勞動者生活的缺乏保障,以及周期性危機的爆發,那麼,伏隆左夫也不會不承認所有這些現象在俄國也是存在的。相反地,他在“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一書的序言中明確地說:“我只是對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形態在俄國統治的可能性表示異議,至於作為一種對國民資源的剝削形態和剝削程度,它的前途如何,我不願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見”。

因此,伏隆左夫認為俄國資本主義只是不能達到象在歐西的那樣成熟程度,但在俄國的條件下,直接生產者之與生產資料分離,毋寧是在意料之中。他更進一步說,他根本不否認在各個生產部門中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大有可能的,他甚至还容許俄國向國外市場作資本主義輸出。他在他的“論市場供給中的商品过剩”一文中說,“在某些工業部門中,資本主義非常迅速地發展起來”(不待說,這是從俄國意義來說——著者)。^①

“俄國,象其他國家一樣,很可能享有某些天賦的優越條件,這

^① “祖國回憶”,第五卷,“時事述評”,第4頁。

些条件使它有可能成为在国外市场上某些种类商品的供应者。資本也很可能利用这一点，而侵入有关的生产部門，也就是說，国民(国际)劳动分工使資本家极易在某些部門获得立足之地。但我們的问题还不在此。我們不是問資本是否偶然参与国家的工业組織，而是問俄国的全部生产是否有可能安置在資本主义的基础之上”。^①

伏隆左夫的怀疑論，从这种形式来看，显然与我們原来可能想象的，大不相同。他所怀疑的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底能否征服俄国的全部生产？可是，資本主义，到那时为止，無論在那一个国家，即使在英国，都沒有完成这样的征服。因此，这种对資本主义前途的怀疑論，初看起来，相当具有国际性的。事实上，伏隆左夫的理論这里不啻对資本主义的性質和基本条件作了一次一般性的考虑，它是以对整个社会資本的再生产过程的一般理論探討为基础的。伏隆左夫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場問題之間的特有关系作了极清楚的表述如下：

“国民(国际)劳动分工，参与国际商业的各国間所有生产部門間的分配，这种事情并不依存于資本主义。这样出現的市場，由于这样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結果而产生的各个不同国家对产品的需求，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市場，在本質上毫无共同之处。……資本主义工业的生产物是以另外一种目的而出現于市場的。国家所有的需要是否得到滿足，这个问题对于它們是完全无关重要的，企业家为了替代自己的生产物，不必取得別的生产物以供消費之用。生产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包藏其中的剩余价值。那么，这种使資本家发生兴趣的剩余价值是什么东西呢？在我国看来，这是国内生产超越消費的过剩部分。每个工人所生产的，超过他自己所能消費的，而所有这些剩余部分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剩余部分的所有者自己消費这些东西，为了这个目的，把它們用来

^①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述評”，第10頁。

在國內和國外，與種種必需品和奢侈品進行交換。可是，不管這些所有者盡量吃、喝、跳舞，他們不可能把剩餘價值全部揮霍掉，勢必有巨額的剩餘，而這個剩餘部分，儘管不能以之交換其他生產物，也必須加以處理。他們必須把它轉化為貨幣，否則就很不好。既然資本家在國內找不到可以承擔這個剩餘的人，它必須向國外輸出。這就是為什麼對於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国家，國外市場是必要的”。^①

以上一段的直譯把伏隆左夫措辭的特色都表現出來了。讀者在這裡可以欣賞這個卓越的俄國理論家，並和他共度一些愉快的時刻哩。

其後在1895年，伏隆左夫在“經濟理論大綱”一書中總結了同樣的見解，這也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他這裡反對薩伊和里嘉圖的見解，特別也反對否認一般生產過剩的可能性的約翰·斯圖阿脫·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闡述他的論點的過程中，他發現前人所未有看到的事情：他揭露了古典學派關於危機問題所犯的一切錯誤的根源。這個錯誤的根源在於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服膺的荒謬的生產費理論。無疑地，從生產費方面看(根據伏隆左夫同樣獨創的假設，生產費不包括利潤)，利潤和危機兩者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能解釋的東西。這個獨創的見解，只有通過作者自己的話，我們才能領會到，作者說：

“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學說，一個生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上所使用的勞動決定的。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表述了價值的決定後，不久就忘記了，於是他們後來對於交換現象的解釋是以另外一個理論為基礎，這個理論以‘生產費’代替了勞動。這樣，兩個生產物相互交換的數量，使雙方的生產費相等。對於交換過程如果抱這樣的見解，這將使國內無商品過剩可言了。工人每年勞動的生產物，按照這種看法，代表這個生產物所用的材料，在生產時所使

^① “祖國回憶”，第五卷，“時事述評”，第14頁。

用的工具，以及在生产期間用来維持工人生活的物品。它(大概指生产物——著者)之出现于市场上，是为了改变它的使用形态，把它轉化为其他对象物，轉化为供工人用的生产物和更新工具所必需的价值。当它分解为各个組成部分后，再結合的过程、即生产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上面所列举的一切价值都将被消費掉，而代替它們而出现的，是一个新的生产物，这个生产物是連接过去和未来消費的鏈环”。

从这种完全独特地証明社会再生产，在生产費观点下，为一个連續过程的尝试，伏隆左夫迅速地得出下列的結論：“这样，如果考虑到一个国家生产物的总量，我們將看不到任何超过社会需求的商品过剩；因此，从資产階級經濟学的价值論看来，卖不出去的过剩是不可能的”。

然而，当伏隆左夫通过极其专橫和粗暴地对待資产階級价值論，把資本主义利潤从生产費中排除出去之后，他立即把这个缺陷当作一个巨大的发现：“然而，上面的分析在目下流行的价值論中揭露了另一个特点：显然地这个理論使資本主义利潤沒有立足的余地”接下去的論点是突出地簡短和单纯：“誠然，如果我以代表生产費五卢布的生产物交换相等价值的另一生产物，我所取得的东西，仅是以抵偿我的費用，至于对于我的节慾(直譯如此——著者)，我却一无所得”。

现在伏隆左夫真正抓到了問題的根源了。“这样，根据資产階級經濟学者的思想的严格的邏輯发展，証明了市场上商品过剩的命运是与資本主义利潤的命运等同的。从这个情况有充分理由可以得出結論如下：这两个现象是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的条件，而事实上，如果沒有利潤，就沒有商品过剩。……如果利潤是在国内形成的，情况又有不同。这样的利潤原来与生产沒有联系；它是一个并非通过技术和自然条件，而是通过外部的社会形态，与生产連接起来的现象。为了繼續生产……就需要材料、工具、工人的生活資料，因此，生产本身只消費生产物中与之相应的

那些部分：对于組成利潤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永久性的工业結構中，在生产中，是没有立足的余地的）必須找到另外一些消費者，——这些消費者并不有机地与生产相联系，他們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偶然的性質。这种消費者可能有必要的数量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在后者的场合下，市场上就将发生商品过剩”。^①

把过剩产品当作資本所創造的东西，并把資本家当作与資本主义生产没有有机联系的“偶然的消費者”，以这样“簡單”的說明为滿足的伏隆左夫于是轉而討論“危机”問題。他自称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利用”了馬克思的合乎邏輯的劳动价值論，以这个理論为基础，伏隆左夫把危机說成是剩余价值的直接后果，他說：

“如果以劳动工資形态加入生产費中的那部分是由人口中的劳动者阶层来消費，那么，剩余价值，除了在市场上用以扩大生产的那部分外，必須由資本家自己加以銷毀（直譯如此——著者）。如果資本家能够这样做，并且实际上这样做的话，商品过剩就不会发生；不然，生产过剩、工业危机、工人从工厂中解雇、以及其他灾禍都接踵而至。”

然而，最后对这些灾禍負責的是什么呢？在伏隆左夫看来，那是由于“人类有机体的缺乏足够的弹性，它不能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同样迅速地增加它的消費能力”。他反复地发表这个妙論，他說：“資本主义工业組織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企业家缺乏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能力”。

伏隆左夫虽然利用了里嘉图价值論的馬克思的“合乎邏輯”的改正提法，但他所達到的結論，却是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論，而他对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論，是尽可能地以粗糙和簡單化的形态接受下来。当然，他相信在他复述西斯蒙第的见解时，他是采用了洛貝尔图的看法。他胜利地宣称：“用歸納的研究方法引导出的危机和赤貧化理論，恰恰与洛貝尔图所客观地闡述的，完全相同。”^②

① “經濟理論綱要”，圣彼得堡，1895年，第157頁。

② “軍国主义与資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78頁。

伏隆左夫用来与“客观方法”对比的所谓“归纳研究方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十分了解。既然对于伏隆左夫而言，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他也許把它理解为馬克思的理論。但是洛貝尔图在这位独创的俄国思想家手中，也不会不經過改善而出现的。伏隆左夫对洛貝尔图理論的修改只是取消了洛貝尔图自認为占他的整个体系的中心地位的在总生产物的价值中固定工資分額的学說。根据伏隆左夫的意见，固定工資分額的办法只是对危机的一种減輕对策，因为“上述现象(生产过剩、失业等等)的直接原因不是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取得的分額太小，而是資本家阶级不可能消費归他們所有的全部生产物”。^①

伏隆左夫駁斥了洛貝尔图的收入分配改革論后，以他特有的“严格的邏輯”上的前后一致性，最后对資本主义的将来命运，得出如下的預见：“如果在西欧盛行的工业組織要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昌盛的話，只有在这样安排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必須找到一些方法，把归于資本家所有而超过資本家消費能力的那部分国民收入銷毀(直譯如此——著者)掉。这个問題的最簡單的解决办法，是把参加生产的人之間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加以适当的改变。如果企业家在每次增加国民收入时，只从中提取足以滿足个人各种癖好所必需的部分，而把其余部分都交給工人阶级、人民群众，那么，資本主义的統治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內获得保証”。^②

于是在里嘉图、馬克思、西斯蒙第和洛貝尔图的混合体之上又加上一个新发现：那就是，只要資本家不把他們的剩余价值轉化为資本，只要他們把这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贈送給工人阶级，資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毛病可以得到根治，資本主义可以达到永久的繁荣和昌盛。在这期間，資本家在沒有通情达理，接受伏隆左夫的忠告之前，正在用其他方法，每年把他們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銷毀掉。

① “軍国主义与資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80頁。

② 上同書，第83頁；“經濟理論大綱”，第196頁。

近代軍国主义就是这些适当方法之一，更确切地說，就在軍国主义的費用是由資本家的收入，而不是由劳动群众的收入来支付的场合下——象这类顛倒事实的事情，伏隆左夫是会做得出来的——这是一个适当的方法。但是，資本主义的主要补救办法是对外貿易，而对外貿易又是俄国資本主义的致命伤。因为俄国資本主义是最后一个走上世界市场的餐桌，所以，它在与較老的資本主义国家竞争中最不利的地位，从而它在国外市场和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两方面都缺乏前途。俄国依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一个“民粹”生产的国家。

伏隆左夫在“論市场供給中的商品过剩”一文中作出結論如下：“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那么，資本主义只能在俄国發揮有限的作用。它必須从农业中撤退出去，它在工业中的发展也必須避免对家庭工业給以过多的损伤，因为在我国的經濟条件下，家庭工业对大多数居民的福利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讀者批評說，資本主义不会接受这样的让步，我們的答复是：如果这样，那对資本主义将更为不妙了”。

这样，伏隆左夫在整个問題上摆脱干净，他自己对俄国經濟发展的未来命运，推卸了一切責任。

第二十章 尼古拉·昂

第二个民粹派批判的理論家是尼古拉·昂，他以其另外一种經濟修养和知識，进行他的工作。他是最精通俄国經濟情况的专家之一。早在1880年，他在“斯洛伏”（Slovo）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农业收入資本化的論文已經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十三年后，他受了1891年俄国大飢荒的刺激，在他的“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經濟概論”一书中，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在这本著作里，他对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以丰富的事实和数字为根据，作了一个詳尽的叙述，并根据这些証据，他指出这种发展，对于俄国人民來說，是一切灾

难的根源，也是飢荒的由来。尼古拉·昂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见解是以他的一般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条件的理論为基础的。我們现在要加以探討的，就是这个理論。

既然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經濟方式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因此，每一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力图确保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首先依賴国内市場。但等到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资本主义国家已不能滿足于国内市場，这是由于下列原因：社会劳动每年新創造的生产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工人以工資形态取得的，而另一部分是被资本家占有了。第一部分所包含的生活資料是从流通中取出来了，它在价值上只相当于全国所付的工資总额。但在资本主义經濟中，这一部分有愈来愈被压低的明显的傾向。压低的方法是延长劳动時間、增加劳动强度、通过技术改进来增加产品，并在技术改进下以妇女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甚至把成年劳动全部排挤掉。即使繼續被雇用的工人的工資虽有增加，但增加之数决不会等于由上述变动而为资本家造成節約的数量。这一切的結果是工人階級作为买主在国内市場上所发生的作用将越来越縮小。同时，还另外有一个变化：资本主义生产逐步地占領了农业居民中的副业經營，这样就逐漸夺去了农民的生計，从而使农业人口对工业品的购买力逐漸下降。国内市場因之愈益縮小。至于资本家階級，我們看到他們也不能全部实现新創造的生产物，不过其原因是刚好相反。资本家的需要無論怎样巨大，资本家还是不能亲自把全部剩余生产物消費掉。第一、因为这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有必要用来改进技术，借以扩大生产，而改进技术，对于个人企业家而言，是在竞争的社会中一个必要的生存条件。第二、因为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生产生产資料（如矿业、机器制造业等）的某些工业部門的扩大，而这些部門的生产物从一开始在使用形态上就不能供个人消費之用，而只能用作資本而发生作用。第三、也是最后，由大量生产廉价商品所达到的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資本儲蓄越来越多地促使社会进行商品的大量生产，結果使一小

撮的資本家无法消費这些商品的全部。

尽管一个資本家能够在另一个資本家的剩余生产物中实现他的剩余价值，反之亦然，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某一部門的生产物、即消費品。但資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不是个人需要的滿足，这可以从消費品的生产相对于生产資料的生产而愈益下降中得到进一步的証明的。

“这样，我們看到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总生产物必然大大地超过就业的全部工业人口的需要，正象每一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大大地超过它的工人和企业家的需要一样。这是完全由于下列的事实：一个国家是資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内部資源的分配不是以滿足居民实际的需要，而是以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目的。正象一个工厂主，作为一个資本家，一天也維持不下去，如果他的市场只限于他的工人和他自己的需要的話，同样地，一个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也不能滿足于自己的国内市场”。

这样，資本主义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它就为自己的前进准备了障碍物。这种障碍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下列的事实：由于直接生产者脱离生产資料的結果，递增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为整个社会謀福利，而只是为个人企业家謀福利；而从这个过程中“解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和劳动時間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不仅是社会的損失，而且也变为社会的負担。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只有当以生产者和生产資料相結合为基础的“民粹型”生产方式占优势时，才能較充分地得到滿足。可是，資本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占有这些生产領域，并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导向自身繁荣的主要因素。例如，在印度每隔十年或十二年重复出现的周期性飢荒是英国周期性工业危机的原因之一。任何国家走上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后，迟早将陷入这些包藏在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中。而且，一个国家踏上資本主义的行程越迟，这些矛盾将表现得越是尖銳，因为国外市场已为較老的竞争国家所征服，从而国内市场一經飽和后，就找不到替代场所了。

由此观之，从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贫困的增长，以及缺乏购买力的过剩工人人数的增加，形成了资本主义的限界。一方面递增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迅速地满足社会上一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无力满足自己的最主要的需要——这两方面是互相呼应的。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滞销货物堆积，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缺乏生活所绝对需要的必需品。

以上是尼古拉·昂的一般见解。^① 我们看到他懂得马克思，并很好地利用了第一、第二两卷的“资本论”。然而他的全部议论仍然是道地的西斯蒙第型。资本主义自身造成了国内市场的缩小，因为它使人民群众贫困化。近代社会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民粹型”生产方式的破坏，也就是说，小规模企业的破坏所致。这就是尼古拉·昂的主题。他甚至比西斯蒙第更为公开地以讚美唯一导致幸福途径的小企业，作为他的全部批判的主旨。^② 资本主义总生产物，归结起来，不可能在本社会内部实现，它必须求助于外部市场。尼古拉·昂尽管在理论出发点上与伏隆左夫大不相同，却得到了与伏隆左夫相同的结论。应用到俄国上来，这就成为对资本主义采取怀疑态度的一个经济科学的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开始就不能获得国外市场，它只能呈现出它的最黑暗的方面——它造成了人民群众的贫困化。因此，在俄国鼓吹资本主义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尼古拉·昂象旧约圣经的先知那样大喝道：“不保持几世纪来的传统，不发展我们天长地久所继承下来的关于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间密切联系的原则，不把西欧科学成就有用地应用到以生产资料农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形态上来，不从西欧生产组织、它的强有力的协作、它的劳动分工、它的机器等等得到好处，而抄袭西欧的生产形态，不发展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原则

^① 见“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特别是第202—205页，第338—341页。

^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俄国民粹派的主张和西斯蒙第的见解之间显著的相同之点，曾在他的论文“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中给了详尽的证明。

而把它应用到农民耕作土地上来，不使科学及其应用广泛地面向农民——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做，而我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我们没有能够阻止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发展，尽管这种形态是建筑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相反地，我们曾竭尽全力促使我们整个经济生活遭到破坏，其结果造成1891年的飢荒”。

“尽管这个祸害已经进展了不少，我们退回原路尚未为晚。相反地，正象克里木战争后亚历山大的改革对于当时是必要的一样，俄国现在面临贫困和崩溃的袭击，也同样迫切需要经济政策的全盘革新。”

尼古拉·昂所主张的社会改革完全是一种空想。这个俄国民粹派分子，是在与西斯蒙第相距七十年后发表他的著作的，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态度，与西斯蒙第的态度相比较，表现出更显著的小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从资本主义的泛滥中，挽救俄国的唯一救命圈，就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即古老的“奥勃希那”（Obshchina）。必须把近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成就移植到农村公社上来，这样就成为较高级的生产的“社会主义化”形态的基础——至于怎样移植，对于尼古拉·昂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俄国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不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退回来，就是听任自趋灭亡和溃烂。”^①

^① “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第322页。恩格斯对俄国情况有不同的估计。他反复地企图使尼古拉·昂相信俄国不能避免高度的工业发展，而俄国所遭受的痛苦不过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矛盾。因此，他于1892年九月二十二日致尼古拉·昂的信上说：“所以，我认为现代的所谓工业生产必然意味着使用蒸气、电气、纺织机械的大工业，以及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工业。俄国从敷设本国铁路的那时起，采用所有这些最新式的生产资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你们不能不修理你们的动力机、客車、铁路等等；为了能够廉价地这样做，你们又不能不在国内把一切在修理上所需要的东西，自己制造出来。从战争技术成为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装甲艦、近代大炮、机关鎗、子弹、无烟火药等）的时候起，为了生产这些项目所必需的一个大工业对于你们也成为政治上的必需品了。所有这些项目，如果没有一个高度发展的金属工业，也不可能制造出来，而金属工业，除非其他生产部门，尤其是纺织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也是不可能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昂书信集”，圣彼得堡，1908年，第75页）恩格斯在同一信中又说：“在俄国工业单靠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它只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国内的需要增长得很慢，在我看来，在现时俄国的生活条件下，它还将下降，因为高度工业

这样，尼古拉·昂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歼灭性的批判后，却以老一套的“民粹派”的万应灵药为结束，而这个万应灵药早在五十年代——虽然当时有比较多的理由——被誉为“俄国特有的”高级社会发展的保证，尽管1875年恩格斯在“人民国家”（Volksstaat）杂志上发表的“亡命者文献”（Fluechtling sliteratur）论文中已指出它的反动性质，并认为它不过是已丧失了生活力的古老制度的残骸而已。恩格斯当时写道：

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是：它以创造国内市场的同样过程来毁灭它自己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通过毁灭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来毁灭国内市场。然而农民没有这样的家庭工业就无法生活。作为农民，他们是破产了，他们的购买力降低到最低限度，除非，他们新的生活条件下扎下了新的根子，除非他们变成无产阶级，他们对于新兴的工厂只形成一个极小的市场。”

“资本主义生产是经济转变的一个阶段，它充满着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发展和显露起来的。一方面自己创造市场，另一方面又自己毁灭它，这种倾向是矛盾表现之一。另外一个倾向是通过上述的倾向而出现的‘绝望的境地’。这种境地在那样缺乏国外市场的国家如俄国，比之其他或多或少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国家，要来得快些。这些后面所述的国家从这个看来是绝望的境地中，通过使用商业政策的强力手段，也就是用强力来开辟新市场，可以找到若干出路。中国是为英国商业开辟的最新的——一个市场，它对英国暂时恢复繁荣，证明相当收到了功效。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资本坚决要求在中国敷设铁路。但中国的铁路修筑，意味着中国的小农经营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被破坏了。在那里，甚至没有发展过一个本国大工业，来在某种程度内抵销这个祸患。因此，亿万人民无法维持生计。结果引起了世所少见的大规模的向外移民，使被人厌憎的中国人泛滥于美洲、亚洲和欧洲。在劳动市场上这个新的竞争者将在中国人所认为满意的生活水平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平）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劳动进行竞争。如果欧洲的整个生产制度到那时还没有实行变革，那正是开始变革的时候到来了。”（同上书，第79页）

恩格斯对于俄国的发展虽然予以经常的注意并表示极大的兴趣，但他坚持不直接参加俄国的争论。在他去世前不久，在189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中，他表示自己的意见如下：“我的俄国朋友们几乎每天、每星期要求我对俄国的书籍和杂志提出抗议，因为它们不仅曲解，而且还误引了我们的著者（即马克思——著者）的言论。我的朋友们向我保证，只要我出来干涉，即足以使事情纠正过来。然而我一贯地、坚决地拒绝所有这些建议，因我不愿意卷入一个争论中去，这个争论是在一个外国进行，这个外国的文字我不能象对我所熟悉的西欧文字一样自由地、方便地阅读；而这个外国的文献，我所接触到的，也只是偶然所见到的片段，我不可能放下我的实际的、重要的工作，有系统地各个阶段上，对之作详尽的研究。到处可以碰到这样的人，他们采取某种立场后，不惜求助于曲解别人的思想以及进行各种各样的不诚实的颠倒黑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对我们的著者所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恐怕他们也不会对我更客气些，所以，结果，我将被迫参加这个争论，最初是为别人辩护，而后来则为自己辩护了。”（同上书，第90页）

“俄国沿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发展，将不需要俄国政府的‘鎗和鞭子’的干涉（象革命的民粹派所想象的那样——著者），即能逐步破坏公共所有制。在租税和高利贷的压迫下，土地公有制已不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种桎梏。农民常常带着家眷或单身脱离了农村，丢掉了土地，作为一个流浪的劳动者而寻求生計。我們看到俄国的公共所有制老早已经度过了它的繁荣时期，现有的一切迹象表明它的没落已日趋接近了”。

恩格斯的这些话，在尼古拉·昂的主要著作发表前十八年，已准确地击中了农村公社问题的目标。如果尼古拉·昂后来以其新的勇气再度用符咒把农村公社的幽灵呼唤出来，那是一个恶劣的时代错误，因为约十年后，沙皇政府正式把农村公社埋葬了。半世纪来，这个专制政府为了财政上的理由，力图人为地保存农村公社制的机构，终于不得不自动放弃这种徒劳无功的工作。这个农业问题很快地表明陈腐的“民粹派”幻想如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相反地，也表明被認為流产而加以哀悼和诅咒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有力地在雷轟电击之下证实自己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时势的变化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证明在极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凡是以怀疑它的发展能力为开始的，根据无情的逻辑，必然象1819年在法国和1893年在俄国一样，归结为反动的空想主义。^①

^① 我們可以提一下現存的“民粹派”悲觀主义的健將們，尤其是伏隆左夫，始終堅持他們的見解，尽管在俄国已經发生了許多事情。这一点与其說为他們的腦力带来光彩，不如說为他們的性格带来光彩。提到1900和1902年危机时，伏隆左夫在1902年写道：“新馬克思主义者的僵硬的教条很快地失去了影响人們思想的力量。个人主义者的最新成就是暫时的，对于这一点即使他們的正式辯护人也是明白的。……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間，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們回到了原来的見解，这些見解就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所遺留下來的。”（參閱“政治經濟学評論”，1902年十月号，轉引自阿·芬·叶諾塔叶夫斯基的“俄国現代經濟，1890—1910年”〔圣彼得堡，1911年，2頁〕）即使在今天，碩果仅存的“民粹派”分子沒有看出自己理論的“暫時性質”，却認為經濟現實是暫时的。巴列尔（Barrère）說过：“只有已經灭亡的东西才一去不复返”，其意义何在呢？

第二十一章 司徒盧威的“第三者”和 “世界三大帝国”

我們現在轉過來看一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前述意見的批評。

1894年，司徒盧威在“社會政策中央新聞”第三卷第一期上發表的一篇論文“論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對尼古拉·昂的著作做了詳細的評價。同年，他又用俄文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評論”。在這本書中他從各方面批評了民粹主義的各種理論。但對於我們現時的問題，他只限於證明資本主義並不縮小國內市場，而相反地，擴大國內市場，借以反駁伏隆左夫和尼古拉·昂。毫無疑問，尼古拉·昂犯了與西斯蒙第相同的錯誤。他們都只描述了傳統的小企業生產形態被資本主義破壞的過程之一面。他們只看到由此造成的群眾幸福的降低，居民中廣大階層的貧困化，而沒有看到這個過程的經濟的一面，即在農業地區自然經濟被排除出去，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經濟的侵入。這等於說，資本主義通過把以前獨立和自足的生产者越來越多地吸收到自己的領域內，連續不斷地把人民中以前不買它的商品的那些新的階層轉變為商品購買者了。事實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恰恰與“民粹派”按照西斯蒙第的模型所描繪的景象相反。資本主義並沒有毀滅國內市場，而是借助於貨幣經濟的普及，着手創立國內市場。

司徒盧威特別駁斥了伏隆左夫關於剩餘價值不能在國內市場上實現的理論。他的論點如下：伏隆左夫理論的基礎是把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看作只由企業家和工人組成，而尼古拉·昂也始終採用這一觀念。當然，從這種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總生產物的實現似乎是無法理解的。伏隆左夫的理論在指出下列事實時，是正確的：即無論資本家的消費也好，或工人的消費也好，都不能實現剩

余价值，因此，必須設想有“第三者”的存在。^①那么，在每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第三者”是否确实无疑地存在呢？伏隆左夫和尼古拉·昂的想法完全是虚构，它“不能把我们对任何历史过程的理解提高一步。”^②没有一个实际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何等高度发展，会完全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

“即使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000个独立谋生的人中，543人从事工业，172人从事商业，140人从事农业，81人是不固定的工资劳动者，62人是政府官吏、自由职业者及其他”。

由此可知，即使在英国，还有大量的“第三者”，而正是他们的消费帮助了实现那些资本家所没有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这些“第三者”的消费是否可以充分实现所有剩余价值，关于这一点司徒卢威没有做出结论。不管怎样，“相反的意见必须加以证明”。^③司徒卢威还认为，在俄国，在具有这样巨大人口的大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俄国是处于能够不要国外市场的幸运地位。在这一点上——这里司徒卢威的想法是从瓦格纳(Wagner)，沙夫来(Schaeffle)，修莫勒(Schmoller)等教授的思想宝库中取来的——俄国与美国享有相同的有利条件。“如果美国的例子能够代表任何东西的话，那是它证明了在某种环境下，资本主义工业能够几乎完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达到高度的发展”。^④

①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论”，第251页。

② 同上书，第255页。

③ 同上书，第252页。

④ 同上书，第260页。“……司徒卢威非常不正确的地方，就在于当他想要驳倒他所称为您对未来的悲观主义观点的时候，把俄国的现代状况和美国的状况等量齐观。他说，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有害后果，也会象在美国一样很容易克服的。这里他完全忘记了，美国的起源就是现代性的、资产阶级性的；它是由力求建立纯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封建制度下逃脱出去的那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创立起来的。而俄国却有着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基础；即先于文明时代的氏族社会，这个氏族社会固然现时已在彻底瓦解，但它仍然还是资本主义革命（这是个十足的社会革命）所借以动作或进行活动的基础或资料。在美国是货币经济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完全确立了，而在俄国却通常都是自然经济，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由此可见，在俄国，变动定会带有更强制和更尖锐得多的性质，并且不免要有比美国更大得无比的痛苦”。（“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斯基（即尼古拉·昂——译者）书简”，1893年十月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502页）

1882年美国工业品輸出数量的微小被用来支持上述的論点。司徒卢威并把这个論点表述为一般命題如下：“一国領土愈广，人口愈多，这个国家发展資本主义所需的国外市场就愈少”。从这个观点，他恰恰与民粹派相反，得出(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比其他国家更有光明前途”的結論。

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农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会創造足够的市场来支持俄国工业資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这个国家的經濟和文化的进展，以及随着自然經濟被貨幣經濟所代替，这个市场有无限扩张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俄国的資本主义，比之其他国家的資本主义，具有更有利的条件”。^①

司徒卢威描繪了一幅詳尽的、色彩浓厚的新市场的图景，这些新市场，由于西伯利亚鉄道的修筑，而在西伯利亚、中亚細亚、小亚細亚、波斯和巴尔干开辟起来了。但是他对于預言的过分热心使他看不到他所講的已不复是“无限扩张”的国内市場，而是特殊的国外市場了。在他的晚年，他在政治上支持了乐观的資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方案。实际上，当他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已为这些主张奠定了理論基础了。

誠然，司徒卢威論說的主旨是对于資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能力的强烈信念。然而这种乐观主义的經濟基础却非常薄弱。司徒卢威認為积累的主要支柱是“第三者”，但所謂“第三者”意味着什么，对这問題他却保持相当緘默，但他所引用的英国职业統計表明他在思想上是指各种私人仆役、政府官吏、自由职业者——总之，是指資產階級經濟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一般公众”(Grand public)，当这些学者自己也完全莫名其妙的時候。馬克思說过，就是这个“一般大众”(Great public)被用来解释經濟学家所不能解释的事情。显然，如果我們把資本家和工人的消費当作一个范畴來說，我們不是指企业家个人，而是指整个資本家階級，包括他們的随从者

^① “俄国經濟发展問題的評論”，第284頁。

一雇員、政府官吏、自由职业者等等。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感缺乏的這些“第三者”，从经济学看来，大部分是剩余价值的共同消費者，只要他們不同时是劳动工資的共同消費者。这些阶层的购买力，有的来自无产阶级的工資，有的来自剩余价值；如果可能的話，也有来自双方的。但总的說来，他应当被認為是剩余价值的共同消費者。因此，他們的消費已經包括在资本家阶级的消費之中。倘若司徒卢威再从后台將他們拉上舞台，当作“第三者”来挽救局势，帮助实现剩余价值，那么，一个狡黠的投机商是不会受欺騙的。他一眼会看出这“一般大众”不是別的，而是他的旧相識即一群寄生者，他們首先从资本家那里取得貨幣，然后再以这些貨幣购买他的商品。不，确是不成！司徒卢威的“第三者”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司徒卢威的外国市场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的理論是同样站不住的。在这一点上，他推崇“民粹派”的机械的见解。按照这个见解，以及教授們的教科书，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剝削国内市场到它的极限，然后，在国内市场完全或几乎完全枯竭之后，轉向国外市场。司徒卢威，于是追随瓦格納、沙夫来和修莫勒之后，得出下列荒謬的結論：一个具有广大領土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成为一个“自給的整体”，并可以无限期依靠国内市场就足够了。①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性质来看，是世界规模的

① 其中修莫勒教授在他所著的“通俗商业政策考”一書中，明显地显示出德国教授們所发展的“三帝国理論”（即英国，俄国和美国）的反动性质。这个可尊敬的学者对于“新重商主义”，也就是，三大恶棍的帝国主义阴谋，抑鬱地摇头叹息。“为了較高的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他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軍和欧洲关税同盟。“由于世界的經濟紧张局势，德国的主要义务是为自己建立一支强大的海軍，以便必要时，准备作战，并符合作为世界强国的盟国的要求”。可是，稍后，修莫勒教授又在別处說，他并不想譴責这些世界强国再度走上大規模殖民地扩张的道路。“（德国）不可能，也不應該，象世界三大强国一样，采取征服政策，但它必須，于必要时，能够冲破外国对北海的封鎖，以便保护它自己的殖民地和巨大的商业，它也必須有能力对它所結成的同盟国提供同样的保証。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必須把与法国合作作为一个任务来看，其目的就是要对世界三大强国的过度侵略政策加以某些限制，这是为了保护所有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因为这世界三强已构成了所有小国的威胁；三国同盟还有責任确保緩和征服和殖民地并吞行动，減輕片面的、沒有节制的保护关税，減輕对弱小分子的剝削和虐待。整个較高的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取决于下列的事实，即二十世紀的世界不应在世界三大帝国之間瓜分，这三大帝国不应建立残酷的新重商主义。”（“十九世紀欧洲貿易政策的变迁”，“立法、行政及經濟年報”，第二十四卷，第381頁）。

生产。与德国学者們有书卷气的处方相反，资本主义，从它的幼年时代起，就已经为世界市场而生产了。在英国，远在破坏农民所有制的过程与手工业和古老的家庭工业的没落结束以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先驱部门，如纺织业、煤铁工业，已经在一切国家和所有各洲上找寻市场了。要是我们劝告德国化学和电器技术工业不要为五大洲生产，象它们从一开始所做的那样，而把自己限于为国内市场生产，因为国内市场，由于大部分由国外供应，对于所有德国其他工业而言，显然还远没有枯竭，这些工业会不会欢迎这个清醒的劝告吗？或者，我们应不应向德国机器工业建议，它们不必向国内市场冒险，因为德国的进口统计指出德国国内对这类生产品的需求还有很大部分是由国外供给满足的？不，这个“国外贸易”的概念不能帮助我们把握住世界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它的无数的支流和千差万别的劳动分工。美国的工业发展现时在世界市场上，甚至在英国本身的市场上，已成为英国的危险的竞争者，正象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和在德国本身的市场上，已经打垮了德国的竞争（电气技术工业就是一例）一样。这个事实证明了司徒卢威的推论的虚妄，实际上，司徒卢威在他写下这些推论时，已是陈旧过时了。

俄国“民粹派”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联系以及在社会劳动分工和地球上自然财富和生产条件的极端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同质的有机体的历史趋向中所看到的，只是商人对自己市场的肮脏的打算。而司徒卢威也附和了这个粗陋的看法。而且，他还接受了瓦格纳和修莫勒的“三帝国”幻想（即英国、俄国和美国的自给的帝国），而这个幻想完全忽略了、或人为地缩小了生活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无限制供应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东西的无限制供应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从世界市场角度计算，正如对于制成品的需求一样，是同样地必要的。单单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侵入世界五大洲的棉织工业历史——一般资本主义历史的缩影——使教授们的幼稚主张成为一个笑柄，实际上，这些主张的唯一真正意义是为保护关税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已。

第二十二章 布尔加科夫及其对 馬克思分析的补充

反对“民粹派”的怀疑論的第二个批評家斯·布尔加科夫，并不贊同司徒卢威的“第三者”說法。他断然否認“第三者”是資本主义积累的最后倚靠。他說：

“在馬克思之前，大多数經濟学家为了解决这个問題，認為某种‘第三者’，作为一个救命神，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借助于他們来消費剩余价值。扮演这种角色的，有豪华的地主（象馬尔薩斯所主張的），有揮霍的資本家，还有軍国主义，以及其他。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中間人，剩余价值就沒有需求，那时，市场停滞了，生产过剩和危机爆发了”。^①

“司徒卢威因此認為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其最終的支持，在于某些异想天开的“第三者”的消費。如果这种一般公众是以消費剩余价值为特殊使命，那么，他們又从那里得到购买手段呢”？^②

布尔加科夫在最初把整个問題集中在对社会总生产物及其再生产的分析上，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所做的那样。布尔加科夫很懂得为了解决积累問題，必須从簡單再生产入手，并充分了解簡單再生产的运用情况。关于这一点，他說，特別重要的是，要在不是生产消費品的生产部类中得到关于消費剩余价值和工資的一幅清晰图景；其次，要充分了解代表已被耗用的不变資本的那部分社会总生产物是如何流通的。他認為这是一个嶄新的問題，在馬克思把它提出来之前，經濟学家根本沒有意識到这样的問題。“为了解决这个問題，馬克思把所有資本主义下生产的商品分为基本上不同的两大范畴：生产品和消費品的生产。这个区分法，比之所

① 斯·布尔加科夫：“資本主义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5頁。

② 同上書，第32頁，附注。

有以前在市场理論上的爭論，更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①

我們看到，布尔加科夫是馬克思理論的率直的和熱心的擁護者。這樣，他的研究目的，照他自己所說的，是批判資本主義沒有國外市場就不能存在的學說。“為了這個目的，本書著者利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所寫的社会再生产的最有价值的分析。不曉得什麼緣故，這個分析還很少有人在经济理論上加以利用。尽管这个分析不能認為已全部完成，我們認為即令在現時片段的形式下，它為市場問題的解决提供了适当的基础，而這個解决方法与尼古拉·昂、伏隆左夫等等自称从馬克思那里找到而加以采用的方法是迥乎不同的”。^②

布尔加科夫對於他从馬克思那里推断出来的解决方法，作如下的表述：“在某些条件下，資本主義可以只靠國內市場而存在。利用國外市場來吸收資本主義的过剩生产，并不是資本主義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內在必要性。这是著者研究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結論”。

我們現在亟欲听一听布尔加科夫对上述命題所提出的論点：

初看起来，这些論点是意外的簡單：布尔加科夫忠实地重述了我們所熟知的馬克思簡單再生产图式，他附加了一些注释，这些注释表明了他的深刻的理解力。他进一步引用了同样為我們所熟知的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这里就是我們所亟欲找到的論点：

“基于上面所述的一切，确定积累形成的来源并不困难。第一部类（即生产資料部类）必須生产为扩大自己的生产和第二部类的生产所必需的追加生产資料。另一方面，第二部类也必須供应追加的消費資料來扩大两部类的可变資本。如果把貨幣流通暫置不論，生产的扩大就是第二部类所需的第一部类的追加生产物与第一部类所需的第二部类的追加生产物相交换”。

布尔加科夫忠实地遵循了馬克思的推論，但他沒有看到他的

① 斯·布尔加科夫：“資本主義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27頁。

② 同上書，第2—3頁。

整个命题不过是空論而已。他相信这些数学公式解决了积累問題。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容易地假想象布尔加科夫从馬克思那里抄来的那些比例数字，如果生产扩大，这些公式也将适用。然而布尔加科夫忽視了主要的問題：象他們所考察的那样机构如果扩大了，究竟誰从中得到好处呢？仅仅因为我們把积累的比例数字写在紙上，能不能就算解释了問題呢？不能，因为正当布尔加科夫宣布問題已解决，而接着要在分析中引入貨幣流通問題时，他馬上碰到了下列問題：第一和第二部类购买追加的生产物所需的貨幣从哪里来呢？过去我們研究馬克思时，他的分析中的弱点不止一次地冒出来，也就是，把实际上是扩大再生产中消費者的問題，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为追加的貨幣来源問題。这里，布尔加科夫十分順从地采用了馬克思的观点，他接受了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令人誤入歧途的表述，而自己看不到这个表述是不直捷了当的，尽管他充分知道“馬克思在自己的手稿中沒有解答這個問題，而这些手稿后来就編入資本論第二卷了”。因之，看一看这个馬克思的俄国学生自己企图作出的解答是什么，这对于我們是极饒兴趣的。

布尔加科夫說：“从我們看来，下列解答好象最符合馬克思的全部学說：第二部类以貨幣形态对两部类供应的新可变資本，就在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中找到它的商品等价物。在簡單再生产时，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家本人必須把貨幣投入流通中去，以实现他們的剩余价值，而这些貨幣最后流回到原来的資本家手中。剩余价值流通所需的貨幣量是按照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决定于以貨幣平均周轉率去除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价值。这个规律在这里也适用；第二部类的資本家必須拿出一定数量的貨幣，来流通他們的剩余价值，因此，必須拥有一定的貨幣貯存額。这个貨幣貯存額的大小，應該既足敷流通代表消費基金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之用，也足敷流通作为資本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之用”。

布尔加科夫还認為国内流通的若干商品包含剩余价值呢，还是不包含剩余价值這個問題，对于在国内流通一定数量的商品所

需貨幣多少的問題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在回答國內貨幣的來源這個一般的問題上，我們的解答是貨幣是由黃金生產者供應的”。^①

如果一個國家由於“生產擴大”而需要更多貨幣時，黃金的生產就必須相應地增加。所以，我們又看到：黃金生產者又成為救命神了，正象它對馬克思一樣。實際上，布爾加科夫，正在我們對他的解答抱著極大的期待時，使得我們感到非常失望。他的“解答”一步也沒有超越馬克思自己的分析。這個解答可以歸結為三個極其簡單的命題：（1）問：要实现資本化的剩餘價值，需要多少貨幣？答：根據商品流通的一般規律來決定所需的數量。（2）問：資本家要实现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從那里得到貨幣呢？答：我們設想他們有這筆貨幣。（3）問：貨幣最初怎麼會流入國內的？答：它是由黃金生產者供給的。這種解釋方法如此簡單，與其說它具有誘惑能力，不如說它令人懷疑不已。

這種以黃金生產者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救命神”的理論，我們不必耗費心力來駁斥它。布爾加科夫自己已經做得很好了。八十頁之後，在別一場合，即在对工資基金理論進行冗長的駁斥中（布爾加科夫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到這個爭論中去），他回到黃金生產者那里。這裡，他突然地表現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深刻的理解：

“我們已經知道在另外一些生產者中有一個黃金生產者。即使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這黃金生產者一方面增加在國內流通的貨幣絕對數量，另一方面，他購進生產資料和消費品，而不出售商品，僅以自己的生產物，即交換的一般等價物，來支付他們所購買的東西。現在，黃金生產者可能向第二部類購買全部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而以黃金支付，而第二部類即用黃金向第一部類購買生產資料，並增加自己的可變資本用來支付追加的勞動力。這樣，黃金生產者，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真正的國外市場。

“然而這個假定是十分荒謬的。接受這個假定將意味着社會生

^① 斯·布爾加科夫：“資本主義生產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50，55頁。

产的扩大,依存于黄金生产的扩大。(請注意!)这又以黄金生产的增加为前提,而黄金生产的增加却是很不现实的。如果黄金生产者必須为自己的工人向第二部类购买所有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那么,它的可变資本就不得不逐时逐日地扩大。可是,它的不变資本和剩余价值也将按比例增加,結果,全部黄金的生产也将大为增加。(請注意!)我們不必用統計数字来检查这个詭辯的假設——这无論如何是不大可能的——我們只要推論出一个事实,就足以駁斥这个前提:那就是伴随着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发展起来了。(請注意!)信用有促使貨幣流通量减少的趋向(这种减少当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絕对的)。这是交換經濟发展的必要补充,否則,交換經濟的发展将因缺乏硬幣而受到阻碍。我想这里我們不必引用数字来証明貨幣在交換行为中所占的地位现今是很小的。这样,这个假設証明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之,它必須加以駁斥”。^①

好!真好!因此,布尔加科夫也駁斥了他以前对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如何实现以及被誰实现的問題所作的解释。而且,馬克思对黄金生产者吞食社会全部剩余价值的假設只加了一个字的按語:“荒謬”。布尔加科夫在駁斥他自己的論点时,不过用較多的篇幅來說明馬克思所用“荒謬”一語的意义罢了。

不待煩言,布尔加科夫也好,广泛地討論这个問題的俄国一般馬克思主义者也好,真正解决他們的問題必須在別处寻求。象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和伊林(列宁)一样,布尔加科夫着重指出在分析总生产物的价值时,反对派的怀疑論者在积累的可能性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錯誤。他們,尤其是伏隆左夫,假設社会总生产物是由消費品組成的,他們并从一个錯誤的前提出发,即消費是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正象馬克思主义者现时所說明的,这是整个誤解的来源,也是有关剩余价值实现問題的一切想象中的困难(而为怀疑論者認為大惑不解的)的来源。

^① 斯·布尔加科夫:“資本主义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32頁以后。

“由于这个錯誤概念，这个学派制造了实际不存在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預先設想着那么的一种情况，即资本主义的消費基金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較小的一部分，其較大的一部分是用来扩大生产的，所以，这个学派（‘民粹派’）所想象的困难显然是不存在的”。^①

布尔加科夫这里对这个問題的漠不关心是令人惊奇的。显然，他沒有想到，关于最后何人得到好处的問題，虽然在全部剩余价值供个人消費的假定下是无关重要的，但在扩大再生产的假設下，它成为一个尖銳的問題了。

由于馬克思的两个发见——这两个发见，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不憚煩地引用来对抗他們的論敌——所有这些“想象中的困难”都消失了。第一个发见是：用价值来表示，社会生产物是由 $c+v+m$ ，而不是由 $v+m$ 所組成。第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前进，在这总額中 c 对 v 的比率不断加大，同时，剩余价值中資本化的部分也相对于被消費的部分而不断增长。在这个基础上，布尔加科夫創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消費的关系的一个完整的理論。因为这个理論，对于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对布尔加科夫，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們必須很好地了解它。

布尔加科夫說：“消費，或社会需要的滿足，仅仅是資本流通中的一个附带的因素。生产的规模决定于資本的规模，而不是决定于社会需要的数量。生产的发展与消費的增长不仅不是相伴而行，而且是互相对抗的。资本主义生产，除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費外，不知有其他的消費。而所謂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只是那些握有工資或剩余价值的人，他們的购买力严格地相当于他們的收入額。但是，我們已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发展规律倾向于压低可变資本和資本家的消費基金的相对数量（尽管在絕對数量上这两者有增加）。这样，我們可以說，生产的发展减少了消費。^② 生产

^①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20頁。

^② 重点是布尔加科夫加的。

的条件和消費的条件因此是互相矛盾的。生产的扩大沒有、也不可能促进消費。然而扩大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內在的基本規律，它以严格命令形式要求每个資本家从事竞争。这个矛盾的出路在于：扩大生产本身带来了追加生产物的市場。‘这个內部的矛盾，企图由生产的外部范围的扩大，得到均衡’^①。”（这里，布尔加科夫引用了馬克思的一句話，但他完全誤解了它；我們下面将再討論这一点）。“我們已經表明过如何使之成为可能”（这里是指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显然，这种扩大的大部分分配給第一部类，即不变資本的生产，而以較小（相对地）的部分分配給生产直接消費商品的第二部类。这两部类关系的变化充分說明消費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它也指出我們应从那里找到資本主义商品的最重要的需求”^②“即使在这个利潤动机和危机的狹隘界限內，即使在这个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資本主义生产，尽管在消費下降的情况下，仍有无限扩张的可能。俄国文献常常指出：由于消費的下降，資本主义生产的显著增加，如果沒有国外市場，就成为不可能了；但这是由于对資本主义社会中消費所起的作用作了錯誤的估計所致，他們沒有看到消費不是資本主义生产的最終目的。資本主义生产不是依靠消費的增加而存在，而是由于生产的外部范围的扩大，这个生产的外部范围实际上就构成了資本主义生产物的市場。許多馬尔薩斯学派的調查工作者，不滿意于薩伊和里嘉图学派的皮相的和諧学說，曾下了不少苦工，以解决这个毫无希望的工作；即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降低消費的情况下，寻求增加消費的方法。惟有馬克思才分析了其中真正的关系：他証明消費的增长致命地落后于生产的增长，即使任何人发明什么“第三者”，情况还是如此。因此，消費及其规模决不能成为生产扩大的直接界限。資本主义生产通过危机使自己从脱离生产真正目的的偏差中得到糾正，但它是不依賴消費为轉移的。生产的扩大，只有在資本的范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291頁。

② 布尔加科夫：“資本主义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第161頁。

围內，才能看出它的界限，也只有依存資本，才有可能”。^①

这里，布尔加科夫和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理論被認為是直接受馬克思之賜。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們的理論，从整个來說，是从馬克思學說中产生的，并成为馬克思學說的一个有机部分。在另外一个场合，布尔加科夫說得更清楚：这是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忠实的注释。一旦一个国家受到資本主义生产的侵入，它的內部运动将按照下列方式发展：

“不变資本的生产形成社会再生产的第一部类，从而在它的可变資本和它的資本家的消費基金的范围内創立了对消費品的独立需求。第二部类也在本部类內开始了对第一部类的生产物的需求。这样，在資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已經形成了一个封閉的圓圈，在这圓圈內，它并不依存外部市场，而是自給自足的；它能够通过积累而自己增长起来。^② 在另一处，他又以如下的粗糙的字句說明这个理論：“資本主义生产对生产物所提供的唯一市场，就是生产本身”。^③

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这个理論成为他們的主要武器，用来在市场問題上打击他們的論敌，“民粹派”的怀疑論者。只要我們根据一切众所周知的事实，看到这个理論与日常实践之間的触目惊心的矛盾，我們就能充分了解它的大胆狂妄。他們胜利地宣称他們的命題是最純粹的馬克思主义福音，而实际上，那是建立在一个十分簡單的混淆上面。我們只要考虑到这一点，我們不能不对它更加表示惊歎。當我們評論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时，我們还将有机会提到这个混淆的問題。

布尔加科夫，以他对資本主义經濟的消費和生产所曲解的关系为基础，还发展了一个完全錯誤的国外貿易理論。在上述的再生产的图景中本来沒有国外貿易立足的余地。如果資本主义在每一

① 布尔加科夫：“資本主义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第167頁。

② 同上書，第210頁（重点是著者加的）。

③ 同上書，第238頁。

个国家最初发展时，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如果，象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它能够为自己的生产物创造无限的市场并能自己刺激自己走上日趋扩张的道路，那么，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整体。只有在一种场合，国外贸易看来好象是合理的，那就是，通过国外的输入来弥补由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所产生的某些缺陷，也就是，由于绝对的必要而输入原料和食物。布尔加科夫，在彻底推翻“民粹派”的命题中，事实上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理论把输入农产品提到首要地位，而把工业品出口仅作为提供必要的偿付品的手段而已。国际间的商品交易在这里不是被看作从生产方式的性质所产生的，而是从各有关国家的自然条件所产生的。无论如何，这个理论不是从马克思、而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专家那里抄袭来的。正如司徒卢威从瓦格纳和沙夫来继承了三大帝国理论一样，布尔加科夫也承受已故的李斯特的学说，把国家按照“农业”和“农业与工业混合”来分类，不过，为了适应时代潮流，把它改为“工业”和“工业和农业混合”两大类罢了。第一类国家生来就缺乏原料和食物，因而必须依赖国际贸易。第二类国家天赋了一切所需物资，因而不感对外贸易的需要。第一类国家的典型是英国，第二类——美国。停止对外贸易将给英国一个经济上的致命打击，而对美国只能造成一个暂时的危机，保证仍能得到充分的恢复。“在那儿，生产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有无限扩张的可能”。①

这个理论是德国经济学中的陈旧遗物，它显然一点也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中所存在的各种相互关系。它观察近代国际贸易所用的概念也同样地适用于斐尼基时代的国际贸易。请听标歌(Buecher)教授的演讲：

“虽然自由主义的时代大大地便利了国际间的交易，但如果由此推论出国家经济的时代即将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国际经济时

①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99页。

代，那是錯誤的。……我們承認：在今天的歐洲，我們看到一些小國家，它們在商品供應上，不是獨立的國家，因為它們必須進口大量的食物和奢侈品，而它們在工業上的生產率又超過本國的需要，因而產生了一個永久性的過剩量，這個過剩量必須在國外的消費領域內找到出路。然而工業生產國和原料生產國雖然同時並存，相互依賴，但這種‘國際勞動分工’不應視作人類即將達到一種較高的發展階段的標志，即那種在世界經濟招牌下正當地可與……過去的各階段相對比的較高的發展階段。沒有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曾經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上保證過充分的獨立自主。在每種需要中必然留下一些空隙，必須用這種或那種方法來補足。在另一方面，所謂‘國際經濟’，無論如何還沒有產生與國家經濟所產生的基本上有所不同的任何現象。我們很懷疑象這樣的現象在最近的將來會不會出現”。^①

對於布爾加科夫而言，這個概念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論：他的資本主義發展具有無限能力的理論只限於某些具有有利的自

^① 標啟：“國民經濟的興起”，第五版，第147頁。桑巴特教授的理論是在這方面的最新的貢獻。他辯論道：我們不是向國際經濟前進，而毋寧是越走越離開國際經濟。“我認為，相反地，今天的商業關係沒有形成文明國家間，相對於它們的整個經濟來說，一個較強的紐帶，而毋寧是一個較弱的紐帶。各個國民經濟，比之一百年或五十年以前，並不較多地，而是較少地把世界市場考慮進去。至少……如果說國際關係對近代國民經濟的相對重要性是在逐漸增長，那是錯誤的設想。事實是恰恰相反”。桑巴特傲慢地拒絕了國際勞動分工逐漸增長的假設，以及國內需求缺乏伸縮性，因而對國外市場的需要越來越增加的假設。他自己確信“各個國民經濟將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個小天地，而且對所有工業部門，國內市場的重要性將越來越超過國外市場的重要性。”（“十九世紀德國國民經濟”，第二版，1909年，第399—420頁）。這個壓倒一切的發見是以完全接受這位教授的特殊的概念為前提。根據這個概念，所謂“出口國家”，由於某些理由，只是那些以超過自己需要的剩餘農產物，即以自己的“土地”支付進口品的國家。在這個概念下，俄國、羅馬尼亞、美國和阿根廷是“出口國家”，而德國、英國、比利時則不是“出口國家”。既然俄國和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遲早將要求以自己的過剩的農產物供應國內的需求，顯然，世界上的“出口國家”將越來越少——國際經濟從而也將消失。桑巴特的另一發見是：有些“非出口”的資本主義大國以輸出資本的利息形態，越來越多地取得“無償”的輸入——但對於桑巴特教授而言，資本的輸出以及工業品的輸出是絕對可以不加考慮的。“隨着時間的進展，我們將要達到只有輸入而沒有輸出的境界”（第422頁）。好不摩登，好不聳人聽聞，好不難能可貴啊！

然条件的国家。在英国，资本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世界市场不久即将枯竭。在美国、印度、和俄国，它将有无限发展的前途，因为这些国家是“自给自足”的。

除了这些明显的怪论外，布尔加科夫关于国外贸易的主张还包含一个基本的错误。从西斯蒙第至尼古拉·昂的怀疑派都相信要实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必须求助于国外市场。布尔加科夫反驳他们的主要论点如下：

“这些专家显然认为国外市场是一个‘无底洞’，可以永久地吞食一个国家在国内所不能卖掉的剩余产品”。

布尔加科夫于是沾沾自喜地指出，国外贸易诚然不是一个“洞”，更不是一个“无底洞”，而看来毋宁是一把双刃的剑，因为输出总是带来输入，而两者是经常相互平衡的。这样，通过一方从国界上推出去的任何东西，将通过另一方以改变的使用形态，从国界上收回来了。他说：“对于作为输出的等价物而输入的商品，我们必须一定的市场限度内为它们找到出路，但根据我们的前提，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求助于国外市场只能产生新的困难”。^①

在另一场合，他说，俄国“民粹派”所找到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出路，即国外市场，“比马尔萨斯、吉尔希曼和伏隆左夫（当他写‘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文时）所找到的出路，更为不利”。^②

尽管布尔加科夫热诚地照抄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但他完全不理解从西斯蒙第到尼古拉·昂的怀疑派所探索的问题真正所在。他否认国外贸易，象被说成的那样，能够解决这个困难，因为它把已经卖出去的剩余价值，以“改变的形态”，重新输回国内。这样，

①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第132頁。

② 同上書，第236頁。弗·伊林（列宁）以确定不移的語句表述同样的見解如下：“浪漫主义者（他对怀疑派的称号——譯者）說，資本家不能消費額外价值（按即剩余价值——譯者），因此必須把它銷售到国外去。試問，資本家是不是就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給外国人或者拋到海里去呢？售賣就是获得等价物，輸出一種产品就意味着輸入另一種产品。”（列宁：“評經濟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頁）事实上，他对国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的說明，与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的相較，远为正确。

他按照吉尔希曼和伏隆左夫粗糙的表述，相信問題是在于消灭一定数量的剩余价值，把它从地球上抹杀掉。他根本没有想到，問題是在于实现剩余价值，商品的变形，从而，也是剩余价值的“改变形态”。

布尔加科夫因此最后与司徒卢威殊途同归。他宣传资本主义积累的自給性，認為资本主义积累可以消費自己的生产物，正象克罗諾斯^①吞食自己的孩子一样，并可以不借助于外援而自己生长得越来越强大。到此为止，从馬克思主义退回到资产阶级經济学，只差一步了，而命运却促使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来完成这一步。

第二十三章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 及其“不平衡”論

我們把这个理論家留到最后来处理，尽管他早在1894年已用俄語发展了他的见解，也就是，在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之前，这是部分地因为他用德語发表他的成熟的理論是在較后的日期，^②同时也因为他从馬克思主义批評家的前提所得出的結果具有影响深远的含义。

象布尔加科夫一样，图岡·巴拉諾夫斯基也是从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出发的，这个分析从錯綜复杂，令人堕入五里雾中的問題中，給他一个綫索。但布尔加科夫，作为馬克思的热心的弟子，只是力图忠实地跟着馬克思走，并把他自己的結論都归之于老师；而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則相反，他把规律归功于馬克思，但認為馬克思沒有很好地利用自己对于再生产过程的傑出的論述。图岡·巴拉諾夫斯基从馬克思的原理得出的最重要的一般結論，作为他的整个理論的中心点的，就是与怀疑派的假設相反，資本主

^① 希腊神話的收获神——譯者。

^②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論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和“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基础”（1905年）。

义积累在收入和消費的資本主义形态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完全不依存于这两者的。他說，形成最好的市場的，不是消費，而是生产本身。生产和市場因此是相同的。既然生产的扩张本身是无限的，市場，即吸收它的生产物的能力，也是沒有界限的。他說：

“所引的图式无可爭論地証明一个命題，这个命題，尽管簡單得很，极易引起別人的非難，除非对这个社会資本的再生产过程有充分的理解。这是一个什么命題呢？那就是：資本主义生产为自己創造一个市場。只要社会生产有扩大的可能，为这个目的所需的生产力足够使用，那么，社会生产按比例的分割必然造成需求的相应扩大，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新的生产物代表新創造的购买力，用来取得其他物品的。以社会資本的簡單再生产与扩大规模的再生产相比較，我們得出最重要的結論如下：在資本主义經濟中，商品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是不依社会消費的总量为轉移的。整个社会消費量下降了，而同时社会对商品的总需求却有增长，这从‘常識’看来，似乎是荒唐的，然而仍然是有可能的”。^①

他繼續下去說：“从社会資本的再生产过程的抽象分析中，我們得出这样的結論：由于社会資本按比例分割的結果，社会生产物沒有发生剩余”。^②

因此，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对馬克思的危机理論，作了一个修正，因为他認為这个危机理論是从西斯蒙第的“消費不足論”中发展出来的。“一般認為占居民的絕大多数的工人的貧困，由于造成需求的下降，使不断扩大的資本主义生产的产品，不可能得到实现。馬克思大体上同意这个见解。但这个见解肯定是錯誤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义生产創造它自己的市場——消費只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契机之一。在一个有計劃的社会生产中，如果生

①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論和历史的研究”，第23頁。

② 同上書，第34頁。

产指导者掌握关于需求的全部知識并拥有把劳动和資本从一个生产部門自由地轉移到另一部門的权力，那么，任凭社会消費水平如何低下，商品的供給不会超过需求”。^①

唯一的情况足以周期地造成市场泛滥的，是在扩大再生产中缺乏平衡。所以，在这个假設下，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描述資本主义积累过程如下：“如果生产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組織起来的，工人們将……生产什么呢？不待說，他們自己的生活資料和生产資料。那么目的何在呢？为了扩大第二年的生产。生产什么东西呢？又是生产資料和工人們的生活資料——这样下去，可以无穷无尽”。^②

請注意，这场問答的游戏不是一种自我嘲弄，而是在十分严肃認真的态度下进行的。“如果生产的扩大沒有实际的限制，那么，我們必須假設市场的扩大也同样沒有限制，因为如果社会生产是按比例組織起来的，市场的扩大，除了现有的生产力外，也沒有限制”。^③

既然生产这样創造自己的需求，資本主义国家的国外貿易也給与那种特殊的、机械的作用，象我們已經从布尔加科夫那里看到的一样。举例來說，国外市场对英国是絕對必要的。“这难道不能証明資本主义生产創造出国内市场所不能容納的剩余生产物嗎？說到这里，英国为什么需要国外市场呢？答复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因为英国购买力的相当大的部分是用来购买外国商品的。英国为着国内市場而輸入外国商品也使得英国有必要把本国商品輸往国外。既然英国不能不輸入商品，輸出对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生存条件，因为如果沒有輸出，它就沒有能力来支付它的輸入了”。^④ 这里，农产品的輸入被描繪成刺激的、决定性的因素。这

①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論和历史的研究”，第333頁。

② 同上書，第191頁。

③ 同上書，第231頁(重点是原著中有的)。

④ 同上書，第305頁。

是与德国教授們所謂天生依靠相互交換的两类国家——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公式十分相符的。

然則，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用以支持他对积累問題的大胆解答(并由此而說明的危机問題和其他問題)的立論根据是什么呢？令人不可相信的，然而也是无可爭辯的，就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証明单单地是由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所組成的——不多、也不少。虽然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反复地、夸大地、提到自己的“社会資本再生产过程的抽象分析”，提到他的分析的“无可爭辯的邏輯”，这个分析的全部不过是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复制品，仅仅改換了一套数字罢了。在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全部著作中，我們再也不能找到任何其他論点的痕迹。不錯，在馬克思的图式中，积累、生产、实现和交換都象钟表那样，运行得十分圓滑和准确；无疑地，这种“积累”能够无限地繼續下去，也就是說，只要墨水和紙張还没有用完。就是这个无害的笔算的練習，使得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十分認真地把它当作实际事物进程的示范。他說：“我們所得出的图式必然会无可爭辯地証明……”。

在另一场合，他以下列語句駁斥霍柏森(Hobson)的积累不可能的理論：“第二图式所表明的扩大规模的社会資本再生产相当于霍柏森所設想的資本积累的情况。但在这个图式中，我們会不会看到生产过剩的发生呢？远不是如此”。^①

因为“在图式中”沒有出现生产过剩，所以，霍柏森被駁倒了，問題也就解决了。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固然也清楚地知道，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事实沒有象这样圓滑地进行。在交換的关系和周期性危机中不断发生波动。但是，这些危机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扩大生产中，沒有保持正当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說，因为第二图式中的比例关系首先沒有被遵守之故。如果这些比例关系被遵守了，就

^①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論和历史的研究”，第314頁。

不会发生危机，而资本主义生产，正象在紙上一样，可以順利地前进。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还抱这样的见解：如果我们把再生产过程当作一个連續的过程，我們可以略去危机而不論。尽管“比例关系”可能在任何时刻遭到破坏，但平均看来，經過不同的偏差、逐日的价格波动、以及从长期看，通过危机，它总是会重新建立起来的。从整个来看，这个“比例关系”或多或少是被維持下去的，这可从资本主义繼續頑强地存在这个事实中得到証明——否則，它老早在分崩离析中告終了。这样，从长期看，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比例关系”大体上能保持下去，因此，我們必須作出现实与第二图式相符的結論。既然这个图式可以无限地扩展下去，所以，资本主义积累也能无限地进行。

这里令人惊异的，不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关于图式与实际事物的进展相符的結論——誠如我們已看到的，布尔加科夫也抱着同样的信念；真正令人惊异的，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不觉得有研究这个图式是否正确的必要，他不去証明这个图式，反而把这个紙上的数学練習看作实际事物的証明。布尔加科夫忠实地企图在资本主义經濟和资本主义交換的现实具体的关系上引伸馬克思的图式；他力图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困难，但沒有得到成功；他直到最后还沉浸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尽管他承認它是不完全的、片断的。但图岡·巴拉諾夫斯基不需要任何証明，他不大开动他的脑筋：既然算学数字可以滿意地得出来，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繼續下去，这对他來說，就是资本主义积累也能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的証明——只要那个“比例关系”能保持下去的話，而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自己也从来不想否認这个“比例关系”無論如何是会保持下去的。

但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对于这个图式及其奇异的結果与现实相符，并忠实地反映现实这一点，有一个間接的証明，这就是如下的事实：根据馬克思的图式，资本主义生产把消費放在次于生产的地位，把前者看作手段而把后者看作目的本身，正象它

把人的劳动，“工人”，看作与机器一样的。

“技术的进步是以劳动手段、即机器，較活劳动、即工人自己的重要性越来越增加这一事实来表现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和商品市场上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与机器相較，工人越来越退向后台去，而从工人的消費所产生的需要也被从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費所产生的需求所掩盖了。整个资本主义經濟的活动具有一种为本身而存在的运行机构，在这机构中，人类的消費表现为再生产过程和資本的流通的一个單純的契机”。^①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把这个发见(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从一个十分具体的现象中得到証实，那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部类相对于第二部类，并以第二部类为牺牲而繼續不断增长。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創立了这个规律，而把它作为再生产图式表述的基础，尽管在进一步发展他的图式时，为了簡單起见，他把后来的改变暫置勿論。生产资料部类比之消費资料部类，可以自动地增大。这一点就被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用来作为他的理論的客观証明：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們消費越来越变得不重要，而生产越来越变为目的本身了。这个命題形成了他的整个理論体系的奠基石。

他宣称：“在所有工业国家，我們遭逢到同样类型的发展——国民經济到处按照相同的基本规律而发展的。为近代工业制造生产资料的采矿工业越来越占显著的地位。因此，英国供直接消費用的制造品輸出的相对减少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一个表现。技术进步越是向前迈进，消費品，比之于生产资料，越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以与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費相較，人們的消費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②

虽然这个“基本规律”，象他的其他一切“基本”规律一样，如果

①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論和历史的研究”，第27頁。

② 同上書，第58頁。

有任何意义的話，是从馬克思那里趁现成地照搬过来的，但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不以此为滿足，他立即把馬克思主义的福音向馬克思本人說教。在象盲人般的滿紙涂鴉中，馬克思又献出了另一顆珍珠，——而图岡愿意把这顆珍珠給他，只是他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因此，需要一个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来发见如何把它应用到科学上去，而在他的手中，这个新发见的规律突然地照亮了資本主义經濟的全部运行机构。这个生产資料部类以消費資料部类为牺牲而不断扩大的规律，清楚地、扼要地、确切地，并在可以計算的字眼下，表明了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的消費越来越失去重要性，人类与生产資料受到同等的看待，因此，馬克思認為創造剩余价值的，只是人，而不是机器；并認為人类的消費成为資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限度，从而資本主义生产必然在目前造成周期性危机而在不久的将来，則給資本主义經濟带来崩潰和恐怖的結束——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总之，生产資料較之消費資料相对增长的“基本规律”反映了整个資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本质，这种本质馬克思似乎是不懂得的，而詳細加以說明的任务落到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身上来了。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資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和怀疑派之間的爭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我們已經知道布尔加科夫的說法。我們已經提到过的另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伊林，在对“民粹派”的論战中，以类似的語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下：

“大家知道，資本发展的规律就是不变資本比可变資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說，新形成的資本愈来愈多地轉入制造生产資料的社会經濟部門。因而，这一部門必然比制造消費品的那个部門增长得快，也就是說，正是发生了西斯蒙第認為是‘不可能的’‘危险的’事情。因而，个人消費品在資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縮小。这是完全符合資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結構的：前者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則使居

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①

当然，在这方面，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还更进一步。由于他爱好似是而非的議論，他甚至卖弄小聪明，用数学公式来証明，即使在消費绝对量减少下，資本的积累和生产的扩大，仍属可能。关于这一点，考茨基曾指出：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利用了科学上大可疑的遁辞，那就是說，他的大胆推論只限于一个特殊的时刻：由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过渡时刻——这个时刻即使在理論上也是例外的，在实践上自然也无任何意义可言。②

至于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基本规律”，考茨基認為那只是一个錯觉，因为图岡只考虑了具有資本主义大工业的老国家中的生产組織。

① 弗·伊林〔列宁〕：“經济学研究与論文”，圣彼得堡，1899年，第20頁（譯文录自列宁：“評經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頁）——附带地說一句，同一著者曾經声言扩大再生产只是在資本主义下开始的。他認為简单再生产是所有前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例，他沒有注意到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我們可能永远不会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刮刀而前进。

② “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危机理論”，第116頁。考茨基从数学上給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証明：消費必然会増加，而且严格地“按照生产資料的价值量以一定的比率”増加。这个証明有两点应加以評論：第一、象馬克思一样，考茨基沒有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进去，因此，消費的数量，比之实际上所有的，显得相对地較多。第二、考茨基在这里所指的消費的増加，既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可变資本的增长，新增的工人的雇用，而发生的。然而这些工人的生活維持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資本家阶级个人消費的増加相同的。考茨基的議論无疑地駁斥了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自鳴得意的看法：在消費绝对减少下，也可得出扩大再生产的古怪念头。尽管如此，他沒有接近基本問題，即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費間的关系，虽然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中，作者告訴我們道：“随着資本家越来越富有，以及他們所剝削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增加，他們对不断扩大的資本主义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費品，形成了一个市場，但这个市場增长得不象資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那么快，因此，必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它們自己領域之外，必須从那些尚未进行資本主义生产的职业阶层和民族間，为这些消費品要求一个附加的市場。这种市場找到了，而且也在不断扩大中，但还扩大得太慢，因为这种附加的市場不象資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的具有伸縮性和扩张能力。一旦資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象在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那样，它就能飞跃地扩张，以致很快地超越了一切市場的扩张。这样，随着市場的大量扩充而发生的每一个繁荣时期，是注定了要夭折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簡言之，这就是馬克思所創立的危机理論，照我們所知，它是一般地为“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同上書，第80頁）。但是，考茨基不想把这个实现生产物的概念与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調和起来，这也許是因

考茨基說：“不錯，随着劳动分工的进展，生产直接供个人消费用的产品的工厂将相对地逐渐减少，而以工具、机器、原料、运输设备等等供应前者、并相互間供应的工厂則相对地增加。在原来的农民經濟中，种植亚麻的生产场所也用自己的工具制造麻布，并使之适合于直接的个人消费，但今天却有几百个企业通过生产原棉、鉄軌、运入港口所需的蒸汽机、鉄路車輛等等来参加制造一件衬衫。随着国际劳动分工，有些国家——老的工业国家——只能慢慢地扩大供个人消费的生产，但在生产生产資料上却有长足的进展，而生产資料的生产，較之消費品的生产，在經濟生活的脉搏上，

为，象我們所引文句所表明的，他完全从危机方面来研究这个問題，換言之，他把社会生产物看作或多或少地无差别的貨物量，而不考虑这个事实，即社会生产物在再生产过程中是有区别的。

布亭(L. Bouding)好象較近这个关键問題。在他对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杰出的評論中，他作如下的表述：“除了下面即将討論的一个例外，資本主义国家之有剩余生产物存在并不阻止生产車輪的前进，这不是因为生产在不同領域間将更有效地进行分配，也不是因为棉制品的生产将为机器的制造所代替。原因毋宁是：既然有些国家的資本主义发展比另一些国家要开始得早些，而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国家还没有发展資本主义，因此，資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拥有一个外部市場，可以把它們自己所不能消費的生产物，不管棉制品也好，或鉄制品也好，在那里抛售出去。我們决不否認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的重要生产物中棉制品之被鉄制品所代替，具有重要意义。相反地，这个变化是极其重要的，但它的含义是与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所列举的有所不同。它表明資本主义終結的第一步。只要資本主义国家还在輸出消費商品，这些国家的資本主义还有发展的希望，至于非資本主义的外界能吸收資本主义商品多少以及多久，这样的問題是不发生的。但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輸出中，如果机器所占的份額排挤消費品而逐渐增加，这表明过去資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因而成为資本主义剩余生产物的傾銷場所的地区現在已卷入資本主义的旋渦中了。它还表明，既然这些地区自己也在发展資本主义，它們自己也能生产它們所需的消費品。目下它們还需要用資本主义方法生产的机器，因为它们还只在資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但不久它們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正象它們現在制造自己的棉制品和其他的消費品一样，它們在将来也将生产它們自己的鉄器。这样，它們不仅将停止吸收原来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而且它們自己也生产剩余生产物，而对这些剩余生产物它們也将感到处理的困难”。（“新时代”，第二十五卷，第一册，“駁馬克思的数学公式”，第604頁）。布亭这里說出了在国际資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作为一个邏輯上的結果，他已深入到帝国主义的問題，但可惜，最后，由于他考虑到整个軍国主义生产以及在“浪費性的开支”标题下，国际資本向非資本主义国家輸出的問題，他对自己的銳利的分析，放上了一种錯誤的鋒芒。我們必須附带地說：布亭，正象考茨基一样，認為生产資料部类相对于消費資料部类以較快速度增长的規律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錯覺之一。

具有更决定性的意义。从有关国家的观点来看，我們可能容易得出这样的一种意见：即生产资料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并以比消费品較快的增长速度，被生产出来，而这种生产与消费品的生产是不相結合的”。

生产资料可以不依存于消费而被生产出来的意见，当然，只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的具有庸俗經濟学的典型性的幻想。用来支持这个謬論的第一部类以較快于第二部类的速度增长的事实却不是如此：这个事实是无可爭辯的，不仅在老工业国家如此，無論在什么地方只要技术进步在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时，也都是如此。这也是馬克思的利潤率趋向下降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但是尽管如此，或毋宁正因为如此，如果布尔加科夫、伊林和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認為从这个规律中发见了资本主义經濟的基本特点，即作为一种經濟制度，它是以生产本身为目的，而人类消费只是附带性质的，如果他們这样設想，那是笑話。

不变資本以可变資本为牺牲而增长只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产生的一般影响的资本主义表现而已。把 c 大于 v 的公式($c > v$)，从资本主义的术语，翻譯成社会劳动过程的語句，就意味着人类劳动的生产率越高，把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改变为制成品所需的时间越短。①

① “把土地肥沃性这一类的自然条件暫置不論：把独立的个别进行劳动的生产者的熟練（它不是更在量上由制成品的多寡来表现，但更是質上由制成品的良否来表现）也暫置不論，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程度，是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以劳动力同一强度轉化成生产物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来表示。他用来发生机能的生产资料的量，随他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增进。在这里，这个生产资料要起两重作用。某一些生产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別一些的增加，則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例如，靠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与机器的采用，在同一时间内，会有較多量的原料被加工好，从而，有較多量的原料及輔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被使用的机器，劳动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的量，却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在建筑物，熔鉄炉，运输机关等等面积聚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如此。但不論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与合并在它里面的劳动力比較而言增大了，这种增大总表示着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与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比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或者說，与它的客观因素比較而言，劳动过

这是人类劳动的普遍规律。它既适用于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也将适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总生产物的物质使用形态来看,这个规律必然表现为社会劳动时间,使用在生产生产资料上的,较之使用在生产消费资料上的,将越来越多。在一个按社会主义路线组织的有计划的、管理的社会经济中,这种转变将比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发生得更快。首先,合理的科学技术只有当私人土地所有制的障碍取消后,才能大规模地得到应用。这将形成在广大生产领域上的巨大变革,其最后结果,将使活劳动为机械所代替,并使我們能够以在目前条件下所不可能的规模开展技术工作。第二、机器将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机器并没有与活劳动竞争,而仅与活劳动中有偿部分竞争。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的费用代表应用机器的最低限界。这就是说,资本家之使用机器,是在机器的生产费——在生产能率相同的场合下——低于它所排挤的工人的工资时,才加以考虑。从社会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是唯一值得考虑的——的观点来看,机器不是与维持工人的必要劳动相竞争,而是与工人所实际完成的劳动相竞争。换言之,在一个不受利润动机支配而以节约人类劳动为目的的社会中,机器的使用,只要它所能节约的劳动超过它本身在制造时所需的劳动,就符合了经济的原则,不要说在其他许多场合下,尽管不符合这个经济上的最低要求,但由于健康及其他类似原因,为工人本身的利益计,机器的使用仍然是需

程的主观因素的量在减少。”(资本论,卷一,第782—784页)马克思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我们前面讲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更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类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它们在劳动手段的形态上,全部一起地,合并到过程里面去,并且不断反复地,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它里面发生作用——的量会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它的结果。这个形态上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并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照第一卷第二十三章II,第781页以下),特别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态,生产资料,并不单是由这种劳动手段构成,且还由各种加工阶段中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跟着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由协作分工及机器等等引起的增进,逐日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53页)

要的。不管怎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机器的经济使用限度，两者间的距离，至少等于活劳动及其有偿部分之间的差别，换言之，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等量物。因此，如果取消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实行了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机器使用的限界将突然增高，其增高的差额相当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全部，所以，那时，将为机器的胜利前进开辟了预想不到的广阔场所。这将具体地证明：号称促进最大限度的技术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对技术的进步，在它依据的利润动机的形态下，筑起了巨大的社会障碍。一旦这些障碍取消了，技术进步将掀起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那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奇迹，相形之下，将成为微不足道的儿戏了。

以社会生产物的构成来说，这种技术进步只能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比较起来——用劳动时间单位来计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在今天还要增长得快得多。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社会生产的两部类的关系，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典型的卑劣特性，即对人类消费需要的漠视；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毋宁证明了自然逐渐受制于社会劳动的表现，而当生产完全依据人类需要而组织起来时，这种表现将更为显著。这样，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基本规律”的唯一客观证据就消散为一种“基本的混淆”。他的全部体系，包括他对危机的新理论，连同他的“不平衡论”，结局都变为建筑在纸上的基础：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奴隶般的抄袭。

第二十四章 俄国“合法”馬克思主义的終結

俄国“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图岡·巴拉諾夫斯基，在他們与資本主义积累的怀疑論者进行斗争中，运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及其图式的表现。这样，在丰富經濟理論上，他們可以申請一份功績，但由于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把这个图式十分錯誤地看作問題的解答，而不是看作問題的表述，他的結論必然地顛倒了馬克思学說的基本順序。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認為資本主义生产能够創造出无限的市場，它并不依存于消費的見解，促使他走上了薩伊—里嘉图的命題，即生产和消費、供給和需要間的自然平衡的理論。他們間的差別只在于薩伊—里嘉图两人仅在簡單商品流通的概念下考察問題，而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把同样的学說应用到資本流通上去了。图岡的由“不平衡”造成危机的理論，实际上，只是薩伊的陈腐而无聊的謬論——即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过剩仅足以表明另外一种商品的生产不足——的翻版，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个荒唐无稽之談以馬克思再生产过程分析中所用的術語重述一番而已。虽然图岡宣称与薩伊的主张相反，从貨幣流通的角度来看，一般的生产过剩是可能的，而薩伊則完全忽視了貨幣流通的問題，但事实上他在得意地玩弄馬克思的图式时，他所依据的条件正是对貨幣流通的忽視，也就是，薩伊和里嘉图在历次探討危机問題时所常犯的錯誤。当“第二图式”应用到貨幣流通时，就荆棘丛生了。布尔加科夫，在企图把馬克思所中輟的分析貫徹至邏輯的結論时，也陷于这些荆棘中而不能自拔了。而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所自謙为“对馬克思理論和古典經濟学的綜合的嘗試”，不过是从馬克思那里承襲的思維形式与从薩伊和里嘉图那里取得的内容加以混合而已。

在几乎一百年后，那些面对着小资产阶级的怀疑论调而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有发展可能的乐观理论，经由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合法者”的健将之手，重新回到它的出发点，即萨伊和里嘉图那里来了。这三个“马克思主义者”与在黄金时代——当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无罪的乐园”中被驱逐出来之前不久——的资产阶级“和谐论”者会师了——这个圈子刚好绕了一周。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是过于彻底了。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证明有发展的可能时，甚至提出理论上证明，认为资本主义能永远存在下去。如果设想资本的积累没有有限界，那么，这显然证明了资本主义有无限生存的能力！积累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扩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以及促进经济进步的方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保证生产力的无限扩张、和经济的无限进步，那么，它诚然是不可战胜的了。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客观论点就会粉碎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不再是经济事件的反映，而社会主义不再成为历史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推论，原来是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为目的，而结局却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了。

这三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在争论中他们是向后转了，尽管司徒卢威在颂扬资本主义的文化使命时，一点也不害怕失去一个有用的保证。^① 布尔加科夫试图对现时在社会主义理论

^① 司徒卢威在他的俄文论文集的序言（1901年出版的）中说：“1894年当著者发表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批判’时，他在哲学上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倾向于坦率的、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著者认为在实证主义以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看不到整个真理，它们就不再充分决定他对世界的看法。恶意的教条主义不仅恫吓进行不同思考的人，而且还窥测他们的道德和心理，它把这样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享乐主义者思想的反复无常’。它不能理解批评的权利本身对于一个活着的、能想的、个人是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著者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尽管他可能将经常处于被指控为‘反复无常’的危险之下”。（“杂志”，圣彼得堡，1901年）

中所造成的一个缺口,尽可能用同样理論的另一片段来加以堵塞:他希望資本主义社会,尽管在生产和消費間有內在的平衡,但由于利潤率的下降,仍然将趋于灭亡。但結局,布尔加科夫自己却推翻这一点模糊安慰的根据。他忘記了他用来解救社会主义的这根稻草,他于是教导图岡·巴拉諾夫斯基道:在大資本的场合下,利潤率的相对下降将被資本的絕對增大所抵銷。^①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比其他两人,較为前后一致。他最后以一种野蛮人的樸素的快乐、情緒破灭了支持社会主义的所有客观的經濟論点,这样,根据他自己的精神,建立了一个在倫理基础上的“更美妙的世界”。“作为个人,他要反对把目的(人)变为手段(生产),又把手段(生产)变为目的的那种經濟組織。”^②

上述三个所謂馬克思主义者刚刚为社会主义奠下了新的基础,却立即背叛了社会主义。他們自己出来証明社会主义的新基础是脆弱的,是草率地建立起来的。当俄国人民群众为了实现一个未来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将把目的(人)放在手段(生产)之上——的理想,而正在献出他們的生命时,那“个人”却退却了,企图从康德那里去找哲学上和道德上的安慰。事实上,“合法”資產階級馬克思主义者,正象我們所預料的那样,結局是从他們的理論地位滾入資產階級和諧論的陣营中去了。

① 布尔加科夫:“資本主义生产的市場問題,理論的研究”,第252頁。

② 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論和历史的研究”,第229頁。

第三編 积累的历史諸条件

第二十五章 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矛盾

我們在第一編中看到馬克思的积累图式沒有解答扩大再生产是为着誰进行的这一問題。如果从字面上看資本論第二卷末尾的图式,好象資本主义生产,总是自己实现全部剩余价值,并应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資本化的剩余价值的。这是馬克思在分析他的图式时所給人的印象。他好象反复地試图以貨币手段,即資本家与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表现图式中的流通問題。这种嘗試,結局会使他認金生产者为救命神借以引导到再生产問題。此外,資本論第一卷中,省一段重要的話也只能作同样的解释,在那里,馬克思說:“首先年生产必須供給这一切对象物(使用价值),来补充一年中消費掉的資本的物質成分。把此等部分除去以后,留下的,就是剩余价值依以存在的純生产物或剩余生产物。这个剩余生产物是由哪些物品构成的呢?也許是由那些用来滿足資本家阶级需要与愿望的物品;此等物品,会加入資本家的消費基金內。但若就是这样,剩余价值就被干杯到底,只能有簡單再生产了。

为要积累,人們就須把剩余生产物一部分轉化为資本。如非借助于奇迹,能轉化为資本的,是限于能被使用在劳动过程上的物(即生产資料),和劳动者能依以維持生存的物(即生活資料)。因此,年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必須被使用来生产追加的生产資料及生活資料,那是替換垫支資本必要量以上有余的。一句話,剩余价值能轉化为資本,只因为剩余生产物(剩余价值就是它的价值),已經含有一个新資本的各个物質成分。”^①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726頁。

于是,为要积累,就必须具备下述条件:

一、资本化的剩余价值首先就以资本的实物形态出现(作为追加的生产资料及劳动者的追加生活资料的)。

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来进行的。

三、生产扩大(积累)的限度,总是由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大小来决定的。既然这个限度依赖于表现剩余生产物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量的结合,所以它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如果缩小,实物形态的剩余生产物一部分,就将不能使用了。不管哪一方向的偏差,偏高或偏低,都能惹起周期的动荡与危机(关于这一点,暂时不管);因为,平均来看,资本化的剩余生产物与事实上的积累,总归要相等的。

四、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是其剩余生产物的唯一购买者,所以资本积累,没有什么限界。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是和上述条件相一致的。在这里,积累是自动地进行着,到底生产是为何人而益加扩大?为哪一些新的消费者而益加扩大?一点也不清楚。那个图式,设想如下的过程:煤炭工业之扩大是为了扩大制铁工业,制铁工业之扩大是为了扩大机器工业,机器工业之扩大是为了扩大消费资料的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扩大,又是为着维持矿工、铁工、机器工及本部门日益增多的劳动大军。这样一来,事情就绕着圈子“无限地”反复旋转。如果孤立来看马克思的图式,它的确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因为马克思本人曾经反复而明确地指出,他企图从单纯由资本家与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中,去说明总资本的积累过程。关于这个问题,“资本论”各卷中都可以找到。

“资本论”第一卷“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那一章,恰好就这样说过:“在这里,使一国奢侈品能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反之也使一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转化为奢侈品的输出贸易,是被搁在一边了。为了要摆开搅乱的附随事件,便于在纯粹形态

上理解研究的对象，我們在这里必須把商业世界当作一国，并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經到处确立，并且已經征服一切产业部門。”^①

“資本論”第二卷中，这个假定出现过好几次。例如，第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这样說：

“现在只有两个出发点：資本家和劳动者。一切第三种人，不是为这两个階級服务，从他們那里得貨币为酬，便是不提供对当的服务，就在地租利息等等形态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至于劳动者，我們講过，就劳动者投入‘流通中的貨币来說，他只是第二步的出发点，資本家却是第一步的出发点。”^②

更在同一章內，特別关于积累前提下的貨币流通，有这样一些話：

“……但若我們假設資本家階級不是一部分而是全体从事貨币資本的积累，困难就发生了。依照我們的假設，——资本主义生产有一般的和唯一的統治地位——在这个階級之外，还只有劳动者階級。”^③

同样在第二十章也說过：

“……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階級存在：那就是只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的劳动者階級，和独占着社会生产資料，也独占着貨币的資本家階級。”^④

在“資本論”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說明中，馬克思很明确地說：

“讓我們設想全社会只是由产业資本家和工資劳动者构成。又把那种价格变动除开不說，那种变动会使总資本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替換。而在全部再生产过程的全面联系（这特别是由信用制度发展的）中必然会引起暫時的一般的停滞。同样，又把信用所助长的虛假营业和投机买卖也除开不說。这样，危机好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727頁附注21a。

② 同上書，第二卷，第402頁。

③ 同上書，第420頁。

④ 同上書，第521頁。

象就只能由不同各部門生产的不平衡，由資本家自己的消費與他們的積累的不平衡來說明了。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資本的替換，大部分要依存于那些不生产什么的階級的消費能力；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則部分地受工資法則的限制，部分地受这个事实的限制：他們要在他們的使用能够為資本家階級賺到利潤的時候，才會被使用。”^① 最后一段引文涉及危机問題，我們現在不討論它，可是，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总資本的运动，“实际上”只依存于三种消費者，即資本家，勞動者，以及“非生产的階級”，那就是依存于資本家階級的随从者（如君王、僧侶、教師、妓女、雇佣軍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很正确地把这些入只当作派生的購買力的代表者，剩余價值或工資的寄食者来处理。

最后，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二部“論資本的積累与危机”中，馬克思規定積累的一般的前提如下：

“在这里，我們只要考察資本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中所通过的諸形态，现实生产依以进行的现实关系，是不在考察之列的。我們总假設，商品是依照價值售賣的。資本的競爭不被考察，信用制度也不被考察。社会的现实构成，决不是单纯由勞動者階級和产业資本家階級构成；在其內，消費者和生产者也不是同一的，第一个范畴（即消費者的范畴），（其所得，就一部分說，是第二次的，是由利潤和工資派生的，不是原始的），要比第二个范畴（生产者的范畴）更广得多，从而，他們支出所得的方法和他們的所得的大小，会在經濟的家計上，特别是在資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上，引起极大的变更。但社会的现实构成，也不在考察之列。”^② 因此，馬克思虽已論究了“社会的现实构成”，但只考虑到那些剩余價值与工資的伴食者，也就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范畴的随从者而已。

毫无疑义地馬克思对積累过程的分析，只是限于在完全由資本家与工人所构成的社会里，在資本主义生产方法普遍而独占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622頁。

② 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三联書店版，第二卷，第594—595頁。

支配条件下。但是，在此前提之下，他的图式除了为生产而生产的解释外，别无其他解释。

让我们回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第二例。

第一年

$$\text{I. } 5000\text{C} + 1000\text{V} + 1000\text{m} = 7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430\text{C} + 285\text{V} + 285\text{m} = \frac{2000}{9000} \text{ (消费资料)}$$

第二年

$$\text{I. } 5417\text{C} + 1083\text{V} + 1083\text{m} = 7583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583\text{C} + 316\text{V} + 316\text{m} = \frac{2215}{9798} \text{ (消费资料)}$$

第三年

$$\text{I. } 5869\text{C} + 1173\text{V} + 1173\text{m} = 8215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715\text{C} + 342\text{V} + 342\text{m} = \frac{2399}{10614} \text{ (消费资料)}$$

第四年

$$\text{I. } 6358\text{C} + 1271\text{V} + 1271\text{m} = 89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858\text{C} + 371\text{V} + 371\text{m} = \frac{2600}{11500} \text{ (消费资料)}$$

图式指明积累年年不断，在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中，恰好是一半由资本家消费，一半资本化那样进行着。资本化之际，追加资本及原有资本不断保持同一的技术基础，即同一的有机构成或同比例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分配，而且也保持同一的剥削率(常为100%)。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假定，一开始就是以追加的生产资料与工人的生活资料的形态出现。这两者都是用来使第一部类及第二部类的生产，益加增大。引起这种生产增大的不断进行，是为着谁呢？从马克思图式的诸前提中看不出来。当然罗，生产增大了，社会消费也会同时增大。资本家的消费增大了(从价值上看，第一年是500+142，第二年是542+158，第三年是586+171，第4年是635+185)，劳动者的消费

也会增大，其正确的指示器，从价值上說，是两部类每年增大的可变資本。如果其他一切都不加考虑的話，資本家階級所增大的消費，决不能看作是积累的目的。事实刚刚相反，当这种消費进行而且增大的时候，就沒有积累可言；資本家个人的消費只能看作簡單再生产。問題毋宁在于：如果資本家自己不消費而“禁慾”，即在积累的场合下，資本家是为着誰而生产呢？更不用說，日益增大的劳动大軍的維持，并不是繼續增長的資本积累的目的。工人的消費，在資本家看来，乃是积累的一个結果，如果不顛倒資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那既不是它的目的，也不是它的前提。無論在怎样的场合，工人常常只能消費相当于可变資本那一部分生产物。此外，一文也不能多消費。倘若是这样，那么，那些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靠誰人去实现呢？图式告訴我們：是資本家本身，只有他們才能实现。那么他們怎样处置这些日益增大的剩余价值呢？图式答复我們：他們为了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使用它。从而，这些資本家們就成为一种为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的糊涂虫了。他們为了要用来制造新机器，所以反复不断地制造更多的新机器。于是，結局就不是資本的积累，而是毫无目的地增加生产資料的生产了。只有象图岡·巴拉諾夫斯基般的胆大妄为，象他那样对怪論的爱好，我們才能認為这种不知疲倦的凭空乱舞，是資本主义的现实在理論上的一个忠实反映，是馬克思学說的正确推断。^①

除了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所揭載的馬克思草拟的扩大再生产分析外，馬克思在全书中，特别是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很詳細而明确地叙述了他对典型性的資本主义积累进程所持的一般见解。我們只要充分地理解这个见解，就很容易看出第二卷終末的图式的一些缺陷。

如果我們从馬克思理論来考察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就可以发

^① “引出这个不合理的結論的，不是这些有創造性的思想家。这个結論，是到后来由薩伊和麦克洛克引出的。”（“資本論”，第二卷，第479頁）我們認為图岡·巴拉諾夫斯基之徒也可以加入在內。

现其中的矛盾。

首先，这个表式完全没有考虑到增大的劳动生产力。表式中虽可看出积累的进行，但只是以每年的资本同一构成，即生产过程的同一的技术基础为前提。这种方法本身，为使分析简单化起见，本无不可。但是，到了后面我们研究实现社会总生产物和再生产的各种具体条件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与资本积累过程并行的，且和它有不可分离关系的技术变化。如果把劳动生产力的增大估计进去，社会生产物（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的实物总量，要比图式所指示的它的价值量，增大得更快。使用价值量的增大之另一面，也就是价值关系的变化。根据以马克思整个理论为基础的，使人不能不相信的证明来看，劳动生产力迅速发展，表现在下列事实中：即在资本积累增大的条件下，资本的构成及剩余价值率，并不是象马克思的图式所假定的那样，停止不变。事实恰恰相反，随着积累的进行，两部类的C（不变资本）不仅绝对地增大，而且比之 $V+m$ ，或新创出的价值全体（劳动生产力的社会表现）也相对地增大。同时，不变资本比之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比之可变资本，也相对地增大。换言之，剩余价值率（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表现）也同样地增大。这种变化，并不一定要照字面那样每年发生，而马克思图式中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等”的关系，也一般不需要和历年一致，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时间都行。最后，资本的构成及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也可以任意假定发生在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等年，或发生在第二、第六、第九等年。问题只是在于一般把这种变化当作周期的现象而估计进去。如果要相应地修正那个图式，那么，这种积累方法会产生每年的生产资料愈加不足，消费资料愈加过剩的结果。图岡·巴拉諾夫斯基想在纸上克服一切困难，他简单地编造另外一个图式例子，把其中可变资本每年减少25%，纸上的数字练习，既然相当成功，图岡就夸耀地认为他已证明这一点：即使消费绝对量减少，积累还是可以照样圆滑进行的。但图岡本人也终于不得不承认他的假定（可变资本的绝对减少）是

和现实非常矛盾的。事实完全相反，可变资本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绝对地增大。只是比之不变资本更为急速的增大，它就显得相对地减少。根据实际所发生的情况，单单每年的不变资本较快地增大，可变资本较慢地增大及剩余价值率的继续增大，那么，就会出现社会生产物的物质构成及资本的价值构成之间的不均衡。假如，马克思的图式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不是五对一的固定比例，而是通过每一次资本的增大，就使构成提高，即第二年为六对一，第三年为七对一，第四年为八对一；又再假定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相应地剩余价值率也不断增大。——例如，我们不假定100%的固定的剩余价值率（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了），而假定照马克思图式中所采用的剩余价值。最后，我们假定从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中，照例以半数资本化（第二部类除外，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假定，它在第一年有一半以上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285之中，有184被资本化）。若果如此，我们就可得到如下的结果：

第一年

$$\text{I. } 5000C + 1000V + 1000m = 7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430C + 285V + 285m = 2000 \text{ (消费资料)}$$

第二年

$$\text{I. } 5428\frac{4}{7}C + 1071\frac{3}{7}V + 1083m = 7583$$

$$\text{II. } 1587\frac{5}{7}C + 311\frac{2}{7}V + 316m = 2215$$

第三年

$$\text{I. } 5903C + 1139V + 1173m = 8215$$

$$\text{II. } 1726C + 331V + 342m = 2399$$

第四年

$$\text{I. } 6424C + 1205V + 1271m = 8900$$

$$\text{II. } 1879C + 350V + 371m = 2600$$

积累若果照此进行,则生产资料第二年会短缺16,第三年不足45,第四年短缺88;同时,消费资料第二年会过剩16,第三年过剩45,第四年过剩88。

生产资料的短缺,一部分可能是表面的现象。劳动生产力增大的结果使生产资料量的增大,比之它的价值量的增大更快,换言之,将造成生产资料的价值低落。对生产技术的提高而言,问题是在于使用价值或资本的物质要素,而不是在于价值。因此,生产资料在价值上虽感短缺,但在数量上可能足以用来继续进行积累到某种程度。这种现象,和其他现象还阻止了利润率的实际下降,使它仅仅成为一个倾向。但如我们的例子所表示,不仅延缓利润率的下降,而且是使它完全停止。从另一方面看,同样的事实表明,没有销路的消费资料的过剩量,要比以价值来计算的过剩量更多。于是,剩下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场合所处理的一样,或者由第二部类资本家自己消费那些剩余(如果是这样,以那些资本家们而论,所实行的不是积累而是简单再生产),或者,这些剩余完全卖不出去,二者必居其一。当然,人们可以这样答复:前面例子上所提出的生产资料短缺,极其容易补救。我们只要假定第一部类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多资本化一些就好啊。事实上,马克思的例子所假定的,说资本家每次都必须恰恰把其剩余价值的一半,加入资本中,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进展,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部分,可能愈加增大。这种假定更有可以被允许的一点,那是大家所知道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之一,是使得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降低。从而,被他们所消费的收入的价值相对的(与其资本化部分比较)降低,仍足以使该阶级保持原有的或甚至较高的生活水平。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我们可以通过把第一部类本来用来消费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类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与它所生产的其他部分相同,是以生产资料的形态出现的),转移到不变资本上,由此而补偿生产资料的短缺部分。那就是说:第

二年轉移 $11\frac{4}{7}$ ，第三年轉移34，第四年轉移66。^①可是，这个困难問題解决了，只加大了另外一个困难。第一部类資本家为要使积累可能，愈加相对地限制他的消費，則第二部类的消費資料就愈加卖不出去。因此，不变資本即使想要在过去那样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扩大，也愈益成为不可能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第一部类資本家相对地愈加限制消費的前提，就是第二部类資本家相对地愈加扩大消費。第一部类积累加速的假設，必須以第二部类积累减速的假設来补充；一个部类的技术进步，則伴之以另一部类的技术落后。

这个結果决不是偶然的。通过上面对馬克思图式的研究，我們现在专门加以說明如下：馬克思本人也承認，技术的进步，表现为不变資本的相对增大（与可变資本比較而言）。其結果必然会使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在C与V之間的分配，不断发生变化。可是，馬克思图式中的資本家，决不能任意进行那个分配。因为，他們在进行資本化之初，是受他們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所束縛的。依照馬克思的假設，一切生产的扩大是以資本主义方式所創出的自己的生产資料与消費資料来进行的。——这里沒有其他生产场所和生产形式，除两部类資本家及工人外也沒有其他消費者——另一方面，使积累圓滑进展的前提，乃是两部类的生产物，要一点不留地参加到流通中去。因此，便产生下面的結果：即扩大再生产的技术形态，是由剩余生产物的物质形态来預先严格规定的。换言之，馬克思图式上的扩大生产，每次都必須在这样的技术基础上才有可能，那就是第一部类及第二部类所造出的剩余价值都被使用着（这里，必須記住两部类只有通过相互交换，才能获得各人的生产要素）。于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每一次在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間的分配，以及追加生产資料与（工人的）消費資料在第一部类与

^① 这个数字是根据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我們所假定的第一部类不变資本的大小与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按照馬克思图式所規定的大小之間的差异而得出的。

第二部类間的分配,一开始就受图式中两部类的物质关系与价值关系所规定。可是,这些物质关系及价值关系的本身,已經反映一个特定的生产技术形态。这就是說,在馬克思图式的假設下,积累进行之际,每次所规定的生产技术,也已預先决定了扩大再生产下一阶段的技术。換言之,倘若我們按照馬克思的图式,假設資本主义的生产扩大总是由在資本形态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进行,此外,更假設(这个假設,不过是同一假設的反面)一个部类的积累,紧密地依赖于另一部类的积累,那么,生产技术基础的变化(此变化表现在C与V的比例中)就成为不可能了。

我們仍可从另一方面来解释同样事情。无疑,当資本有机构成高度化,即不变資本比可变資本增加得快的時候,在物质形态上就表现出生产資料的生产(第一部类)比之消費資料的生产(第二部类)增加得快。但是,在馬克思的图式內,两部类的严格协调是被当作不辯自明的公理来看的,它排斥了任何部类內积累的变化。我們有充分的根据来假設,在加大的技术条件下,較大一部分的資本化的剩余价值,不断从社会轉入生产資料部类中去,不轉入消費資料部类中去。既然生产的两部类,因为只不过是同一的社会总生产的分科,或者可以看作全体資本家的部分經營,这种假設——由于技术的要求,把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断从一部类移轉到另一部类——是无可非議的,而且也符合資本的事实上的实践的。不过这个假設,只能适应于把資本化的剩余价值作为价值的大小来考察。根据馬克思的图式及其諸关系上看,这一部分剩余价值,采取一定的物质形态,而这个物质形态又规定了它的資本化。因此,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是作为消費資料而存在的。它只有依靠第一部类才能实现。因此,把一部分資本化的剩余价值,由第二部类移轉到第一部类的企图,終于宣告失敗:首先失敗于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上(这种物质形态对第一部类是无用的),其次,失敗于两部类的交换关系上,因为这种关系必需使第二部类生产物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轉移到第一部类时,第一部类以相同价

值的生產物轉移給第二部類。所以，在馬克思圖式的限界內，要使第一部類比第二部類有較快的增長是完全不可能達到的。

無論我們怎樣去對待在積累進展中生產方法的技术變化，如果不推翻馬克思圖式的根本關係，那就無法進行。

此外，根據馬克思的圖式來看，每次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到了下一生產期間，會直接而且全部加入生產。因為，剩餘價值最初就具有物質形態，這種形態只能通過特定方法來使用（可消費的部分除外）。剩餘價值以貨幣形態被兌現而貯藏起來，作為等待投資的資本，在該圖式中，是不存在的。在馬克思看來，作為自由的貨幣形態而存在的私人資本首先包括逐漸積存起來的貨幣用來抵償固定資本的磨損，並充作固定資本今後更新之用的；其次包括代表已經實現的剩餘價值，但用來投資在數量上還嫌太少的那些貨幣。這種自由貨幣資本的二個源泉，從總資本的觀點來看，為數太小，可以擱而不論。因為，倘若我們假定被實現的剩餘價值只有一部分保留貨幣形態，充作將來投資之用，那麼，馬上就發生這樣一個問題：購進代表這部分剩餘價值的實物的是誰？提供貨幣的又是誰？如果是這樣答復說：正是其他資本家。那麼，資本家階級既然在圖式上是以兩部類來代表的，這一部分剩餘價值也就不能不看作在事實上已用作投資，並已被使用在生產上了。這樣，我們就退回到把剩餘價值直接地和全部地用作投資的地位了。

或者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凝固為貨幣形態，保存在某些資本家手中，這是否意味着相應部分的剩餘生產物在物質形態下，保留在另一些資本家手中？已經實現的剩餘價值由一些資本家貯藏起來，這是否意味着另一些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不能實現，因為資本家相互間是剩餘價值的唯一購買者？如果這樣，那麼，圖式中所描寫的再生產及積累的圓滑進程就會中斷了。我們將會碰到一個危機，它不是由於生產過剩所產生的，而是由於積累的意圖所產生的，正如西斯蒙第所想象的那一類危機。

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某一個地方明白說過：“在這

里,我們沒有說到這種情形:蓄積資本,比能投在生產上的資本更多,以至必須在貨幣形態上,休閒的,把資本存放在銀行業者手里,沒有說到國外放款等等。”^①對這些現象,馬克思要我們參閱論競爭一節。然而,最重要的是,馬克思的圖式確實排斥了這種過剩資本的形成。自由競爭的概念不管你怎樣用廣義來解釋它,顯然不可能創造不從再生產過程產生的價值和資本。

這樣,這個圖式排斥了生產的跳躍式的擴大。它只容許與剩餘價值的形成在步調上緊密地一致的,生產逐步擴大,而這種逐步擴大是以剩餘價值的實現與資本化兩者間相等同為基礎的。

根據同一的理由,這個表式是假定一樣包括兩部類,從而包括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部門的積累。它排斥需求的跳躍式擴大,也同樣地排斥資本主義生產的個別部門的片面發展。

因此,這個圖式所假設的總資本運動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過程相矛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粗看起來有兩種典型的事實。即一方面,遍及全部生產的跳躍式的週期擴張;一方面,各生產部門極端不平衡的發展。英國棉業歷史,從十八世紀最後25年到十九世紀70年代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富特點的一章,但根據馬克思的圖式它是完全無法解釋的。

最後,這個圖式又和資本論第三卷所表述的資本主義總過程及其經過的見解相矛盾。提出這個見解的根本思想是資本主義分配關係下的生產力的無限膨脹能力與社會消費的有限膨脹能力之間的內在矛盾。我們聽一聽馬克思在第十五章“這個法則(利潤率低落的法則)的內部矛盾的展開”中的詳細說明:

“假設已經有必要的生產資料,那就是,假設已經有充足的資本積累,在剩餘價值率,從而勞動的剝削程度為已定時,剩餘價值的創造就不會在勞動人口以外,再遇着什麼別的限制。在勞動人口為已定時,就不會在勞動剝削程度以外,再遇着別的什麼限制。

^①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585頁。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質上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剩餘價值就是表現在剩餘生產物或無給勞動在所產商品中依以對象化的可除部分內。我們不要忘記，這個剩餘價值的生產——剩餘價值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即積累過程，在這個剩餘價值生產中是一個不可少的部分——便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的目的和決定的動機。所以我們不要把這種生產，表現為別樣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認為享受是這種生產的直接目的，不要認為這種生產，是為資本家生產享受品。（當然，更不能把勞動者的享樂品生產，當作生產的直接目的——著者）如果這樣看，我們就會完全看不見資本主義生產表現在它的全部內在核心形態上的特殊性質。這個剩餘價值的獲得，形成直接的生產過程。象上面講的，這個生產過程，除了以上所述，沒有任何別的限制。可以榨出的剩餘勞動量一經對象化在商品內，剩餘價值就被生產了。但和剩餘價值這種生產一起終了，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第一種行為，直接的生產過程。資本吸取了這樣多的無給勞動。跟着這個表現為利潤率下降的過程的發展，這樣被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的量，會驚人地增大起來。現在是過程的第二種形為了。總商品量，總生產物——那包含補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部分，也包含代表剩餘價值的部分——是必須售賣的。如果沒有賣掉，或僅賣掉一部分，或不過依照生產價格以下的價格賣，勞動者固然受剝削了，但對於資本家，這種剝削會不照原樣實現出來。榨出的剩餘價值，可以完全不能實現，或僅實現一部分，甚至與資本一部分損失或全部損失的情形結合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它的實現的條件，不是相同的。它們不僅在時間空間上分開；在概念上，它們也是分開的。——一個僅受限制於社會的生產力，別一個却受限制於不同各生產部門的比例性與社會的消費力。但後者既非由絕對的生產力，也非由絕對的消費力決定，而是由那種在對抗性的分配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消費力決定。這種對抗性的分配關係，會使社會大多數人的消費，縮減到一個只能在比較狹隘界限內變動的最小

限度。并且，消费力还会由积累冲动——追求资本增加并依扩大规模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冲动——受到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法则；这是生产方法自身的不断革命、与这种革命不断结合在一起现有的资本的价值减少，一般的竞争战，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畏惧灭亡而改良生产与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所规定的。所以，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以及规定这种联系的条件，愈益采取与生产者相独立的自然法则的姿态，愈益成为不能统制的。这个内部的矛盾，企图由生产的外部范围的扩大得到均衡。但生产力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与消费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狭隘基础陷于矛盾。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的过剩会与愈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相结合，决不是什么矛盾；因为，二者结合时虽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会增加，但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会跟着增加。”^①

试将上面的叙述与扩大再生产图式比较一下，我们看出两者并不完全一致。根据图式看，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实现之间，完全不发生内在的矛盾，无宁说是内在的同一性。在这里，剩余价值从最初起就以一种用来单纯满足积累要求的物质形态出现的。事实上，它从生产场所产生出来时，已采取一种追加资本的形态，也就是说，它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已获得了实现的可能性。这就是说，资本家自身的积累冲动，给与它的可能性。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把所要占有的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专以那种物质形态生产它，这种物质形态保证他们有可能用来进行进一步的积累。剩余价值的实现及其积累，于是就成为同一事情的两面，从逻辑上看，它们是等同的。因此，社会消费力，就表式上所说明的那种再生产过程来看，丝毫没有限制生产。在这里，尽管社会的消费力没有越过社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生产的扩大可是年复一年地自动地进行着。这种扩大，也就是积累的自动的进展，当然是“资本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291页。

义生产的法则——畏惧灭亡。”但是，根据第三卷的分析，“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市场”显然不得超过资本家与工人的消费而扩大。倘若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直接把马克思后面那句话：“这个内部矛盾，企图由生产的外部范围的扩大得到均衡”。解释为好象马克思认为所谓“生产的外部范围”，恰恰正是生产本身，这样一来，图冈就不仅曲解了辞句的意义，而且对马克思的明确的思维过程，也是牵强附会。所谓“生产的外部范围”，在此处，很明显而且很明确地并不是指生产本身，而是指“必须不断扩大”的消费。马克思所想的是这样而不是别的，这从“剩余价值学说史”里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得到证明。马克思说：“所以，里嘉图首尾一贯的，否认生产扩大资本增加时，市场也会扩大的必然性。现存在一国内的一切资本，可以在该国有利的被使用。因此，他反驳亚当斯密，因为亚当斯密一方面创立了他（里嘉图）的见解，同时又凭他的常识的本能，反对这种见解。”^①

马克思又在另一个地方明确地指出，图冈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与马克思没有关系。马克思说：“此外，和我们以前看到的一样（第二卷第三编第522—526页）在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一种不断的流通（还把加速的积累除开不说），这种流通既然不加入个人的消费，所以它在这个程度内，首先是不以个人的消费为转移的，但它最后还是由此受到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不是为它自身而发生的，却不过因为那些会把生产物供个人消费的生产部门，需用更多的不变资本。”^②

从第二卷的图式看——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唯一根据——，市场和生产是同一的。因此，扩大市场即是扩大生产。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处，生产本身是自己唯一的市场（工人的消费，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即可变资本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具有同一的限界——社会资本的大小或已经达到的积累阶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63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3—374页。

段。剩余价值——資本的物質形态——剝削得愈多，积累就愈加增大；积累愈加增大，以資本的物質形态投入的剩余价值，就愈多，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愈多。所以，照图式上看，第三卷分析中所标志的矛盾，是不存在的。于此，在图式上所描述的那样过程中，把市场超越資本家与工人的消費而不断加以扩大，就一点也没有必要了，而社会消費能力之有限性，对于生产的圓滑进行及其无限的扩张能力，并不构成一个障碍。图式是承認危机的存在的，可是，那完全是因为生产內部比例失調之故，即缺乏社会对生产过程的統制之故。但它排除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費能力之間的深刻而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正是由資本积累而生，它爆发为周期性危机，并驅使資本向不断扩大市场迈进。

第二十六章 資本的再生产 及其社会环境

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說明資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們說，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試圖在資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費的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來說明資本积累过程的。我們在資本論全部三卷中看出，馬克思的分析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資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統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資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階級存在。資本主义社会上的第三者，官吏，自由职业者，僧侶等作为消費者，是应当計算在两階級，特别是資本家階級之內的。这个前提，乃是理論上的权宜之計。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給自足的資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論証純粹形态的問題之助，而不变更問題的條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許的理論上的权宜方法。这里适用的场合就是分析社会总資本的簡單再生产。在这里，問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即在以資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

会,也就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里,全部剩余价值,是由其占有者即资本家来消费的。这样假定的目的,就是要在此种条件下,表述社会生产及再生产的形态。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生产除开资本家与工人以外,不知有其他消费者,从而,它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占着普遍的、唯一的统治地位。所以,这两者的假定具有同一的涵义。同样地,正如资本论第一卷上所给的假定一样,在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把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作为前提,也是可以的。个人资本的再生产,是社会总再生产的要素,但这个要素有着独立的进程,它和其他要素的运动相矛盾的。所以,社会资本的总运动,不是资本的各个运动的机械的总和,它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譬如,个人资本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的价值总额,虽与社会总资本、及其组成的两部分和总剩余价值的价值大小相一致,但社会生产物在各个部分上的价值大小之物的表现,就与个人资本在价值关系上的物的具体化完全不同。这样,个人资本的再生产关系,在其物质形态上,相互之间不一致,与总资本的再生产关系也不一致。在正常的流通条件下,个人资本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进行流通或积累,只有当它为自己的生产物找寻市场和供自己特殊活动需要而寻找生产资料的时候,才依赖其他的资本。提供这种市场和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阶层是否资本主义生产者,就个人资本看来,是无关重要的事,尽管在理论上,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最适当的前提,就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是这个过程的唯一环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已达到了普遍的、唯一的统治地位。^①

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个人资本的基本前提,是否对总资本也可适用呢?

马克思事实上是把总资本的积累条件与个人资本的积累条件

^① 马克思:“资本越大,劳动生产力越是发展,一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越是发展,则在由生产到消费(个人的消费和产业的消费)的进程中,在流通中,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量会越大,从而,每一个特别资本越是有把握可以在市场上,寻到各种现成的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4页。)

看作同一的，下面就是他的証明。

“問題必須取得如下的形式：假設有普遍的積累，那就是假設在一切生產部門都有多少的積累——這在現實上，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是資本家之資本家的衝動，象蓄積貨幣（這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成立的先決條件）是貨幣貯藏家的衝動一樣——我們要問，這種普遍的蓄積分解起來，是以一些什麼事為條件？”

他的答复是这样的：“所以資本蓄積的條件，和資本最初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是完全相同的。這些條件是：用貨幣一部分購買勞動，用貨幣別一部分購買商品（原料機械等）……”“所以，新資本的蓄積，只能和既有資本的再生產，在相同的條件下進行。”^①

實際上，總資本積累的現實條件，是與個人資本及簡單再生產的情況，完全有別。問題在於：如果在剩餘價值中愈來愈大的一部分，不是由資本家消費掉，而是充作擴大生產之用，那麼，社會再生產成什麼樣子呢？社會生產物，除了補償不變資本外，所剩下的，根據前提，不能消耗在工人與資本家的消費中（這就是問題的主要因素），同時，工人和資本家自己也不能實現總生產物。他們只能實現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以及剩餘價值的可消費部分，但在這樣做時，他們只不過保證生產以過去的規模進行更新而已。至於剩餘價值的資本化部分，就不可能由工人和資本家來實現。從而，在那種只由工人和資本家所構成的社會里，為積累而實現剩餘價值，就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了。令人奇怪的，所有分析積累問題的理論家，從里嘉圖、西斯蒙第起，到馬克思止，都正好是從不能解決問題的前提出發。為得要實現剩餘價值，“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資本家以外的消費者——是有必要的。這在直覺上意會到的一點使得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逃避方法：例如，馬爾薩斯所說的封建地主，伏隆佐夫所說的軍國主義，司徒盧威所說的“自由職業者”，以及其他體現為資本家階級的隨從者等等人

^①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582—585頁。重點是馬克思本人加的。

物的“不生产消費”；更有，从西斯蒙第到尼古拉昂一切資本积累的怀疑派，所带来的作为安全瓣而起着很重大作用的国外貿易。另一方面，問題既得不到解决，于是，象基尔希曼，洛貝尔图那样，索性撇开資本积累不談；或者，象西斯蒙第及俄国“民粹派”那样，尽可能設法防止資本积累。

不过，由于馬克思对总生产过程作了較深刻的分析并以确切的图式形式来作例証，尤其是他对单纯再生产問題的天才說明，才开始暴露出积累問題的症結所在，以及过去为了解决这个問題所作各种嘗試中的弱点。但馬克思不能立即提供一个解答，这一方面因为他对这个問題的分析，刚刚开始，就擱下来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当时致力于駁斥亚当·斯密的錯誤分析，不免忽略了这个主要問題。事实上，馬克思假設資本主义生产方法已占統治地位，这毋宁增加了解答这个問題的困难。但是，在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的全面分析和对資本主义总过程的特征的闡述（这个闡述表明了資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内在矛盾和这些矛盾的发展，见“資本論”第三卷）中，已暗含着对积累問題的解答，而这个解答是与馬克思学說的其他部分相协调的，也与資本主义的历史經驗与日常实践相协调的。因此，图式中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如果我们仔細地观察一下扩大再生产图式，由于图式中所有的一切关系不完整，它表明了需要某种較純粹資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更进一步的結構。

迄今为止，我們只考察了扩大再生产問題的一个方面，即剩余价值如何实现的問題。这个問題，直到现在为止，吸引了怀疑論者的全部注意力。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地是資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問題。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資本家的消費基金存而不論，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条件，是要求一个資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們是說购买者，而不說消費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質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資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結構来实现

的。这里，可以設想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給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資本家)以上的消費資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英国的棉业，在十九世紀最初六十年間(部分地直到現在)，以棉織品供給欧洲大陆的农民及都市小資产階級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此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費，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① 为棉业供給紡錘、机台的大规模机器工业，以及金属工业及煤炭工业，都在英国发达起来。这样，第二部类(生产消費資料部类)就可以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阶层，实现更多的生产物。由于他們自己的資本积累，增大了对国内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資料部类)生产物的需要，帮助了这部类实现剩余价值和增大資本积累。

其次，从相反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越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資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例如，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供給美洲澳洲諸国建設鉄路的材料。鉄路建設的本身，还不能認為是一个国家受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統治的証据。事实上，鉄路那个东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侵入的主要前提之一。又如德国化学工业，供給亚洲及非洲等非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象顏料那样的生产資料。^② 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部类，就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中，实现了它的生产物。由此发生的

① 棉业在英国輸出的重要性，从下列数字中可以看出來：

1893年——工业制品总輸出額为 5,540,000,000 馬克，其中棉制商品为 1,280,000,000 馬克，即23%。鉄及其他金屬商品，不到17%。

1898年——工业制品总輸出額为4,668,000,000馬克，其中棉制商品为 1,300,000,000馬克，即28%，鉄及其他金屬商品，不到22%。

拿德意志帝国的数字与英国比較：

1898年——总輸出額 4,010,000,000馬克，其中棉制商品为231,900,000馬克，即5.75%。1898年輸出棉布的长度为5,250,000,000碼，其中2,250,000,000碼輸往印度。(爱·約飞：“英国棉織工业与輸出貿易的組織”，“施莫勒年鑒”，第24卷，第1033頁) 1908年英国的輸出，单单棉紗一項，就达262,000,000馬克。(“德意志帝国年鑒”，1910年)

② 德国的苯胺顏料的五分之一，靛藍的一半，輸往中国、日本、英領印度、埃及、亚洲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等国。

第一部类递增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国家中，相应地引起了第二部类的扩大，因为第二部类要以消费资料供给第一部类中日益增加的工人。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马克思的图式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第二部类的生产物，超过了以两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来计算的需要。在第二种情况下，第一部类的产物，超过了两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总量，虽然这个总量已经考虑到生产的扩大而增加了。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剩余价值并不以那种物质形态出现，这种形态足以使两部类的任何一个部类的剩余价值资本化成为可能和必要。——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类型的情况，相互交错，相互补足，并混合起来。

有一点看起来还不很明了。例如，倘若过剩的消费资料——例如棉织物——能够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卖出去，那末，大家可以看出来，这种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的棉织物，不仅表现了剩余价值，而且也包含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把出售给资本主义社会阶层以外的商品当作除了代表剩余价值以外，不能代表其他东西，这似乎是相当武断的。另一方面，其他部类（第一部类）不仅实现了剩余价值，而且还积累起来，而它的生产物不必出卖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部类以外的市场上去。然而这两点反对论调只触及表面现象。我们只要记住，总生产物的每一组成部分代表着总价值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不仅总生产物包含了剩余价值，各个商品也都同样包含了剩余价值。可是，这种事实，并不阻止个别资本家作这样的打算，把出售他的特定商品所得，首先用来补偿他的不变资本，其次收回他的可变资本（或者，不严格地说，但与现实生活相符的，它首先必须补偿固定资本，其次补偿流动资本）所剩下的，才成为利润。同样地，我们可以把社会总生产物区别为三个比例部分，这三个部分，表现为价值，即相当于社会上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榨取的剩余价值。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总生产物的物质形态，也和它的价值比例一致：即不变资本表现为生产

資料形态，可变資本表现为工人的生活資料形态，剩余价值表现为資本家的生活資料形态。可是，簡單再生产概念（在剩余价值全部为資本家所消費的场合），我們認為只是一种理論上的假設。至于扩大再生产（即积累），馬克思的图式，在此处也规定了社会生产物的价值构成与其物質形态之間的严格的比例。那就是，剩余价值中被指定为資本化的部分，从开始就按一定的比例——这是和已定的技术基础上的生产扩大相适应的——采取了物質生产資料与工人的生活資料的形态。然而，这种立足在資本主义生产的自足性与孤立性上的见解，我們認為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問題。我們如果假定剩余价值是在資本主义生产范围以外实现的，那末，剩余价值的物質形态，与資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就沒有什么关系了。剩余价值的物質形态，是和帮助它們实现的那些非資本主义社会的要求相适应的。换言之，資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按不同的情况，可以表现为消費資料的形态，如棉織物；或生产資料的形态，如鐵路器材。如果某一部类通过輸出它的生产物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此后在扩大生产时帮助了其他部类实现剩余价值，那么，这一情况，不会改变作为全体的社会的剩余价值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在这两部类以外得到实现的事实。同样的道理使个别資本家也能实现他的剩余价值，即令他的全部商品，只能补偿其他資本家的可变資本或不变資本。

但剩余价值的实现，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关键問題。假定第一部类向两部类之外出卖了剩余价值，从而开始积累的过程；再假定第一部类預期非資本主义阶层的需求有新的增长；单有这两点，只不过获得了刚刚一半的积累条件。唇与杯之間还有許多距离呢！积累的第二个前提是要有机会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我們既然已經把第一部类的剩余生产物，作为生产資料，卖给非資本主义阶层，而使之变为货币，那么，我們从什么地方拿回这些物質形态的东西呢？那些帮助我们实现剩余价值的貿易，彷彿又通过另一张門，把被实现的剩余价值变为生产資本形态的可

一能性，从我們手中夺去了。于是，我們就好象想避雨又碰着雨滴了。讓我們再詳細来考察一下：

此处把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 C，好象当作生产的不变資本全部，我們知道，这是不对的。单单为了把图式簡單化，我們沒有顧到图式中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 C 只是社会总的不变資本的一部分，就是在一年期內在生产周期中消耗掉而轉移到生产物中的那部分。如果認為資本主义生产（其他方式的生产亦是如此），在每一生产周期內，消耗了不变資本的全部，并每次再重新生产出来，那是极不合理的。相反地，我們假定在图式所显示的生产的背后，存在着全部的生产資料，而图式所提供的是每年周期地更新的那部分，也就是被消耗后而加以更新的那部分。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大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生产資料的全部容量有絕对的增长，而且相对于每次生产上所消耗的部分，也有增长。同时，不变資本的效率，也有相应的提高。扩大生产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对这一部分的不变資本，增加使用的强度，不管它的价值有多少的增加。

“在采掘工业，例如在采矿业上，原料不构成資本垫支的部分。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生产物，如金属、矿物、煤炭、石材等等，都是自然不要报酬賜予的。在这里，不变資本几乎完全由劳动手段构成。此种劳动手段，很能够負担起增加的劳动量（例如劳动者昼夜換班）。但假設其他一切情形不变，生产物的量及其价值，就会与所使用的劳动为正比例的增加。在这里，正象在最初一日的生产上一样，各种原始的生产物形成要素，也即資本物质要素的形成要素，人与自然是一起进行着。賴有劳动力的伸縮性，积累的領域，虽然沒有不变資本的先行的扩大，还是可以增加。在农业上，沒有种子及肥料上面的追加的垫支，耕地是不能扩大的。但那种垫支一旦实行，土地上面的純机械的加工，也就会在生产物的量的增大上，发生奇异的影响。只要同数劳动者支出了較大的劳动量，那就使不在劳动手段上作新的資本垫支，丰度也会增进。这又是人对于自然的直接作用。无須有新資本的介入作用，那也会成为增大

的积累之直接的源泉。最后，在狭义的工业上，每一度在劳动上面作追加的支出，虽然必须相应地在原料上面作追加的支出，但不一定也要在劳动手段上作追加的支出。并且，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会为制造工业供给原料和它所用的劳动手段的原料，所以前者不用追加资本垫支，已经可以造出的追加生产物，当然也于后者有利。

总的结论是：劳动力与土地，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资本一经与这两者合为一体，它就获得了一种伸张力。这种力，允许它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大到那个表面上象是由它自身的大小，由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资本就是在这里面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与量设定的限界以外。”^①

然而更加不了解的是，为什么必要的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都必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呢？这个假定，正是马克思资本积累命题的基础。但它与资本的日常工作实践和历史，以及这个生产方法的特质，并不符合。1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是以棉织物形态从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剩余价值用来资本化的物质要素，乃是表现为美国蓄奴各州所生产的原棉，或者表现为农奴制俄国田地生产出来的谷物（这是英国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确实是剩余生产物，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积累，如何依存于非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由美国南北战争时植棉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英国棉花危机，或俄土战争时农奴制俄国亚麻输出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欧洲麻织业的危机，就可以证明。此外，我们要知道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事实上，如何依靠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只须回想一下，为要养活欧洲工业劳动者大众（即可变资本的要素），输入农民用非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谷物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就够了。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以其本身性质而言，决不许可只限于用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个别资本家想达到提高利润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56—758页。

的欲望，有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就是竭力把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压低。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大，是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最重要的方法，而不断增大劳动生产率的首要条件是对自然与土地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便利进行无限制的利用。在这方面容忍任何的限制是与资本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不相容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今日还不过在全世界总生产中占一小部分。即令在小小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成为主流，但还没有征服生产的所有部门，例如小农的农业经营及独立的手工业。同样也没有征服北美大部分及世界其他大陆的各个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迄今大体上，只限于温带国家的产业，而在东方与南方，它的进展比较不大。从这些理由上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如果只依赖于在这样狭隘的限界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那末，它想达到现在的高度是不可能的，甚至一般的进展，也不可能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为生产力的蓄积之处。资本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它搜索全世界，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资本积累的物资要素问题，远没有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它转变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取得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进行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

资本积累的过程尽管带有伸缩性和间歇性，但当从旧有的来源输入原料已告中断或社会需要突然增加，它必然要求有进入新的原料区域的便利。南北战争时美国棉花对英输出的中断，造成了兰开夏地方有名的“棉花饥荒”，那时候，在埃及就在极短时间内，好象魔术师念咒那样，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栽植。埃及是一个带有古代奴役制度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它为欧洲的资本开辟了一个活动场所。只有那些自己具备技术资源的资本，才能在极短时

間內，进行这样奇蹟般的变革。但是，那种情况，只有在原始的社会关系下，在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为完成这种奇蹟所必需的支配地位。关于这种情况的另一例子，是世界橡胶消费的大规模增加。(1912年)要求有每年值十亿馬克的生橡胶供应。这种原料生产的经济基础，是欧洲的资本，在非洲殖民地及美洲所实行的原始剝削制度，这种制度是奴隶制与奴役关系的各种形式的结合体。^①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倘若我們照上面那样假定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只能在非资本主义的地区內实现它們的剩余生产物，那末，我們認為这是檢驗馬克思图式的最适当的场合，因为它指出再生产关系的純粹性。但是，现实情况不能使我們假定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一部分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外部相应部門的生产物上实现出来。以后，生产的扩大及部分地在物质形态上所消耗的生产要素的更新，也有可能通过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物来进行。由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物量的部分，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內，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外部，无条件地通过非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阶层及社会形态，才能找到购买者。

于是，就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随后的资本积累时期之間，发生了两个不同的交易——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是向純粹的价值形态的轉化和这个純粹的价值形态再向生产资本形态的轉化。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周围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間的交易。所以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及不变资本物质要素的取得两方面来看，国际贸易，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因为国际贸易，在

^① 据英国最近的藍皮書所揭露的关于普土馬佑(putumayo)的秘魯阿馬遜公司的实况，証明了在自由的秘魯共和国領域內，即使沒有殖民統治的政治形态，国际资本，事实上，把当地土人引入到接近奴隶制的关系，这样它就能占有原始乡村里的生产資料，以进行大规模的掠夺。自1900年以来，这家由英国及其他外国资本家投資的公司，掠夺了将近4,000吨普土馬佑橡胶，在倫敦市場上拋售。在这期間，三万个土人被杀害，剩下的一万人之中，大多数被毆打成为残废。

实际的情况下，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之间的交易。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从剩余价值及不变资本的角度上来考察资本积累。而积累的第三个要素，是可变资本。积累进展了，可变资本也随着增大。在马克思的图式上，「社会生产物包含越来越多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就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的表现。然而，现实的可变资本，并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活劳动（为了活劳动的再生产才需要这些生活资料）。因此，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活劳动的供应，而这种活劳动，为了满足积累的需要，能为资本动员起来的。在有利条件下，这个供应量是可以增加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但只能达到某种限度。但是这些增加供应量的方法并没有增加可变资本，或者，只增加少许（例如作为加班的工资）。而且，这两种方法，只限于一定的狭隘范围内，由于自然和社会原因，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因此，随伴积累而来的可变资本的不断增大，就必定表现被雇用的劳动数量的不断增大。那么，这种追加的劳动从哪里来呢？

马克思在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答复：“但要让这些成分事实上当作资本来发生机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的劳动。如果已经被使用的劳动者的剥削，不复能在外延方面或在强度方面增加，那就不能不用追加的劳动力。关于这种事体，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经先有安排了，因为它会把劳动者阶级当作依赖于工资的阶级再生产出来；他们通常的工资，不但够维持他们的生存，且还够他们去繁殖他们的种属。资本不过要把劳动者阶级每年供给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和那种已经包含在年生产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①在这里，可变资本的增加就完全而且直接地归因于工人阶级（已经受资本支配的）的自然繁殖。这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这个图式只承认资本家与工人两个社会阶级，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唯一的、绝对的。在这些

前提下，工人階級的自然增殖，就成為資本支配下增加勞動供應量的唯一源泉了。可是，這種看法，與資本積累的运动規律相矛盾。工人的自然繁殖，無論在時間上，在數量上，都不和積累資本的要求相適應。馬克思自己曾經出色地指出，自然的繁殖不能與資本突然擴大的要求相協調。如果自然繁殖是資本發展的唯一基礎，那麼，積累周期地在緊張與疲勞間搖擺中，是不可能持續的，生產領域的飛躍擴張也是不可能的，這樣，積累的进行也成為不可能了。由此可知，積累的进行，不管是对可變資本的增大，或對不變資本的要素，都需要無限制的自由运动，從而，也需要對勞動力的供應具有無限制的支配能力。馬克思認為這一點可以通過“勞動者的產業後備軍”來達到。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顯然沒有承認這一後備軍的存在，同時，也沒有給它留一點余地，因為資本主義的工資勞動者的自然繁殖不能形成一個產業後備軍。這個後備軍是從資本主義領域以外的社會儲藏庫中招募得來的——它只是在需要時被吸引到工資無產階級中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從非資本主義階層及非資本主義國家中，不斷汲取這些追加的勞動力。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四節分析產業後備軍的時候，只考慮到下列情況：1. 機器驅逐成年勞動者，2. 農業上資本主義生產支配的結果，農村勞動者流入城市，3. 脫離產業從事不規則工作的勞動力，4. 最後，當作相對過剩人口底層的剩餘部分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727頁。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話：“最先；剩餘價值一部分，並且在生活資料形態上與剩餘價值相當的剩餘生產物一部分，要轉化為可變資本，用來購買新勞動。這件事，在如下的情形下，才有可能的：即勞動者的人數增加了，或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延長了。後一種情形，在勞動人口一部分（比方說）原只有半分的職業或三分之二的職業時，就會發生；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內，那還會由必須有給付的勞動日的絕對延長引起，但這並不能說是蓄積之不變的手段。勞動人口，在向來的不生產勞動者轉為生產勞動者，或向來不從事勞動的人口部分（如婦女和兒童，待救濟的貧民）被拉入生產過程時，也能增加起來。這一點，我們且在這里攔起來。最後，勞動人口又會在一般人口增加時，絕對增加起來。如果蓄積進地不斷地进行，人口的絕對增加（雖然和所用資本相對而言是減少）是條件。把蓄積當作一個不斷的過程，人口的增加，好象是蓄積的基礎。這又以下述一件事為條件：平均工資允許勞動人口不只再生產，並且不斷增加。”（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577頁。）

——貧民。这些范畴的本身，已經表現着种种形态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残滓，表現着在各种形态上被使用的过剩的工資劳动者。那些不断流入都市的农业劳动者，馬克思認為也是工資劳动者——他們过去已經受农业資本的支配，今后也完全要受工业資本的支配。这里，馬克思很显然是只着眼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英国情况。但馬克思漠視了一个对欧洲大陆上情况极关重要的問題，即都市及农村无产阶级从何处不断流进来的問題：农村及都市中間阶层随着农村經濟及手工业小經營的沒落而变为无阶级的不断过程，也就是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繼續的崩潰和解体中所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如何不断从非资本主义情况过渡到资本主义情况的过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欧洲的农业及手工业的沒落，欧洲以外国家的种种原始的生产形态和社会机构的崩潰，亦是如此。

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侵入一切地带与气候，才能充分发展，它就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温带的自然资源 and 劳动力上，它也不能只使用白种人的劳动力。資本需要其他人种来开发白种人所不堪劳动的土地。資本必須能够无限制地动员全世界的劳动力以便在生产剩余价值所允許的范围内，利用地球上所有的生产力。但是，这些劳动力，如果要想把它編入到資本的活动队伍中去，首先就需要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束縛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从原始社会关系解放出来，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工資制度中去，这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历史基础之一。对于第一个真正资本主义生产部門，即英国棉織工业而言，沒有北美联邦南部諸州的棉花，固然不可能发展；同样，沒有几百万非洲黑人——他們是作植棉的劳动力而移殖到美洲去的，后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自由无产阶级，他們被編入工資劳动者阶级內——也不可能发展。^①为了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必要的劳动力，所謂劳动問題对于在殖民地的資本，愈来愈显得重要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用各种可能的“温和的强制”方法，尽力把隶属于其他社会制度的劳动解放出来，以听命于資本的支配。由于这种努力，在殖民地国家便产生了近代

工資制度与原始統治关系的极其奇特的混合形态^②。由此可知，資本主义生产沒有其他社会結構的劳动力，就一步也走不通。

固然，馬克思对非資本主义的生产資料获得过程以及农民向資本主义的无产階級轉化过程，已經詳細地討論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关于英国无产階級的发生，农业資本主义的租地农业家階級及工业資本的发生的叙述，就是一个証明。在这个叙述中，馬克思特別着重強調欧洲資本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从所謂“原始积累”的角度来分析的。在馬克思看来，这些过程是附带发生的，只是說明資本的发生史即資本在世界上的最初出现情况。它們表现了資本主义生产方法从封建社会母胎內出生时的痛苦过程。当馬克思进入資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时，他又重新申述了他的前提，即資本主义生产占普遍而唯一的

① 美国南北战争前所发表的一个統計表列举关于蓄奴各州的年产值及其使用奴隶的数量如下，其中大多数是从事于棉花的栽培：

年次	棉花生产額(单位一百万美元)	使用奴隶数
1800	5.2	893,041
1810	15.1	1,191,364
1820	26.3	1,543,688
1830	34.1	2,009,053
1840	74.6	2,487,255
1850	101.8	3,179,509
1851	137.3	3,200,000

(西蒙士：“美国历史上的階級斗争”，“新时代”杂志，附刊，第七号，第39頁)

② 这种混合形态的典型例子，可以參看英国前大臣布萊士关于南非洲的金刚石矿的叙述：“在庆伯利(南非洲一个城市，那里盛产金刚石——譯者)地方最足令人注目的現象是有两个所謂圍地(compaund)，那里幽閉着許多矿山上所使用的土人。宅地周圍有很大的圍柵，无屋頂，但是盖了一个鉄絲网，任何人都无法跳出去，有一地下道通往邻近的矿山。一天三次每次八小时輪流作业，因此，矿工繼續八小时的时间集結在地下。圍柵內側設有小房，供土人休息与睡眠。圍中有病院，还有一个学校供矿工休息时学习識字。不准卖酒。——每一入口处严格地加以看守，不管是白人或土人，都不許进去訪問。生活資料由圍地內公司所屬之商店供給。德·伯尔矿(De Beers)的圍地，在我訪問的时候，有包括各族土人2,600人住在那里；因此，从南非的納达尔及潘多兰到遥远的北部的坦干依喀湖，所有各类型的土人标本，都可以看到。在高工資——通常每周十八到三十馬克——的引誘下他們从各方面来到这里，工作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有时，还停留較长的时间……在这种广濶的四角的圍地里，可以看到納达尔的楚魯人，芬哥人，潘多人，邓甫人，巴左多人，伯叔安那人，葡領干干哈那的臣民，一些馬达伯人，馬卡拉卡人，以及住在贊伯西河两岸的各族青年等等。在南非沒有一处地方能看到象这样的一个活的种族展覽会。还有一些布西曼人或者至少是出自布西曼族的土人。他們和平地共同

統治地位。

但，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在它十分成熟時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與它並存的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這不僅僅是“過剩生產物”的銷售市場那樣單純的問題，象西斯蒙第和後來對資本主義積累進行批評和抱懷疑論者所提出的那樣。資本的積累過程，是通過它的一切價值關係及物質關係——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而與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結合着。這種非資本主義生產形態，成為這一過程的特定的歷史背景。既然資本的積累，沒有非資本主義環境，在任何場合下，是不可能的，那麼，假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唯一的，絕對的統治地位，是不能提供一個正確的圖景的。西斯蒙第及其學派，把他們的困難完全歸之于剩餘價值的實現問題，在這樣做時，他們確實表明他們對資本積累的主要條件具有正確的感覺。但增大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的條件是與實現剩餘價值的條件有區別的。資本如果沒有全地球的生產品與勞動力，那是不能成的。為得要使積累運動順利進展，必需要地球上一切地帶的自然財富及勞動力。絕大部分的資源和勞動力，事實上還存在於前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範圍內，——這是資本積累的歷史環境——因此，資本就

生活，用各種方法來消磨他們的休息時間。除了賭博之外，他們還玩類似英國的‘狐與鵝’那種以石頭放在木板上面的遊戲。音樂方面，也是使用兩種原始樂器：一種叫所謂‘卡芬琴’(Kaffernklavier)，用不同長短的鐵片，並排綁在一個木架子內，按之使發聲；一種是所謂天然的樂器(Kunstlosen instrument)，用幾根很長的堅韌的木片做的，擊之可發出種種的聲音，而且能奏鳴旋律的基礎音。還有少數人正在閱信或寫信；其他人自己做飯，或聊天。有些種族的人不停地指東說西。如果我們從一堆人中走到另一堆人中，可以在這個奇特的黑人的混合場所聽到十二種語言。”黑人勞動了幾個月之後，拿着他們的貯蓄的工資，離開礦山，回到自己的家鄉，以金錢買一個老婆，回復到原來傳統的生活，這是常見的事情。(詹姆士布萊士：“南非洲印象記”，1897年，第242頁起)這裏面可以看出對於南非洲解決“勞動問題”方法的生動的描述。這本書還告訴我們，黑人被強迫在那些地方，如慶伯利，威提瓦特蘭，納達爾，馬達伯爾蘭的礦山和種植園勞動，他們被奪去了一切土地，一切家畜，即一切生活資料，使他們變為無產階級。用酒精麻醉他們。(以後，等到他們已經走上了資本的“圈套”，那個時候，剛剛養成飲酒習慣的他們，又被嚴禁“飲酒”。因為對於剝削的對象，不能不保持可以繼續使用的狀態。)最後，通過赤裸裸地使用強力，牢獄，鞭笞，他們被推入到資本的“工資制度”中了。

必須熱烈要求統治這些領土和社會組織。例如，在印度按資本主義方式進行的橡膠種植，當然沒有理由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服務。可是，對某些國家的某些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的事實上的支配，必然會為導致資本的擴張，因而發生了力圖把那些國家和社會，置於資本支配之下的現象。事實上，在原始的社会关系里，可以采取較大的強迫力量 and 更无情的措施，而這些在純粹資本主義社会条件下是不能忍受的。

剩餘價值的實現，則與此不同。它確是依存於非資本主義的消費者。因此，剩餘價值的非資本主義的購買者之存在，乃是資本及其積累的直接的生存條件。而且，在這個限度內，又是資本積累問題的決定性力量。

總之，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資本積累，不管它的理論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於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階層及社會結構形態的。

因此，在將近一世紀來這個成為經濟理論上論爭中心的問題，其解答是處在兩極之間：一面是小資產階級的懷疑論者，如西斯蒙第，吉爾希曼，伏隆佐夫，尼古拉·昂等等，他們認為資本積累是不可能的；另一面是粗糙的樂觀主義者，如里嘉圖，薩伊，圖岡·巴拉諾夫斯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有無限的自我繁殖能力，而由此所得的邏輯上結論是資本主義的永恒性。問題的解答，根據馬克思學說來看是在辯證法的矛盾中，一方面資本主義需要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才能使資本主義的積累能夠繼續不斷進行；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在前進中不斷同化那些條件，而正是這些條件才能保證資本主義本身的存在。

這裡，我們應該修正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這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在關於積累問題的爭論中是很重要的。內外市場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確實起着很大的，但完全不同的作用。可是，它們並不是政治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社會經濟學的概念。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觀點上看時，國內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是它自己的生產物的購買者及其自身的生產要素的供應者。國外市場是

吸收資本主義的生產物并供給資本以生產要素及勞動力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從這個觀點來看，即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德國與英國在相互交換商品上，主要構成了國內市場，即資本主義市場。但德國工業與德國農民間的交換，就德國的資本上看，表現為國外市場的關係。正如從馬克思再生產圖式中可以看到的，這些概念是嚴格而不含糊的。國內資本主義的交易，至多只能實現社會總生產物一定的價值部分，即被耗用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的消費部分；反之，剩餘價值的資本化部分，就不能不靠外部來消費。剩餘價值的資本化，是生產的本來的目的，是促進生產的動機，而另一方面，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更新（及剩餘價值的消費部分），則是剩餘價值資本化的廣泛基礎，是前提條件。與資本主義的國際發展同時，剩餘價值的資本化變為更加迫切，更加不穩定，而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的根基將成為一個不斷增長的混合體，絕對地，并相對地（相對於剩餘價值），日益加大。因此，舊的資本主義諸國，相互間提供日益擴大的市場，并日益增加彼此間的依賴性。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又相互間在與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關係上，又成為日益劇烈的競爭者。^① 剩餘價值資本化的條件與總資本更新的條件，相互更加矛盾。而這種矛盾，不過是利潤率下降規律所包含的矛盾的一個反映而已。

第二十七章 對自然經濟的鬥爭

資本主義歷史地生育并發達於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之中。西歐諸國的資本主義，最初是處在產生它的封建環境之中——在农村是莊園經濟，在都市是基爾特（行會）手工業——以後，脫離了封建制度之後，它又主要處於農民和手工業的環境之中，也就是說，處於農業及商業的簡單商品生產的體系之中。此外，圍繞

^① 德國與英國的關係是一個典型例子。

欧洲资本主义的，还有非欧洲文化的广大区域，它们代表各个发展水平，从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或畜牧为业的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一直到农业与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所处的环境。

这里可以区别为三个阶段。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有的积累条件而斗争。

资本主义为着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需要那些围绕它们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但并不是所有非资本主义形态都对它有用。资本主义之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是要把它们作为其剩余价值的销售市场，作为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并作为工资制度下的劳动力的蓄积场所。但资本不能依靠自然经济的生产形态来达到所有这些目的。因为，一切自然经济的形态——在土地公有制下的原始农民公社，封建的赋役关系，或其他类似的形态——都是主要为了自己内部的需要而生产。从而，对外来商品，或者完全没有需要，或者需要得很少。并且，自己的生产物，通常也不感觉过剩，或者，至少也没有脱售它的过剩生产物的迫切要求。最重要的是在任何自然经济中，生产之所以继续进行是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下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庄园及其他类似的组织，把劳动力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置于法律及习惯的支配之下，借以维持它们的经济结构。因此，自然经济在每一方面都以它的坚固的壁垒来阻挠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到处要对它所遭逢的各个历史形态的自然经济，不管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社会也好，原始公社也好，家长制农民经济也好，进行一场歼灭战。这场战斗的主要方法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革命，战争），国家租税的重压，及廉价的商品。这些方法，或者同时进行，或者连续进行，互相配合起来。对欧洲封建制度的斗争，它的强力表现为革命的形态（如17世纪，18世纪及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结局是属于

这一类的)，而在欧洲以外諸国，对較原始的社会形态的斗争，采取了殖民政策的形态。这些方法，連同所实行的租稅制度以及貿易关系，特别是和原始社会建立的貿易关系，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和經濟因素相輔而行的联合行动。

資本主义对自然經濟社会的斗争，其經濟目的，可詳細地分列如下：

1. 直接占有生产力最重要的源泉，如土地，原始林中的野兽，矿物，宝石及矿石，外国植物产品，如橡胶等。
2. 使劳动力“自由化”，强制它为資本而劳动。
3. 商品經濟的导入。
4. 农业之与手工业分离。

在原始积累时期，即从中世紀末起直至19世紀为止，欧洲資本主义最初的历史阶段，英国与大陆諸国的剝夺农民财产，是使生产資料及劳动力大量轉化为資本的一个最突出的武器。可是，到今天，掌握大权的資本仍然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通过近代殖民政策——来进行。如果認為資本主义只满足于通过商品交易所取得的生产資料，那是一个幻想。就在这一方面，資本已遭遇到困难，因为在地球上有广大地区是属于那些社会形态，它們沒有商品交易的愿望，或者，由于全部社会結構和所有制形式的关系不可能出售生产力，而这些生产力正是資本所感到兴趣的。当然，这些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及其矿藏、牧场、森林、河水及原始游牧部落的家畜等等。这里，如果資本依靠緩慢的内部解体过程，这将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耐心等待最重要的生产資料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通过商品交易而分离出来，那就等于完全放弃那些地区的生产力了。因此，对資本主义而言从殖民諸国剝夺最重要的生产資料，是它自己的死活問題。可是，土著居民間原始的联合是他們社会結構的最坚固的保障，也是他們生存的物质基础的最坚固的保障。因此，資本主义一开始就对阻挠它发展的非資本主义社会組織安排有系統的破坏与歼

灭。这里，我們已越过了原始資本积累的阶段，但这个过程一直进行下去。对每一次新的殖民地扩张，必然伴随着資本对土人的社会經濟联系的无情的战斗，同时，这些土人又被用强力夺去了他們的生产資料和劳动力。如果希望把資本的积累，限于完全“和平的競争”——即限于象資本主义生产者各国間所进行的那样正常的商品交换，那么，这种希望，恰好是建筑在一个錯觉的基础上：即資本，沒有較原始組織的生产力及需求，也能进行积累，它可以依赖于自然經濟解体的內部緩慢的过程。其实，具有跳跃式扩张的資本积累，决不能满足于等待非資本主义形态內部的自然分解从而轉变为商品經濟，正如它不能满足于等待劳动人口的自然增加一样。强力是資本所采用的唯一解决方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資本的积累不仅在它誕生时，而且直至今日，都使用强力作为一个永久的武器。从原始社会看，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問題。对它們來說，除了拼命进行反抗和斗争，直至全部灭亡为止外，沒有其他办法。因此，对殖民地的永久軍事占領，土人暴动及出兵鎮压，就成为殖民地統治日程上的永恒现象。这样，暴力方法，完全是資本主义与阻碍它积累的自然經濟組織之間冲突的直接結果。自然經濟組織的生产資料和劳动力，以及自然經濟組織对資本主义剩余生产物的需求，对資本主义是同样必要的。可是，資本主义却有意識地，有目的地，破坏自然經濟形态的独立性，借以掠夺他們的生产資料和劳动力，并使他們变为商品购买者。这种方法，从資本的立场上看，是最有利的，它产生最快的效果，因此对于資本是最合适的。实际上，这个方法必然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軍国主义。但軍国主义对积累所具有的意义，与其他問題有关，容后再述。关于資本主义在殖民地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印度人的远古經濟組織——共产主义农村共同体——它的形态几千年来經歷过种种变迁，不为“政治风云”所动摇，而繼續保

存下来。在紀元前六世紀时，波斯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征服印度一部分地区。二百年之后，希腊人侵入，留下一些由亚历山大建立起来的、完全仿照外国文明的殖民地。接着，野蛮的西徐亚人也侵入国内。印度在阿剌伯人統治下达好几百年。其后，阿富汗人从伊朗高原侵入。他們受到游牧民族韃靼人的激烈攻击，从特兰斯苦煞尼亚 (Transoxanien) 被驅逐出来。凡蒙古人所过之处，留下了恐怖与破坏的痕迹，全村全乡被屠杀的不可胜計，滿生庄稼的郊野，都洒遍了鮮血。可是，印度的农村公社最后还是繼續存在下来。以后繼之以回教的征服者，但他們也沒有侵犯农民大众的內部社会生活及其传统的机构。他們仅在征服地区任命官吏，监督軍事組織和征收租稅。所有征服者，都是以統治和剝削这个国家为目的，但沒有一个企图掠夺人民的生产力，破坏他們的社会組織。在大莫臥儿王朝，农民每年以实物貢納繳付給外国統治者；但他們还是不受干扰地在农村中生活下去，和他們的祖先一样，繼續在他們的“Sholgula”上种植稻米。英国入侵以后，資本主义文明疫病終于破坏了印度人民的整个社会組織，它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几千年来所沒有完成的，即用諾加亚劍也无济于事的工作。英国資本的最終目的，是要占有印度农村公社的生存基础，即土地。

为达到这个目的，欧洲殖民者过去所喜欢采用的一个杜撰的說法，說什么殖民地的土地，都属于政治統治者所有。于是，英国人把全印度的土地所有权，事后追贈給莫臥儿王朝及其官吏，使他們成为印度的“合法”繼承人，来繼承此項财产。詹姆士·穆勒那样最优秀的經濟学家，也想給这种杜撰的說法以“科学”的根据，他說：我們必須認为印度的土地财产是属于国王的。“因为，如果認为国王不是土地所有者，那末，我們就說不出哪一个是所有者？”^① 这就是他的有名結論。而穆勒就根据这个結論，热心支持上述的杜撰的說法。早在1793年，英国人已經把孟加拉的土地财产交給柴明达儿^②——即过去依伊斯兰教徒的收稅承包人——

或者，他們地區內的世襲市場管理者，其目的在出兵鎮壓農民大眾之際，利用這些地主作為他們的幫兇。以後，英國人侵入亞格拉地方，奧德地方及中部地方時，也是採用同樣的方法。結果，引起了很大的農民暴動，在暴動中收稅吏經常被驅逐出去。那時，英國資本家乘全盤混亂及無政府狀態的機會，掠奪了很多的土地。

此外，租稅的負擔高得可怕，差不多吞嚥了人民勞動的全部成果。最厲害的地点（根據1854年英國稅務局的官方證明），是在德里和阿拉哈巴德地區，那裡的農民，甚至感覺到與其讓自己的

① 穆勒在他的“英領印度史”內，為得要証實在原始關係上，土地經常而且到處屬於國王的財產那個命題，於是從種種龐雜的典據內——如蒙哥拔克（Mungo Park），赫羅多德（Herodot），波爾納（Bolner），亞可斯達（Acosta），嘉錫拉索·德·拉·伯加（Garcilasso de la Bega），亞伯·格羅錫爾（Abbe' Grosier），巴羅（Barrow），狄阿多魯士（Diodorus），斯特拉波（Strabo）等等——無選擇地，無批判地搜集了許多材料。他把這個命題應用到印度上去，他說：“根據這些事實，只能得出如次的結論：土地財產屬於國王，因為，如果土地財產不屬於國王，那末，就無法指出它是屬於何人的。”（詹姆士·穆勒：“英領印度史”，1840年，第四版，第一卷，第311頁）對於這個經典式的推論，穆勒的編者 H·H·威爾遜（Wilson）給了一個很有趣的注釋（威爾遜是牛津大學梵語教授，精通古代印度的法律關係）。他在序言中認為，著者想用英領印度全部歷史，來證明邊沁（Bentham）的理論見解，因而他用了最可疑的材料來描畫印度人的形象。（這個形象與原型並不相似，而且幾乎違反了人道主義。）其後，他附加了下面的腳注：“大部分原文與腳注，在這裡都是不相干的。從伊斯蘭教徒的習慣中引用的例子，假定是正確的，也和印度人的法律與權利無關。然而這些東西又是不正確的，穆勒的嚮導使他迷失了道路。”於是，威爾遜率直地反駁國王對土地所有權的理論，特別是關於印度的情況（同上書，第305頁腳注）。亨利·梅恩（Henry Maine）也指出英國人企圖把他們對印度全部土地的所有權，說成是從伊斯蘭教徒那裡繼承來的，而梅恩承認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說：“英國人最初所作的假定，是從他們的前任，伊斯蘭教徒那裡繼承來的，全部土地都屬於國王的絕對財產，一切土地的私有權，只有得到他的許可才能存在。伊斯蘭教的教義與相應的伊斯蘭教徒的習慣掩蓋了古代關於國王權利的看法，根據這種看法，雖然分配給國王的土地產品的份額，比之西方統治者所曾要求獲得的，要大得多，但它並不否認土地私有權的存在。”（“東方與西方的農村公社”，第五版，第二卷，1890年，第104頁）另一方面，馬克西·柯瓦列夫斯基曾徹底地證明這種借口“伊斯蘭教義與習慣”，只不過是英國的神話而已（參看他用俄文所寫的著名作品：“土地公有制崩潰的原因、過程與後果”。莫斯科，1879年，第一部）。迄今為止，英國學者及其法國同僚們例如對中國，仍堅持同樣的神話，他們認為中國全部土地都屬於皇帝所有（參考歐·弗蘭克博士“中國的土地財產與法律關係”1903年版中對這個神話的駁斥）。

② 即向英國政府繳納地租的孟加拉地主——譯者。

土地負擔高額租稅，不如把它出租或抵押，還來得有利些。高利貸就在這種租稅制度下，侵入印度農村。它好像一個癌腫，從內部腐蝕社會組織。^①英國人為得要加速這個過程，實施了一套漠視村社一切傳統和公平觀念的法規：誰敢延滯納稅，就強迫拍賣農村的土地。古老的家族團體，企圖利用對他們世襲的土地以及對近鄰土地的優先購買權來保衛自己，但終歸無用。村社的解体無法制止。強迫拍賣土地，個人脫離村社，農民負債從而失去土地等等，層出不窮。

英國人運用他們在殖民地所常用的策略，試圖把他們的強制政策——這個政策實際上破壞了傳統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使印度農民經濟土崩瓦解——說成為了保護農民們的利益，幫助農民們抵抗本地的壓迫和剝削，而有必要實施的。^②英國犧牲了農村公社的古老財產權，人為地創造了印度的土地貴族；然後，又出來“保護”農民以免這些被稱為壓迫者的壓榨，並把那些“違法侵占的土地”，收歸英國資本家的手裡。

於是，印度在一個短期間內發展了大地產制，而廣大地區的農民卻大量地淪為在短期租約下的貧困的小佃戶。

^① 遺產分割與強制以土地抵償債務，不斷破壞了農村公社。這是在現今印度到處看到的公式。（亨利·梅恩：“東方與西方的農村公社”，第113頁）。

^② 以這樣見解來闡述英國政府殖民地政策的，可以久居印度的英國政權代表者康達哈爾的羅柏茲爵士（Lord Roberts of Kandahar）為代表。他對士兵暴動爆發的原因，除了認為單純地“誤會”英國統治者慈父般的意圖外，不能提供其他解釋。他說：“在印度叫做土地權授與法的制度被認為是不公平的。根據這個制度，每個土地所有者對他的地產的地契和權益都受到審查，他對政府所應付的租賦也加以限制。……和平與秩序恢復之後，過去在土著各朝代的統治下，以極端殘暴和腐化的方式所實施的土地稅制必須加以研究和修改。以此為目的，對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权進行了調查和訪問，結果發現在許多場合下，有地位，有勢力的家族或是掠奪了地位較低的隣人的財產，或是逃避了按地產價值比例計算的租稅。儘管調查和訪問是在極端善良的意圖下進行的，但仍然使地位高的階級感到非常不滿，同時，也不能見諒於一般群眾。處在統治地位的家族極端憎恨我們要實行公正確定地權和估算土地稅的企圖……在另一方面，即使農業居民，在我們的統治下得到很大的利益，他們仍舊不會了解政府使用一切方法，來提高他們的地位和改善他們的前途的仁政。（“四十一年來的印度”，倫敦，1901年，第一卷，第307頁）

最后，还有一个突出的事实表明典型的资本主义殖民方法。对公用事业极端漠不关心的。在印度的征服者中，英国人可算首屈一指。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及蒙古人，曾经在印度经营并维护广大的运河系统，在全国建设了道路网，在河川架设了桥梁并督促人民掘井引泉。印度蒙古王朝的创业者、铁木尔（Timur）即塔墨朗（Tamerlane），对土地的耕种，灌溉的开发，交通的安全，以及旅客的扶助予以很大的关心。^①

印度早代的帝王、阿富汗及蒙古的征服者们，尽管有时以残暴行为加诸个别人民的身上，但他们却留下宏伟的建设，使我们今天还可以到处看到，好象是一个巨人种族所遗留下来的产品似的。

“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直至1858年为止，在这期间，这个公司并没有使印度人获得一条泉水的便利，并没有开凿一个土井，也没有为印度人架设一个桥梁……。”^②

另外一个证人英国詹姆士·威尔逊说：“马德拉斯省的巨大的古代灌溉系统，其痕迹仍然一直残留到今日，真使人惊叹不置。水闸和围堰的修建使河流变为巨大的湖泊，而运河即从这些湖泊导引水流，以灌溉周围六七十英哩的流域。大河旁象这样的水堰有三十至四十个之多……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集中在人工的蓄水池中。这种蓄水池迄今残存，其周围长达十五哩至二十五哩。这些巨大工事，差不多都是在1750年以前完成的。在东印度公司

^① 铁木尔在他的“施政原则”（1783年由波斯文译成英文）中说：

“而我命令他们必须在各都市建造礼拜堂与寺院，必须在通衢修房舍以接待旅客，又必须在河流上架设桥梁”。

“而我命令坏桥必须修理，小川与河流上必须架设桥梁，道路上每隔一驿程必须建筑‘柯鲁汪沙赖’（Kauruwansalai），路上必须配置向导与哨卒，每个‘柯鲁汪沙赖’必须住人……”

“而我规定无论何人，想开垦生荒地，修浚水道，开凿运河，栽培树林，或将荒蕪土地恢复耕种，第一年对他不征收任何贡赋，第二年让他自愿缴纳多少，就收多少，第三年照章征收租税。”（詹姆士·穆勒：“英领印度史”，第四版，第二卷，第492—498页）

^② 瓦伦伯爵（Count Warren），“印度居民的道德状态”，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土地公布制崩溃的原因、过程与后果”，第164页。

和蒙古統治者戰爭期間，甚至，在我們統治印度的整個時期內，這些工事都已失修敗壞。”^①

這無怪英國資本對印度的農村公社絲毫沒有給予經濟支持或幫助它們生存下去的意圖。恰恰相反，英國資本是以破壞它們，奪去它們的生產力為目的。積累的無底貪慾和占有本能，從其本性來看，必然會充分利用“市場條件”，而不考慮明天的情況。它決不能看得這麼遠，以致認識到一個古老文明所遺留下來的經濟紀念物的價值。（最近在埃及的英國工程師，當他們為了發展資本主義企業被委託對尼羅河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時候，他們曾在熱地試圖發掘一個古代灌溉系統的遺迹，這個灌溉系統是與由於愚昧而任其敗壞的印度灌溉系統類似的。直至1867年英國才能認識到它的“高貴”行為在這方面所產生的結果如何。就在那一年的大飢荒中，僅僅阿利薩（Orissa）一地，死去了一百萬人，這迫使英國議會對這次災害的原因進行調查。現在英國政府已採用行政措施，試圖解救農民免受高利貸的壓迫。1900年旁遮普土地授與法禁止把農民的土出售或抵押給農民階級以外的人們。但在個別場合，在徵稅吏的同意下，可以作出例外。^②英國人在有意識地破壞了印度古老社會關係的保護紐帶，並養育出高利貸制度（百分之十五的利息是普遍的现象）之後，就把破產的印度農民置於財政部及其官吏的慈愛的照料之下，也就是說，置於那些吸干農民生路的人的保護之下。

仅次于受尽折磨的英領印度的，是在法國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它在資本主義殖民史上也占有顯赫的地位。當法國人征服阿爾及利亞的時候，阿拉伯、卡畢列入中間，流行着古老的社会經

^① 胡·毛勒（Hugh Murray），詹姆士·威爾遜（James Wilson），克萊費（Greville），詹姆遜教授（Prof. Jameson），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及上尉達連普（Captain Dalrymple）所著的“從遠古時代到阿富汗戰爭終結止，關於英領印度的歷史敘述的記錄”。愛丁堡，第四版，1843年，第二卷，第427頁。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書。

^② 賚登（Victor V. Leyden）：“Jahrb. f. Ges., Verw. u. Volksw., 英領東印度的農業狀況與地租”、“立法、行政及國民經濟年報”，第36卷，第四冊，第1855頁。

济制度。这些制度一直被保存到19世紀，而且，尽管这个国家的历史如何长久，如何动荡不安，这些制度仍然部分地留存到今日。

在都市里，在摩尔人与犹太人中間，在商人、手工业者及高利貸者中間，一般存在着私有财产。在农村中，自从实行了土耳其的封建制以来，广大的土地，作为国家所有，而被統治者所掠夺，但可利用的土地，仍然有一半是属于阿拉伯人及卡毕列人部落的联合财产，而这些部落，一般还保存古代家长制的风俗。許多阿拉伯家族在19世紀还过着同样的游牧生活，象远古时代一样；他們的生活表面上看，好象极不安定而沒有规律，但实际上是受到严格的规定，而且是极端单調的。每屆夏季，他們携带男女老幼，畜群和帐篷，移居到海风吹拂，凉爽宜人的泰尔 (Tell) 海岸去；等到冬季，他們再大伙儿回到温暖的沙漠。他們按照一定的路綫移动，无论哪一个部落或家族，都被指定夏季和冬季的圍居场所。那些經營农耕的阿拉伯人，他們的土地是氏族共同的财产。卡毕列人的家族团体，也是根据传统的规律，在他們选出的首領的监督下，过着家长制的生活。

家庭事务由妇女輪流担任，其中負总責的由家族所选出的最年长的妇女担任，或者也由其他妇女輪流担任。住在非洲沙漠边缘的卡毕列人的氏族組織极类似著名的南部斯拉夫族的“查特魯加”(Zadruga)——不仅土地，而且成員在工作上所必需的，或由他們获得的一切工具、武器和貨幣，都是这个氏族的公有财产。属于各个人的私有财产的，男子只有一套衣服；女子只有她結婚时作为嫁粧的衣服及飾品。較高貴的服装及宝石，都被作为家族的公共财产，非得到整个家族的同意，各人不能任意使用。如果氏族的人数不太多，大家聚集在一张桌子上吃飯，由妇女輪流烹調食物，而最年长的老妇負責分配。如果人数过多，則所有生的食物，都由家长每月严格根据平等原則分配給各家族，由各家族自己去烹調。这些村社是在血統、互助和平等的联系下，結合

起来的。家长临死时，往往教訓其子孙，要效忠家族，至死不渝。^①

十六世紀土耳其在阿尔及利亚所建立的統治，已經严重地破坏了这种社会关系。但土耳其长官沒有沒收所有的土地以充国庫；說所有的土地都被土耳其人收归国庫，只是后来法国人所发明的神話。只有欧洲人的脑筋才能作出这样的幻想，它与整个伊斯兰教的全部經濟基础在理論上和实践上是矛盾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土耳其人並沒有触动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他們只沒收了氏族的大部分未耕土地，作为在土耳其的地方官(Beyliks)管轄下的皇家土地。这些土地中一部分，直接由国家征用土著居民来經營，另一部分則出租出去以取得地租或实物貢賦。此外，土耳其人还利用被征服家族的叛变或地方上的騷动的机会大规模沒收土地，从而扩大了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他們或則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軍事組織，或則把这些土地公开拍卖(那时，許多土地就落到土耳其人及其他高利貸者的手里了)。許多农民为了要逃避这种沒收和租稅的負担，象在中世紀的德国一样，不能不依靠教会的保护，这样，大量的土地成为教会的財產。經歷了这些变化后，到了法国征服的时候，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分配表现如下的情况：皇家土地占有150万公頃，同时，还有300万公頃的未耕土地，作为至高无上的信仰者的公有財產(Bled-el-Islam)。私有土地，包括巴巴尔(Ber bers)人从羅馬时代起所占有的300万公頃土地及土耳其統治下移归私人之手的150万公頃土地。而剩下的属于阿拉伯氏族的公有財產的，仅存500万公頃的土地。在撒哈拉沙漠，在沃壤地带，大約有300万公頃的肥沃土地

^① “家长临死时，差不多都根据祖先成規，劝告兒孙繼續过共同的生活。这是他的最后的訓戒，最眞摯的願望”。(阿·哈諾托和阿·勒托諾：“卡畢列及卡畢列人的风俗”，1873年，第二卷，“民法”，第468—473頁)此外，著者在生动地描述这种氏族的共产主义时，曾作如下的評論：“在勤勉結合的家族团体中，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的而結合起来，大家为了共同利益而工作。可是，沒有一個人抛弃了自己的自由，或者放弃了自己的繼承权。沒有一个其他氏族的組織这样接近于平等，因为这些其他民族还离开共产主义很遙远哩。”

是由氏族所公有，另一部分属于私人所有。剩余的2,300万公顷土地，主要是荒地。

法国人把阿尔及利亚变为殖民地后，即开始喧嚷要做文明使者的工作，因为，阿尔及利亚，在18世纪初脱离土耳其的统治后，变为骚扰地中海，进行贩卖基督徒奴隶的海盗的藏身之处。特别是西班牙和北美合众国（尽管当时那些国家本身也进行规模不小的奴隶买卖），就对这种穆斯林罪恶进行无情的战争。即使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还是发动了反对阿尔及利亚无政府状态的十字军。因此，法国的奴役阿尔及利亚，是在打击奴隶制和建立文明秩序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实践很快地揭穿了这种口号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大家知道，在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后的四十年间，象法国那样频繁地变更政治组织，是在其他欧洲国家所看不到的。君主政体复辟后，继之出现了七月革命与“公民国王”的统治；接着，又发生了二月革命、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最后，又出现1870年的灾难和第三共和国。贵族，大金融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交相掌握政权。可是，在那样走马灯似的现象之中，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它自始至终追求着同一的目标。在非洲沙漠边缘上，清楚地表现出，19世纪法国的种种政治革命都围绕着一根本利益为中心，那就是：建立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统治及其所有制形式。

1873年6月30日法国国会議員洪伯（Humbert）在国民議会席上，以阿尔及利亚农业调整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說：“提交国会考虑的法案，是以参議院的一系列的条例，布告，法律及通令为基础而拟定的，而这些文件不論合起来看或分开来看都是以在阿拉伯人中建立私有财产制为目的。”尽管法国国内政治动荡不定，法国殖民政策半世纪来继续以破坏和分裂公有财产作为系统的，有意识的努力的目标。这个政策是为着两个明显的目的：公有财产的瓦解首先是被用来打击阿拉伯家族团体的社会力量并镇压他们对法国统治的顽强抵抗，因为在法国统治下，尽管法国

兵力占绝对优势，仍发生无数次起义，使整个国家处于不断战争状态^①。其次，为了要侵占被征服国的经济资源，公有财产也必须加以破坏。这就是说，要把上千年来由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掠夺过来，转移到法国资本家的手里来。于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谎言，即在伊斯兰法律下，所有土地属于君主，又被利用起来了。

和英属印度的英国人完全一样，路易·斐立浦派往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们宣称大家族的公有财产，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以这个虚构的事实为借口，宣布所有未耕土地，特别是公有地、森林及牧场，都收归国有，并供殖民目的之用。于是，完整的移民制度所谓“宿营”（Cantonnements）办法就发展起来了。法国人在原属氏族的土地上居留下来，并把原有部落排挤到极小的地域内居住。根据1830, 1831, 1840, 1844, 1845, 1846年的通令，这样盗窃来的阿拉伯家族的土地，被合法化了。可是，这种移民制度，实际上完全没有促进殖民，只是养成了一些巨大的投机与高利贷。阿拉伯人，在许多场合下，设法买回他们被夺去的土地，但，他们也就因而欠了许多债。法国的租税压迫，更加速了这个趋向。特别是1851年6月16日的法律宣布一切森林国有，这样，从土著居民手中夺去了牧场灌木林约达240万公顷，并使畜牧业丧失了根本必要的东西。在这些法律、条例、规章等骤雨般的冲击下，这个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受到莫大的损害。在狂热的土地投机盛行下，许多土人把土地出售给法国人，他们希望最后会把这些土地买回来。往往同一块土地，他们同时出卖给二个或三个买主，甚至，把不可割让的家族土地，或者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也出卖了。例如从罗昂来的某一投机公司自以为买到了二万公顷的土地，但实际上只获得了尚有争执的一千三百七十公顷的地权。于是发生了无数的诉讼事件，而法国的法院，原则上都是支持土地的分割与买主的要求权的。在这

^① 国会議員迪的尔(Didier)在1851年国民议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必须赶快解散家族团体，因为它们是反抗我们统治权的杠杆。”

样情况混乱下，投机倒把，高利贷及无政府状态，就成为一般的现象。但是，虽然在阿拉伯人中间所引进的大量法国移民，其原来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法国政府的支持，但这个计划惨遭破产了。因此，法国政策，在第二帝国下，曾试走第二条道路。法国政府具有欧洲人的一般缺乏远见，三十年来曾经顽固地否认公有财产的存在，但最后，却学得乖一些，于是，大笔一挥，正式承认了家族公有财产制，但同时，却又要解散这个制度。1863年4月22日的参议院通令，之所以具有双重意义，就在于此。亚拉尔将军（General Allard）在参议院说：“政府并没有忽视它的政策的一般目标是削弱部落首长的势力，和解散家族团体。通过这个方法，它将扫除为政府法案反对者所辩护的封建制（！）的最后残余，……加速解散家族团体的最确实办法是建立私有财产制并使欧洲殖民者在阿拉伯家族中间定居下来”。^① 1863年的法律成立了许多分割地产委员会，其主席为少将或上校，下设部长一人，阿拉伯陆军武官一人，及国领管理員一人。这些参加委员会的当地专家（精通非洲的经济与社会情况的），面临着三重任务：第一是决定家族领地的明确界线，第二、把每个氏族的领地，分配给各支族；最后，各家族的土地，再分割为各个私有地。这样，许多少将被派往非洲内地去执行职务。委员会前往目的地后，它要兼任土地纠纷的法官、土地测量员和土地分配三种职务，而最后决定权则属于阿尔及利亚总督。各委员会的十年努力产生下列结果：自1863年至1873年，在700个领地中约有400个分配给每个氏族的支族，在这里就已经预先奠定了将来大地产和小地段的不平等的基础。因为，根据领地的大小和氏族内成员的数目，一个家族有时分得1至4公顷的土地，而另一家族甚至分得100至180公顷的土地。但是，土地的分割到这里为止。由于阿拉伯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分割家族的土地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所以，尽管有上校和少将参加，以创造私有土地制

^① 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书第217页。当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时的风尚是把政府反对派说成是封建制度的公开或隐蔽的拥护者。

(以便把土地轉移到法国人手里)为目的的法国政策还是归于失敗了。

但第三共和国,是赤裸裸的資產階級政權,它具有勇气和厚顏无耻逕直地走向它的目標;它从另外一端来解决問題,它抛弃了第二帝国的那些初步工作。1873年,国民議會制定了一个法律,它的公开目的是要把所有700个阿拉伯氏族的全部領地都立即分散开来,并在尽可能的最短时期內强制建立私有財產制。这个措施的借口是殖民地已陷入了絕望状态。在印度正是1866年的大飢荒才使英国公众清醒过来,看到了英国殖民政策严重的后果,从而在議會內成立了委員會进行調查。同样地,在六十年代末,欧洲看到阿尔及利亚的紧急需要而大吃一惊。法国統治阿尔及利亚达四十年以上,結果却給阿拉伯人带来了广泛的飢饉和惨重的死亡率。于是成立了一个調查委員會来建議新的造福阿拉伯人的立法。然而,一致的結論認為拯救阿拉伯人的唯一办法是建立私有財產制!只有这个办法似乎才能使阿拉伯人免于匱乏,因为这样,阿拉伯人就可以随时出卖或抵押他的土地了。因此,大家認為要減輕在法国人的土地掠夺和租稅压迫下負債纍纍的阿拉伯人的灾难,唯一办法是把他們完全送入高利貸者的手中去。这样謬論居然庄严地在国民會議席上提出,并同样庄严地为这个尊貴机构所接受。巴黎公社的“战胜者”,誇耀着他們的厚顏无耻!

在国民議会上,特別有两种議論支持新的法律。第一个議論:拥护这个議案的人,再三強調說,阿拉伯人自己也迫切希望采用私有財產制。事实上,希望这样做的,是那些土地投机家及高利貸者。他們想从家族联系的保护中“解放”他們的犧牲者。只要在阿尔及利亚通行穆斯林法律,世襲的氏族和家族的土地是不可割讓的,这对于希望抵押自己土地的任何人构成不可克服的困难。1863年的法律,仅仅对这些障碍打开一个缺口,现在成为問題的是要完全取消这些障碍以便高利貸者充分自由活动。第二个議論“是很科学的”,是与可尊敬的詹姆士·穆勒对印度所有制关系据以

得出隱晦難懂的結論相同的思想寶庫的一部分，這就是英國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和里嘉圖派的門徒們，熟悉他們師長的學說，強調地辯護說：私有財產制對於防止阿爾及利亞的飢荒，對於更好的、更集約的耕作土地，都是必要的。因為，顯然任何人都 unwilling 對不屬於他自己的那塊土地（那塊土地的產品又不是他自己所有而可以享受的）投入資本和大量的勞動。但是，事實並不如此。事實證明，法國投機家並沒有把他們在阿爾及利亞所創造出來的私有財產，用之于更集約的、改良的耕作上面。1873年有40萬公頃的土地是法國人的財產，但占有12萬公頃土地的两个資本主義公司，阿爾及利亞公司及色提甫公司根本沒有耕作這些土地，而把它們出租給土著居民，而土著居民依然用傳統的方法耕種這些土地。其餘的法國人所有者，其中四分之一，也同樣自己不從事農業。資本主義投資和集約的土地耕作，不可能在一夜間象用符咒般地創造出來，正如一般資本主義條件也不能從“無”中創造出“有”來。這些資本主義條件只是追求利潤的法國投機家的幻想，他們的科學經濟學家的好心的教條主義想象而已。如果把所有花言巧語撇開，支持1873年的法律的要点只是意圖掠奪阿拉伯人的土地，他們的生存條件而已。儘管這些議論是多麼破綻百出，儘管這些解釋是多麼缺乏誠意，這個沉重地打擊阿爾及利亞人民及其物質幸福的法律，終於在1873年7月26日被全場一致通過了。

可是，這個傑作不久也失敗了。由於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一下子難以代替古老的氏族的共產主義，第三共和國的政策流產了，正象第二帝政時代的政策在同一問題上宣告失敗一樣。1873年7月26日的法律——這個法律被1887年4月26日的第二個法律所補充——實行了17年之後，到了1890年，產生了如下的後果：為要进行160萬公頃土地的清算手續，支出了1,400萬法郎。這個過程，據估計，將繼續到1950年才能完成，同時，還需要6,000萬法郎的經費。可是，消滅氏族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仍沒有達到。實際所完成的是很明顯的：狂熱的土地投機，繁盛的高利貸及土著居民的

經濟破產。

强制实行私有財產制既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新实验試行了。1890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所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譴責了1873和1887年的法律。再隔了七年之久，立法先生們才試图对这个破產的国家考虑改革办法。参議院的新通令原則上拒絕用强制或行政手段来建立私有財產制。1897年2月2日的法律及1898年3月3日阿尔及利亚总督的指令，主要规定了在土地所有者或买主的自愿申請下建立私有財產制^①。可是，这两个文件的附带的条款准許个人所有者，不經其他土地共有者的同意，提出私有財產的要求。此外，这种“自愿申請”在任何方便时刻，可以勒索得到，只要土地所有者負有債務，高利貸者加以压力即可。因此，新法律也仍旧給法国資本家及土著資本家，进一步破坏和榨取世襲的氏族土地，大开方便之門。

阿尔及利亚的肢解已經进行了80年，但近年来，这种肢解遭遇更少的反抗，因为1881年突尼斯被征服，最近摩洛哥又被占領，阿拉伯人在法国資本的包围下，越来越孤立无助。法国統治阿尔及利亚的最近結果，是阿拉伯人向土耳其移居^②。

第二十八章 商品經濟的侵入

生产資料的取得与剩余价值的实现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以自然經濟为基础的独立社会遭到破坏之后以及在破坏的过程中，

^① 格·加·安东(G. K. Anton):“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新农业政策”。(“立法、行政、經濟年報”)1900年,第1341—1342頁。

^② 阿尔及利亚行政法(Indigenates)改革委员会报告人亚尔邦·罗茲(Albin Rozet),在1912年6月20日在法国众議院的演說中,提到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从色提甫地区移出,而上一年有1200个土人从托勒姆色移出,他們的目的地是叙利亞。有一个移民,从他的新的安家地点寄信中說:“我現在居住在大馬士克,生活非常幸福。在叙利亞有許多象我一样移住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給我們土地并給我們在耕作上的其他便利。”阿尔及利亚政府用拒絕发放护照的方法,来限制移民。(1912年6月21日的官報,第1594—1595頁)

如何把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引导进去。一切非资本主义阶层和社会，为资本的利益计，不能不一方面成为商品的购买者，他方面成为生产物的出卖者。这里，看起来似乎找到了“和平”与“平等”，正常交易(Das do ut des)互利，“和平竞争”与“文明影响”的起点。因为即使资本可以依靠强力，夺取其他社会团体的生产资料；强迫劳动者服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它仍然不可能强制这些社会团体购买它的商品或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在自然经济曾经流行的地区，交通工具——铁道、航路、运河——的采用对商品经济的散播，是不可缺少的。商品经济的胜利侵入，因之，多半是以大规模的近代交通建设开始：例如贯通原始森林和切断山脉的铁道线，跨越沙漠地带的电线，以及驶往遥远港口的海洋轮船等。如果把这种变革当作是和平进行的，那是一个错觉。东印度公司打着商业旗帜与各香料国家所保持的关系，是海盗式的，并具有榨取和欺诈的性质，正如今日美国资本家与加拿大印第安人间的关系(美国资本家向他们购买皮毛)，或德国商人与非洲黑人间的关系一样。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一个与不发达社会进行所谓“温和的”，“爱好和平的”商品交换的典型例子。中国近代史，从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整个十九世纪内，是以战争来分段落的，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就是用野蛮的武力来开辟通商关系。传教士激起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欧洲人挑拨了暴动，而在周期战争引起的血腥屠杀中，毫无准备的和平农民，被迫和欧洲列强最新式的战争技术相周旋。沉重的军费造成了国债，中国于是接受欧洲借款，结果欧洲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占领了中国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强制开放，修筑铁路权被迫让渡给欧洲资本家们。通过这一切，商品交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国革命爆发为止，在中国得到了发展。

欧洲文明，也就是在欧洲资本下的商品交换，对中国所发生最初剧烈的影响是由于鸦片战争。当时，为了使英国资本家赚钱，中国被迫购买印度农场出产的毒物。在十七世纪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开始种植罂粟。公司的广州支店把这个毒物散播到中国来。十

九世紀初，鴉片價格，顯著下降，因此，不久就成為“民眾一般的享樂品”。1821年中國輸入的鴉片，已達4,628箱，價格平均達1,325美元。其後，價格跌落一半，1825年輸入增至9,621箱，1830年高達26,670箱^①。這種毒物，特別是貧苦人民吸食的價格較賤的那一種，產生劇烈的影響，成為公眾的災害；於是中國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宣布禁止鴉片進口。1828年兩廣總督就曾經禁止鴉片輸入。可是，這種禁止不過使鴉片交易轉移到另外口岸去罷了。北京的一位御史奉命進行調查，發表了下列的報告：“臣聞凡食鴉片烟之人，日久中病者為有引，應時而食，名為過引，倘當過引之時，不得食烟，則四支委頓，涕泗交下，刻不可支，吸烟數口，則精神倍尋常，是食鴉片烟之人，直以烟為性命，故拿獲到官，甘受重責，不肯供認買自何人，致拿私販，斷其來路。而地方官或規避處分，或听受囑託，不復嚴追，亦所時有。且近年以來，挑販廣貨各商，大半挾帶鴉片烟……

“臣愚以為鴉片烟之害，倍甚于賭具，則食烟之罪，不應輕于賭博”^②。

御史建議被証實吸食鴉片的杖八十，不肯供出出售鴉片者的姓名的，杖一百徒三年。這位嚴峻的北京伽圖（Kato，古羅馬的政治家，曾任風紀檢查官——譯者），以歐洲政府所不會听到的那種坦白態度，總結他的意見說：“竊查鴉片烟，來自外洋，其始間有劣幕奸商，私自買食，浸浸而貴介子弟，城市富豪，轉相煽誘，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訪查，據云：現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鴉片烟之人，而各衙門為尤甚，約計督撫以下，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絕

① 1854年輸入77,379箱。以後由於國內生產的擴大，輸入略有減退。然而，中國仍然是印度栽培地的大主顧。1873——74年之間，印度生產鴉片640萬公斤，其中，約610萬公斤銷售至中國。印度現今（1912年）仍每年輸出480萬公斤，價值150,000,000馬克的产品，幾乎是全部輸到中國及馬來群島的。

② 著者引自謝伯特：“中國戰爭”，1903年，第二卷，第179頁。按這個御史是兵科給事中劉光三，他的奏折原文，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一冊，第413—414頁（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譯者

无食鴉片烟者，甚属寥寥……且州县等官，即出示曉諭，严禁私卖鴉片烟，而各衙門官亲、幕友、长随，食烟者如故。彼奸商牟利，更将借严禁之名，以为居奇，而該兵役深畏官署人等，必不敢認真巡緝，甚至迎合討好，反代官署偷买者有人，則一切章程皆属具文，安在其能查拿也？”^①

此后，1833年规定更严，吸食鴉片者杖一百，示枷二月。各省巡撫，必須每年呈报禁烟的效果。这个运动产生了两重結果，一方面是中国内地，特别是湖南、四川及貴州，开始大规模种植罌粟；另一方面是英国为强迫自由輸入鴉片計，发动对华战争。这就是通过鴉片烟枪，强迫中国对欧洲文明开放的伟大的开端。

广州是第一个目标。这个城市在珠江口修建的防御炮台再也没有更簡陋的了。每隔相当的距离，碇泊着木筏，每日黄昏后用铁炼加固。木筏上所装的大炮，并没有上下炮口的任何設備，因此，不能供有效的使用。中国人就是用这种原始的防御工事——只能妨碍两三个商船的入港——来抵抗英国人的襲击。因此，英国巡洋舰两艘就已有足够的力量于1839年9月7日强行进港了。而中国人抵抗英軍所用的十六只战船及十三只烧夷船，不到四十五分钟都被摧毁了。英国在初次胜利之后，又增加舰队，于1841年初，开始新攻势。这一次的攻击，是对炮台与舰队同时下手。中国舰队，是由許多帆船編成的。第一枚火箭穿过帆船的装甲板，飞入火药庫，于是全船水兵都被爆上天空。不久，十一只帆船舰队便与旗舰同归于尽。残兵败将都潰走以求安全。英兵登陆不过二三小时就完成了。英人乘着中国大炮之无力，突入炮台中心，完全占領了战略要点，从上而下大肆屠杀毫无防备的中国人。战争結果，中国方面，死者六百人；英国方面，死者一人，伤者三十人，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于火药庫偶然爆炸而負伤的。二三周之后，英国人派出一队新兵，占領亚娘鞋山与北横档的炮台。此外，英国又准备十二只以上的

^① 謝伯特：“中国战争”，第二卷，第179頁。

武装巡洋舰。中国方面，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即固守南横档岛。因此，英兵就平安地登陆，运入一队迫击炮，一方面攻击要塞，另一方面，又从兵舰发射炮火。在几分钟内中国兵被赶出炮台，英军未遭抵抗，即完成登陆。继之而起的残酷景象——据某一英国报告上所說——使英国士官都感惭愧。中国人离城逃走时，誤落壕沟，轉瞬間，壕沟内填满了呼救的兵士。印度兵据說违反了长官的命令，不断射击这些成群地挤在壕沟中的人体。广州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开放通商。

其他港口的情况，也差不多。1841年7月4日，装有120門大炮的三艘英舰，出现于宁波入口的島上。其余的战舰，也于次日駛到。入夜，英国海軍司令通知中国总兵，要求交出該島。中国总兵回信說，他无力抵抗，但他沒有得到北京的命令，不能交出該島，乞英軍稍待。結果，英国并沒有等待，即于清晨二时半，对此毫无防备的小島开始进攻，海岸的要塞与房屋，九分钟之内化为废墟。英国部队即向中国人已撤出的海岸登陆，海岸上散布着断枪，弯劍，盾牌与小銃，还有许多尸体。英国逼近城墙，企图占领定海城。拂曉，他們得到刚到的其他船只上水手的增援，架起云梯围攻那个几乎没有防御的城壁，几分钟之間，即占领該城。英国人对于这次光荣的胜利，作了如下的謙遜报导：“1841年7月5日的早晨，根据天意，是一个值得紀念的日子。那一日，女皇陛下的旗帜，初次飞扬于天国中华的美丽島上，最早的欧洲旗帜胜利地豎立于可爱的平野上”。^① 1841年8月25日，英軍在厦門出现。厦門炮台装备了一百門中国最大口径的大炮。但是，那些大炮簡直全无用处。統帅也是昏庸老朽，因此，占领厦門不費吹毛之力。英船不断发射炮火，逼近鼓浪屿城壁。水兵由此登陆，經過很少的抵抗，中国部队被驅逐出去。英軍在港内掠获了遺下的装有128門大炮的帆舰26只。蒙古队伍据守某一炮台，在五艘英舰密集炮火下，英勇抵抗。可

^① 謝伯特：“中国战争”，第207頁。

是，登陆的英軍，从背后冲击他們，这一据点即被消灭。

于是，臭名昭彰的鴉片战争告終。1842年8月27日締結和約，英国获得香港，并迫使广州、厦門、福州、宁波及上海，五口通商。十五年后，爆发了第二次鴉片战争。这一次战争，是英法联合进行。1857年广州被联合舰队攻克，其英雄气概，正和第一次战争相同。1858年在天津締結和約，允許鴉片进口，与欧洲通商及內地传道。1859年英国人再开始敌对行动，想在白河破坏中国要塞，但結果在激烈的战斗后，死伤464人，被迫撤退。^①在这一次以后，英法又联合作战。英軍12,600人和法軍7,500人，在孟斗班(Cousni montau ban)將軍指揮下，于1860年8月末，不战而占領大沽炮台，續入天津，向北京进迫。1860年9月21日，在八里桥发生血战，結果，北京淪陷于这两个欧洲强国之手。这个城市的居民差不多都已逃散，城内毫不設防，胜利的侵略軍进入后，首先就劫掠皇宮。孟斗班將軍(后来被升为元帅和“八里桥伯爵”)，本人也热心参加。在額尔金勳爵(Lord Elgin)的命令下，皇宮付之一炬，以資“懲罰”。^②

现在，欧洲列强可以在北京設立使館，可以在天津及其他口岸通商。当英国反鴉片同盟鼓动反对在倫敦、孟彻斯特及其他工业地区传播毒物，当議会所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宣称吸食鴉片最为有

^① 咸丰十年八月三日(1860年九月六日)的上諭，其中有这样的叙述：“朕撫馭寰海，一視同仁，外洋諸国，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吉利，佛兰西与中国和好有年，久无嫌隙。咸丰七年冬間，在广东遽啓兵端，闖入我城池，襲擄我官吏，朕犹以为 总督叶名琛，刚愎自用，召釁有由，未即兴問罪之师也。八年間，夷酋額尔金赴懇天津，当諭总督譚廷襄，前往查办。該夷乃乘我不备，攻踞炮台，直抵津門。朕恐荼毒生灵，不与深較，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議，息事罢兵。因所請条約，多有要挾，复令桂良等，馳往上海，商定稅則，再将所立条約，講求明允，以为信据。詎夷酋普魯斯，桀驁不馴，复于八年，駕駛兵船，直抵大沽，毀我防具。經統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轟剿，始行退去。此由該夷自取，并非中国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酋額尔金，葛罗等，复来海口，我中国不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陆，赴京換約。不意該夷等，包藏祸心，夹带炮車馬步各队，抄我大沽炮台后路。我兵撤退后，复至天津”。(著者引自濮兰德和白拉克浩司〔J.O.P. Bland 和 E.T. Blackhouse〕合著：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有中譯本，書名“慈禧外紀”，陈冷汰等譯，1914年，中华書局版〕，这里引文录自賈楨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2卷，18—19頁(1930年故宮博物院影印本)。——譯者

害的时候,1876年的芝罘条约却保证,鸦片自由输入中国的便利。同时,欧洲诸国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对欧洲人——不论商人或传教士——保证给以土地的商租权。为了这个目的,有意的欺詐,有力地支持了合法的論据。首先,条约上文句的含混,使欧洲資本得到侵入通商口岸以外地区的借口。它(指欧洲的資本——譯者)以利用条约文字上的漏洞为起点,后来要挟中国政府准许教会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在全国各省取得土地。他們是以1860年法国协定附件中传教士德拉馬臭名昭彰的歪曲中文原意的翻譯为根据。法国的外交部和基督教会一致譴責这个天主教士的狡猾的欺騙行为,但这并不妨碍他們坚决主张法国传教士以欺騙方法取得的权利也必须推广給基督教徒享受。③

中国的开港通商,是以鴉片战争开始,而以一系列的租借地及1900年对中国的远征而告完成,在这期間,欧洲資本的商业利益造成对中国領土的公开的爭夺战。西太后下面的告急信,很恰当地揭露了所謂对中国的欧洲“文明使者”的最初的理論与以后的实践之間的对比。西太后在太沽要塞被占領后,在致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說:

“謹候女王陛下! 自从我們两国之間的关系最初建立后,在中英两国的一切談判中,英国从未对中国領土抱有野心,而只是切望促进通商利益而已。我們考虑到中国已經陷入了可怕的战争状

② 那些使中国开港通商的欧洲英雄們的功績,对中国国内史中一个可爱的插曲提供了背景。清朝圓明園被劫掠之后,“中国的戈登”发动对太平天国进攻。1863年他甚至取得清軍的指揮权。事实上,这个起义的鎮压,是由英国軍队做的。然而,当多数欧洲人(其中也包括一个法国提督)为了支持清朝而丧失生命之时,欧洲商人,却利用战争机会捞一笔錢,所以对他們所拥护的清廷和与之作战的叛乱者双方,都供給武器。“此外賺錢的机会,也誘惑了可尊敬的商人,使他們对双方同时供給武器与彈药。由于叛軍取得这些供应,較之清軍,更为困难,他們不得不以高价收購,于是他們得到优先供应的机会,从而他們有力量不仅足以抵抗他們本国的政府軍而且还足以抵抗英法軍队”。(墨·弗·布兰特(M.V.Brandt),《东亚三十三年》,1911年,第三卷,“中国”,第11頁。)

③ 佛兰克博士,“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关系”,萊比錫,1903年,第82—83頁。

态,同时又想起中国貿易之大半,約七成至八成是和英国进行的。此外,貴国的海關稅,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且貴国的海港,对外国的輸入,又差不多不加限制。由于这些理由,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英国商人与我們之間的友誼关系,在过去五十年間維持不墜。可是,现在情形起了急激的变化,大家对我們发生了猜疑。因此,我們請求您考虑,由于种种情况的結合,如果我国丧失了独立,如果列强联合起来实现瓜分我国領土的計劃(激动的慈禧太后在給日本天皇所写的信中,公然称“彼称頌西土,虎視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那么,其結果就会使貴国貿易恶化,影响所及,极为不利。我国现在正竭尽全力筹兵筹餉,以保护我国疆土。在这个时候,我們非常希望你进行干施,并迫切期待你的决定。”^①

無論在战争期中或在战争之間の間歇期內,欧洲文明使者都忙于大规模掠夺和窃盜中国的宮殿,公共建筑及古代文化的紀念物。例如,1860年法国人掠夺中国宮殿及其神話般的宝藏,又如1900年各国竞相盜窃中国的公私財宝。欧洲人每进一步,不仅带来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且也標誌着伟大而古老的都市的化为废墟,广大地区农村的农业荒蕪,以及偿付战費而征收的苛捐杂稅的沉重負担。中国四十个以上的通商口岸,都曾付出流血、屠杀与摧毁的代价。

第二十九章 对农民經濟的斗争

对自然經濟斗争的最后的重要一章,是农业之与工业分离,农村工业从农民經濟中排除出去。手工业在它的历史初期,是次要的职业,是文明和定居的社会里农业的附属物。中世紀欧洲手工业的历史,是手工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庄园分离开来,向专业化、也就是向城市行会的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在工业地区,生

^① 濮兰德和白拉克浩斯:“慈禧外紀”,第337—338頁。

产是从家庭手工业经过工场手工业，再向资本主义工厂大工业推移，但在农业地区，家庭手工业，仍执拗地固着于农业。作为农闲期家庭副业的手工业，对供应农民经济的自己需要上，起着重大的作用。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从农民经济中逐渐夺去某一工业部门，以便于在工场集中大量生产。纺织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农业中其他手工业部门，也发生同样情况，但没有那么显著罢了。为了使农民大众成为商品的购买者，资本应首先把农民经济限制在单一的范围內——农业——这个范围是不容易立刻屈从于资本的统治的。而在欧洲的所有制条件下，也只有经过重大的困难才能屈从于资本的统治。②表面上，这个过程好象是和平发展着的。它很难识别出来，仿佛单纯由经济因素产生作用。工场的大量生产，一方面具有较高的专门化，对生产过程又有科学的分析与管理，另一方面又有改进的机器和国际原料资源，其技术的优越性，确非原始的农村工业可比。但实际上，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决定于一些因素，如租税重压，战争，及国家土地的浪费和独占等。因此，这个问题之属于政治权力和刑法的范围，不亚于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这一过程没有比在美国进行得更彻底的了。铁道——由欧洲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投资的——把美洲的农民一步一步从合众国东部推进到西部。在他们经过大地区前进中，他们以鎗炮，猎犬，酒精与梅毒，来消灭印地安人，并强制地把他们由东部赶至西部去，以便攫取印地安人所撤出的土地，加以开垦与耕作。美洲农

① 直至最近为止，中国的家庭工业，还广泛地由资产阶级兴办，在古老、較大的城市，如有三十万居民的宁波中便是如此。“大約三十年前，妇女自制鞋帽衬衣及其他东西，以供她的丈夫及自己的需要。当时宁波青年女子，如果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反而向商人去买用品，那就是聳人所聞的事”。（周尧清〔譯音〕博士：“宁波工业经营的形态”。屠滨根，1909年，第51頁）

② 在农民经济史的最后阶段，当资本主义生产已发生全部影响，这种关系，当然是顛倒过来了。小农被毁灭后，男子常常依靠资本家企业主的家庭工业和工场的奴隶般的工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农业经营，则全部落在妇女与老人及小孩的身上。符騰堡的小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民，即“公有地的居民”，在南北战争以前，是一种与今日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在遥远的农场上，差不多与外界隔绝，度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九十年代初期，“农民同盟”(Farmers' Alliance)的领导者之一参议员柏菲(Peffer)写道：“今日的美国农民，与五十年乃至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活着的许多人，还能够回想起那个时代，大部分农民从事制造业，也就是他们做了许多工具供自己使用。每一个农民，都有他的一整套工具，用来制造木制工具，如干草叉、耙、锄及锹的把手，车轆及其他木制器具。农民又生产亚麻及大麻，羊毛及棉花。这些纤维材料，在农地上整理，在家中纺成纱，织成布，制成衣，并在家中穿用。各农地都设有木工和铁工的小作坊而在家内又有刮毛梳及织布机，以织毛毯、被盖及其他卧具。各农地也饲养鹅群，其羽毛用以填家中的被褥及枕头，如有剩余，则送到附近市场出卖。到了冬季，小麦、面粉及玉米粉装在大车上，用六匹或八匹马拉往百哩乃至二百哩远的市场去，交换明年用的农业供应品——杂货和干货。此外，农民间也有各种工匠。农村用的马车，在农场里约需一年至二年的时间制造出来。材料可以从近处找到。其所用的木材种类，在合同中规定好，这种木材必须在一定的季节里取来，然后在一定时间内弄干。这样当车辆制成时，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可以知道每一根木材是从何处来的，何时弄干的？在冬季里，近邻的木匠就赶制窗木，盖板，门扉，门框等，以备下一季建筑之用。秋霜降时，鞋匠走到农民家里，坐在角落，为家庭成员制成靴鞋。这些东西，都是由农民在家中做的，其支出的大部分，是以农场生产物支付。冬季则为贮藏肉类之时。供家庭食用的肉类是以烹制或燻制贮藏起来。果树园供给果实，以制果酒，苹果汁，及其他贮藏物。那些东西，足够供给一年乃至一年以上一家的需要。小麦是根据需要，即什么时候需要现款，什么时候就割麦换钱。所有的东西都贮藏起来，供使用。这种经济的结果之一，是用比较少额的货币，即可以进行农业经营。大农场雇佣乡村工人，修理农具及其他临时用款，平均只需支付百元

即足。^①

这样的田园诗，南北战争后，就迅速的消逝了。战争使美国负担了六十亿元的巨额国债，伴之而来的是租税负担的显著增大。另一方面，战争以来，在加高的关税的保护下，近代交通业，工业，尤其是机器工业，开始狂热地发展起来。许多公地被赠给铁道公司，以奖励铁道建设及农业移民。单在1867年，这些公司已获得7,40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铁道网以空前的速度增加起来了。1860年尚不过有五万公里，到1870年即达八万五千公里有余，1880年更提高到十五万公里以上（在1870—1880年间，欧洲全部铁道网由十三万公里增至十六万九千公里）。铁道与土地投机，引起了从欧洲到美洲的大量移民。由1869年到1892年二十三年间移民达450万以上，这样，美国逐渐脱离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工业，而自己开办工厂，国内纺织工业，钢铁工业及机器工业都发展起来了。农业也发生迅速的变革。南北战争后不久，南部诸州的种植园主，由于黑奴的解放，就已经应用了蒸汽犁。铁道建设后，西部新创立的农场一开始就使用最近代的机器和技术。1867年美国农业委员会报告：“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西部的农耕。所使用的人工比例，降低到以前所没有的最低标准。与机器应用到农业上去的同时，扩大的商业也试图与这个杰出的方法联合起来。于是，对于几千公顷的农场，较之四十公顷的农场，在管理上可以应用更大的技巧，更加经济地使用各种方法来达到目的，因而获得更大的实际利润率”。^②

同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负担，显著地增大。南北战争期间，于1864年6月30日颁布了新税法（它是今日仍然通行的税制的基础），这个税法显著地提高了消费税及所得税。为了要抵销对国内生产所课的租税，这项沉重的战时征课便成为实行保护关税的借

^①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纽约，1891年，第二编，“我们如何到此？”，第一章，“农民的变动情况”，第56—57页。又参看西蒙士：“美国的农民”，第二版，芝加哥，1906年，第74—75页。

^② 引自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新时代”杂志，1885年，第344页。（这篇论文最初登载在1883年俄国某一杂志上）

口。①把战争作为自己实行保护網領的工具的摩理尔，斯提芬士斯及其他紳士們，开始以关税政策作为公开地，无耻地促进各种营私牟利手段。当那些出现于立法會議之前的国内生产者要求某种特别关税，以充实自己的荷包时，他們发现他們的要求立即得到批准，而关税率总是被增加到任何有关方面所期望达到的高度。美国人陶錫格 (Tauseig) 說：“战争在許多方面給与我們的国民生活以清新的可貴的影响。可是它对于工商业及对于有关金錢利害的立法工作的直接影响，則是伤风敗俗的。对公众义务与私人利益的界限綫，立法者往往分辨不出来。巨大的財富是由法律的变更所造成，而促进和实现这种变更的人，就是从这些变更得到好处的人。而国家則看到政治家的令名和廉洁受不起考驗而感到痛心”。②这个維持有效二十年、完全变更全国經濟生活的关税法案，不經過批評，不經過討論，也沒有任何人反对，在三天內通过了国会，二天內通过了参議院。直至今天，它还成为美国关税法的基础。③

美国財政政策的改变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时代里，美国議會內的狼狽为奸，营私牟利沒有比这个时候再公开的了，而收买选举、立法和报刊，以滿足大資本家的貪慾也沒有比这个时候更肆无忌憚的了。“发财致富” (Enrichissez-Vous)，自那场把人类从“奴隶的污辱”解放出来的荣誉战争以来，成为公众生活的口号。自称为黑奴解放者的美国佬，在交易所里拚命做投机买卖，追求暴利，在国会里，侵占公地，并通过关税与租税，通过壟断、虚拟股票及公共财产的窃盜等而发财致富。工业繁荣起来了。现在，

① “1864年6月30日的三項税法实际上构成一方案，它可能是世界上空前的最大的征稅方案。国内稅法的安排，正如威尔斯 (David A. Wells) 所說的，采取了頓尼布魯克市集上的爱尔兰人的办法：‘見头就打，見商品就課稅’。(陶錫格：“美国关税史”，紐約，1888年，第163—164頁)

② 陶錫格：“美国关税史”，第166—167頁。

③ “由于情勢的必要，国家的紧急状态，及稅收需要的迫切，这样的仓卒从事可能是有理由的，但这种仓卒从事确是文明国家史无前例的”。同上書，第168頁。

那种时代——小中农差不多可以不需要现金而生活，如果迫切需要的話，他可以把小麦脱壳换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现在经常需要现款。需要很多的货币来支付租税。他又很快地被迫出售他所生产的一切产品，并从制造家手中购买他所需要的制成品。柏菲写道：“从那个时候转眼到现代，我们看见一切都变了。特别是在西部诸州，无论那个地方，农夫都是一旦打出小麦，就马上去出卖。他们出卖他们的生猪，买回猪肉和火腿。他们出卖他们的牛群，再买回生牛肉与罐头牛肉和腌牛肉。他们出卖了果物，再买回它们的罐头。假使他们栽培亚麻，就不象五十年前那样自己纺麻织布，为小孩做衣服，而是打麻，出卖种子，并以麻藁作燃料。现在每五十个农夫中难得有一个农夫自己牧羊；他从大牧场主那里得到羊毛，以制成布或衣服供自己使用。他的衣服，已不再在他自己家里或者请邻居妇女或离开不远的乡间裁缝制成，而是从附近市场上买来，或买了布再请城中裁缝为他制成衣服。叉子，锄头等必要用具，都不是自己做，而是到市场上购买，甚至斧柄，槌柄也向城中购买。他还购买网子，绳子以及以纤维制的成品。他还购买衣料及衣服。他还购买罐头果物和蜜饯品。他还购买，腿肉，以及生牛肉，和生猪肉。事实上他现在差不多购买所有以前他所能生产的一切东西，而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货币。除此以外，看起来比其他任何都新奇的事情是这样：过去美国人的家庭，自由而无负债——以家里房屋作抵来取得借款之事，千不得已——经营农场，需现款很少，农民手中所存的现金以之应付需要，总是绰乎有余；反之，现在需要现金十倍于昔日，而农家却只有很少的钱，或者完全没有。将近一半农场，都负担着吞没农场全部价值的抵押债务，而且，利息特别高。至于造成这种显著变化的原因……那些掌有羊毛工厂及麻工厂，木材加工厂，棉花纺织工厂及织造工厂；肉类厂及食物罐头厂，水果贮藏场等等的制造商都来了；农场上的小作坊让位给都市的大工业；邻近制造车辆的作坊，让位给城市中能够在一周内生产一百辆或二百辆车子的大工厂；制靴作坊也让位

給城市中的大工場，在那里大部分工作是用机器进行的”。^①最后，农夫本身的农业劳动，也变成了机械劳动。“现在，农夫鋤田、播种、或割禾，都使用机器。用机器割禾束藁，用蒸汽打禾。农夫一面犁田，一面还讀早报。他在割禾的时候是坐在机器的垫椅上呢”。^②

然而，自“大战争”以来，美国农业的这种变革还不是結局。这只是把农民卷进来的漩涡的开始。这个农民的历史，自然会引导我們到资本主义积累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对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說明。自然經濟、‘自給’的生产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結合，这些都必須加以排斥，而代之以簡單的商品經濟。资本主义需要商品經濟，以作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市场。但一旦簡單商品生产，代替了自然經濟，資本就反过来对它作斗争。資本把簡單商品生产捧上舞台后，两者就会为生产資料，劳动力，和市场而发生竞争。资本主义的最初目的是孤立生产者，切断保护生产者的社会联系；其次就是要从小商品生产者手中夺去生产資料。

我們已看到美国“大战争”开辟了壟断資本公司和私人投机家大规模掠夺公地的时代。狂热的鐵道建設以及鐵路公司股票的投资热潮引起了狂热的土地投机，有錢的人和公司发了大財，有的甚至占有了整个郡的面积。此外象蝗虫般的搨客，采用了象走江湖的广告手段，通过各种欺騙和引誘，从欧洲吸引了到美国来的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最初，定居在大西洋东岸諸州。可是，在那个地方，随着工业的发达，农业被迫逐渐向西移动。1850年在俄亥俄的哥侖布地方所形成的“小麦中心地”，五十年后向北移动99哩，向西移动680哩。1850年，大西洋沿岸諸州供給的小麦占全国收获額的51.4%，1880年漸降为13.6%，当时，北部中区的諸州供应了

①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58頁。

② 同上書，序言，第6頁。据謝林(Sering)計算，八十年代中叶，西北地区开办一个最小的农場，以最簡陋的标准計算，約需現金數1,200—1,400美元。“北美农业竞争”，萊比錫，1887年，第431頁。

71.7%，西部諸州供給了9.4%。

1825年孟祿(Monroe)領導的美國議會，決定把印地安人從密西失必河之東移向密西失必河之西。印地安人拚命反抗，可是——至少在四十次對印地安人討伐戰爭中，那些幸免被屠殺的印地安人象糞土般地被掃除出去，象趕牛群般地被驅入西部，在那里又象羔羊般地被監禁在“保留區”中。印地安人曾經讓位給農民，現在，則輪到農民讓位給資本而自己則被驅往密西失必河的西岸。

美國農民沿着鐵路綫移往西部及西北部的樂土，在那里大的土地投機家及其代理人說得天花亂墜。可是，那些最肥沃，處於最方便位置的土地，却被投機公司保留，用之于純粹資本主義經營的大經濟上。在荒野中，在疲勞的農民四圍，出現了作為他們的可怕的競爭者及不共戴天的仇人之“波南查農場”(Bonanza farm) (使用最好機器的農場——譯者)，這種農場是一種新舊世界所沒有見過的大資本主義經營。這裡，使用近代科學及技術的一切手段來生產剩餘價值。1885年拉法格寫道：“今日大西洋兩岸著名的阿利費·達利姆普爾(Olivier Dalrymple)，可以看作為一個經營農業金融的突出代表人物。1874年以來，他同時經營紅河上的輪船航路及總面積三萬公頃屬於由一小撮金融家所有的六個農場。他把每個農場分為有800公頃的地段，更在每地段之下，分為三個地區，每地區267公頃。並設正副監督，以資統率。各地區建立棚屋。其中有五十個人住的宿舍及同數目的馬廐與騾。還有廚房，貯藏人與家畜的生活資料的倉庫，安置機器的小屋，最後還有鍛工場及五金工場等等。各地區有完備的工具：二十對馬，八架雙鋤，十二台馬拉的播種機，十二架鋼齒耙，十二台割禾束囊機，二台打禾機與十六輛馬車等。為了保證機器與活勞動(人，馬，騾)的情況良好，並保證能夠做出大量的工作，一切方法都使用盡了。一切所有地區，都與總部有電話聯絡。

“面積達三萬公頃的六個農場，採用軍隊式的組織，以六百個

劳动者为一队进行耕作。收获期中，管理本部仍可募集五百乃至六百个补助劳动者，分配于各部门之间。秋季工作完成之后，除监督本人及每地区十人之外，其余劳动者都被解雇。在达哥塔及明纳苏达的一些农场，马和骡子不能在工作场所过冬。一俟禾根翻犁之后，即以一百至二百对为一群，运至一千哩至一千五百哩远的南方，到春季再运回”。

“工作时，技师乘在马上，随着犁地机、播种机、收获机之后前进。如果发生什么障碍，技师就策马疾驰至机器生事的地方，进行修理，使其立刻恢复运转。收割的谷物，运到日夜开动的打禾机上脱粒，打禾机用一捆一捆的稻草通过投入火舱中烧热。禾谷则用机器打出，簸开，秤量及包装，然后，运到沿农场修好的铁道上，再装火车运到杜卢司(Duluth) 与水牛城(Buffalo)。达利姆普尔每年增加播种土地2,000公顷。1880年达一万公顷”。①七十年代末，已经出现了拥有14,000至18,000公顷小麦地的个人资本家和公司。自拉法格写这本书以来，美国粗放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在技术上和使用机器上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②

美国农民，很难和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相竞争。当美国的金融，生产和运输条件的全部变革，使美国农民不得不抛弃自给的生产，而进入市场的生产时，农产品的价格，由于耕种面积的急速扩大，而大为降低。正值农业依赖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农业市场，突然从地方市场，转变为世界市场，并成为资本家巨大商行疯狂投机的牺牲品。

1879年是欧洲和美国农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美国小麦开始向欧洲大量输出。③

由市场扩大所产生的利益，不待说是由大资本独占的。小农一方面受到日益增多的大农场竞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成为投机家的牺牲品。这些投机家买进小农的谷物，借以压迫世界市场。在强大的资本势力之前，农民是无力抵抗的，他们陷入了债务。这是农民经济没落的一个典型现象。关于农民所处的绝望地位，

1890年,美国农业部长拉士克(Rusk)曾在某一通告中,說道:“以农场、家屋及土地作抵的債務負担,无疑地,已达到极端令人沮丧的程度。在个别场合,农民可能太輕率地举債,但在大多数的场合,这也是必要使然……这些抵押业务收取利息很高。到了今天,由于主要农产物的价格下落很多,这些抵押业务成为极端令人憎恨的东西,在許多场合下,农民甚至受到丧失家屋及土地的威胁。这对那些力图拯救农民免受苦难的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問題。农民照现在的价格,想获得一块錢来偿还自己的借款,他势必出卖比他借一块錢的时候更多的农产物,那是极其明白不过的事实。当借款的偿还,显然成为完全无望时,利息就会逐渐积累起来。我們所討論的那种萧条,使得抵押債務的延期极为困难”。④ 根据1891年5月29日普查,陷入債務的农场有2,500,000戶,而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自耕农,其負債額大約为22亿元。柏菲結論說:“这样,

①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貿易”,第345頁。

② 根据美国劳动專員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劳 动 的 种 类	每单位所需的劳动時間				
	机 器		手 工		
	小 时	分 鐘	小 时	分 鐘	
小谷物的种植	—	32.7	10	55	
小谷物的收割与打禾	1	—	46	40	
玉蜀黍的种植	—	37.5	6	15	
玉蜀黍的收割	3	4.5	5	—	
玉蜀黍的除壳工作	—	3.6	66	40	
棉花种植	1	3	8	48	
棉花培养	12	5	60	—	
干草收割	机器与镰刀比較	1	0.6	7	20
	机器捆束与手捆束比較	11	3.4	35	30
馬鈴薯的种植	1	2.5	15	—	
番茄的种植	1	4	10	—	
番茄的培养与收割	134	5.2	324	20	

农民的状态,极为危险(农民正在穿过“死亡的渊谷”)。农场经营,成为无利可图的事业。农产物价格,大战以来,下落50%。农场价值,最近十年间下落25%至50%。农民负债累累,而这些债务是以自己的房产作抵的。在许多场合,他们无力支付到期的利息,也没有能力续借,因为抵押品的价值由于一般经济萧条而下落。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的房产。负债的石磨,正在碾碎他们。我们

③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百万蒲式耳
1868—69年	17.9
1874—75年	71.8
1879—80年	153.2
1885—86年	57.7
1890—91年	55.1
1899—1900年	101.9

(尤拉雪克:“世界经济概观”,第七卷,第一编,第32页)

同时,在农场当地的小麦每一蒲式耳的价格下落如下:

	美元
1870—79年	1.05
1880—89年	0.83
1895年	0.51
1896年	0.73
1897年	0.81
1898年	0.58

1899年价格跌到每蒲式耳0.58元后,自1900年起价格又上涨:

	美元
1900年	0.62
1901年	0.62
1902年	0.68
1903年	0.78
1904年	0.92

(同上书,第18页)

根据“国外贸易月报”,1912年6月小麦每千公斤的价格如下:

	马克
柏林	227.82
曼海姆	247.93
奥得萨	173.94
纽约	178.08
伦敦	170.96
巴黎	243.69

是在冷酷无情的魔掌中。农场已经岌岌可危了”。^④

那些背负重债接近破产的农民，只有做些工资劳动，以补充他们的收入，或者根本放弃农场，此外别无他途。如果他不象几千个农场那样，因无法支付债款而陷入债权人爪牙的爪牙，那么，他很可以丢掉那块已经对他成为地狱的“乐土”。在八十年代中期，到处可以看到被抛弃而陷于荒废的农场。1887年谢林写道：“农民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不能支付债务，他的应付利息，就将提高到12%、15%、甚至20%。银行、机器商人及杂货商人，逼迫他并夺去他的辛劳成果……于是，他就不得不仍旧留在农场做佃户，或者再移到西部去碰运气。实际上，在北美任何其他地区，我没有看到象在西北平原的小麦产地那样多的负债累累，陷入悲观失望的农民。在达科塔，和我交谈的农民中，没有一个不想出售他的农场的”，^⑤ 1889年威尔蒙(Vermont)地方的农业专员，对普遍发生的抛售农场的事情，有一个报道。他写道：“在本州内，我们发现大量的土地适于耕种，而没有耕种。我们可以用与西部诸州土地差不多的价格来购买它。这些土地接近教会及学校，离开铁路也不远。本专员并没有对本州内报有这样土地的各郡普遍进行访问，但本专员所访问过的地方使他确信许多过去曾经耕种而现已抛弃的土地事实上已无耕作的价值，但其中还有许多土地，只要加以适当劳动，即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果实”。^⑥

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专员，1890年公布一个文件，其中有六十七页的篇幅用来叙述有关廉价出售农场的事情。他叙述1,442个带有出租房舍的农场最近都已被抛弃了。其他地方也发现同样情况的农场。几千英亩的小麦及玉米的田地没有耕种，而沦为荒地，为了要在这些荒蕪的土地上再移植居民，土地投机商大

④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⑤ 同上书，第42页。

⑥ 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433页。

⑦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84页。

张其欺騙广告，吸引大量新的移民入境，但这些移民不过是新的牺牲品，他們将更快地遭遇到他們先一輩同样的命运。

某一私人书信中写道：“在鐵道和市场附近，已沒有公地，所有土地都已落入投机商人手中。移民获得一块空地，即变成农民。但經營这块田地既不能保証他的生活，更不能与大农场竞争。他耕种由法律规定所必須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但为了把生活过得好些，他就不能不在农业之外，找一些副业收入。例如，在奥列岡 (Oregon)，我曾碰着一个移民，他已拥有160英亩土地五年了。但每至夏季，他还做修路工作，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日工資一元，一直做到七月底为止。当然他在1890年普查中算作5,000,000个农民中一个。又例如，在爱·多拉多郡 (El Dorado)，我看见許多农民，他們耕种土地，只够养活自己和家畜。为在市场出售而生产，对他們并不有利，所以，他們的主要收入，来自挖掘金矿，采伐和販卖木材等等。这些人是相当富裕，但并不是由农业造成的。两年前，我們在爱·多拉多郡的琅·卡农工作，住在某一地段的小舍內。那个地段的主人，一年只回家一次，而且也不过回来几天工夫。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沙克兰孟特 (Sacramento) 的鐵道上工作。二、三年前，他稍微耕种了一小部分土地，以免违反法令，现在已完全不耕作了。他把几英亩的土地用鉄絲网围起来，建筑一栋木头小屋及堆貨小棚。过去几年，这所小屋是空的，小屋的钥匙，由邻居保管，而邻居准許我們使用这所房子。在旅行中，我們看到許多被抛弃的地段，这些地段是曾經試图經營过的。三年前，有人愿以一百元出售給我一块带有房舍的农地，但不久，这所空房子因大雪而坍塌了。奥列岡也有許多荒蕪的带有小住宅与菜园的农地。我們所看到的其中之一，是一座很秀丽的建筑：由一个名手造成的有全套設備的小木屋，但这一切都被主人抛弃了，任何人都可无偿取得”。^①

美国这些沒落农民，轉移到何处去呢？他們手里拿着手杖，随

^① 引自尼古拉·昂的前引書，第224頁。

着“小麦中心”和铁道而迁移。小麦地带，主要转移到加拿大及沙士卡及万(Saskatchewan)和麦肯基河(Mackenzie River)沿岸。在那些地方，虽在北緯62度地带，小麦仍能生长。而美国一部分农民，就是向那些地方移居，^①但在加拿大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近年来加拿大在世界市场上进入了小麦输出国之列。但它的农业比其他地区更广泛地为大资本所统治。^②

① 把公有地施与资本主义的公司，在加拿大比之在美国更为盛行。从加拿大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特許状所授予的土地而言，这个公司作为私人资本向公众掠夺的行为，是无与比类的。这个公司不仅保有二十年的修筑铁路的壟断权，而且无偿获得值35,000,000美元，长达713英里的铁路基地。这个公司不仅对它的股份资本100,000,000元获得十年内3%利息的保证，而且还得到27,500,000美元的现金贷款。此外，这个公司又获得了25,000,000英亩土地作为无偿的贈品，而且这些土地可以在最丰饶和位置最好的土地中任意选择，不必限于铁道敷設地带的附近。这样后来移居这个广大地区的人民，都一开始就无条件地受铁道资本的支配。铁道公司首先就把自己所占有的5,000,000英亩土

①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1901年达49,149人，1911年更达300,000以上。其中138,000是英国人，134,000是美国人。1912年5月末，蒙特利奥(Montreal)的通訊說，美国农民的移住，一直繼續到那年之初为止。

② “我在加拿大西部旅行时，只訪問过占有一千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場一个。据1881年加拿大的普查，当时在馬尼多巴(Manitoba)，約2,384,337英亩土地，仅仅为由9,077人所占有，因此，每人平均得2,047英亩以上。这个平均数，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远不能达到”。(謝林：前書，376頁)八十年代初，大規模的农业生产在加拿大固然还没有十分盛行。但在1887年謝林就曾記載过屬於某一股分公司所有的“拜耳农場”(Bell-farm)，这个农場，占有不下22,680公頃的土地，很明显地是仿照“达利册普尔农場”而建設起来的。在八十年代，謝林以极其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加拿大竞争的前景，他估計西部加拿大的“丰饶地地带”，有311,000平方公里平地，即占德国全部面积五分之三的地域。他認為实际上其中仅有38,400,000英亩是耕地，至于說有希望的小麦产地，則其中不过只有15,000,000英亩而已(謝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37—338頁)。根据1912年6月中发行的“馬尼多巴自由新聞”，1912年夏季加拿大春麦的播种面积为11,200,000英亩，而美国的春麦面积为19,200,000英亩。(參看1912年6月18日发行的商业新聞“柏林日报”，第305号)

地，出賣給“西北土地公司”，這是一個在曼徹斯特公爵領導下的英國資本家集團。第二個資本家集團獲得大批公有地的慷慨贈與的，是“漢得遜灣公司”。這個公司放棄了它在西北的特權，而換得自威尼伯格湖 (Lake Winnipeg)，美國邊境，洛基山脈 (Rocky Mountain)，至北沙士卡及萬間全部土地的二十分之一。於是，這兩個資本家集團占有了可供移居的土地的九分之五。其餘的土地中，有一大部分由國家分配給二十個資本主義的“殖民公司”。^① 這樣，加拿大農民實際上到處置身於資本和資本主義投機的羅網之中。然而大量移民不僅從歐洲，而且也從美國繼續湧至。

這就是在世界規模下資本統治的特徵。具體說來，就是它把脫離土地的農民，從英國驅往美國東部，再從東部驅往西部。並在印地安人的經濟廢墟上，把這些農民再變為小商品生產者。當這些農民又破產了，他們再度從西部被驅往北部——由鐵路領先，以破產為結尾，資本為自己开辟了道路，而在其前進的途中點綴着普遍的破壞。繼九十年代農產物價格大跌之後，出現了農產物價格的上漲，但這對於美國小農民，正如對歐洲農民一樣，是無濟於事的。

但農民人數仍在不斷增加。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他們的人數從4,600,000 增加到5,700,000。此後十年間，也有絕對的增加。同時，農場全部價值，也有增大，在最近十年間，從751,200,000 美元增加到1,652,000,000 美元。^② 農產物價格的普遍騰貴，表面上好像賜給了農民以幸福的遠景，但其實不然，我們看到農民中佃農人數的增長，超越了農民全部人口的增長。歷年來在美國農民總數中，佃農人數所占的百分率增長如下：

1880年	25.5%
1890年	28.4%
1900年	35.3%
1910年	37.2%

① 謝林：“北美農業競爭”，第361—362頁。

② E. 修爾茨：“美國的經濟生活”，“立法、行政及經濟年報”，1912年，第四冊，第1724頁。

农产物的价格虽有腾贵，但农场主比之佃农，相对地更加减少。今日已经远超过美国农民全体三分之一的佃农，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于欧洲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他们实际上是在资本下的工资奴隶。他们毕生拼命劳动，为资本创造财富，而自己所得的，不过是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

在过程相同，但历史场面不同的南非洲，资本主义与小商品生产者竞争的“和平方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止，在好望角殖民地与波耳人共和国，流行着纯粹的农民经济。波耳人从霍屯督族（Hottentotten南非土人之一種——譯者）及卡菲尔人（Kaffer南非的班图〔Bantu〕族之一種——譯者）手中，掠夺了最好的牧场，甚至想用暴力绝灭他们，驱逐他们。长时期来，波耳人度着流浪的游牧生活。到了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带来了鼠疫病，光临他们的国土，使霍屯督族人几乎全部死光，这就给荷兰的移民扫清了土地。由于他们向东扩大移民，他们与班图族发生冲突，于是引起长时期可怕的卡菲尔战争。这些虔奉上帝的荷兰人抱着古老的清教徒的道德规范，自认为是“上帝选民”，并以他们精通旧约圣经而自豪，但他们却不满足于掠夺土人的土地，他们还想在黑人的背上，象寄生物般地建立起农民经济——他们强迫黑人为自己作奴隶劳动，为达此目的，有组织地，有意识地腐蚀他们，使他们神经失常。酒精就在这里起了这样大的作用，以至好望角殖民地的英国政府禁止饮酒，却遭到了清教徒的反对而行不通。波耳人的经济，直至六十年代止，一般仍停留在家长式的，自然经济的形态。1859年南非洲才开始建设铁路。波耳人的家长式作风，当然决不妨碍他们的极端残暴和严厉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李温斯顿（Livingstone）对波耳人的不满，甚于对卡菲尔人。波耳人认为黑人是天生地为他们服务的奴隶，而且又是农民经济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他们对于1836年在英国殖民地废止奴隶决定，虽然以三百万镑来补偿奴隶所有者，但还是免不了用“大批出走”来对付。波耳人从好望角殖民地移居奥伦治（Orange）与巴

尔(Baal)；他們把馬特伯烈人(Matabeles)从林坡坡河(Limpopo)驅逐至北方，并且又赶走馬卡拉卡人(Makalakas)。正象美国农民受了資本經濟打击，把印地安人赶到西部一样，波耳人也是把黑人驅到北部。奥侖治与林坡坡河之間的“自由共和国”，就这样作为对英国資产階級对奴隶制的神圣权利的阴谋的一种抗議而产生的。这些小的农民共和国，与班图种黑人进行了不断的游击战。就在黑人的背上，波耳人与英国政府之間，进行了十年的战争。作为英国与共和国战争的口实，是黑人問題，即表面上象是英国資产階級努力爭取的黑人解放問題。但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农民經濟及大資本主义的殖民政策正在相互爭夺霍屯督人与卡菲尔人，也就是爭夺他們的土地与劳动力。两者爭夺的目标完全同一：即征服，驅逐或消灭有色人种，破坏他們的社会組織，借以强迫他們做工。但是，它們所用的方法却有根本的區別。波耳人代表着小规模的家長式农民經濟基础上的旧奴隶制，而英国資产階級則代表着近代大规模資本主义对土地和土人的剝削。脫兰斯瓦尔共和国的宪法，以粗魯的偏见宣称：“不論在国家也好，在教会也好，人民不允許白人对黑人有任何平等的存在”。奥侖治与脫兰斯瓦尔根本不允許黑人占有土地，无証旅行及夜間出街。布萊士(Bryce)举出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农民（正确說是英国农民），在东开普兰（东部好望角殖民地）打死了一个卡菲尔佣人。該农民被法庭判决无罪，他的邻居奏乐送他回家。白人常常在土著自由劳动者做完工作后，虐待他們，以至他們逃亡出去，这样就为主人节省了他們的工資。

英国政府采用恰恰相反的策略。它长期間作为土人的保护者，特别是收买酋长的欢心，保护他們的威望，企图給他們土地处理权。不錯，英国政府尽可能用最妥当的方法，使酋长变成他們族內土地的所有者，这虽反乎黑人的习惯及实际的社会組織，亦在所不惜。事实上，所有种族都共同拥有土地，即使象馬特伯烈酋长；罗奔古拉(Lobengula)那样残忍专制的魔王，也只有分配耕地与各

家族的权利与义务，而各家族只有在实际耕作时才能保留这块土地。英国的政策的最終目的，是很显明，那就是在伸出大手企图大规模掠夺土地。而把土人酋长作为他們的工具。最初，他們只限于采用扩大的軍事行动以“鎮撫”黑人。到1879年为止总共打了九次血腥的卡菲尔战争，其目的是企图打破班图族的抵抗。(8)

1869—70年的庆伯利 (Kimberley) 金刚石矿的发见与1882—85年的特兰斯瓦耳金矿的发见，这两个重要事件，給南非洲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英国资本主义才暴露了自己的真正意图。于是，英属南非公司——即西薛尔·罗德斯 (Cecil Rhodes)，开始行动起来。在英国輿論之中，引起了急激的变化。对南非宝庫的貪慾，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激烈的措施。为了要征服南非各国，費多大的金錢，冒多大的牺牲，对英国資本家來說，并不算一回事。于是，移民运动突然如江河流入大海。在此以前，移民还不多，因为欧洲移民当时都被吸引到美国去了。但自金刚石矿及金矿发现后，白人在南非殖民地的数目，飞跃增加。1885—95年間，仅在維特发忒斯南 (Witwatersrand) 沿岸，就有100,000英国移民。簡陋的农民經濟，立即被推到背后去了，而矿业及矿业資本則出人头地。

英国政府，现在不能不改变它的政策。在五十年代，根据桑得河协定 (Sand River) 及布隆方丹条約 (Bloemfontein) 英国承認波耳共和国。现在，英国政治势力已从各方面向这些小共和国推进，占領了所有隣近的地区，阻止了这些小共和国扩张的一切可能性。同时，黑人不再是被保护的寵儿；他們是被犧牲了。英国資本，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1868年英国占領了巴苏托兰 (Basutoland) ——当然这是因为土人曾“屡次請求”英国，英国才这样做的。(9)

① 巴苏托的伟大領導者摩西 (Moshesh) ——由于他的勇气和政治才能，巴苏托人才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着——当时还活着。可是，和奧倫治自由国的波耳人不断战争，使得他和他的部下陷于极端困境。二千名巴苏托战士被杀害，家畜被夺去，家室被破坏，作物被毀弃。这样，这个部落陷入被飢餓所迫的亡命者的状态，他們除了几次請求英国政府的保护以外，簡直无路可走。(卢卡士：“英領殖民地志”，牛津，第四卷，第60頁)

1871年維特发忒斯南沿岸的金鋼石矿，或作“西格利瓜兰”(West Grigualand)，从奥侖治自由国手中被夺去而变为英国皇家殖民地。1879年楚魯兰(Zululand)被征服之后，合并于那达尔(Natal)殖民地。1885年征服了伯丘阿拉兰(Betschuanaland)，后来編入好望角殖民地。1888年英国征服馬特伯烈与馬謝那兰(Maschona-land)。1889年英属南非公司在此两个領土上，获得特权，^①当然又是应土人的請求，为了滿足土人的希望，而这样做的。1884—87年圣路西亚湾(St. Lucia Bay)及到葡萄牙領地为止的东海岸的全部，都为英国所吞并。1894年英国占領唐加兰(Tongaland)。馬特伯烈与馬謝那兰再度拼命打了一仗，但公司以罗德斯(Rhodes)为首，首先对暴动进行血腥的鎮压；接着，再采用慰撫手段以欺騙土人。其方法是在形势不稳的地方，建筑两条大铁路。

这样突然的包围，益使波耳共和国感觉不安。而这些共和国的内政也变得紊乱不堪。移民的浪潮和新的狂热的資本經濟的冲击使这些小的农业国家受到被冲破国境的威胁。一方面农业經濟和政治上的农民經濟和另一方面資本积累的要求和欲望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無論在哪一方面，这些共和国都不会应付这些新的問題。不断来自卡菲尔人的危险(无疑地，这是英国人所喜欢的)，不灵活的原始行政，渗入議會进行收买以貫徹大資本家意图的腐敗行为，用以抑制冒险家和維持治安的警察的缺乏，供应突然流入的十万移民的給水設備和交通設備的不具备，用以管理和确保矿井上的黑人的剝削的劳动法的不存在，增加資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价格的高額保护关税，以及煤炭的高額運費——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这些农民共和国迅速走向破产的地步。

他們頑固地、头脑简单地試图以令人难以相信的粗陋办法来对付突然发生的資本主义以保卫自己而这种資本主义已席卷了他

^① “領土的东部是馬謝那兰，英屬南非公司得罗奔古拉王的許可后，最初在这里創辦起来”。(卢卡士：“英領殖民地志”，第77頁)

們。这种粗陋办法也只有頑强的、狹隘的农民脑筋才能想出来：他們不給那些异国人（指英国侵入者——譯者）政治权利，而这些异国人的人数比他們自己多，而且是他們正是資本、权力与时代的代表者。在当时的紧迫形势下，是一个預兆不祥的把戏。由于农民共和国經濟上管理不善，紅利降低了很多，这是不能忍受的。矿业資本已經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英属南非公司建設鐵路，征服卡菲尔人，組織他国人暴动，最后，煽起了波耳战争。农民經濟的喪鐘响起来了。在美国，战争是經濟变革的起点；而在南非，則是其終結。但这两者的結果是相同的：資本对小农經濟的胜利，而这小农經濟則是在代表土人原始組織的自然經濟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波耳共和国对英国的抵抗，与美国农民对美国資本統治的抵抗相同，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小农共和国为一个近代的大国家新的南非联邦所代替——这是西薛尔·罗德斯的帝国主义綱領所指示的——而现在資本就公开地支配了这里新的南非联邦。旧的英国人与荷兰人的冲突让位給新的資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两国的1,000,000白人剝削者在联邦內結成了亲密的联盟，剝夺了5,000,000有色劳动人民的市民权与政治权利了。那个时候，不仅波耳共和国的黑人，一无所得而去；即使以前获得了英国政府在政治上相等权利的好望角殖民地的黑人，也丧失了一部分权利。这个可貴的事业，是由保守党帝国主义政策，通过无耻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但实际上，是靠自由党在欧洲自由主义分子的喝采下完成的——这些自由主义白痴把英国賜与南非极少数白人的完全自治政府与自由权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的伟大和一貫的創造性的力量的証据。

由于資本的競争而遭到破产的独立手工业，其本身虽少有騷动，但同样也是极为痛苦的一章。資本主义下的厂外包工，乃是在这一章內的最黑暗的一节。但我們不必在这里詳細研究这种现象。

資本主义与簡單商品經濟斗争的一般結果是：資本以商品經

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啮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从而,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

因此,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所假设的前提,仅仅代表积累运动的客观历史倾向及其在逻辑上的结论。积累过程普遍地企图以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它的最終目的是努力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切国家和一切部门获得唯一的,普遍的统治地位。

然而,这里开始碰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况。一旦这最后结果达到了——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实际上不会发生——积累即将停止。剩余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化,变成不可解决的问题。一旦现实符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时候,那就是表示它的终结,即积累运动的历史到达了它的顶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到了终局。对于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的矛盾行动的道理。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因此不符合积累在实际进展中的诸条件。积累的进展不能象图式所规定的那样,简单地分解为社会生产二大部类(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之间的静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部类间的内部

关系，它首先是資本与非資本主义的环境之間的关系，——在这里，生产的两大部类，有时可以单独进行积累过程，两部类間互不依賴，但即使是这样，运动的每一步都是相互交錯，相互穿插的。由此所生的复杂关系，即两部类的积累进展的速度与方向的差异，資本积累与非資本主义生产形态在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上的不同关系，所有这些使我們不可能以硬性的公式规定出来。馬克思的积累图式，不过是一种对資本的統治已达到頂点的那一瞬間的理論表现而已。因此，在某种条件下，这个图式，正如对資本主义积累提供理論表述的出发点的簡單純再生产表式一样，只是一个虛构的东西而已。就在这两个虛构的东西之間，我們可以找到資本主义积累及其规律的确切界說。

第三十章 国际借款

資本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换言之，資本的世界竞争阶段，包含对迄今为止的資本落后国家——在那里資本原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的——进行工业化及資本主义的解放。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外債，铁道建設，革命与战争。最近十年——1900到1910年間，資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特別在亚洲及隣近亚洲的欧洲部分，如俄国、土耳其、波斯、印度、日本、中国及北非等，表现很是显著。正如通过战争、社会危机和社会整个机构的破坏，商品經濟代替了自然經濟，資本主义生产又代替了簡單商品經濟一样，现今在經濟上落后国家及殖民地，也通过革命与战争，达到了資本主义的自主。革命在資本主义的解放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須摆脱它們陈旧的政治組織以及自然經濟和簡單商品經濟的残余，从而創造一个适应于資本主义生产的近代国家机构。土耳其、俄国及中国的革命，即属于此类。这种革命，尤其是象俄国及中国那样的革命，不完全为了满足資本主义的直接政治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它們保留了过时的前資本主义主张，另一方面，它們已經包含有和資本統治

发生直接对立的新的矛盾。这些因素造成了这几个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但同时也障碍并推迟了革命力量的最后胜利。战争通常是某个青年资本主义国家脱离旧资本主义国家束缚的方法,是一个近代国家取得资本主义独立而所受到的大洗礼。这就是为什么军队的改造与财政的整理,总是成为争取经济独立的先驱。

铁路网的发展,大体上反映了资本的侵入。铁路网的急速发展,在欧洲是在四十年代,在美洲是在五十年代,在亚洲是在六十年代,在澳洲是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在非洲是在九十年代。①

与铁路建设及军备有关系的公债,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一切阶段,如商品经济的侵入,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等而发生。对于资本的积累,借款发生下列作用:(甲)把非资本主义阶层的货币变为资本,也就是,把作为商品等价物的货币(中间下层的积蓄),以及作为资本家阶级的随从阶层的消费基金的货币变为资本;(乙)利用国营企业——铁路建设及军需品的供应——把货币资本变为生产资本;(丙)把被积累起来的资本从旧的资本主义国家移入新的资本主义国家。

① 铁路网的发展如下表(公里):

	欧洲	美洲	亚洲	非洲	澳洲
1840	2,925	4,754	—	—	—
1850	23,504	15,064	—	—	—
1860	51,862	53,935	1,393	455	367
1870	104,914	93,139	8,185	1,786	1,765
1880	168,983	174,666	16,287	4,646	7,847
1890	223,869	331,417	33,724	9,386	18,889
1900	283,878	402,171	60,301	20,114	24,014
1910	333,848	526,382	101,916	36,854	31,014

根据上表,其增加率表示如下:

	欧洲	美洲	亚洲	非洲	澳洲
1840—50	710%	215%	—	—	—
1850—60	121%	257%	—	—	—
1860—70	102%	73%	486%	350%	350%
1870—80	61%	88%	99%	156%	333%
1880—90	32%	89%	107%	104%	142%
1890—1900	27%	21%	79%	114%	27%

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時，借款把資本從意大利的城市轉移至英國；在十八世紀時，從荷蘭轉移至英國；在十九世紀時，從英國轉移至美國及澳洲；從法國、德國及比利時轉移到俄國；現在（1912年），則是从德國轉移至土耳其，從英國、德國、法國轉移至中國，並以俄國為中介轉移至波斯。

在帝國主義時代，外債作為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獲得獨立的一個手段，起了很顯著的作用。作為帝國主義階段特征的那些矛盾，具體地表現在近代外債制度的內在矛盾上。外債雖然是上升的資本主義國家獲得解放的不可缺少之物，但對於舊的資本主義國家，它也是一種最確實的手段，用來維持在青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管理它們的財政，對它們的外交政策、關稅政策及商業政策施以壓力。公債還給舊國家所積累的資本開辟新的投資場所，但同時，由於對投資國家創造了新的競爭者，而限制了投資場所。

國際借款制度中的這些內在矛盾，是一個確切的例證，它證明剩餘價值的實現條件及其資本化條件之間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的差異。剩餘價值的實現，僅僅要求商品生產的一般擴大；反之，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則要求簡單商品生產逐漸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排除；由此可知，剩餘價值的實現及其資本化的限度是不斷在緊縮中。在世界鐵道網建設上使用國際資本，即反映了這個差別。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鐵道的敷設及其所需的借款，主要是用來驅逐自然經濟及擴大商品經濟。用歐洲資本所敷設的北美鐵道，以及六十年代的俄國鐵道公債，都是這樣的。另一方面，二十年來，在亞洲和非洲的鐵道敷設，則差不多只是服務於帝國主義政策、使經濟壟斷化，並把落后社會的經濟屈從自己而已。至於俄國在東亞及中央亞細亞的鐵道敷設，大家都知道，這個國家借口保護在滿洲鐵路工作的俄國工程師；利用派遣軍隊的方法來為軍事占領滿洲做好準備。俄國在波斯、德國在小亞細亞及美索不達米亞、英德在非洲所獲得的鐵道敷設權，都具有與之相同的目的。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關於外國的投資和外國對資本

輸入的需要的一種誤解。英國資本對美洲的輸出，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已經起着重大的作用。1825年在英國發生的第一個真正的工業和商業危機，主要就是由那時的資本輸出造成。1824到25年間，南美及中美新建的國家在倫敦募集了二千萬鎊以上的債款，此外，這裡還出售了巨額的南美工業股票及其他股票。南美市場的急速躍進與展開，又引起了英國對中南美諸國商品輸出的大量增加。英國商品輸出到這些國家的總額，1821年達290萬鎊，1825年更增至640萬鎊。

這種輸出的重要項目，是棉織物。由於大量需要的刺激，英國棉紡織品的生產，也急速增大，許多新工廠建立起來了，英國的加工原棉總值，1821年達到129,000,000鎊，1825年增至167,000,000鎊。

於是，危機的一切要素，都具備了。圖岡·巴拉諾夫斯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然而南美諸國在1825年購買了兩倍於1821年的商品，它們的購買手段是從何處得來的呢？這些手段是由英國人自己供給的。在倫敦交易所發行的借款，是用作輸入商品的支付手段。英國製造業者們，被自己所創造的需要所欺騙，不久，就從自己的經驗中發覺他們的遠大的期待是多麼沒有根據啊”。^①

在這裡，圖岡把南美對英國商品的需要，是由英國資本所引起的這一事實，說成是一種“錯覺”，一種不健全的脫離常規的經濟關係。圖岡此處盲目地承繼了一個理論家的學說，而對於這個理論家的其他學說，他是絲毫沒有一點與之相同的。在1825年英國的危機中，有人提出這樣的見解，即這個危機可以由英國資本與南美需要之間的關係的“特殊”發展來說明。而提出與圖岡同一問題的人，除西斯蒙第以外，找不到第二個。西斯蒙第在“新原理”第二版中，極正確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

“西班牙領美洲，开辟了提供工业生产物的巨大市场，我想这

^① 圖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國商業危機理論與歷史的研究”，第74頁。

对英国制造工业的复兴，是起了根本的影响。英国政府也同意这个见解，于1818年危机后七年間，竭尽全力把英国貿易开展到墨西哥，哥倫比亚，巴西，里奧·德·普拉达，智利及秘魯等最远离的地方。政府在决定承認这些新国家之前，必須时常調动軍舰来保护英国商业，而軍舰的船长負有与其說是軍事使命，不如說是外交使命。因此，它抗拒了神圣同盟的叫喊，而当全欧洲决意破坏这些新共和国的时候，英国承認了它們。可是自由美洲提供的市场，不管是怎样大；如果它們购买英国商品的手段不是突然地、超越一切限度地被这些新共和国的公債所扩大，那么，就不能够充分吸收英国在滿足消費需要以外所生产的全部商品。每个美洲国家，向英国借貸一笔金額，以巩固自己的政府。虽然这些借款是資本借款，但它們在常年中被当作收入来花用。换言之，这些借款被全部用来为国庫购买英国商品，或者，支付那些由私人訂购而已經运出的貨物。同时，为开发美洲矿山，成立了許多拥有巨大資本的公司。可是，那些公司所花的貨幣，都流回到英国来，或是用来支付立即要用的机器，或是用来支付那些运到使用场所的貨物。只要这样特殊的商业維持下去，在这种商业中，英国人只要求美洲人用英国資本来购买英国商品，供自己的消費，英国制造工业的繁荣，是惊人的。用来促进消費的，不是收入，而是英国的資本：英国人自己购买并支付了运到美洲去的商品，他們从而放弃了使用这些商品的享受”。^① 西斯蒙第由此得出他的独特的結論。只有收入（即个人消費）才确立資本主义市场的现实限度。西斯蒙第并且利用这个例子，再一次对資本积累提出警告。

直至今今天，1825年危机之前的情况，依然是資本的高涨和扩充的典型事例。而这种“特殊的商业”实际上是形成資本积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这种情况特別在英国資本的历史上，有規則地反复出现在每次危机之前，正如图岡根据下述事实与数字所說明的一

^① 西斯蒙第：“政治經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四册，第四章“商业財富依賴收入的增加”。

样：1836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市场上英国商品的泛滥，可是，这些商品也是用英国货币支付的。1834年美国的商品输入，超过输出达6,000,000美元；同时，美国的贵金属输入，超过输出将近17,000,000美元。即使在1836年的危机年分里，商品的入超仍达52,000,000美元，而贵金属的入超，也达9,000,000美元。货币的流入，正如商品的流入一样，主要来自英国，在那里，美国的铁道股票被大量收购。1835—36年间，美国新成立了六十一家银行，它们共有52,000,000美元资本，而这些资本的来源主要是英国。因此，英国人又一次用自己的钱支付自己的输出。相同地，五十年代末美国北部史无前例的工业发展——其结果导向南北战争——也是由英国资本供给的，而这些资本，又给英国工业在美国开辟了广大市场。

不仅英国资本，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也尽力参加这种“特殊的贸易”。据雪伏尔(Shäffle)的说法，1849—54年五年间，在欧洲各国交易所中，至少有1,000,000,000盾(Gulden德荷两国的旧货币名)投入美国的有价证券。这样被引起的世界工业活跃，也汇流为1857年的世界危机。——在六十年代，英国资本很快地就在亚洲，正如在美国一样，创造了类似的条件。在小亚细亚和东印度来了一股供应大规模铁道建设的资金洪流。英属印度的铁道网增长如下：

1860年	1,350	公里
1870年	7,683	公里
1880年	14,977	公里
1890年	27,000	公里

因此，对英国商品的需要立即增加了。南北战争刚刚终结，英国资本立即再度流入美国。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美国的庞大铁道建设，也大部分是由英国供给资本的。美国铁道网的建设增长如下：

1850年	14,151	公里
1860年	49,291	公里
1870年	85,139	公里
1880年	150,717	公里
1890年	268,409	公里

这些铁道的材料，同样是从英国来的。这是造成英国煤炭业及钢铁工业飞跃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说明为什么这些工业部门，受1866年、1873年和1884年美国危机的影响这样的严重。因此，西斯蒙第所认为显而易见的蠢事，在这里看来，确是如此：英国人用自己的铁及其他材料在美国敷设铁路，他们用自己的资本来付这些铁道的账，但自己却没有享受这些铁道。但是，不管一切周期性危机，这种蠢事很适合欧洲资本的口胃，所以在七十年代中叶，伦敦交易所笼罩着一片对外国借款的热潮。自1870年至1875年间，这种公债，有260,000,000镑在伦敦募集起来了。其直接的结果，是英国商品输出的急激增加，尽管有关的一些国家时时有破产之虞，大量资本继续流入这些国家。七十年代末，土耳其、埃及、希腊、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赤道国、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圣·多明哥、乌拉圭、委内瑞拉等等，全部或部分地停止支付利息。但不管怎样，八十年代末，追求外债的狂热，仍然反复出现。巨额的欧洲资本被借给南美各国和南非的各殖民地，例如阿根廷共和国1874年借了10,000,000镑，而到了1890年借款增至59,100,000镑。

英国用自己的铁与煤在这些国家敷设铁道，并以自己的资本来偿付这些开支。阿根廷的铁道网，1883年有3,123公里，1893年则增至13,691公里。

英国的输出相应增加如下：

	1886年 (百万镑)	1890年 (百万镑)
铁	21.8	31.6
机器	10.1	16.4
煤	9.8	19.0

英国对阿根廷的输出总额，1885年达4,700,000镑，四年后即达10,700,000镑。

同时，英国资本，以国债形式流入澳洲。在八十年代末，维

多利亞、新南威爾斯、及達斯馬尼亞三個殖民地的債款，達112,000,000鎊，其中有81,000,000鎊投於鐵道建設。澳洲鐵道的哩數增長如下：

1880年	4,900哩
1895年	15,600哩

英國為了修築這些鐵道供應了資本和材料，但因此，也卷入了1890年在阿根廷、特蘭斯瓦爾、墨西哥、烏拉圭發生的危機，以及1893年在澳洲發生的危機。

最近二十年間，所發生的變化就在於除英國資本外，德國、法國及比利時資本也大量參與對外投資，特別是外債，而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小亞細亞的鐵道敷設，是完全由英國資本進行的。但以後，德國資本侵入小亞細亞，實行安那托利亞—巴格達鐵路大計劃。德國對土耳其的投資，也引起德國商品對土輸出的增加。

德國對土耳其的輸出，1896年為28,000,000馬克，1911年為113,000,000馬克；特別是對亞洲土耳其的輸出，1901年為12,000,000馬克，1911年達37,000,000馬克。在這種場合，輸入的德國商品，大部分都是以德意志資本支付的，而德國人——照西斯蒙第的說法——則犧牲了對自己生產物的享受。

我們再詳細地考察一下：

英國或德國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由於不能在本國資本化，就投放到阿根廷、澳洲、好望角殖民地或美索不達米亞的鐵道建設、水利事業及礦業等中去了。機器、材料及其他物品，由輸出資本的國家供應，並用這筆資本來償付這些物品。實際上，這個過程表明了資本主義的特征，在任何地方，連資本主義國家本國在內，都是如此。資本自身必須購買生產要素，從而在自己活動之前，把自己變為生產資本。當然啦——生產物，在前一場合，是被外國人享用；反之，則留在本國享用。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並不在乎生產物的享用，而在乎剩餘價值的積累。**剩餘**生產物在國內既然沒有需

要，資本就閑置着而沒有积累的可能。然而，在那些資本主义生产尚不发达的外国，非資本主义阶层，或則自愿的，或則被强迫的，产生了新的需要。国内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消费，从积累的目的看来，是不相干的；对資本來說，重要的是让别人来享用資本的生产物。生产物的“享用”，一定要靠新的消费者来实现，来支付，因此新的消费者，又不能不具有货币手段。他們可以从同时发生的商品交换中获得一部分货币手段，因为紧跟着铁道敷設和采矿业（金矿等）的开始出现着活跃的商品交易。因此，預墊給铁道建設及采矿业的資本連同剩余价值一起，逐步的得到实现。那些流入外国的資本，不論变成新的独立企业中的股份資本也好，或者作为政府借款，通过外国政府，在工商业中找到活动的地盘也好，对于整个局面來說，没有什么区别。不論在前一场合，有些股份公司失敗而不久即告倒閉；或者，在后一场合，債務国最后宣告破产；也就是資本的主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有时損失了自己的資本的一部分，这也是无关重要的。这一些情况，从全体来看，并不改变事实的本質。在危机之时，个别資本也会在原产地喪失掉。重要的一点是老国家所积累的資本，要在其他地方找到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机会，才能使积累繼續进行。在新建国家里，有广大地区的自然經濟等待着人們把它轉变为商品經濟，或是已有的商品經濟可以被資本取而代之。旧資本主义国家对新資本主义国家投資的典型对象是铁道敷設和采矿业，特别是金矿业。这些投資，是最适合于在一直为自然經濟所支配的社会中引起活跃的商品交易。这两种因素在經濟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旧經濟形态的急激解体，社会危机的发生，近代社会关系的出现，也就是以商品經濟为起点的发展，以及資本的生产——在这一切的过程中，这两种因素是可以作为里程碑来看的。

因此，对外貸款以及对外国铁路和矿山股票的投資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說明馬克思积累图式中的缺陷。在这些场合，資本的扩大再生产，是一种以前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資本化（在外債或国外投資，不是由小資本者或半无产者的儲蓄来支付的

情形下)。至于老国家的資本何时,何地,用何种方法,得到实现后才向新国流入,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积累场所是毫不相干的。流入阿根廷以兴建鉄路的英国資本可能过去是以印度鴉片形态在中国实现的。再者,投到阿根廷鉄道上的英国資本,不仅作为貨幣資本,成为純粹价值形态时来自英国,而且它的物質形态作为鉄、煤、机器等物,也来自英国。换言之,剩余价值的使用形态一开始就以适合于积累目的的使用形态出现的。但是可变資本的实际使用形态,即劳动力,主要是外国的:即是說,作为老国家的資本剝削的新对象的,正是新国家的土著劳动力。如果我們在同一地位上进行研究,我們甚至可以假定劳动力与資本来自同一国家。事实上,举例來說新发现的金矿——特别是最初的时候——足以引起从老的資本主义国来的大量移民,并大部分由这些从老的資本主义国来的工人开采。因此,很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一新国的貨幣資本、生产資料及劳动力,都是来自同一的老的資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因此,实际上就在英国已具备了积累所需的一切物質条件——即已經实现为貨幣資本的剩余价值,在生产形态上的剩余生产物,最后,劳动后备軍。但这里在英国积累没法进行,因为英国及其老的买主,一点也不需要鉄道,也不需要扩大的工业。只有当一个具有非資本主义文化的新的分布很广的地区登上了舞台,扩大了消費者的队伍时,資本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积累,才成为可能。

那末,什么人是这个新社会的新消費者呢?什么人最后偿付这些借款呢?什么人实现那些以外債設立的資本主义企业的剩余价值呢?对这些问题的典型答案,是埃及的国际借款的历史。

十九世紀后半期埃及国内历史的特点,是下列錯綜复杂的三种事实:大规模的近代資本主义企业,似滾雪球般的激增的国債,以及农民經濟的崩潰。埃及直到最近,还存在着徭役劳动以及瓦里(Wali土耳其高級行政长官)和以后的克梯夫(Khedive埃及总督)对土地所有关系的无限制的暴力政策。但是,正是这种原始条件,对于欧洲資本的活动,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基础。在經濟上,最

初的問題是貨幣經濟條件的創造，因此，國家就用直接的強制手段創造了這些條件。近代埃及的創立者穆罕默德·阿里統治埃及至三十年代為止，他採用簡單的家長制方法，即為了國家的需要，他每年向農民“收買”全部收穫物，再以較高的價格，讓農民買回為生活和播種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數量。此外，他又從東印度訂購棉花，從美洲訂購甘蔗，此外還輸入靛藍和胡椒。同時又發給農民正式指令，規定種植哪些東西和種植多少。政府又宣布棉花與靛藍為國家壟斷，並保留買賣這些東西的壟斷權利。埃及採用這種方法，以實行商品交易。必須承認，穆罕默德·阿里也曾努力想提高勞動生產率。譬如，修浚舊運河網，掘通水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開始在卡里甫（Kaliub）修建尼羅河堤壩的工程，這個工程引起了埃及許多大資本主義企業的創立。這個工程，以後擴大到四個大方面：第一、灌溉計劃——在這一計劃中占首要位置的是卡里甫工程，那是在1845年至1853年間建設的，除無償的徭役勞動外，還耗費了50,000,000馬克，結果在初期證明毫無用處；第二、交通路線，其中最重要的而且後來證明對埃及有害的建設是蘇伊士運河；第三、是棉花栽培；第四、是砂糖生產。隨着蘇伊士運河的开凿，埃及人民陷入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羅網之中，無法脫身出來。法國資本帶頭，英國資本繼之而起。其後二十年間，兩國資本的競爭，左右了埃及國內的一切紛擾。法國資本恐怕是歐洲資本以犧牲原始社會形態作為積累和方法的最特殊的代表。不堪使用的尼羅河水閘及蘇伊士運河的完成，都是法國資本活動的結果。埃及首先負擔供給二萬個徭役農民的無償勞動若干年，其次，承購相當於蘇伊士運河公司總資本的百分之四十（70,000,000馬克）的股票。這一切都是為了開凿一條運河，而這條運河將使歐亞間的全部貿易繞過了埃及，從而不利地影響埃及在這個貿易中的地位。這70,000,000馬克形成了埃及龐大國債的核心，其結果是二十年後帶來了英國對它的軍事占領。在灌溉系統里，也開始了突然的變革。原始的“沙其”（Sakias），即牛拖的水車，這種水車只是在尼羅河三角洲上，就

使用了五万部，每年开动有七个月之久，——有一部分是被蒸汽抽水机代替了。尼罗河上开罗与阿斯旺（Aswan）間已經使用了近代的輪船。但是，引起埃及經濟条件最大的变化的，乃是棉花栽培事业。由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及英国的棉花荒的结果——当时，一公斤60至80分尼的棉花价格，上漲至4至5馬克——埃及掀起了棉花种植的狂热。大家都种植棉花，首先是总督及其家属。大规模的土地掠夺，沒收，强制“收买”或純粹的盗窃，使总督地产急速扩大。总督还侵占了許多村庄，尽管一点法律根据也沒有。于是，这些强制并吞的土地，都在一瞬之間变成棉田。这种转变，使得埃及传统的全部农耕技术也都改变了。为要免除尼罗河季节性的泛滥，到处修筑堤坝，以保护棉田，并成立了一套广泛的人工灌溉系統。这些水利工程和持續的深耕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埃及农民是完全新的，过去从法老年代以来，他們只是用犁在泥土的表面上松动一下而已——以及最后收获时的集約劳动，这一切，都对埃及的劳动力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埃及的劳动力，仍然是徭役农民。国家对这些徭役农民的劳动力具有无限制的处理权。数以千計的农民已經使用于卡里甫水坝和苏伊士运河的工地上。现在为了灌溉和在总督地产上种植棉花，也爭取这些强迫劳动。原来供給苏伊士公司使用的二万个农奴，现在克梯夫自己也要他們了。于是他便和法国資本之間发生了最初的爭执。拿破侖三世的仲裁宣告，判給苏伊士公司以67,000,000馬克的賠償金。克梯夫也很同意这个判决，因为結局他还是可以同样从农民——由于他們的劳动力而引起爭执——身上搜刮出来。灌溉事业也很快地着手进行。这可以从英国与法国訂購大量的离心式唧筒及蒸汽机牵引車等。这些机器数以百計，从英国运到亚历山大港，再从港口用汽船、尼罗河上的船舶以及駱駝队，載运到全国各地。在耕作上，需用蒸汽犁，特别是因为1864年牛瘟流行，使所有的家畜遭到死亡。这些机器也多半是从英国来的。福萊工厂（Fowler Works）突然間大大地扩充起来，以滿足埃及总督的需要，而这笔賬却必須由埃及来支付。①

埃及人还需用第三类的机器，即轧棉机与棉花打包机。这种机器设备，在三角洲诸城市，装起了几十个。沙加希亟(Sagasig)、当达(Tanta)、沙馬努德(Samanud)及其他诸城市，正如英国工业城市一样，开始冒烟。巨大财富在亚历山大港及开罗的銀行中流通起来了。

到了次年，棉花投机的失败到来了，棉花价格在美国战争结束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由每磅二十七辨士下落到十五辨士，十二辨士，最后竟跌到六辨士——翌年，伊斯美尔·帕沙又一次投入甘蔗生产的新投机。现在埃及农民的强迫劳动必须与奴隶制已被取消的美国南部各州竞争。埃及农业再度遭到混乱。英法资本家找到了迅速积累的新地盘。1868—69年，预计每日生产二十万公斤砂糖的十八个大型糖厂预定成立了。它的生产能力四倍于当时最大的工厂。其中有六个厂由英国签订合同设立，有十二个由法国签

① 福莱公司代表依特(Eyth)工程师说：“开罗、伦敦、里芝(Leeds)之间，开始了热烈电报往来。‘该公司150台蒸汽犁何时交货呢？’答复是，‘全部开工一年内交货。’——‘那是不能满意的，如果明春没有150台蒸汽犁运来亚历山大港，那就麻烦哪！’——答复是，‘不可能的！’——这个工厂当时的生产能力，一星期只能出产三台蒸汽犁。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机器每台值50,000马克，全部订货总共是7,500,000马克的交易。其次是伊斯美尔·帕沙(Ismael Pascha)的电报，‘工厂立即扩建需要多少钱？总督准备出资。’你们可以设想，里芝不会坐失良机的。此外，英国和法国的其他工厂也被要求供应蒸汽犁。亚历山大码头上的仓库，原来为堆积总督所用货物之地，现在充满了各种汽锅、车轮、滚筒、铁索、铁箱及钱柜等等。而在开罗的二等旅馆内，充满了蒸汽犁手——这些人是由五金匠、铁匠，农村青年及无事可作而满怀希望的青年人，匆忙地训练起来的。因为，这种蒸汽犁，至少必须有一个拥有专长的文化开拓者来驾驶。亚历山大港的爱芬第(Effendi 土耳其人对官吏和学者的尊称——译者)，把所有的东西杂然成堆地送到内地，其目的是腾出空位，给后来的船舶卸下货物。这些东西运到它的目的地，或者无宁说运到目的地以外的其他场所时，成怎样情况，什么人都不知道。尼罗河岸上放有十个汽锅，附属汽锅的机器却在十里外存放。这里堆积着钢丝圈，但你必须再走二十小时，才能找到相应的滑车。在某一处，坐在一大堆法国制的铁箱上的是一位饥饿而绝望的英国装配技师，他是开动这机器的。在另一处，他的同伴在绝望中以酒解愁。爱芬第与卡第勃(Katibs)奔走于赛得与亚历山大港之间，求救上帝，编制无穷无尽的清单，清单上的名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最后，这种机器的一部分开动了。蒸汽犁在上埃及的天空中冒烟。文明与进步更加推进了一步”。(“生的力量，关于技术方面的七个讲演”，柏林，1908年，第219页)

訂合同設立。由于普法战争的結果，交貨时英国占了主要部分。这些工厂沿尼罗河每隔十公里就設立一个，它們成为附近十平方公里的甘蔗种植地的中心。每个工厂，全部开工时，每日需要二千吨甘蔗。棉花时代的旧蒸汽犁，损坏散失的，数以百計，现在又必需調动几百部新的蒸汽犁来种植甘蔗。农民被調至甘蔗种植园强迫劳动的，数以千計。另外几千农民則为衣布拉希米雅运河(Ibrahimiya kanal)的开凿而服役。木棒与尼罗馬鞭被到处用来打人。不久运输又成为一个問題。为了使大量甘蔗运到工厂，必需迅速地修筑围绕工厂的鐵道网。运输輕便鐵路、鉄索車及蒸汽压路机，也必需設置起来。这样巨額的訂貨，也落入英国資本之手。1872年開設了第一个大工厂。四千駱駝成为临时的运输工具。可是，工厂所需的必要数量的甘蔗不可能全部供应。工作人員全不敷用，徭役农民也不能用鞭笞的方法把他們变为近代工业劳动者，这个冒险，甚至在許多进口机器安装前，已告失敗了。这样，1873年埃及的巨大資本企业时期，就以砂糖投机而告結束。

这些企业的資本出自何人呢？国际借款。賽德·帕沙(Said Pascha)在其故世前一年(他死于1863年)，募集了头一笔借款，其票面額为66,000,000馬克。事实上，扣除了手續費及折扣額等后，实得50,000,000馬克。他把这笔借款和苏伊士条約遺留給伊斯美尔·帕沙。埃及人結局負担了340,000,000馬克的債務。1864年伊斯美尔也借了他的第一笔借款，其票面額为114,000,000馬克，利率7%，而实得額为95,000,000馬克，利率8.25%。这笔借款一年內就耗光了，其中，至少有67,000,000馬克付給苏伊士公司作为补偿，剩下的款項，大部分为棉花的投机所消耗了。1865年英埃銀行承受了第一次所謂戴拉(Daira)借款，并以克梯夫的私有地产，作为担保。这笔借款，利率为9%，票面額为68,000,000馬克，但实际票面額50,000,000馬克，利率为12%。1866年由佛留林和哥森(Fruehling & Goschen)，募集新借款，其票面額为60,000,000馬克，实付款为52,000,000馬克。1867年奧托曼銀行发行了又一笔

債券，其票面額為 40,000,000 馬克，實付額為 34,000,000 馬克。短期債務當時已達 600,000,000 馬克。1868 年，阿本哈姆—納芬銀行 (Bankhaus Appenheim & Neffen) 發行了一筆債券，利率為 7%，票面額 238,000,000 馬克，借以合併上述債務的一部分。但事實上，伊斯美爾所得的只有 142,000,000 馬克，利率 13½%，而這些錢又用來開支蘇伊士運河通航的豪華典禮（在典禮時邀請了許多歐洲宮廷、財界及公司的人士）和恣情的揮霍，同時，還以新的酒錢方式使土耳其皇帝也分潤到 20,000,000 馬克。1870 年再由畢謝夫海姆—哥德斯密特公司 (Tirma Bischoffsheim und Goldschmidt) 發行一筆債券，票面額為 142,000,000 馬克，利率 7%，而實付額是 100,000,000 馬克，利率 13%。這筆借款是用來彌補砂糖投機的虧空的。其後，1872—73 年由阿本海姆銀行發行兩種債券：小的一種是票面額 80,000,000 馬克，利率 14%；大的一種是票面額 340,000,000 馬克，利率 8%。這兩筆借款抵償了短期債務的一半，但實際所得的只有 220,000,000 馬克，因為歐洲各銀行承購這些債券時，一部分是以貼現的匯票支付的。

1874 年試圖發行年利率 9% 的 1,000,000,000 馬克的內債，但僅得到 68,000,000 馬克。埃及的證券價格跌至票面價值的 54%。在賽德·帕沙死後十三年間，埃及的國債總額從 3,293,000 英鎊增至 94,110,000 英鎊，即增大約 2,000,000,000 馬克。^① 財政崩潰，迫於眉睫。

初看起來，這種資本的活動，可謂荒唐之至。一筆借款緊接着另一種借款，舊債的利息，以新債支付，而從英法借來的資本又用來支付對英法工業資本的巨額訂貨單。

當全歐洲為伊斯美爾的荒唐的經濟搖頭嘆息的時候，歐洲資本正在埃及大做其生意。這種生意在規模上是獨一無二，異想天開的。它可以說是聖經中關於埃及肥牛傳說的現代的、難以置信

^① 克羅麥伯爵、E. 拜林：“現代埃及”，倫敦，1908 年，第一卷，第 11 頁。

的翻版。它在資本主义历史上至今是空前絕后的。

首先，每一笔借款都包含高利貸的因素，名义上出借的款子中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留在欧洲銀行家的手中。結局，高利貸利息，必須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支付，但如何支付呢？支付的錢又从何处得来呢？出这些錢的必然是埃及自身。它的来源就是埃及农民經濟。归根到底，埃及的农民經濟对巨大的資本企业提供了一切重要的要素。它供給了土地，因为，所謂克梯夫的私有地产——这是灌溉計劃、砂糖投机及棉花投机的基础——是通过掠夺和勒索无数农村而迅速地扩大的。在强迫劳动下，埃及农民还提供了劳动力而且这种劳动力是无償地被剝削着，甚至，在工作时，还要自己供应維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正是由于农民的徭役劳动，才在埃及灌溉、运输、农业、工业领域中出现了欧洲工程师和机器所造成的技术奇迹。在卡里甫的尼罗河水閘工程及苏伊士运河工程中，在鉄道敷設及堤防建設中，在棉花种植场及砂糖工厂里，广大的徭役农民成群地被强迫劳动着。他們随着需要，从一种工作轉移到另一种工作，被別人无限制地剝削着。尽管很明显地，为了近代資本的目的而使用徭役劳动，有它一定的技术限度，但足以抵偿这个缺点的，是資本对这些劳动力集体的无限制的支配权力，它可以无限制地决定人們工作，生活和被剝削的条件和時間的久暫。

可是，农民經濟不仅供給土地与劳动力，也还供給貨幣。对于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租稅制度——在資本主义經濟的势力之下，它是压榨农民的工具。对于农民所有的土地，地稅是逐步提高的——在六十年代末，一公頃要收55馬克的地稅；反之，对大地产，則一公頃只收18馬克；王室的巨大地产，連一文也不付。此外还征收不断增多的附加稅。为了維持灌溉設備，每一公頃另抽特別稅2.5馬克，而这种灌溉設備几乎只是被皇家地产所利用。农民的枣树，每棵抽1.35馬克，他的泥土住宅，每戶抽75分尼，此外十岁以上的男子每人須付6.5馬克的人头稅。在穆罕默德·阿里統治

下农民全体，共繳納了50,000,000馬克；在賽德·帕沙統治下，共繳納了100,000,000馬克；在伊斯美尔統治下，共繳納了163,000,000馬克。

欠欧洲資本的債愈大，从农民經濟榨取的也愈多。^① 1869年全部捐稅提高了10%，1870年的捐稅又預征了。1870年征收了土地附加稅每公頃8馬克。于是，上埃及的居民到处迁离农村，毀坏自己的房舍，不再耕种土地，借以逃避租稅。1876年枣树稅提高了50分尼。于是整村整村的居民出动斫伐枣树，政府不得不开枪扫射来阻止他們。1879年在賽得港北面据报有农民10,000人死于飢餓，他們付不出他們的灌溉稅，他們杀死了家畜，以避免負担家畜稅。^②

现在农民最后一滴血，已經吸尽了。埃及国家，作为欧洲資本的吸血工具，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务，而归于无用了。克梯夫伊斯美尔被免职；資本可以开始清算它的业务了。

1875年英国以80,000,000馬克买进苏伊士运河股票172,000股，而埃及对这些股票现在仍須付出利息394,000埃鎊給英国。为了“整理”埃及財政而成立的英国委员会，现在开始活动了。奇怪的是欧洲資本一点也不耽心破产国的絕望状态，一再提供新的巨額借款来挽救埃及。柯威与斯托克士(Cowe and Stokes)提議发行利率7%的債券1,520,000,000馬克来掉換一切債務。利佛·威尔逊(Rivers Wilson)認為至少需要2,060,000,000馬克之数。“土地銀行”(Credit Foncier)收买了几百万短期的匯票，企图以

① 此外，从埃及农民身上强夺的錢，仍然通过土耳其而成为欧洲的資本。1854年、1855年、1871年、1877年及1886年的土耳其借款，是以几次提高的埃及貢賦为基础的，而这些借款是直接支付給英格兰銀行的。

② 1879年3月31日“泰晤士”报的亚历山大港报导說：“根据三角洲的駐扎官所說，現在要开始征收一年內第三季的租稅，这次征收，仍是采用旧办法。这与下列消息并列起来令人感到奇怪的：路旁倒斃了飢餓的人，由于負担过重而許多田地荒芜，农民出卖了牲畜，妇女出卖了她們的首飾，高利貸者的債券充滿了抵押处，法庭充滿了沒收抵押品的訴訟。”（引自托馬士·罗特斯泰因：“埃及的破产”，1910年，第69—70頁）

1,820,000,000馬克的借款来合并全部債務,但没有成功。当財政状态愈加絕望,愈加难于救济时,埃及全国及其全部生产力为欧洲資本吞食的时刻,就愈加迫近,愈加难逃。1878年10月,欧洲債权人代表抵达亚历山大港。英法两国資本共同管理埃及財政,在双重的支配下,实施了鞭打并掠夺农民的新稅。于是1876年一时中断的利息支付,1877年得以恢复起来了。① 现在欧洲資本的債权,成为經濟生活的中心及財政制度的唯一根据。1878年成立了新的委员会和主管部,其中人員,欧洲人占半数。1879年埃及財政置于欧洲資本的永久管理之下,成立了設在开罗的埃及公債委员会。1878年占有431,000英亩面积的总督領地梯夫里克士,变为国有地,典押給欧洲資本家作为国債的担保品。克梯夫的私有地戴拉領地(主要是在上埃及占地485,131 英亩土地),亦获得同样的遭遇。其后,这块領地出賣給一个投資財团。其他地产的絕大部分,尽入于資本主义公司,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公司之手。英国又沒收寺院及学校的教会土地,以偿付占領的費用。在呻吟于欧洲的財政管理下食不果腹的埃及軍隊(而欧洲官吏却領取高额的薪金)中所发生的一次叛乱以及在被榨取得一干二淨的亚历山大港的群众中爆发的暴动,这两件事情为欧洲人提供了进行致命打击的口实。作为二十年来英国大資本家在埃及大规模活动的結果,1882年英軍占領了埃及,从此不再撤去。这就是欧洲資本排挤埃及农民經濟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驟。② 现在可以明白了; 尽管表面上看来,欧洲貸借資本与欧洲工业資本間的交易似乎是荒唐的,因为这种借貸資本用来偿付埃及对工业資本的訂貨,而一笔借款的利息又用另一笔新借款来支付,但这种交易是建筑在对于資本积累极其合理和健全的关系上面。这些关系,如果剝去所有障人眼目的中間环节,那末它們包含一件簡單的事实——即埃及农民經濟,大部分被欧洲資本吞沒了:作为租稅支付給国家的大块土地,无数劳动力及巨額劳动生产物,結果都变成了欧洲資本,而被积累起来了。很显然,只有利用鞭子的力量,才能把通常需要一世紀的历史发展过程压缩

为二十年乃至三十年,而且,正是埃及社会关系的原始性,才提供了資本积累的优良条件。相对于一方面的神話般的資本膨胀,另方面的經濟后果是农民經濟的衰敗,以及商品交換的生长,而商品交換的生长是根源于全国生产力的加强利用。在伊斯美尔統治下,埃及的耕作土地及围堤土地从2,000,000公頃增加到2,700,000公頃;运河网,从73,000公里扩张到87,000公里;鉄道网,从410公里,扩展到2,020公里。在賽得与亚历山大港,建造了船塢;在亚历山大港,建造宏伟的修船所。为便利麦加朝拜者起见,沿叙利亚及小亚細亚海岸和紅海設立了輪船航綫。1861年埃及輸出达89,000,000馬克;1864年即跃至288,000,000馬克;在賽德·帕沙統治期間,輸入为24,000,000馬克;在伊斯美尔統治下即达100,000,000至110,000,000馬克。苏伊士运河开辟后在八十年代貿易恢复了,在1890年,輸入为163,000,000馬克,輸出为249,000,000馬克;到了1900年輸入达288,000,000馬克,輸出达355,000,000馬克;到了1911年,輸入增至557,000,000馬克,輸出增至593,000,000馬克。不待說,埃及由于欧洲資本的助力,商品經濟得到飞跃的发展,但它事实上也就成为欧洲資本的所有物了。正如在中国及最近的摩洛哥一样,埃及也表明,在国际借款、鉄道敷設、灌溉設備及其他类似的文明事业的背后,正潜伏着作为資本

① “泰晤士”报通訊員自亚历山大港报道:“这种产物都是由农民用实物所繳納的租稅組成。倘若我們一想到那些貧困的、操勞过度、飲食不飽、住在破烂的茅棚內的埃及农民为了满足債权者的慾望从早到晚工作时,按期支付股息的事,是一点也不会引起喜悅的。”(引自罗特斯泰因:“埃及的破产”,第49頁)

② 伊特(Eyth)是資本主义文化在落后国家的一个卓越的代言人。我們曾經从他关于埃及的杰作中引用了重要的数字。他結束这部杰作时,曾表述資本主义信条如下:“过去我們所学到的东西,将来还是适用。欧洲必須,而且也必将对那些不能用自己力量跟上現代生活的国家加以坚强的控制,尽管这样做时不可能沒有各种斗争。在那个时候,是非将模糊不可分清,政治上和历史上的正义往往会給千百万人造成不幸,而为了解救这千百万人又必須依靠在政治上非正义的行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混乱局面将由最强者来結束,在尼罗河两岸也将是如此。”(“生的力量,关于技术方面的七个講演”,第247頁)关于英国“在尼罗河两岸”建立了什么样子的“秩序”,罗特斯泰因曾加以充分說明了。

积累执行者的軍国主义。东方諸国，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再由商品經濟向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是不够迅速的，从而它們被国际資本吞沒下去，因为它們不可能不把自己出卖給国际資本，而完成这些变革。它們狂热的改变形态也就意味着它們被国际資本吸收下去了。

（德国資本在亚洲土耳其的活动，是最近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資本，特别是英国資本，早就企图占有这块古代欧亚間貿易路綫所跨越的地方。①

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英国資本修筑了斯米拿—艾丁—丁納尔鉄路綫及斯米拿—卡沙巴—亚拉雪希尔鉄路綫(Smyrna-Aidin-Diner及Smyrna-Kassaba-Alaschehir)，而且获得把路綫延长到亚西安卡拉希沙尔(Asiunkara hisoar)的許可，最后，又租用了安那托里亚鉄道(Anato lischen Bahn)第一綫阿达—巴沙尔—伊斯米得(Ada-Bazar-Izmid)路綫。法国資本也逐渐获得一部分的鉄道敷設权。1888年德国資本也登场了。它通过与由阿托曼銀行代表的法国資本家集团的协商，成立了一个国际利益的合并組織，其中德国金融資本家集团参加了百分之六十，国际資本参加了百分之四十。②安那托里亚鉄道公司(它的后台主要是德意志銀行)，以土耳其公司名义設立，在穆罕默德紀元1306年、即1889年3月4日成立，它接收了自七十年代以来开始經營的阿达—巴沙尔—伊斯米得鉄道綫，并敷設伊斯米得—爱斯基雪希尔—安哥拉鉄道

① 英国—印度政府，已經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之初，委托謝勒上校(Colonel Chesney)調查幼发拉底河是否可以通航，以便建立地中海与波斯灣至印度間的尽可能最短的联系。經過1831年多初步的探勘旅行和作了詳尽的准备以后，正式的远征队于1835—37年出发。在这期間，英国軍官和職員考查和測量了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这种活动一直繼續到1866年，但对英国政府沒有带来有用的結果。但后来通过波斯灣，在地中海与印度間建立一条聯絡路綫的計劃为英国用另一个方案来代替，那就是底格里斯(Tigris)鉄道計劃，1879年卡麦侖(Cameron)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旅行美索不达米亚，研究計劃中的鉄道設置綫。奥本海(M. F. Von—Oppenheim)：“从地中海通过豪兰、叙利亚沙漠及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灣”，第二卷，第5頁及第36頁)

② 施萊德(S. Schneider)：“德国的巴格达鉄道”，1900年，第3頁。

綫(共 845 公里长)的特权。这个公司,还有权完成阿达—巴沙尔—斯庫达里(Skutari) 鐵道及接到布魯薩的支綫。又由于1893年所获得的权利,而建筑爱斯基雪希尔—柯尼亚(Eskisehir-Konia)的补充路綫(約445公里长),最后,又得到經營安哥拉—凱沙里(Angora-Kaisarie 約长425公里)路綫的权利。土耳其政府,給这个公司如下的国家保証:在阿达—巴沙尔綫上每公里每年总收入10,300法郎;在伊斯米德至安哥拉綫上每公里每年总收入15,000法郎。因此,政府就把伊斯米德州、爱多克魯(Ertoghru)州及卡达西(Katahia)州和安哥拉的什一稅收入,让度給阿托曼公債管理署。这个管理署就以这些收入来补足政府对上述鐵路所保証的总收入。政府对安哥拉—凱沙里鐵路,保証每公里每年总收入775土耳其鎊,即17,800法郎;对爱斯基雪尔—柯尼亚鐵路,保証每公里每年604土耳其鎊,即13,741法郎,其条件是在爱斯基雪希尔—柯尼亚綫上补充津貼不超过每年每公里219土鎊,即4,995法郎。反之,总收入超过保証額的时候,政府即获得超过部分的25%,特列必桑得(Trebizonde)州及古姆附勒(Kunuchhane)州的什一稅,直接又由阿托曼公債管理署征收,这个管理署再从由指定存放起来的什一稅所形成的公共基金中拨交鐵道公司必要的保証補助額。1898年对爱斯基雪希尔—柯尼亚鐵道的保証,从219土鎊,提高到296土鎊。

1899年这个公司获得修筑并經營港口(除投資于阿达—巴沙尔之外),发行倉庫証券,建造谷物起重機,修筑各种商品的堆棧等权利;又获得雇用自己的人员来装卸貨物的权利,最后,还获得在關稅制度方面实行一种自由港的权利。

1901年,公司获得柯尼亚—巴格达—巴士那—波斯湾之間的巴格达鐵路(Die Bagdad Bahn Konia-Bagdad-Basra-Persischer Gulf)(全长2,400公里)的权利,这条鐵路是通过柯尼亚—艾列格里—布古魯(Konia-Eregli-Burgurlu)綫以接連安那托里亚綫。这个公司为要行使敷設这条鐵路的权利起见,設立了一个新的股

份公司，以代替旧的股份公司。这个新的公司就首先把修往布古魯綫的建筑权利，让給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Maine)登記的一个建筑公司。

从1893年至1910年間，土耳其政府，給阿达·巴沙尔—安哥拉鐵道 48,700,000 法郎的补助金，給爱斯基雪希尔—柯尼亚鐵道 1,800,000 土鎊的补助金，合計补助金共达 90,800,000 法郎。^①最后，根据1907年的协定，卡拉維浪湖(Karaviran)的排水及柯尼亚平原的灌溉，都由这个公司来进行。这些工作规定在六年內完成，由政府出資。在这场合，公司借給政府必需的資本，19,500,000 法郎，年利 5%，分三十六年偿还。对此，土耳其政府乃以下列权益为抵押：(一)从交給阿托曼公債管理署支付鐵路补助金及其他債務的什一稅基金的盈余中，每年提出 25,000 土鎊；(二)新灌溉地区过去五年的什一稅尾数；(三)經營灌溉設施的純收入，(四)出售开垦或灌溉的土地后的价款。为了进行这个工作，法兰克福的公司設立一个附属公司，担任灌溉柯尼亚平原的工程，它的資本为 135,000,000 法郎。

1908年这个公司获得把柯尼亚鐵道延长到巴格达和波斯湾的权利(也包括一笔保証的收入)。

为了支付鐵路的补助金，分三次发行了德国巴格达鐵路債券，(第一次是 54,000,000 法郎，第二次是 108,000,000 法郎，第三次是 119,000,000 法郎)并以艾丁、巴格达、摩苏尔、第亚伯基、烏薩及亚利坡等地方的什一稅和柯尼亚、阿打那及亚列坡等地方的畜羊稅为担保品。^②

这里积累的基础，完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德国資本，在亚洲土耳其建設了鐵路、港口、及灌溉設備。在所有这些企业，德国資本，从亚洲人(以他們作为劳动力而被德国資本雇用的)身上，抽取

① 沙林(Saling):“金融年鉴”，1911—12年，第2211頁。

② 沙林:“金融年鉴”第360—361頁。烏騰堡工程师普列色尔(Pressel)是希世男爵(Baron von Hirsch)的助手，他自己在欧洲土耳其曾活跃地参加过这些交易。关于土耳其政府为了敷設土耳其鐵道被迫付給国际資本的全部补助金一事，普列色尔曾

了新的剩余价值。可是,这些剩余价值,不能不和生产上所使用的德国的生产资料(铁路器材、机械等)同时实现。那末,誰帮助它的实现呢?一部分是由铁路、港湾的设备等所引起的并在小亚细亚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培养的商品交换;一部分是当商品交换不能急速增长,以适应资本实现的要求时,通过强制力量,国家机器,把国民实物收入变为商品;这些商品换成货币以便实现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这就是对国外资本所创办的独立企业给以收入补助金以及对借款给以担保品的真实目的。在这两种场合下,以各种不同的条件抵押的所谓“什一税”,是由土耳其农民以实物缴纳的,这种租税逐渐提高到12%至12.5%。亚洲地方的农民,不能不缴纳“什一税”,因为,若不如此,宪兵与中央和地方官吏就简单的从农民身上没收这什一税。“什一税”本身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古代亚细亚专制政治的表现,它不是由土耳其政府直接征收的,而是通过旧政制下的租税征收者所谓租税包征吏之手来实行的。这种包征

举出如下的表:

	长度(公里数)	支付的保证金(法郎)
1. 欧洲土耳其的三条线路	1,888.80	33,099,352
2. 1900年前完成的亚洲土耳其铁道网	2,313.20	53,811,538
3. 手续费及与支付铁路保证金补助金给阿托曼公债管理署有关的其它费用		9,351,209
合计		96,262,099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只是到1899年末为止的数字,1899年以后才开始部分地支付收入的补助金。在亚洲土耳其74州中,当时已有28州的什一税,被用来担保收入补助金。自1856年至1900年间,在这些补助金担保下,在亚洲土耳其共铺设了2,513公里的铁道。(普列色尔, W. Von Pressel: “亚洲土耳其的铁道”, 苏黎士, 1900年, 第59页)

关于铁道公司以土耳其为牺牲品所使用的卑鄙方法,专家普列色尔曾举了下列的一个事例:他说根据1893年的协定,安那托里亚公司答应经营经由安哥拉到巴格达的铁道。但后来,发现公司的计划行不通,但由于得到了公里保证金,它们就听任这条铁路受命运的摆布,而自己却致力于经营经过柯尼亚的另一条路线。“这些公司刚刚把斯米拿—艾丁—丁纳尔铁路线拿到手,它们就要求把这条路线延长到柯尼亚。而这几条支线完成之后,公司就采取种种手段强迫用这些新路线来运输商品,因为这些路线没有公里保证金,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收入他人不能染指,反之,其他路线当它们的总收入超过一定数目时,就必须把剩余的一部分付给政府。结果,政府在艾丁线上什么也得不到,而公司则将赚几百万。政府对卡沙巴线及安哥拉线,支付了差不多全部的公里保证金,而决不可能从超过15,000法郎总收入的剩余中获得原来规定的25%的分额。”(同上书,第7页)

方法，就是国家把租稅的預期收入，分別拍賣給包征吏。个人投机家或集团承购这包稅后，再把各州的什一稅出售給其他投机家，而其他投机家又把他們的股份出售給无数的小代理人。所有这些中間人都想抵償自己的費用，賺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当什一稅正式征收时，农民所交付的已經膨胀到巨大的数目了。租稅包征吏如有計算錯誤之处，他就犧牲农民以資补偿。农民不得不經常借債度日，什么时候他能出售自己的收成，真是望眼欲穿。在他收割谷物后，往往几星期过去了他还不能打谷物，一直等到什一稅的包征吏来收取他应繳納的部分。而什一稅的包征吏——他們通常是谷物商人——就利用农民担心谷物在禾田中腐烂掉的損失，迫使他们們廉价出卖其收割物；而且为了对付那些怀抱不滿口有怨言的人，他們知道如何取得官吏特别是村长的支持。^①

什一稅与盐、烟草、酒类稅、絲稅、漁業稅一道，抵押給阿托曼公債管理国际委员会作为铁路补助金和借款的担保品。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保有考查承包吏的合同的權利，并规定什一稅收入必須直接存入这个委员会的地方办事处的金庫中。如果找不到承包吏时，那就由土耳其政府把什一稅的实物形态貯藏起来，而仓库的鎖匙，移交給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为了自己把什一稅出售給別人。

从而，小亚細亚、叙利亞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与德国資本之間的經濟的新陈代謝，是以下述方法进行的：谷物，作为原始农民經濟的簡單的使用生产物，产生于柯尼亚、巴格达、巴斯拉等地，它立即落入租稅承包吏之手成为国家的征課。只有在那时，在承包吏的手中，谷物才变为商品，并作为商品再变为貨幣，而交給国家。这笔貨幣就是从农民的谷物变来的，而农民的谷物当初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现在作为国家的担保品，这笔貨幣用来支付铁路的建設和經營費用，也就是在修筑和經營铁路时，从亚洲农民和无

^① 查理士·摩拉維茨 (Charles Moravitz): “从財政上看土耳其”，1903年，第84頁。

产者身上榨取的生产资料价值和剩余价值。此外，当建设铁路之时，还使用了德国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因之，亚洲农民的谷物变成货币后，还用来把从德国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转变为货币。在完成这种机能中，货币从土耳其国家手上，转移到德国银行的金库内，在这里，这些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而积累起来，它以发起人的盈利特权费，红利和利息等形态，列入格运纳尔西门子、斯汀司及其共事的董事的眼上，列入德意志银行的股东和顾客及其全部附属公司的复杂系统的眼上。如果没有那些特权所产生的租税承包吏，那么，一系列的复杂变化，就会还原为最简单最明显的形态：即农民的谷物，直接交给阿托曼公债管理署，也就是交给欧洲资本代理人之手，它已成为德国及其他外国资本的实物形态的收入。它在摆脱亚洲农民的使用形态之前甚至在变成商品和它自己的价值实现之前，它即已实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这是欧洲资本和亚洲农民经济间血腥的赤裸的新陈代谢作用而土耳其国家在其中的实际作用仅仅是一个为了资本主义目的而剥削农民经济的政治机构而已。这当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所有东方国家的真正任务。这种以德国资本支付德国商品的交易，表面上看来一个荒唐的循环，好象仁慈的德国人让狡猾的土耳其人利用它们文明的巨大工程，但在根本上是德国资本与亚洲农民经济间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在国家强制下完成的。一方面它助长不断增长的积累，和“利益范围”的扩大，作为德国资本在土耳其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扩张的借口。另一方面是国家在亚洲农民经济的急速分解、破产以及被剥削的基础上培植了铁路建造和商品交换，而在这个分解、破产和被剥削的过程中，土耳其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愈来愈顺从德国资本了。①

① “此外，在这个国家，一切都还是困难而混乱的。如果政府要实行烟纸或纸牌专卖，那么，法国与奥匈帝国为了它们的贸易利益计，马上会加以否决。如果问题牵涉到石油，俄国就会提出抗议，甚至那些利害关系很少的强国也要根据某种某种协定才能表示同意。土耳其的命运好象跟桑丘·般沙 (Sancho Pansa) (西班牙作家西万提斯小说中吉訶德先生的持盾侍从——译者注) 及其进餐时的命运一样；财政部长刚刚想做一些事情，就有某一个外交官出来扼着他的手腕，否决了他的想法”。（摩拉维茨，前书，第70页）

第三十一章 保护关税与积累

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以地理而言，这些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占地球上最广大的部分，可是，作为资本扩张的领域，在与资本的生产力所已经达到的高度发展水平相形之下，这些地区还是微不足道的；请看老国家所积累的巨额资本，这些资本正为它的剩余生产物找寻出路，并力图把它们们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请看前资本主义的文化如何迅速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就可得出上述的印象。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剧烈的竞争，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蛮横粗暴了。但是，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

‘希望资本积累和平发展，希望“贸易与工业只能在和平中繁荣”，这种主张一方面世界各商业国家间的利益和谐，另一方面资本与劳动间的利益调和的正统的自由放任派理论，是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的狂飙时代。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欧洲短短的自由贸易时期，看起来这些希望好象找到了实践的证明，其实，那时的自由贸易建筑在英国自由贸易论者的错误学说上面，根据这个学说，商品交换是资本积累的唯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提条件，而资本积累和商品交换又是相同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里

嘉图及其学派都是把資本积累及其再生产条件，与簡單商品生产及簡單商品流通的条件等同起来了。这种看法不久在一些普通自由貿易論者的实践中表现得更明显了。柯布登同盟(Cobden Jayue)的全部論点，都是为兰开夏的制造棉制品的出口厂家的特殊利益而制定出来的。他們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市场。而他們的信条，是从外国买进来，再把我們的工业产品(即棉制品)卖到新市场上去。柯布登与布莱特(Bright)为了消費者的利益，要求自由貿易，特别是要求得到較低廉的食物，但这些消費者，并不是吃面包的劳动者，而是吃劳动力的資本家。

这种学說，絕對沒有表达資本积累的全部利益。在英国本身，这种看法已經由四十年代的鴉片战争而彻底破产了。——远东商业国家利益的和諧是在鴉片战争的砲火声中宣布的，而鴉片战争通过并吞香港最后引起与这种和諧相反的东西，即利益范围体系的形成^①。六十年代欧洲大陆的自由貿易，根本沒有代表工业資本的利益，因为当时，大陆上主要的自由貿易国家，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大工业相对地还很不发达。自由貿易制度，无宁是作为中欧諸国政治建設的一种手段来实行的。在德国，这个制度在孟德維尔及俾斯麦的領導下一种特別的普魯士手段。它的目的是从联邦及关稅同盟中把奥地利排挤出去，并在普魯士領導下建立德意志帝国。从經濟上說，自由貿易的主要支柱在这里是商人資本的

^① 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1859年，在全德国曾散发一本小册子——著者是維尔逊(Viersen)的工厂老板梯尔嘉得(Diergarlt)曾热心劝告德国要在适当时期确保东亚市場。它贊成用显示兵力的办法从日本及东亚各国取得商业利益。以民众所貯积的零星資金来建設德国艦队，长时期来曾是一个年輕人的梦想。尽管普魯士有几艘船只，它的海軍力量是不足道的。可是，为了要在东亚进行通商談判，普魯士决定装备一支艦队，并由有能力的、謹慎的、普魯士政治家奥倫堡伯爵(Graf zu Eulenburg)担任这个远征团的团长，这个团还負有科学的任务。奥倫堡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执行他所接受的委托。尽管和夏威夷群島同时进行談判的計劃，不能不放弃，远征团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成功的。当时的德国新聞有較多的了解，对于每次发生的困难报导时总是說那是老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并对艦队示威的开支斥之为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却並沒有使新時代的政府动摇。成功的果实終於为繼起的政府所获得了”。落茲(W. Lotz):“德国的商业政策思想”，第80頁)

利益，特别是在对世界貿易有利害关系的汉撒諸城市的商人資本的利益，以及农业消費者的利益。在工业中則情况剛相反。炼鉄工业几經困难，用取消萊茵通过稅作为交換条件，才被爭取过来。但南德意志的棉花工业，則断然站在保护关系的反对派方面。在法国，奠基于全欧自由貿易制度的最惠国条款协定，是由拿破侖三世締結的。但是这些协定并未获得国会以及构成多数的工业家和农业家的同意，甚至违反了他們的意志，因为这些人贊成保护關稅的。第二帝国的政府把通商条約当作一种紧急的措施——而英国也接受了这个看法——供以避免法国議会的反对，并在立法的背后，用国际行动，把自由貿易建立起来。英法間第一个主要条約是冲着法国輿論而締結的^①。自1853年至1862年实行的法国旧保护關稅制由两个敕令加以废弃了。1863年，这些敕令，沒有很好的遵守应有的手續就被“批准”了。在意大利，自由貿易是加富尔(Cavour)政策的支柱，并依靠法国的支援。1870年在輿論压力下，进行了一次調查，这次調查暴露了利害关系最密切者对自由貿易是仇視的。最后，在俄国，六十年代的自由貿易傾向，只不过是給商品經濟及大工业建立一个广濶基础的第一步，它与农奴制的废止及鉄路網的建設是同时出現的^②。

① 經過施瓦利尔(M. Chevalier)与柯布登(R. Cobden)代表法国与英国政府进行初步商談后，“不久即举行正式会談，会談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1860年1月5日，拿破侖三世給国务大臣孚尔特(M. Fould)一个备忘录，宣布他的意图。这个宣布象是一个晴天霹靂。經過过去一年事情的发展，一般認為在1861年以前，關稅制度不至有任何修改。群情很是激昂，但尽管如此，条約仍然于一月二十一日签了字”。(阿·德維尔：“1860年以后的法国商业政策”，“社会政策学报”，第51卷，第136頁)

② 1857年至1868年間俄国關稅率按照自由主义路綫的修正以及关于保护關稅的荒謬的康特林(Kantrin)制度的最后取消是全部改良事业的标志，也是必然的結果，而这种改良措施是由灾难性的克里木战争所促成的。然而關稅的減輕，也反映了地主紳士的利益，因为这些土地占有者，作为外国商品的消費者和出口谷物的生产者，是关心俄国与西欧間的自由貿易的。农业利益的辯护者“自由經濟学会”：声言“自1822年至1882年的过去六十年中，俄国最大的生产部門农业遭受了四次巨大的損害，从而使俄国农业瀕于极端危險之境。这四次損害都可直接归咎于过高的關稅率。反之，在1845年至1877年的三十二年間，由于实行了温和的關稅，尽管經過三次战争与一次內乱(意

因此作为国际体系的自由貿易的最初开始，表明仅仅是資本积累史上的一个插曲而已。这里也表明：如果把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一般恢复保护关税的事情，解释为完全是对英国自由貿易的自卫性反应，那是顛倒事实的說法^③。

上述的說明，因下面的事实而失效。即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同，在轉变到保护关税之时，起指导作用的，乃是农业上的利益，在农业利益上，問題不是英国的竞争。而是美国的竞争。此外，对刚刚抬起头来的国内工业，要求保护的，在俄国是对抗德国，而不是对抗英国；在意大利，則是对抗法国，也不是对抗英国。七十年代以来的长期的全世界范围的肖条引起了保护关税的要求，但英国的壟断地位也不是那次肖条的原因。我們必須从更为深远处找寻造成保护关税轉变战綫的原因。自由貿易学說及其对世界市场上利益和諧所抱的幻想是符合于用商品交換角度来看一切事物的观点的。一旦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大工业資本充分地

指1863年的波兰暴动——著者）——每次都或多或少地使国家財政陷于紧张状态——沒有发生过象以前那样的危急情况”。（“帝国自由經濟学会关于修改俄国关税率的备忘录”，彼得堡，1890年，184頁）近年来为自由貿易或温和的保护关税作辯护的人在俄国沒有被看作是工业資本利益代表人，这一点可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作为自由貿易运动的理論支持者，上述的“自由經濟学会”，在九十年代，鼓动反对保护关税，把它当作把資本主义工业“人为地移植”到俄国来的一种手段，并且以反动的“民粹派”的精神，把資本主义斥之为近代无产阶级的温室，“那是一群不能移动的人，沒有家也沒有财产，他們无物可失，也老早就沒有好名誉。”云云（同上171頁）这充分証明直至最近，俄国的自由貿易或至少温和关税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不代表工业資本的利益。参閱罗得欣斯基(K. Lodyshenski)，“俄国关税史”，彼得堡，1886年，第239—258頁。

③ 恩格斯也具有这种見解。1892年6月18日他致尼古拉昂的信中，說道：“英国学者为自己的爱国利益所蒙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由英国所作出的自由貿易榜样，到处被人頑强的拒絕，并且与自由貿易相反，采取保护关税制度。固然，他們不敢简单地承認現在差不多已經普遍实施的保护貿易制，只是对抗英国自由貿易的自卫措施，而自由貿易是完成英国工业壟断的手段。这种自卫措施多少是合理的——在某些場合下，还是絕對愚蠢的，举例來說，在德国，这种手段是很愚蠢的，因为，德国在自由貿易之下，已經成为大工业国；而它現在实施对农业生产品及原料的保护关税，从而增大了工业生产的生产費用。我認为这种普遍向保护关税轉变的运动，并不只是一种偶然現象，而是对不能忍受的英国工业的反抗。这种反抗所采取的形式，正如我前面所說的，可能是錯誤的，不合适的，甚至更坏的；但这种反抗的历史必然性，在我看来，乃是显而易見的事”。“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昂書信集”，圣彼得堡，1908年，第71頁。

建立起来而需要考虑到資本积累的条件时，这个学說就被抛弃了。与資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利益相反，这些資本积累的条件把爭夺非資本主义环境所引起的对抗性提到显著地位来了。

当自由貿易时代开始的时候，东亚刚通过中国的鴉片战争而开放門戶，欧洲資本也刚开始染指埃及。在八十年代与保护貿易政策相并而行的扩张政策更见加强，如英国占領埃及，德国在非洲进行殖民地侵略，法国占領突尼斯及远征东京（越南地名——譯者），意大利开进亞薩布(Assab)及馬薩华(Massawa)，埃塞俄比亚战争及厄立特利亚(Eritrea)的建立，英国侵略南美——这些扩张行动都是在八十年代，連續不断发生的。意大利与法国为攫取突尼斯的势力范围所进行的斗争，成为七年后法国对意大利关税战争的序幕，通过这个剧烈的收场白，欧洲大陆上自由貿易的利益和諧說宣告終結了。壟断国内和国外的非資本主义領域成为資本的呐喊口号，而自由貿易的門戶开放政策，正式代表着非資本主义諸国在国际資本面前束手无策状态以及国际資本在全部或部分占領这些地区作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初期的竞争中所企图达到均衡形势。唯有最老的資本主义帝国英国现迄今还能忠实地保持自由貿易，那首先是由于它老早就占有了广大的非資本主义的領域作为活动的基地，从而使他拥有几乎无限的資本积累机会。直到最近，英国因此是处于别的資本主义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地位，所以别的資本主义国家都力求在保护关税的壁垒下达到自給自足，然而它們还是相互购买商品，并为了补充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更加相互依賴了。实际上保护关税对生产力的技术发展，在今日已完全失去作用，它常常会相反地导致人为的保存陈旧的生产方法，国际保护关税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国际借款体系的双重性相同，不过是在积累的双重利益間所发展起来的历史对抗性的反映而已；即一方面是扩张，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資本化，另一方面，从商品交换角度来看一切事物时所抱的观点。

这一个事实特別在下列情况中得到証实；即与殖民地扩张和

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环境的内部对立相适应的近代高额保护关税制度也是为了扩充军备而实施的。在德国，以及同样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向保护关税的转变，是与军队的扩充相伴而行的，并且还是为军队的扩充服务的。它是作为首先在陆上，其后在海上，发展的欧洲军备竞争的基础而实行的。欧洲的自由贸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欧洲大陆的步兵制度，已经让位给保护关税，作为强烈转向海军的帝国主义军事制度的基础和补充。

因此资本主义积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具备着二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工厂、矿山及农场。若单从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积累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的最重要的阶段，是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交易。但是，这两个阶段（即商品市场和生产场所），只限于等价物的交换，并停留在商品交换的限度内。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和平、财产和平等占支配地位。至于在资本主义积累的进程中，所有权如何变为对他人财产的掠夺，商品交换如何变为剥削，平等如何变为阶级支配，这些问题则有待于科学分析上锐利的辩证法才能加以阐明。

资本主义积累另一方面，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要想从这些乱纷纷的政治上暴力和权利的掠夺中，探求出经济过程的严密规律，那是需要费一点气力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只看见前一个方面，即“和平竞争”、技术及纯粹商品交换的奇迹，它和另一方面，即资本主义汹涌的暴力行动，截然分割开了，后者完全被看作“对外政策”的偶然表现，好象与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毫不相干的。

实际上，政治上的暴力，只是经济过程的一种工具。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本身提供了资本主义积累两个方面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的

紐帶。只有把這兩方面總合起來，才能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事跡。“從頭到尾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血和污物”，這不僅在資本誕生時如此，而且資本主義在世界上每一步的進展中，也都是如此。因此，資本主義準備著在更加劇烈的痙攣震動下自身的滅亡。

第三十二章 作為資本積累領域的軍國主義

軍國主義，在資本的歷史上，完成一種十分確定的任務，它與積累的每一個歷史階段相伴隨的。在歐洲資本的發軔時代即所謂“原始積累”時代，軍國主義作為征服新世界及印度出產香料諸國的手段，曾起過決定性的作用。其後，軍國主義被用來奴役近代的殖民地，破壞原始社會的社會組織借以占有他們的生产資料，在社會結構不利於商品貿易的國家里強制進行商品貿易，以及在殖民地用強迫土著居民為工資而勞動的方法把他們變為無產者。歐洲資本在非資本地區的勢力範圍的建立和擴大，對後進國鐵道敷設權的勒索，作為國際放款人所提出的要求的履行，這些都通過軍國主義來實現的。最後，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各國在爭奪非資本主義文化領域的工具。

此外，軍國主義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從純粹經濟觀點來看，軍國主義是實現剩餘價值的一個卓越的手段——它本身即是資本積累的一個領域。在我們考察什麼人應該算作購買包含着資本化剩餘價值的大量生產物的主顧時，我們常常會拒絕把國家及其機關當作消費者來計算。既然他們的收入是派生的，他們就與那些依靠剩餘價值（或部分地依靠勞動的工資）為生的，以及自由業者，或今天社會中的各種寄生者（國王、教授、妓女、雇傭兵）被列入同一的類別。但是，這樣解釋只有在下述兩個假設下，才能站得住。第一，我們必須假定，按照馬克思再生產圖式，國家除了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及資本主義的工資以外，沒有其他什麼租稅源

泉^①；第二，我們把國家及其機關單純地作為消費者來進行考察。這即是說，問題如果涉及國家機關（或僱傭兵也可）的個人消費時，重要的是消費中有一部分從工人階級被轉移到資本家階級的隨從者手中，而由工人支付這筆賬。

讓我們暫時假定從工人那里強奪來的間接稅——這意味着工人們消費的縮減——是全部用來支付國家官吏的薪俸及供給常備軍的給養。照這種假定，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將不起什麼變化。生活資料部類，從而，生產資料部類，也依然不變，因為，社會總需要，無論在其種類上或數量上，都沒有受到什麼變動，只是作為商品的勞動力 V 與第二部類的生產物即生活資料間的价值關係發生變化。這個 V ，即代表勞動力的同樣數量的貨幣，現在與較少量的生活資料相交換。那麼，剩餘下來的第二部類的生產品又怎樣處理呢？它不是由勞動者拿去，而是進入了國家官吏及軍隊的手中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機關從工人那里取去剛好同量的消費品，因此，再生產條件完全不變，僅總生產物的分配發生了變化。以前充工人消費之用（即充償還 V 之用）的第二部類生產物的一部分現在轉充資本家階級的隨從者的消費了。從社會再生產的觀點上看，這種轉變，其結果完全和下述情況相同——即相對剩餘价值最初就有一個較大的數量，而這個較大的數量就加入資本家階級及其隨從者的消費中去了。

到此為止，可知通過間接稅來剝削工人階級借以維持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吏，其結果等於增大剩餘价值，也就是，增大剩餘价值

^① 事實上，列納爾 (Renner) 博士，就是以這個假定作為他的租稅專論的基礎。他說：“一年之間所創造的价值，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因此，一年的租稅，只有從那些部分中收取：即，利息、利潤、地租及工資。”（“勞役者與租稅”，維也納，1909年，第9頁）列納爾以後立刻就想到農民的存在，可是，他只用一句話就把他們解決了：“例如，有一個農民，同時兼做企業家、工人、地主。他的經濟收入，是工資、利潤和地租合而為一”。象這樣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範疇，同時應用到農民身上，把農民當作一身兼企業家、工資勞動者和地主的身份，顯然只是一種空洞的抽象論。如果象列納爾那樣，把農民列入一個單獨的範疇，那麼，他在經濟上的特點就在於他既不屬於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也不屬於工業無產者；同時，他並不代表資本主義的，而是代表簡單商品生產的。

的消費部分，其差別就在于这样从可变資本中进一步分割，发生得晚一些，即发生在資本与劳动力之間实行交換之后而已。可是，資本主义国家机关的这种消費是与資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毫不相干的，因为这个追加的、用之于消費的、剩余价值——即使这种消費是由于牺牲工人阶级而得到的——是后来創造出来的。反之，如果工人们不負担国家官吏及雇佣士兵的大部分的維持費，則資本家本身就不能不負担其費用的全部。資本家阶级为了維持其阶级統治机关，就不能不直接从剩余价值中分出相当的一部分，从而或則牺牲生产，把生产作相应的縮减，或則，更可能的，从供他們消費的剩余价值中节省一部分出来。資本家勢須以較小的规模进行資本化，因为，他們必須以較多的部分来直接保全本阶级的存在。只要把資本家阶级随从者的主要負担轉嫁于工人阶级（也包括簡單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农民与手工业者），那么，資本家就获得較大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足供資本化之用。可是，这样进行資本化的机会这里还不存在，也就是說，虽然有了剩余价值，还没有足以生产和实现新商品的剩余价值市场。但当集中在国庫中的稅款用之于生产軍备，情形就不同了。

以間接稅与高額保护關稅为基础的軍国主义，它的費用，主要是由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支付的。这两种租稅，应当分別来考察。对工人阶级來說，租稅在經濟上是有如下的意义：在生活資料价格上涨，而工資并不比例地上涨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对现在大多数工人阶级，都是适用的，甚至对参加职工会的少数人，由于受到卡特尔和企业主团体的压迫，也是适用的^①——間接稅就无异于把工人阶级购买力的一部分，移轉到国家手中。这里正象从前一样，当作定額貨幣資本的可变資本，将用来促使相当数量的活劳动发生作用，也就是說，它把相当数量的不变資本投入生产，从而

^① 卡特尔及托拉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現象，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它們产生于各个資本家集团的內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壟断积累和分配利潤的現存的範圍。

产生相应数量的剩余价值。一旦資本完成了这样的循环，它就在工人階級与国家間进行分割，換言之，工人們用劳动交換得来的一部分貨幣額，轉移到国家方面去了。資本全部占有了过去可变資本的实物形态，即劳动力，而工人階級只保留了可变資本的貨幣形态的一部分，其余一部分則被国家拿去了。这种情况，总是在資本与劳动間的資本循环完成后发生的，也可以說它是在資本的背后进行的，它一点也沒有直接触犯資本流通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各个主要阶段，从而对于后者沒有直接的关联。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影响到总資本再生产的条件。把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购买力轉移給国家，意味着工人階級对生活資料的消費相应地减少了。就总資本看来，它意味着，在可变資本(采取貨幣資本形态和当作劳动力的)和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容量不变的前提下，供工人階級用的消費品将少生产一些，从而工人們在总生产物中所获得的份額，也少了一些。結果，在全部資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生活資料的数量，与可变資本的价值相比，将生产得少一些，因为可变資本的价值与其借以实现的生活資料数量之間的比例发生了变动，而根据我們的前提，工人的貨幣工資不变或至少沒有增加到足以抵銷生活資料价格上涨的程度。这个生活資料价格的上涨就代表着間接稅的水平。

再生产的物質关系将如何調整呢？由于劳动力更新所必要的生活資料数量相对地减少，相应数量的不变資本和活劳动就可以騰出来生产其他商品，以滿足在社会內部出現的新的有效需求。在国家方面，由于它通过租稅立法而占有了一部分的工人階級的购买力从而出现了新的需求，但是，现在国家所需要的，不是生活資料(在“第三者”的标题下，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我們现在不考虑国家官吏对生活資料的需要，这个需要也是从租稅中得到滿足的)，而是特殊种类的生产物，即海陆軍的軍火。

我們再以馬克思的积累的第二个图式为基础来考察社会再生产所起的变化：

$$\text{I. } 5000C + 1000V + 1000m = 7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430C + 285V + 285m = 2000 \text{ 消费资料}$$

假定由于間接稅及其所引起的生活資料的騰貴，整个工人階級縮減消費达实际工資的 100 个价值单位。劳动者还是和以前一样，得 $1000V + 285V = 1285V$ 的貨幣。但实际上，則只得到价值 1185 的生活資料，这 100 单位代表生活資料价格騰貴的貨幣額，它作为租稅轉入到国家手中了。此外，国家又以軍事稅形式向农民等征收了 150 单位，合計起来，国家共得到了 250。这 250 貨幣額就构成了新的需要，即軍需品的需要。不过，现在我們暂时只注意从工人工資中取得的 100 单位。为了滿足价值 100 的軍需品的需要起见，必須建立一个相应的生产部門。这个生产部門的有机构成，按照馬克思的图式所假定的平均有机构成，将为 71.5 的不变資本和 14.25 的可变資本：

$$71.5C + 14.25V + 14.25m = 100 \text{ 軍火}$$

对于这一生产部門的需要，必須更生产价值 71.5 的生产資料与价值約 13 的生活資料，因为这里工人的实际工資当然也降低了十三分之一。

然而，有人馬上会提出反駁：由这种新的需求的扩张所产生的資本利潤，不过是紙上的东西而已。因为，工人階級的实际消費減少，必然会导致生活資料生产的相应縮減。而这种縮減，在第二部类中，表现为如下的比例：

$$71.5C + 14.25V + 14.25m = 100$$

与上述情况相应的，生产資料部类的规模，亦将相应地縮減，这样一来，两部类由于工人階級的消費減少的結果，必将形成象下面的表式：

$$\text{I. } 4949C + 989.75V + 989.75m = 6928.5$$

$$\text{II. } 1358.5C + 270.75V + 270.75m = 1900$$

现在，这同样的 100 单位，通过国家的媒介，引起同样价值的軍需品生产；并相应地刺激生产資料的生产；但是，从表面上看来，那

不过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形态之外部变化而已；换言之，不过是以一定数量軍需品的生产，代替一定数量生活資料的生产而已，也就是資本用左手取得了从右手所失掉的东西。或者，我們也可以說：生产劳动大众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多数資本家，丧失了銷路；而一小撮制造軍火品的大工业家，获得了利益。

然而，只有从个别資本的观点来看，上述景象是正确的。根据这个观点，生产轉向这个或那个領域沒有任何区别。就个别資本家看来，象图式所区分的那样，总生产部类是不存在的。只有存在着商品和买主。因此，就个别資本家看来，他生产生活資料也好，或杀人工具也好；罐頭食品也好或者装甲鋼板也好，对于他是无所謂的。

对于这个观点，軍国主义的反对者常常掀起許多論爭：軍国主义的反对者想証明，作为經濟投資的軍备，就資本看来，不过是由某些資本家收夺来的利潤，轉給另一个資本家^①。另一方面，資本及其辯護士們，試图硬使工人階級接受这个观点，并向他們鼓吹說，間接稅及国家的需要，只不过造成再生产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不生产其他商品，而生产巡洋舰与大炮，工人們仍可获得同样好的生活，如果不是更好的話。

粗略的看一下图式，就可知对于工人們來說，这个論点如何缺乏真实性。为使容易比較起见，我們假定軍需工厂雇用的工人和以前生产工人階級的生活資料时所用的工人人数完全相同，其結果，

^① 例如曼篤依罗夫(Manuilov)教授，在他給伏隆佐夫的一件复信(这个答复当时受到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讚美)中写道：“此处应当把生产軍需品的企业家集团与資本家階級全体，加以严格的区别。就生产大炮、步槍及其他軍用品的制造业者看来，軍国主义的存在，无疑是有利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武装和平体系的废弃，对克魯伯公司來說，是意味着破产，那可能是很好的；然而，成为問題的并不是某个特殊的企业家集团，而是作为一个階級的資本家們，是整个資本主义生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租稅負担如果主要落在劳动人民大众身上，那么，这种負担愈大，則人民大众的購買力以及他們对商品的需要，也就愈减少。”这种事实，可以証明“軍国主义从軍备生产方面来看，确使某些資本家发财，但同时，它也損害一些資本家，一方面意味着收益，而另一方面意味着損失。”(“法学杂志”，圣彼得堡，1890年，第一册，“軍国主义与資本主义”。)

支出了相当于1285V的工資，而这笔錢只能买1185的生活資料。

从总資本的观点上看，則与此不同。对于总資本，在国家支配下，代表对軍需品的需要的100单位构成了新的市场。原来这笔貨幣額是可变資本，并且作为可变資本，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已經被用来与活劳动交换，借以生产剩余价值。此后，可变資本的流通就停止在这里，这笔錢被分离开来，归入国家手中，成为新的购买力。它仿佛是从虛无中产生的，然而它所起的影响等于一个新开的市场。不錯，这种資本，暫時减少了100单位的工人階級生活資料的銷路。就个别資本家而言，工人与其他資本家、国家、农民和“外国”等比較起来，是同样的消費者或商品的买主。但我們不能忘記对总資本而言，工人階級的給养，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只是一种达到生产真正目的（即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手段。如果对劳动力不給以同量的生活資料，而能够剝削其剩余价值，那样对老板是再好不过的。首先，間接稅产生同样的功效，好象資本家在生活資料的价格不变条件下，能够不减低劳动者的效率，而降低貨幣工資似的，因为工資的不断压低，結果同样会导致生活資料的縮減。如果工資压低了很多使工人生活資料的生产不得不减少，資本家对此倒不必耽心，毋宁說，在任何机会下，他都乐于这样做；同样的，如果由于征收間接稅而又沒有提高工資来抵銷間接稅的負担，工人階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縮減了，那么从总資本来看也不必因此而发愁。这看起来是奇怪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下，可变資本的差額流到国庫去，而在直接降低工資的时候，可变資本的差額，是留在資本家的錢袋中，在商品价格不变条件下，这会增加相对的剩余价值。但是，貨幣工資的普遍和繼續下降，尤其在职工会組織高度发达的场合下，是很难办到的。在資本的这种虔誠期望面前，存在着强烈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障碍。反之，通过間接稅来压低实际工資，是可以迅速、順利而普遍地实行的，而对于这种压低工資的抗議，多半是經過長時間之后，才会听到，而且反对者只限于政治領域內，不发生直接的經濟后果。这

样一来，以后生活资料生产的缩减，从总资本的观点上看，不是市场的缩小，而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成本节约了。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作为活劳动的再生产是必要的条件，但尽管如此，它决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

我們再看一看我們的例子：

$$\text{I. } 5000C + 1000C + 1000m = 7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430C + 285C + 285m = 2000 \text{ 消费资料}$$

初看起来，第二部类在生产工人的消费资料的过程中，也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而第一部类是通过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来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的，然而，我們一考查社会总生产物时这种错觉就消失了，它表现如下：

$$6430C + 1285V + 1285m = 9000$$

现在工人們的消费减少了100，两部类相应缩减的结果，再生产即发生如下的变化：

$$\text{I. } 4949C + 989.75V + 989.75m = 6928.5$$

$$\text{II. } 1358.5C + 270.75V + 270.75m = 1900$$

而社会的总生产物，则为：

$$6307.5C + 1260.5V + 1260.5m = 8828.5$$

粗看起来，这好象是表示生产总量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一般都缩减了，然而，这种说法，当我们只考虑在总生产物构成中的抽象价值量时，才能成立；对于其中的物质构成，它就不适用了。假如我們更详细的观察一下，即可判明只是劳动力的维持费实际上减少了。现在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的生产减少了，但它们除了维持工人外，没有其他功能。社会生产物减少了，較少量的资本被使用着，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越来越多的资本，而是生产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这里，资本之所以减少，是因为现在需要較少的资本就足够维持工人們了。在社会上被雇用的工人的全部维持费用，以前是1285，现在，总生产物中减少171.5(9000-8828.5)，这就必須从维持费內扣除出来。于是，我們就获得社会总生产物

构成的如下变化： $6430C + 1113.5V + 1285m = 8828.5$

不变資本与剩余价值，依然不变，只有社会的可变資本，即偿付的劳动减少了。或者如果我们不变資本不受影响这一点，有些怀疑，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正象在实践中发生的那样，随着工人生活資料的縮减，不变資本也相应的縮减。社会总生产物的公式如下：

$$6307.5C + 1236V + 1285m = 8828.5$$

在这两种场合，不管总生产物如何减少，剩余价值依然不变，只有工人的維持費用下降了。

这种事实也可以这样来说明：社会总生产物的价值，可分为三个部分：社会总不变資本、总可变資本和总剩余价值，其第一部分，不包含追加的劳动，第二及第三部分，則不包含生产資料。至于它們的物质形态，所有这些生产物都是在规定的生产期內出现的，虽然以价值而言，不变資本是在前一期生产的，而轉移到新生产物中去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全部雇用的工人也分为三类：专门制造社会总不变資本的，专以提供工人們全部維持費用的，最后，为資本家阶级創造剩余价值的。

因此，如果工人們的消費减少了，只是第二类的工人将受到失业。根据假定，这些工人，最初就沒有为資本創造剩余价值，因此，他們的解雇，从資本的观点上說，并非什么損失，而是得到了利益，因为它降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成本。

反之，在国家方面同时发生的需求，对于实现剩余价值提供了新的诱人的領域。参加可变資本流通的一部分貨幣額，脱离了流通，流入国庫便成为一个新的需求。当然，对于租稅的技术而言，事情发生的次序稍有不同，因为，間接稅的总額，事实上，是由資本預垫給国家的，而在商品銷售之时，在消費品价格上，由消費者再归还給資本家的。但从經濟方面看，这没有什么差別。关键在于：这笔具有可变資本职能的貨幣額必須首先作为資本与劳动力的交換媒介。其后，工人与資本家間作为商品的买卖两方而进

行交换时，这笔货币当作租税，从劳动者手中移入国家之手。作为资本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额，首先在与劳动力交换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其后，在国家的参与下，它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事业，即是说，作为一个既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劳动力的新的购买力，它对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新产品发生兴趣，而这个生产部门既非为工人阶级，也非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因此，它对资本提供了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新的机会。以前，当我们认为从工人勒索到的间接税，必然用来支付官吏薪给及军队给养时，我们会看出工人阶级在消费上的“节约”意味着工人们而不是资本家们被迫支付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的个人消费和阶级统治工具的费用。这个负担从剩余价值转移到可变资本；同时，也出现了相应数量的剩余价值供资本化之用。现在，我们看到把勒索工人所得的租税，用之于军需品生产时，它对资本提供了积累的新的机会。

实际上，军国主义是以间接税为基础，向两方面发生作用。即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正常的生活条件，它保证一方面资本能够维持常备军，即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广大领域^①。

我们现在转而看一看在我们例子中所提到的国家购买力的第二源泉，即投入军需品总额250之中的150单位。这150，与迄今为止所考察的100，有本质上的差别。它不是发源于工人，而是发源于小资产阶级，即农民与手工业者，（在这里资产阶级对租税的小额负担额，我们可以暂时不管）。

由农民大众——此处把农民当作非无产阶级消费者的总称——以租税形式支付给国家的货币额，最初并不是由资本预垫的，也不是从资本的流通中脱离出来的。在农民手中时，它是已实现的

^① 最后，劳动力更新的正常条件的退化，其结果将使劳动力本身退化，劳动平均强度及生产率缩减，从而，也危害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但是，资本将长时期感觉不到这些后果，因此除了当这些后果引起一般工资劳动者的更激烈的自卫办法时外，它们在目前不在资本的经济考虑之内。

商品的等价物，即简单商品生产的交换价值。此处移轉給国家的，是非資本家的消費者的购买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这部分购买力已經可以供实现剩余价值之用，借以进行資本主义积累。問題在于这一阶层的购买力，因軍国主义的目的而移轉給国家的結果，是否对資本引起經濟上的变动？如果引起来了，那么，又是怎样一种变动？粗看起来，这里的问题，也是再生产的物质形态上发生变化的問題。資本不是去生产农村消費者用的大量生活資料及生产資料，而是去生产国家所需的同一价值額的軍用品。事实上，这种变化还要深入一步。首先，通过課稅机构，国家所能够动员非資本家消費者的购买力較之他們通常用之于自己消費的购买力还要多些。

最初把商品經濟强加农民身上的，大家都知道正是近代的租稅制度。在租稅的压迫下，农民必須把更多部分的生产物变为商品；同时，又須买入更多的东西，租稅把农民經濟的生产物投入流通；并强迫农民成为資本主义生产物的买主。最后，在农民式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租稅制度从农民經濟中誘出的购买力比原来所能活动的要更多一些。农民和下层中产階級在正常情况下所貯藏起来以待数目增大后再存入儲蓄銀行或其他銀行的款子，现在被释放出来形成一个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投資的机会。再者，为数众多的个人的細小的对种类繁多的商品的需求——这些需求通常在不同時間出现，并且可以通过简单商品生产来满足的——现时为广泛的、性質相同的国家需求所代替了，但是，这个国家需求的滿足，是以高度水平的大工业为前提。它要求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具备有利的条件。在国家軍事定貨的形式下，消費者的分散的购买力大量集中起来，它不受个人消費的任意选择和主观变动的影響。它的活动达到了几乎自动化的有規則的程度，它的成长是有节奏的。資本最后借助于立法和制造輿論的新聞界，控制了軍需生产的这种自动的和有节奏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資本主义积累的这个特殊領域最初似乎拥有无限广大的能力。其他一切为資本扩大市场和建立活动基地的企图是依存于在資本控制之外

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而軍需生产代表这样一个领域：它的有规则的累进的扩大，似乎主要是决定于資本本身。

这样，資本把历史的必然性变为一个有利因素：即資本主义世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头等容量的积累领域，資本越来越多的利用軍国主义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补充借以占有非資本主义国家和非資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資料和劳动力。这种軍国主义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同样地产生作用，那就是把购买力从非資本阶层轉移出来。这样，简单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和工人阶级受到同样的影响。换言之，以他們为牺牲，通过掠夺前者的生产力和压低后者的生活水平，資本积累被提高到最大的限度。不待煩言，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資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們变为資本沒落的条件了。

資本通过軍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資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資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連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瘟疫，在这样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經濟灾禍或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資本自己創造的經濟絕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資本的統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

資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經濟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驅逐其他一切經濟形态，以及不容許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經濟形态，它需要其他經濟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潰，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資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沒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們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質，是一个和諧的、普遍的經濟形态。

譯 後 記

露莎·卢森堡所著“資本积累論”一书现已譯成中文在我国出版。为了帮助讀者了解这本书起见，我們在这里利用最后几頁的篇幅，把著者的生平、本书的基本內容，以及我們翻譯本书的經過，作一簡單的說明。

* * *

露莎·卢森堡(1871—1919年)是近代德国工人运动和波兰工人运动的一个杰出的活动家^①。她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資產階級犹太家庭。她于中学毕业后，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为了避免沙皇警察的追捕，她逃亡到瑞士，在苏黎支讀毕了大学，并写了一篇以“波兰的工业发展”为題的博士論文。

卢森堡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創始人之一(1893年)。她为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而斗争，但在这个斗争中，她不适当地采取了否定民族自决的态度，以致在事实上等于支持了大国沙文主义。

1897年，卢森堡移居德国。她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这个組織是在九十年代由馬克思主义者从波兰民族主义政党中分化出来的)的领导人之一，同时，她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九十年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中，卢森堡是批判伯恩斯坦的健将之一。她以她特有的革命热情，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但她不懂得对机会主义不仅要在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在組織上划清界线。因此，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

^① 这里所述的卢森堡生平事蹟，主要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5卷，第545—547頁。

展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斗争时，卢森堡甚至站到孟什维克一边去了。

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卢森堡产生巨大的影响。她热烈地拥护群众性罢工运动，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方式。但她还不能正确估量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推动力量。她和巴乌斯起草了半孟什维克的不断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特点是否定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后来，这个不断革命纲领被托洛茨基所利用，成为反对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了。

为了亲自参加俄国革命，卢森堡于1905年12月秘密来到华沙。她于1906年3月4日被捕。她在狱中患病，1906年6月被交保释放。一个月后，她从华沙出走。她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反革命性质作了充分的估计。在1907年斯图加特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她和列宁一起，对阿·倍倍尔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改的意见，主张工人阶级如果阻止战争无效，应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使群众革命化，并推翻资本主义。代表大会采纳了这些修改的意见。

在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前，卢森堡在德国进行革命工作。她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以及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分子。她主张在德国，应效法俄国的革命，采取在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如示威游行、群众性罢工等。

但是卢森堡的半孟什维克错误，特别在对党的作用的想法上，使得她在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后，站在取消派一边，而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她与德国的左派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中间的领导人的叛变行为。1915年3月，她在德国被捕。她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危机”，在“尤利乌斯”的化名下，于1916年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任务是粉碎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沙文主义者关于这次战争具有

民族解放性質的謊言，并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叛变行为。这本书冲破了德国容克統治集团的严密控制而出现，对德国革命运动起了鼓舞作用。列宁看到这本小册子后，也感到兴奋，但他指出在这本小册子中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錯誤，所以，列宁認為尤利烏斯沒有完全从德国环境，甚至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解放出来，她害怕分裂，害怕无保留地把革命口号提出来^①。

1916年1月底，卢森堡从獄中被释放出来。早在1916年初，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斯巴达克团”，其领导人为李卜克内西、蔡特金、梅林格、卢森堡等。卢森堡出獄后和李卜克内西在德国进行有力的革命活动，包括在各地組織示威游行。1916年7月10日，卢森堡再度被捕，差不多直至1918年11月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前，一直被关在獄中。

卢森堡出獄后，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她过去的大部分錯誤，得到了糾正。她和李卜克内西领导德国的左派进行独立政党的組織。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成立了，但卢森堡在成立大会上所报告的綱領中，仍表现了自发論的影响，对革命政党的作用估計不足，对中农当作反革命力量的孟什維克看法等等的缺点。但德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事实不仅对德国无产阶级，而且对所有国际工人革命运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德国反动陣营方面对这两人的疯狂的仇恨。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工人的1月战斗失敗后，右派社会党人，勾結了軍人小集团，布置了对德国共产党領袖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野蛮的屠杀。卢森堡就这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牺牲了。

尽管卢森堡在革命理論上和革命实践上曾犯过不少錯誤，她的始終不渝地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仍值得我們的追怀和景仰。列宁說得好：“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問題上曾經犯过錯誤；她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22卷，第291—305頁。

于1903年在对孟什維主义的估計上曾經犯过錯誤；她在資本积累的理論上曾經犯过錯誤；她于1914年7月和普列汉諾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并肩拥护布尔什維克与孟什維克联合而曾經犯过錯誤；她在其1918年獄中的写作上曾經犯过錯誤（并且她本人于1918年末和1919年初出獄后曾糾正了自己錯誤的大部分）。可是，虽然她犯过这些錯誤，但她曾經是只鷹，而且现在仍然是只鷹；不仅关于她的紀念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将永远是宝贵的，而且她的傳記和她的全集都将成为教育全世界許多代共产党人的最有益的教訓……‘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一具发臭的尸体了’。——卢森堡以这句名言而使她的名字留传在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上”^①。

* * *

我們知道，卢森堡不仅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而且也致力于理論問題的研究。“資本积累論”是她的一本最主要的著作。这本书是在1912年以德文出版的。在这本著作中，卢森堡以馬克思再生产理論为中心，討論了資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問題。在这問題上，她也表现了她的半孟什維克观点。她提出了在积累条件下，剩余价值如何实现的問題。她認為按照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要实现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两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必須有在两部类以外的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据卢森堡看来，在資本主义生产的两部类以外的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在非資本主义領域（即农民和手工业經濟）中产生的。因此，卢森堡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有一个非資本主义經濟形态的环境，資本主义需要非資本主义阶层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部分生产資料的供应来源，和劳动力的后备源泉。卢森堡用这个理論來說明資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爭夺殖民地和對不发达国家的控制权，为什么要实行保护关税来防止外国商品侵入國內的非資本主义市

^① 列宁：“政論家札記”，人民出版社版，第9頁。

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军国主义对于轉移非资本主义阶层的购买力、帮助資本积累方面所起的作用。但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却迅速地消灭这些非资本主义領域，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經濟的一部分。因此，根据卢森堡的理論，当世界上所有非资本主义領域在资本主义侵蝕下而完全消失时，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无法进行，到了那时，资本主义的末日就降临了。所以，卢森堡說：“它(资本主义)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經濟形态，它需要其他經濟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潰，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由此可知，从卢森堡的資本积累理論所得出的邏輯結論，是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潰論。这个結論对于无产階級革命运动是有害的，因为它对主观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无产階級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階級政党的領導作用，沒有充分估計进去。

从理論上看，卢森堡的分析也是站不住的。首先，在剩余价值的实现問題上，卢森堡不是不知道列宁对于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的批判意見^①，同时，她也并不滿意于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的看法，但她在实质上沒有从这个錯誤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其次，她对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論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尽管她很推崇馬克思在再生产理論上的不朽貢獻，她对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却加以沒有根据的非难。据她看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所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似乎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实现产品上是沒有困难的。这两部类的資本家在进行扩大再生产时，可以相互找到自己产品的买主，因而可以把这两部类的生产无限制地扩大下去。因此，卢森堡硬說馬克思的

^① 列宁批判剩余价值实现問題的主要論点，見他所写的“評經濟浪漫主义”一文和“俄国資本主义底发展”一書。“評經濟浪漫主义”一文編入弗拉基米尔·伊林“經濟論文集”，于1898年出版；“俄国資本主义底发展”的初版于1899年出版。卢森堡在本書中，曾屢次引用列宁在“評經濟浪漫主义”一文中語，但沒有提到过“俄国資本主义底发展”一書，不知何故。

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第二圖式與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分配條件下生產力的無限制擴大能力和有限的社會消費能力間的內在矛盾（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第二十五章第一節）相抵觸的。實際上，盧森堡完全誤解了馬克思擴大再生產圖式的真正含義。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只是說明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社會總資本運動的條件和規律性，它並不企圖證明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能夠經常順利地、毫無間斷地進行下去。馬克思在闡述促使交易和再生產（不問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正常進行的條件時，曾特別指出：“這些條件會變為同樣多的使再生產的進行不正常的條件，會變為同樣多的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發性的情況下，均衡本身是一種偶然的現象^①。可見盧森堡在這個問題上對馬克思的責難是完全無的放矢。第三，盧森堡在自己的推理上，也有許多混亂和錯誤。為了要把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因素考慮進去，她修改了馬克思擴大再生產圖式中的數字從而“證明”了在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下，似乎在馬克思的圖式中，就發生了生產資料不足和消費資料過剩的現象（見本書第二十五章）。她根本不知道，假設的數字是不能證明任何問題的，而在她的那個“證明”中，毛病不在於馬克思的圖式，而在於她所任意選擇的數字。她也不了解，如果剩餘價值的實現確有困難，她的“非資本主義領域”也同樣不能解決問題。她批評俄國民粹派把國外貿易作為實現剩餘價值的出路時，曾說：這只是“把在分析中所包含的困難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去，而沒有解決問題”。既然在商品交換中，有賣必須有買，不能只銷售而不購入，我們要問：盧森堡的“非資本主義領域”理論是不是也只不过把困難從資本主義領域轉移到“非資本主義領域”呢？

最後，盧森堡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也是不正確的。她沒有把帝國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而把它說成是資本主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62頁。

义国家争夺世界上剩余的“非资本主义领域”的政策表现（见本书第三十一章）。这样理解帝国主义，实质上，与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没有多大的区别。而大家知道，考茨基的定义已被列宁加以严厉的驳斥了。

* * *

尽管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的主要论点是不正确的，但我们觉得现时还值得把这本二十世纪初曾在欧洲流行的名著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问题确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卢森堡的理论虽然基本上是错误的，但她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考虑。真理愈辩愈明，她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误解以及她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正好推动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辨明是非，我们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理论，一定会理解得更透彻些，掌握得更牢固些。

著者在本书中不仅阐明自己的论点，而且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能否顺利地无限发展下去的问题的论战。她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如萨伊、麦克洛克、直至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或则加以猛烈的攻击，或则加以尖锐的讽刺。另一方面，她对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怀疑论”者自西斯蒙第起直至俄国民粹派为止，也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和反科学性。她对这些“学者”的评价可能不完全正确，而且由于她所注意的只是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问题，所以，她对他们的批判也可能不够全面。但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对十九世纪初以来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如何一脉相承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获得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这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论战线上对迄今流传不绝的“资本主义永久繁荣”，予以更有力的打击。

著者还引用了丰富的史实，有声有色地描绘了近代资本主义



破坏殖民地与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过程。在目前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高潮中，本书所提供的关于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许多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实，特别是关于英法资本掠夺埃及和法国资本掠夺埃塞俄比亚的材料，是具有现实的意义的。书中还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侵华的许多史实，这也值得我们的注意。

此外，在我们研究近代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时，这本书也将帮助我们了解这位无产阶级卓越战士的思想认识，她的长处和短处。

* * *

我们翻译这本书时，根据了下列三种版本：（1）德文原版：“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Paul Singer d Co., Berlin, 1912年版；（2）日译本：益田丰彦和高山洋吉合译：“资本蓄积论”，东京同人社书店，昭和三年第二版；（3）英译本：Agnes Schwarzschild译：“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伦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1年版。

卢森堡的原书于1912年出版后，曾受到德国和奥国的舆论的批评。这些批评的主要攻击目标，倒不是她的经济理论，而是她的革命结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卢森堡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对批评的答复。这篇答复在帝国主义大战结束后，曾以“资本的积累，或马克思的后代所见到的马克思理论”为题在德国出版。在这篇答复中，卢森堡对她的理论重新作了一个简练的表述。遗憾得很，我们在国内没有找到这本小册子，所以，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与本书一并出版。

我们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由于其他任务的紧迫，感到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对译文作必要的修饰。同时，又以工作关系，我们俩人后来又分居两地，所以，在校阅译稿时，又不免发生了一些困难。我们现在诚恳地希望读者对我们的译文多多予以指正。

译者

1958年7月8日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再生产问题

第一章 我们研究的目的

第二章 魁奈和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第三章 对于亚当·斯密分析的批判

第四章 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

第五章 货币的流通

第六章 扩大再生产

第七章 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

第八章 马克思对解决这个困难的尝试

第九章 从流通过程角度看这个困难

第二编 本问题的历史发展

第一回论战 西斯蒙第 - 马尔萨斯对萨伊 - - 里嘉图 - - 麦克洛克

第十章 西斯蒙第的再生产论

第十一章 麦克洛克对西斯蒙第

第十二章 里嘉图对西斯蒙第

第十三章 萨伊对西斯蒙第

第十四章 马尔萨斯

第二回论战 洛贝尔图对吉尔希曼

第十五章 吉尔希曼的再生产理论

第十六章 洛贝尔图对古典学派的批判

第十七章 洛贝尔图对再生产的分析

第三回论战 司徒卢威 - 布尔加科夫 -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对伏隆左夫 - 尼古拉·昂

第十八章 问题的新提法

第十九章 伏隆左夫及其“过剩”论

第二十章 尼古拉·昂

第二十一章 司徒卢威的“第三者”和“世界三大帝国”

第二十二章 布尔加科夫及其对马克思分析的补充

第二十三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及其“不平衡”论

第二十四章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第三编 积累的历史诸条件

第二十五章 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矛盾

第二十六章 资本的再生产及其社会环境

第二十七章 对自然经济的斗争

第二十八章 商品经济的侵入

第二十九章 对农民经济的斗争

第三十章 国际借款

第三十一章 保护关税与积累

第三十二章 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

译后记